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英）威利斯（Willis,P.）著；秘舒，凌旻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2（2013.4重印）

（人文與社會譯叢／劉東主編）

書名原文：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ISBN 978-7-5447-3176-8

I．①學…　II．①威…②秘…③凌…　III．①無產階級—研究—英國②社會結構—研究—英國　Ⅳ．①D756.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89721號

Learning to Labour by Paul Willis

Copyright © 1977 by Paul Willis

This translation of Learning to Labour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08-367號

書　　　名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

作　　　者　［英國］保羅·威利斯

譯　　　者　秘　舒　凌旻華

責任編輯　　許　昆

原文出版　　Ashgate Publishing, 1993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譯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電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網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張　11.5

字　　　數　288千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2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7-3176-8

定　　　價　39.00元

譯林版圖書若有印裝錯誤可向出版社調換

（電話：025—83658316）

目录

[中文版前言 4](#_Toc69226470)

[“茂寧賽德”版前言 9](#_Toc69226471)

[前　言 12](#_Toc69226472)

[致　謝 13](#_Toc69226473)

[筆錄符號說明 14](#_Toc69226474)

[序　言 16](#_Toc69226475)

[第一部分　民族志 20](#_Toc69226476)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21](#_Toc69226477)

[抵制權威，擯棄教條 21](#_Toc69226478)

[非正式群體 28](#_Toc69226479)

[打盹、哄騙和逃學 31](#_Toc69226480)

[“找樂子” 33](#_Toc69226481)

[無聊與刺激 36](#_Toc69226482)

[性別歧視 42](#_Toc69226483)

[種族歧視 45](#_Toc69226484)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47](#_Toc69226485)

[階級形式 47](#_Toc69226486)

[制度形式 50](#_Toc69226487)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和制度 66](#_Toc69226488)

[官方準備 66](#_Toc69226489)

[連續性 69](#_Toc69226490)

[職業 72](#_Toc69226491)

[上崗 76](#_Toc69226492)

[第二部分　分析 84](#_Toc69226493)

[第四章　洞察 85](#_Toc69226494)

[分析之要素 85](#_Toc69226495)

[洞察 88](#_Toc69226496)

[第五章　局限 94](#_Toc69226497)

[分工 95](#_Toc69226498)

[勞動力與父權制 96](#_Toc69226499)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99](#_Toc69226500)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100](#_Toc69226501)

[證實 101](#_Toc69226502)

[擾亂 102](#_Toc69226503)

[內部對話者 104](#_Toc69226504)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注解 106](#_Toc69226505)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109](#_Toc69226506)

[第八章　周一清晨與千禧年 111](#_Toc69226507)

[補充訪談 124](#_Toc69226508)

[“茂寧賽德”版后記 129](#_Toc69226509)

[中心與邊緣：保羅·威利斯訪談［1］ 141](#_Toc69226510)

[索　引 158](#_Toc69226511)

[譯后記 166](#_Toc69226512)

# 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謝譯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華兩位譯者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讀者面前。中國正經歷著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歷史性跨紀元變化，文藝科學界正摩拳擦掌準備迎接全新的挑戰，以試圖理解“中國的重大轉型”，我的書能在這個時機被譯介到中國，真是我的榮幸。非常感謝！

我從未到過中國。與其直接討論令我神迷但我又知之甚少的中國現狀，還不如借這個前言來概述一下《學做工》的一些主題和重點，這可能對你們——我親愛的中國讀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經歷的時刻最為有用。我沒有從某一特定學科，如教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人類學的角度出發來進行概述，而是秉著一種多學科或者后學科時代的精神。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對我所選擇的方法論的活力和未來至關重要；《學做工》正是使用這種方法的例證，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實踐。我和馬茨·特朗德曼共同創辦、編輯的《民族志》（Ethnography）學術雜志[［1］](#_1_183)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學科的邊界，尤其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邊界。在我內心，我希望鼓勵中國的研究者，特別是博士研究生，跨越學科界限，并擔當起重塑民族志這一艱巨而美好的任務，將大多數人接受國家公共學校教育時的經歷和文化描繪出來，而這些經歷和文化通常是隱形的。

文化與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國的民族志學者能重新審視“文化”這一備受爭議的術語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特定環境中創造意義的各種實踐，而不能被簡化為對其他事物的反映，如個體心理、話語或經濟。它自成一體。對文化實踐和過程，尤其是社會底層空間的文化實踐和過程的重視，引發了一系列簡單但具有革命性的問題：“什么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這個世界在他們看來是怎么樣的？”“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掌權者對他們所做與所說的？”“他們是如何引導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的？”嘗試回答這些問題最終將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論。若要復原底層被統治群體及他們的人性，學者必須和他們一起，在共處和互動的過程中以開放、人性的態度去理解他們。

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文化的特性在于社會能動者“意義創造”的積極過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處境，包括經濟地位、社會關系以及為維護尊嚴、尋求發展和成為真正的人而構建的認同和策略的過程中。

意義創造的文化實踐并非在抽象中運作，也不是無中生有地變出意義來。它們不是在個體大腦中或大腦間流動的電流。“意義創造”源于象征性的物質、過程和行為。就像勞動過程中的物質生產一樣，文化層面也有生產過程，即文化生產，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從事感官上的實踐，用象征性的原始資料生產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滿足有用的人類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產品”是意義和表達，它們不僅自身具有價值，同時對人類理解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也多少有用。

我認為，文化生產的文化實踐，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們的生存狀態，從而從他們的角度決斷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動，以及可提供的制約和條件。洞察這一概念試圖在分析的某一時刻捕捉到文化生產的推動力，從而揭示文化所依賴的，及定位文化的結構元素。這些“洞見”嵌在他們的“民間”知識、實際“常識”和“將就”使用的意義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現行的文化形式對于后學科批判性民族志學者來說格外重要，這并非因為它們保留了一套奇怪的習俗，或者實體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為學和歷史學記錄下來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包含了對自身生存狀態而言至關重要的、身體力行的洞見。它們是解決問題的實際、生動、就地的方法。如果對一個現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記錄感興趣，那么就必須在認識論上取得某種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種馬克思主義或者后結構主義，那么你就不必煩心去做田野調查。如果你相信關于孩子們所作所為的制度性或意識形態上的解釋，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調查。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就是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對象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處境的，而這些方式無法被預知，甚至還可能“令你驚訝”。這種文化是如何為自身處境建構意義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種意義建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是如何認識到有可能出現一種由行動者根據自身處境創造出的中斷、差異、地方性知識的，這些對于外界而言，無論是在官方的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還是在商業的層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過反學校文化的調解，《學做工》一書中研究的“家伙們”洞察了學校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的群體邏輯認為證書和考試永遠不可能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他們并不幻想“事業”發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環境中付出自己的勞動力，判斷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來自于被支配地位的雙重侮辱：一種是真實的，一種是意識形態上的。他們釋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場：樂趣、娛樂、“找樂子”。

文化生產過程的“原材料”以及隨之而來的洞察以各種形式出現：可塑的、口頭的、文本的、音樂的；它們的來源亦紛繁復雜：歷史的和當代的、本土的和舶來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我們不應低估歷史文本中的“珍寶”、口述史的資源，以及老一代傳下來的建議。意識形態的敘述和文本也發揮了一定作用。雖然很多文化生產中使用的象征性資源仍未被社會科學分類命名，但它們卻是對記錄真實生活的民族志的補充。在性、性別、種族、民族、年齡等常見類別中，經由社會傳承而形成的特定傳統和延續至關重要。它們在把其他各種象征材料組織起來的同時，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征意義。[［2］](#_2_178)由于它們服從于文化生產的作用，因此所有這些資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態，被放入產生新型混合形式的接合中。資源如何被組合，通過何種實踐、出于何種目的被組合，對于這些問題的追問極具民族志意味。

關于文化層面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理解”結構位置的過程不僅“揭示”了過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促成了過程的再生產，提供維護和再生產它們（依據權力組織起來的位置和關系）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家伙們”的案例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洞察的形式恰恰也為他們進入下層經濟結構做好了準備。如果他們的洞察直截了當、真實無誤，那么他們就不必承受那諷刺性的社會再生產的狹隘恥辱了。他們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會解放。

除了與對抗、洞察學校要求高度相關外，反學校文化中的反智態度也成為了“家伙們”的第二天性，并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以及之后的很長時期內，對他們的形體風格、態度和價值觀起導向作用。這個模式驅使他們終其一生朝向某種經文化調解、經驗感受形式的意義創造發展。危險的是，這種反智態度使得整個世界被分為兩派：腦力的和體力的。對各個階層的處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象可能看起來無謂而遙遠，這種想象不能用體力來觸及、解決或理解。更為實際的是，所有需要動用腦力的工作，不論是在現在還是將來，看似都只是無聊的文書工作——“誰想整天被紙張文件所包圍？”這使得“再次”回到校園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變得更加困難和不可能。“家伙們”的反智主義使他們以及和他們相似的群體向體力工作妥協，一輩子在沒有前途的工作之間換來換去——英國現在有很多長期失業甚至永久性失業的案例。

我們從民族志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結構，正是由于舊事物的更新和變革具有連續性、波動的穩定性和辯證性。因此，民族志的關鍵問題不僅僅關乎文化實踐到底在“理解”結構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關乎同樣是這些實踐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諷刺性地維護了那些既有的權力關系和利益。這些問題也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廣泛意義的政治問題：在未來這些相互關聯的關系循環中，這一平衡如何轉變成被統治者的優勢，在何種條件下對文化生產的洞察可能轉化為政治意識和實踐，并被動員起來中斷社會再生產，而不是反過來強化它。

理論上的不確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簡化還原的理論：徹底的不確定性對民族志觀點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許產生主體創造力和選擇的不確定主觀因素。對于宏觀理論家來說，這些可能僅僅是以一些范例來“解釋”的幻覺，而這些范例只是證明了他們認為本該存在的事情，毫無“驚訝”可談。一些簡單、開放、具有生成力的機制（創造性、洞察、再生產）在結局各不相同的群體中反復出現，如果我們對此予以理論關注，那么就足以涵蓋各種可察覺的結果——這些結果會激怒那些坐在搖椅上的理論家，使他們生產出更復雜的理論，也會讓民族志學者心懷訝異地走進田野。

我主張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意識形態的概念進行嚴格限定，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意義來自于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們的主觀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馬克思主義觀點截然相反。如果你愿意，意識形態也能反方向流動，被壓制的主體和受壓制的地位也能通過他們的文化形式享用認知上的資源，從而在意識形態上尋求異議，或者根據受壓迫者的利益或視角、用某種不同的方式進行重新闡述。

我所主張的觀點有悖于后結構主義的很多觀點。盡管在某些方面，《學做工》與后結構主義都先見性地對象征性表達的生產和再生產感興趣。但是，對我來說，這些象征性表達是以一種鮮活、主動的方式被創造出來的，而非以內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觀察客體和人工制品的功能，以及話語的關聯，并對它們新的表達抱以“好奇之心”——我們關注的不是表達的書面形式，而是在歷史的世俗背景、在具體情境中，表達是如何通過實踐，以一種生動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動搖和擾亂的。交叉，顛倒，出人意料的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當的情境中做出不恰當的夸張，在兩個極端間轉變，監督他人發表特定話語的影響，以及在那種情形下的重組和重新排序——所有這些以實踐為基礎的對話語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題材，都能生產出不同的內容、意義和思想，這些都懸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間常常難以把握、永遠無法知曉的關系。這樣制造出來的意義不能被統治關系或是任何處于支配地位的話語的內容和“主體位置”所同化。此處可能是“人本主義”民族志實踐和“反人本主義”的后結構主義之間無法實現合作的領域。但是，民族志必須把具體情境中的文化生產實踐視為最重要事物。實踐使所有象征資源屈服，盡管這些資源可能正頑強地遵循內部“語法”來展現某種為了實現社會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現它們特有的內部腳本。那些被抽象探討，即使是被在混合關系中探討的孤立的話語，通常會有明顯的參照，并與腦體分工含蓄地勾結在一起。腦體分工描述了對腦力勞動的建構和表現，是與實踐的關鍵結合，也正是這種實踐，使被支配群體與眾不同。歸根結底，民族志就是要關注那些行動的主體及他們的“驚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種推論。沒有民族志這個后盾，后結構主義就只能在人類主體缺席的情況下主張多樣性和創造性。我完全意在展示主體在形成象征體系時的復雜性和變化性，但是盡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類社會主體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時是足夠成熟的。

這并非在為本質主義的人本主義辯護。意義的創造、自我的意義和自我認同并不能自動地、富于表現力地從人類自身之中生發出來。洞察亦非完全形成于先在的統一主體。當人們以某種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條件、按自己的潛能和目標而追求自身完全發展的時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無預見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隨意發生了。“認同”并不先于此而存在，而是在實踐中形成并重塑。在《學做工》一書中，“家伙們”洞察、探索和展示結構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構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話語參照。被支配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往往“無意識地”展示了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礙于他們從屬的歷史位置和關系，工人階級和底層行動者無法產生自身所必需的、自決的、“純粹”且“表現階級”的文化。他們借助于各種話語和“已建立”的象征資源發揮作用，并通過實踐那些令人驚訝的潛能、事先無法想象的“雙重”意義來展示自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意義早已存在，當然也沒有留下“工人階級文化”著作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強加的條件、掙扎求生的時候，現存的文化才能從根本上古怪地、間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會結構的各層面。例如，面對學校時，“家伙們”的直接目標不是繼續搞階級斗爭，而是尋求樂趣、轉變、“找樂子”，并向所有他們不喜歡的人或是學校具體制度中的種種限定提出挑戰。他們不想成為課堂中的出色學生，而是想成為好“哥們兒”。在那樣的追求中，對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生動洞察”與勞動力的本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得以實現。然而，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啟示，無法被口頭表達出來，幾乎只能作為文化所依賴的隱性前提來分析——這就是其成員就自身而言，對世界如何運作所作出的無意識假設。

無論通過何種隱蔽的邏輯過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于確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愿意，它們就會因與它們的因果關系的隨意性截然不同的緣故，在實踐中被擴展并不斷地被“再選擇”。它們“標志”著文化不僅產生社會有效性，也產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較之于那些特定社會條件的、可獲得的文化選擇或官方選擇，它們也有助于人們做出更好的“理解”——通過認同和實踐的可行性，營造心理和真實的空間。這種“標記”亦使他們更有可能被攻擊為社會的對抗力量，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和社會偏見，從而進一步強化他們獨特文化實踐的防御性，并且由于某種自我懲罰而更加封閉和自我壓抑。

性別

性別關系、男女分工與其他分工之間的關系，是《學做工》一書的核心。這可以被視為本書最主要的“科學”發現之一，即性別類別與資本主義類別——特別是腦體分工——的意義重合并改變了資本主義類別，而腦體分工反過來又限定了性別形式的意涵。本書所描述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種必要方式，形成于那些工人階級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確切地講，這是一種建構的產物，一種與勞動力的獨特分工、腦體分工、獨特的國家構成相關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氣概。對于“家伙們”來說，男性氣概可以就他們認為自己所面臨的緊迫問題發揮作用，因此男性氣概在階級的情景下被調動起來。男性氣概的象征結構有助于體現“家伙們”對學校的反抗，并且為這種反抗注入額外的力量。男性氣概賦予“家伙們”駕馭女性的軸心力，但是也給予他們某種感受的現實基礎，至少是一種較之于其他明顯更為成功的男性——如老師和“書呆子”（循規生）—的模糊優越感。這種反應具有明確的邏輯，對反抗學校企圖實施的控制極為有效，而且它也為自我評價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非腦力的依據，為抵抗他人對自己的貶低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有時候極強大的表現。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實踐先于性別和階級的組合，因而真實的社會效應便隨之而來。一旦形成，那“強硬”或“粗暴”的男性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定型化的社會關系，會被證明是極為不可改變、難以駕馭和持久的。自此以后，無論形勢如何，男性氣概及其反映都會有助于組織同一整套防御性／進攻性反應。此外，在學校中形成的反智主義和“家伙們”的男性氣概與自我意識、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對于“家伙們”而言，體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種男子漢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則是女性化的。這些性別化的關聯彼此強化又互相鎖定，于是造就了一種性情和敏感，毫不夸張地說，這種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續一生。對于“家伙們”來說，在他們注定的從屬命運中，腦力勞動不但成了毫無疑義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們”的觀點，即使是高薪的腦力工作仍被視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費體力、受剝削、薪水極低的體力工作卻被視為男性氣概的表現，其野蠻本質也得以掩飾。

英國的情況仍然如此：學生被強制性地禁錮在學校這個非自然的環境中。在學校里，壓力將不同的社會和象征關系拼湊在一起，全然不考慮個體在心理上如何掙扎求生，而這些個體歷經苦難，將周圍的象征性資源積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種切實可行的文化認同，尤其是將性別作為像防彈衣一樣的防御機制——這就為那些與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階級男性積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煩。但是，這無一處于歷史或經濟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環境中，所有這些組合都可以按不同順序加以安排。這就開啟了一種偶然性的文化政治。

中國的社會變化

中國的物質條件與社會條件正在發生著巨變。你將面臨一個令人不知所措的嶄新世界，這個世界充滿對立影響，舊世界的深重危機與新世界的動蕩不安交織在一起。在現在這種新形勢下，這種必然性要通過何種文化中介才能與自發性聯結在一起呢？盡管我對中國形勢并無直接了解，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實踐為理解人類所展示的這幅歷史巨卷提供了依據。在最低限度上，而且作為一種先決條件，批判性民族志強調能動性，并且一貫堅持從屬群體在生產他們的特有文化和理解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民族志學者總是不加修飾地發問：什么是下層階級創造的意義？翻天覆地的宏變往往被視為被動的過程，并被上層以動名詞加以描述——沒有人，沒有行動主體真正為此承擔責任。全球化？誰人使然？誰人為此遭受苦難？誰又理會那愚蠢的全球化呢？裁員——沒有人在解雇誰，這僅僅是一個過程——沒有人知曉它源于何處。重組？“啊！是呀，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現代條件。”那里沒有能動性，它只是“發生”。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觀點。危急而又緊迫的是，人們需要一種來自底層的“實踐感”。

民族志進一步提醒我們：真正的社會能動者同時生活在上述那樣的生存空間之中——“空間”中的錯位與社會重組、經濟轉型，以及試圖牢牢控制、指導社會變遷和經濟變革的國家體制同時存在。民族志的工作必須囊括這些通常被分而視之、實際內部交織纏繞的事物，尤其是當它們構成能動者生存和行動的實踐領域的時候。當新的關系正在醞釀、傳統文化形式正被銷蝕的時候，新的可能性即將來臨，而突現的形式必將被審視，因為各種社會可能性會帶來社會變化的端倪。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新型社會能動者，不會自詡為新型的社會主體，也不會在自己的前額貼上自制的標簽。通常，人們只會借助于對他們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來認識他們。不要錯過下層群體創造意義的瞬間，這些瞬間在理論上無法避免，卻通常未被人注意。不要錯過那些看似不著邊際、實際具有象征意義的資源，這些資源傳統而現代并以市場為導向，正是文化生產和洞察使它們發揮效力。不要錯過對那些“不可見的”或者“頗具代表性的固定”群體給予肯定和信心，正是他們進行了所有那些體現社會差異的自下而上的復雜變革。不要錯過萌生新倫理、性別和階級意涵的良機，因為對于社會能動者來說，平常的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社會世界的象征秩序。

學校將成為新的社會和認同結構的專屬地。我無法談論中國的學校及其與文化的內在聯系，也無法談論受所有制度支配的底層群體的文化生產和洞察。不過，一如我在英國所做的那樣，我可以就中國的不同情境提出一些有待回答的問題。無論是來自于社會上層還是下層，在集體文化影響和個體抱負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矛盾？社會與制度背景、知識與智力技能的傳播如何造就了反對自身的社會對抗性領域？校園文化是如何從日常壓迫和剝削這個熔爐中鍛造出來的更廣泛的文化形式中汲取靈感，并與之發生聯系、對之產生影響的？為什么由于學校的當前安排，腦力工作的解放和機遇反而會成為這么多人生活的羈絆？關于在更廣闊的制度背景下學校教育的作用，關于對社會公正的渴求，關于那些處于社會底層位置的社會能動者所表現出來的復雜的創造性和服從性，我們能從“倒退”、“反社會”和“反抗”的文化，或者是對于學校教育的回應中獲得什么啟示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洞察與再生產之間將出現怎樣的錯配與臨界地帶呢？

實際上，我要傳遞給大家的信息很簡單：學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產和洞察的領地。當文化生產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時，我們就很難解開它們如何促成社會再生產這一謎團了。我希望批判性民族志能夠延續《學做工》的研究成果，在解釋類似的中國謎題時能夠發揮作用。

保羅·威利斯

注釋

[［1］](#_1_182)關于本學術雜志使命的完整描述請參見Paul Willis和Mats Trondman, “Manifesto for Ethnography”, Ethnology1.1, 2000。

[［2］](#_2_177)我知道這些類別不僅構建了整套可能的象征意義，而且也構建了關于它們自身象征利害關系和物質利益的地位和關系的資源。這些象征性資源的驍勇及它們的有效性隨時間推移不斷被再生產的方式，來自于特定時期和界限內就意義和身份進行的積極爭論。我在討論性別這部分時，就是要展示不同類型關系之間的復雜動態關系的“全景”。其實我取一個女權主義的視角來解釋結構地位和關系也完全可以，這樣階級傳統就會被看做是為“理解”性別提供象征性原材料。那么，我為什么要強調階級呢？在某種意義上，性別和種族這兩個基本社會分類確實要比階級類別更為重要，至少對一個人來說更具實證性。但是對我而言，它們比階級類別更具“惰性”；后者對它們的改變要遠遠大于它們對后者的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組織動力來自于底層階級組織，而階級組織源于經濟目的和組織。最終，為了更好地理解種族和性別（人類經驗大部分落在這兩個領域），或者說為了更準確地理解它們改變的方向和內部張力的來源，我們需要把它們放到更為動態的階級關系中來看，因為階級關系貫穿它們的始終。

# “茂寧賽德”版前言

盡管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一書講的是發生在英國一所全日制中學的事，但是這本書對于我們了解美國教育亦有重大貢獻。威利斯只身與在校學生相處，以人類學家敏銳的眼光捕捉社會底層生活，同時具備了一流社會理論家的遠見卓識。在這篇簡短的前言中，我想集中討論威利斯對我們了解學校所作出的理論貢獻，并闡述他在哪些方面有助于解釋美國教育中的社會關系。

過去十年中，大家就教育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展開了辯論，專攻學校研究的激進派馬克思主義學者成功地開辟了一個新的局面。這一新“學派”的主要貢獻在于，他們在少數學者的帶領下，成功地挑戰了受約翰·杜威思想影響的對教育作用的傳統理解。勞倫斯·克雷明的《學校的變革》（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詳細闡述了截至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教育史；對他而言，學校是建立民主、公平社會的主要機制。自托馬斯·杰弗遜以來，公共教育一直被視為民主國家的標志；始于19世紀末的免費義務教育為貧困社會階層提供了實現社會流動和充分參與政治經濟機構的機會。克雷明認為，全民教育是實現公平夢想的關鍵所在。

盡管克雷明對學校發展的闡釋引起很多評論家的爭論，其關于學校實現社會平等的作用卻幾乎從未受質疑。20世紀60年代，那些為學校改革奔走的大部分進步分子所考慮的問題，都是如何實現杰弗遜和杜威勾勒的藍圖，如何通過改善教育讓底層社會成員，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在競爭中獲得更好的工作，提高生活水準。他們和克雷明一致假定：爭取平等的關鍵在于教育系統，因為在工業秩序中晉升越來越取決于文憑。他們認為那些禁止就業歧視的法律條文是必要的，但是只要少數族裔缺乏應聘高科技新工種的資格和條件，雇傭過程的公平性就難以得到保證。對于教育改革者和克雷明來說，學校為縮小階級差異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但是，改革者們與克雷明的分歧在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改革多少才行。激進的教育改革認為不但要改革課程設置，更要變革教室內外的權力關系，在技術學校和大學里建立公開錄取機制。然而，那些堅持20世紀50至60年代民權運動所宣揚的信條的人，堅定地認為學校是消除黑人和白人、工人和中產階級、男人和女人之間日益拉大的經濟、社會、政治差距的起點。

這種把學校放在民主變遷核心位置的意識基于一種廣為傳播的信念，即美國經濟雖然有起有落，但是終究會無限擴張。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在美國經濟生活中起引航作用的政府—商業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創造機會。主要問題是美國人口中很多少數族裔被排斥在美國夢之外，飽受貧困、饑餓和疾病的困擾。學校自身不能成為讓整個社會分享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消費的主要機制；但是學校對于實現全民中產階級的宏遠目標卻起了主要作用：雖然不能完全把經濟剝削造成的收入差異從我們的政體中消除，但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這種差異。上述對美國教育的樂觀信念受到激進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抨擊，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也許是塞繆爾·鮑爾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合寫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這本書并沒有局限在爭辯如果學校管理更人性化或者民主化，學校是否就能實現所有的目標，而是從根本上挑戰了自由派教育信念的基石。鮑爾斯和金蒂斯認為，與堅信學校確已或者可能創建民主的理論恰恰相反，學校從創立之初走的就是反方向路線。兩位作者認為，學校是被資本賦予重任的機構，任務是為工業秩序再生產勞動力；在這個工業秩序中，工種有高低之分。學校不可能成為民主前哨，因為它們在結構上無法催生這些結果。公共教育的目標是為不同層次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生產不同的工人。有些學校培養經理人；有些培養技師和專業人員；大多數則為工廠和大型企業提供產業工人和辦公室文員。除少數例外，學校的課程設置、權力關系和教室生活其實都是在說服工人階級和貧困人口，使他們相信他們注定要留在社會底層。即使有少數人“成功”躋身技術或管理層，能夠獲得高度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學校這個系統的目的不是爭取平等，而是恰恰相反：強化不平等。

鮑爾斯和金蒂斯因而成為美國教育“再生產”理論最著名的發言人。學校再生產社會中的主導生產關系，包括社會流動性的再生產意識，這種意識使人們相信，沒能提升階級地位的人應該責備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畢竟，如果社會提供了晉升的機會，而個人沒有獲取打開這些機會大門的資格，或者在爬上權力和社會流動的階梯后卻沒有達到要求的話，資本主義不應為此負責。在激進學者看來，學校的意識形態傾向于把不平等和貧困歸罪于受害者，這種意識又通過全民公共教育得到進一步強化。

其他學者為上述將學校視作工業秩序下社會再生產工具的理論補充了證據，如邁克爾·阿普爾對意識形態和課程設置關系的研究挑戰了學校教育的民主本質說；又如杰羅姆·卡拉貝爾對社區學院的研究發現，那些學院映射著工作場所和政治領域的統治關系。到20世紀70年代末，教育理論中的多元主義顯然開始走下坡路。即使克雷明仍對他早期對教育懷有的期望深信不疑，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已接受學校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不平等結構，但是他們仍堅持個人可以通過高效、更“相關”的教育系統獲得資格，在工作和社會階層中獲得更好的職位和地位。于是，這場辯論又回到杜威早前就已提出的論點：傳統課程和專制式教學手段的抽象本質可能中斷，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更具扶持性的教學理念，讓學生相信學習的結果就是一份穩定的工作。正如現在美國工業界日益推崇改善的管理方式，并視它為提高工人生產力的最佳方案，右翼教育改革家認為學校管理可以采用“系統方案”，弱化社區大學和州立大學里的人文教育，代之以系統化、個人化的課程和機械化的教學方式。盡管20世紀80年代初，教育改革從左翼多元主義轉向更為死板的“回歸根本”的意識形態，再生產理論家已把他們的想法確立成一套新的體系，用來評判所有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調。然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缺乏一套關于教室里具體社會關系的理論，因為他們假定教室在社會再生產結構中是一個變量；他們從根本上假定教室內發生的一切都附屬于學校的再生產功能。因而，對那些研究師生關系和學生自身組織——保羅·威利斯稱它們為學校的文化層面——的傳統論著，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提出過批評。威利斯指出，豐富的田野調查方法可以和再生產理論結合起來，從而解釋鮑爾斯、金蒂斯和阿普爾等人遺漏的問題，即工人階級子弟繼承父業的過程。威利斯關注的是勞動力再生產——對他而言這是學校無可爭辯的功能——是如何在主觀意識層面上被領會的。

威利斯批評了新激進主義學者過于簡單的方法論和理論假設。通過強調那些教育控制對象中形成的“反文化”的重要性，他提出，正是那些“家伙們”自身的活動和意識發展把他們自己再生產為工人階級。學校課程鼓勵學生通過獲取學歷來實現社會流動，但學生們反抗權威，拒絕執行學校課程的要求，因此把自己變成了工人階級。威利斯借助仔細的田野調查方法，用翔實的證據反駁了激進主義批評的控制論。他發現，工人階級的“家伙們”創造了反抗學校知識的文化。更準確地說，逃課、反文化和抵抗學校課程的再生產，最終帶來了具有反諷意味的結果：這些“家伙們”使自己喪失了從事中產階級工作的資格。他們沒有學到中產階級的技能，這些技能需要忠實服從“三R”[［1］](#_1_185)原則（使他們適應工作的訓練）方能掌握。恰恰相反，這些學生把自己變成叛逆的、“缺乏教養”的工人，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從事沒有技術含量或者技術含量很低的體力勞動。

威利斯取得了一個難得的綜合。他堅持社會分析要考慮學校社會關系的文化、主觀層次，觀察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細節，因此而得出了一個更具說服力的學校再生產勞動力的理論。通過理論綜合，他避免了那些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缺乏多元主義復雜性的批評，使得理論結論更為精準。當然，威利斯不是多元主義者。恰恰相反，他觀察日常關系，研究工人階級子弟在抵制教學目的和社會再生產機制的同時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一分子的種種狀況，從而展示了學校內對峙文化的結果，即把自己變成工人階級的一分子。

威利斯的書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呢？首先，我們不僅僅要分析課程設置如何讓學生誤以為他們可以通過教育獲得更高的階級地位，或者調查學校教學理念的哪些方面違背了追求平等、進步的美國夢。僅僅找到證據說明學校通過使學校知識服從于公司利益而再生產了不平等是不夠的。威利斯認為，學校好比一個戰場，在對勞動力進行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的過程中，學校是在對立和沖突中起作用的。但是，工人階級子弟并不像鮑爾斯、金蒂斯和其他激進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完全是資本主義工廠的炮灰。這些孩子具有真正的反抗意識，但他們在制造政治社會對立者的同時也把自己再塑成產業工人。因此，這種辯證的理論有助于解釋在教育領域內再生產和對抗是如何產生的，它標志著近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高度。

保羅·威利斯自己出身于工人階級，在英格蘭現已衰敗的工業腹地長大。他的視角是一個選擇了社會流動的工人階級子弟的視角，同時他又能把握住那群“家伙們”的心態，這樣獨特的背景成就了這項卓越的研究。那些不屑于研究具體事例的人們注定只會重復機械化的激進批評的方法。他則提供了學校知識的一個新范式，這個范式扎根于社會經驗，表明階級不是勞動統計局電腦上的數據，也不是階級分析的一個前提假設，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學校日常運作、工廠、辦公室，以及工人階級群居的社區中。對威利斯而言，工人生產產品的同時也進行了自我生產。如果他們沒有把再生產內化，那么再多的操控也不能成功再生產社會關系。在他看來，工人們在把自己變成政治社會對象、把自己定位成“中產階級文化”的“外人”的過程中，再生產了自己。資本的歷史轉型早已見識了老工業基地的衰退，可能已經部分超越了生產已有工人階級的階段，只要社會關系還是以政治經濟統治為主，那么對立的出現，即反文化的形成，終將不可避免。這就是《學做工》這本書長遠的貢獻：它幫助我們認識到，不能像給瓶子灌水一樣對人灌輸意識形態。人們在與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實踐相對立的關系中，進行自我再生產。不過，自決權并不意味著一個新社會就此誕生了；它只告訴我們：未來從未像制度上的權威設計的藍圖那樣清晰可辨。

斯坦利·阿羅諾維茲

紐約市

1981年5月

注釋

[［1］](#_1_184)作者在這里并沒有詳細闡釋“三R”的具體所指，可能是指美國標準化基礎教育中所謂的“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閱讀，寫作和數學）。——譯注

# 前　言

1972年至1975年，我受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資助，研究工人階級子弟從技術學校到上崗工作的轉變歷程；本書即該項目的成果。項目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個案研究、訪談、小組討論以及對幾組工人階級子弟在校最后兩年及剛開始工作那幾個月進行的參與觀察。本書的第一部分展示該項目的實證數據和主要發現。這部分基本上是一部校園民族志，尤其是描述校園內對立性工人階級文化形式的民族志，是對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相關文獻的實際補充。第二部分更理論化。它分析了第一部分所記載的那些文化過程的內在含義、緣由以及變化；同時也闡釋了這些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并再生產社會秩序的。

本書旨在讓社會學者、相關從業者和普通讀者都能了解書中的論點。因此，專業術語和文獻都已挪到注釋部分。相關從業者可能對本書第一部分和結論更感興趣，而社會學者則更關注第二部分。

值此書出版之際，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已經同意資助本書的一個衍生項目，該衍生項目旨在關注“青年工人和車間文化”。這一研究成果將成為本書的續篇。

# 致　謝

感謝斯圖亞特·霍爾和理查德·霍加特的幫助、建議、鼓勵和垂范。也感謝曾經閱讀過本書草稿并提出實質性建議的人：托尼·杰弗遜、丹·芬恩、邁克爾·格林、艾倫·奧西，以及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教育組的成員。同時感謝打字員迪爾德麗·貝克、艾麗妮·霍爾和珀爾·紐。

我也要感謝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及其所有成員，感謝漢默鎮的學校和居民，尤其是漢默鎮男校的那些“家伙們”。沒有他們，我的研究就不可能實現。

# 筆錄符號說明

|  |  |
| --- | --- |
| ［　　］ | 背景信息 |
| …… | 停頓 |
| （……） | 刪除的內容 |
| — | 身份未確認的發言者 |
| —— | 摘自于不同討論的筆錄 |
| \* | 來自田野筆記，而非筆錄 |
| PW | 訪談筆錄中作者的簡稱 |

個人在沒有創造出他們自身的社會關系之前，根本無從駕馭這些關系。不過，倘若把這種關系看成單純的客觀關聯，看成是自然而然的、與個體本質（與他們有意識的認知和意愿相獨立的個性）不可分割的，而且是個體固有的關聯，那就大錯特錯了。它是個體的產物。它是歷史的產物。它屬于個體發展的特定階段。它所表現出來的與個體對立的異己性和獨立性，只是表明：個體仍在致力于為他們的社會生活創造條件，他們甚至還沒從這些條件出發開始他們的社會生活。……全面發展的個人……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

［企鵝出版社，第161—162頁］

# 序　言

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難點在于解釋別人為什么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難點卻是解釋他們為什么自甘如此。

單說他們別無選擇，未免太過輕巧。在不同社會體制下，使人們進行體力勞動的方法有很多種：從以機關槍、子彈和卡車相威脅，到灌輸集體意識、使之自愿加入產業工人大軍。我們所在的自由民主社會可能正處于這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武力威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導向的結果。然而，體力勞動報酬低下，社會地位不高，體力勞動本身也日益單調無聊；簡單說來，體力勞動者處于我們階級社會的底層。[［1］](#_1_187)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闡明這一令人驚訝的過程。

人們通常認為，工作能力和學習才能在不同人群中是逐步遞減的，而工人階級處于底層，從事著糟糕的工作，以至于他們認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輩子就應該待在汽車廠里把螺母一個個擰到輪子上去，這公平合理。”當然，這種逐步遞減的模型須假設其底層的讀數為零或接近于零。然而生活在底層的真實個體很少會給生活打分，更別說給人生打分。既然這些個體遠非行尸走肉，而且使整個系統陷入危機，那么我們顯然有必要重新審視這個模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作的市場經濟斷然不會延伸到滿意度的市場經濟中去。

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失敗的”工人階級子弟并不是隨便撿個中產階級及成功的工人階級子弟不肯做的糟糕工作就去做的。我們不應當假設在職業、階級結構中存在一條連續下滑的能力曲線，相反，我們應該看到不同文化形式銜接中顯現的徹底斷裂。我們應該觀察工人階級“失敗”的文化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有何不同，以及兩者是如何中斷的。盡管處于既定的環境中，它對其他傳統意義上被視為更成功的群體有自己的過程、自己的定義和自己的看法。這種階級文化不是中立的范式，不是心理范疇，也不是一套外界灌輸給學校的變量。它包含了各種經歷、關系，以及關系的系統類型的總和，這些不僅設定了孩子們在特定時間的“選擇”和“決定”，而且在實際和經驗的范疇內設定了這些“選擇”一開始是如何出現和被定義的。

本書另一相關、次要的目的是通過具體研究工人階級文化中最有啟迪意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來探討工人階級文化的重要及核心方面。事實上，我最初的研究興趣是整個的工人階級文化，但我逐漸被引到那些心懷不滿、不求進取的男青年身上，他們適應工作的過程正是工人階級文化形式不斷更新的關鍵時刻，而這些文化形式關涉勞動關系這一最基本的社會結構。

事實上，上述兩組關注的話題均指向了勞動力這一重要概念以及在我們的社會中它是如何被準備、以應用到體力勞動中的。勞動力是人類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生產物品以滿足需求和繁衍的能力。勞動不是一項普世、永恒、不變的人類活動。它在不同的社會具有特有的形式和意義。勞動力被主觀理解、客觀應用的過程，以及過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所生成的社會的類型和該社會各階級的身份及構成具有深遠的意義。這些過程不僅在經濟和結構的層面，而且在文化和象征的層面，都有助于建構特定主體的身份和鮮明的階級形式。

只有當階級身份在個體和群體中被傳遞、在個人和集體自主意識的情境中得以再現時，階級身份才真正被再生產。當賦予人們之物被重塑、強化并應用于新的目標時，人們才真正活出，而不是借用他們的階級命運。勞動力是這一切的重要樞紐，因為它是人們主動聯系這個世界的方式：用外部現實表達自我的最佳方式。這事實上就是通過現實世界，自我實現與自我的辯證。一旦達成這種與未來的基本契約，其他一切就能作為常識被接受。

我認為，對體力勞動力的某種主觀意識，以及將體力勞動力應用到體力工作中的客觀決定是在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特定背景中產生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的主題在確定的環境中被調和到個人和群體中；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子弟在自己的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改變，并最終再生產了大文化環境地某些方面，以至于他們最后都被導向某類工作。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是一部男性白人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民族志。為求簡要明晰，我沒有討論諸如種族和性別等其他變量，但這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

這里我們也許應該注明一下，這種反學校文化的存在照例已被媒體以夸大的形式披露，如教室暴力和無紀律。[［2］](#_2_180)1972年9月英格蘭開始實施的“提高離校年齡”計劃（RSLA, Raising of the School Leaving Age）似乎也強調、并進一步揭露了這種文化最具攻擊性的方方面面。[［3］](#_3_173)主要教師工會委托撰寫了特別報告[［4］](#_4_171)，尋求工會支持，以使將“鬧事者”逐出課堂的做法正規化。英格蘭和威爾士超過大半的地方當局在學校里設立了專門的班級，甚至倫敦內城區也為這種鬧事的孩子設立了獨立的“凈化所”。英國教育大臣下令對這個問題進行全國性的調查。[［5］](#_5_163)學校里的破壞和逃學行為儼然成為英國現任首相卡拉漢先生所呼吁的教育“大辯論”的重要議題。[［6］](#_6_157)

我認為，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為有效地讓部分工人階級子弟準備好以體力勞動的方式出賣勞動力，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角色中存在一種自我詛咒。然而，矛盾的是，他們是以真正的學習、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體驗這種詛咒的。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進一步分析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指出這些主觀感受和文化過程是有客觀基礎的，他們其實已部分洞察了真正決定工人階級生存狀態的先決條件，這些認識顯然要比那些由學校和各種政府機構所提供的官方版本要高明。只有在這種真實反映他們境遇的文化表達基礎上，工人階級子弟才走上了自我詛咒的道路。悲劇和矛盾在于，這些“洞察”往往在不經意間被一系列復雜過程限制、扭曲、攔阻，這些過程范圍廣泛：從普遍的意識形態和學校與指導機構的意識形態，到工人階級文化中的男性家長統治和性別歧視的普遍影響。

我在第二部分最后想要論證的是，自我納入勞動過程的過程是構成整個工人階級文化更新的一個方面，也是反映這個文化如何與規范性國家制度產生千絲萬縷關聯的一個重要例證。他們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再生產了某一特定生產方式的社會基礎。

以上是本書的主干。在達成上述目的的過程中，本書也對其他一些領域做出了貢獻。本書探討了我們學校教學關系的核心——教育范式，對職業指導提出了批評，并針對現有國家公辦教育中一而再的失誤提出了一些建議，以期能根本性增加工人階級子弟在生活中的機遇。[［7］](#_7_155)第二部分討論與父權制及資本主義有關的性別模式化，并在理論層面對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形式，及各自的地位進行討論。

這項研究所采用的定性方法、參與觀察法，以及以民族志呈現的方式均源自于我對“文化”的興趣。用這些技術記錄這一層面的故事，能更敏感地捕捉各種意義和價值，也能更好地再現和闡釋文化生產中的象征性表達、實踐和形式。尤其是民族志這種形式，能夠允許研究對象在不知道為什么的情況下主動敘述，展現自己的創造力和人類能動性，并在分析中傳達給讀者。這對我的研究意圖至關重要，因為在我看來，文化不僅是一套被傳遞的內部結構（如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化），也不僅是主導意識形態自上而下行動的消極結果（比如在某些馬克思主義制度下），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類集體實踐的產物。

漢默鎮的個案研究

這本書所匯報的研究，包括一個實驗研究和五個對比研究。實驗研究關注的是一個鎮上十二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階級子弟，我們稱這個鎮為漢默鎮，稱他們的學校為漢默鎮男子學校。我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和工人階級學校反抗文化的關系——他們不是反抗文化的成員，就是成員的朋友。這所學校建于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地處那時所建的福利公屋當中，這些公屋均按標準建造，維護良好，通常都有陽臺，房子與房子之間由迷宮一般的馬路、彎道和里弄連接在一起，社區里有很多大酒館、成群的商店和小超市。

在我開展研究的那段時期，這所現代化、非選擇性的中學只收男生，旁邊還有一所同等級別的女校。調研結束后，作為當地中等教育重新規劃的一部分，這所學校被重新設置成單一性別的綜合中學。在我調研期間，學校預見到教學改革，同時為應對比賽及“提高離校年齡”計劃的壓力，擴建了校園，并引進或實驗了一些新的方法。學校用混合分組取代了分流教學，建立了資源中心，嘗試了小組教學和課程發展項目，并為“‘提高離校年齡’計劃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新“選修”課程。我接觸這個學生群體是在他們畢業前一年的第二個學期之初，我密切關注他們，一直到他們工作的前六個月（他們在校的最后一年正好是“提高離校年齡”計劃實施的第一年）。學校共有約六百人，學生中有不少來自西印度群島和亞洲的少數族裔。我選這所學校，是因為它位于一個典型的建于兩戰間隙的工人階級公屋社區的中心，而這個社區正處于漢默鎮中心。雖然這所學校的學生完全來自工人階級，它卻是所名聲不錯的“好”學校。這似乎意味著這所學校基本上代表了學生行為和穿著的“合理標準”，而這些標準由負責任、有能力的資深教職人員執行。我想盡可能確保所選的群體是工業區中典型的工人階級，而他們享受的教育至少和同等環境下英國所能提供的教育一樣好。選這所學校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新建了一個設施齊全的青年活動中心，學生們經常光顧那里，這也就為我最初進入這所學校提供了非常開放而非正式的機會。

比較個案研究是在同一時期進行的。他們是：漢默鎮男子學校同一年級的一群“循規生”（conformist lads）；漢默鎮附近一所現代男女混合中等學校的一群工人階級出身的“循規生”，這所學校被視為一所“更野”的學校；漢默鎮男子文法學校的一群“違規生”（non-conformist lads）；漢默鎮所在城市市中心附近一所綜合中學的一群相似學生；漢默鎮所在城市最高級住宅區的一所重點文法學校的一群各階級男“違規生”。我盡可能保證所有群體都來自同一個年級，選擇他們也是因為他們都很有可能在法定最低離校年齡十六歲終止求學。對于那所重點文法學校的學生，后一個原因決定了這組成員的組成和他們來自各階級的特征——只有他們打算在十六歲讀完第四學年的時候離校（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他們時，他們的想法），事實上，只有兩個學生在本文寫作的時候確實離校。我選擇這幾個小組是為了就階級、能力、學校制度和對學校的態度等方面進行對比。

在課堂、學校和課余活動中，我對實驗組進行了密集的觀察和參與觀察；定期進行小組討論并錄音；同時還采取了非正式訪問和日記形式。我（作為班級一員而非老師）參加了這群學生在不同時間上的所有主課和選修課，還參加了一輪職業培訓課程，培訓課由一名相當熱忱、經驗豐富、剛修完聲譽很高的職業咨詢課程的老師執教。我還長時間訪談了實驗組成員的所有父母、所有副校長、和小組學生長期接觸的低年級老師，以及來學校的職業指導官員，并進行了錄音。

我對實驗組的十二名男孩以及從對照組里挑出來的三名男孩進行工作跟蹤調查。我和每個孩子都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進行了參與觀察，最后同他們進行了一對一的錄音訪談，我也有選擇地采訪了領班、經理及商店管理員。

漢默鎮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末日審判書》（Doomsday Book）中。它地處英格蘭中心，是一座大都市的衛星城。和附近許多小鎮一樣，它的人口數量和重要性在工業革命時期激增。18世紀中期，博爾頓和瓦特為了向其他制造商供應金屬鑄品，在當地開通運河、建立鑄造廠，從而改變了這個小鎮的風貌。它是最早的工業化城鎮之一，它的居民也成為第一批工業無產者。到1800年，它已擁有大量熔鐵廠和鑄鐵廠，以及肥皂、鉛和玻璃制造廠。最近，它成為設計和制造彈簧、自行車部件、玻璃、螺絲、螺母和螺釘的重要工業中心。它的的確確算得上英國中部地區的螺母螺釘鎮，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之一。

漢默鎮現在是中部地區大工業區的一部分。人們還是將它視為一個粗野、骯臟的地方，盡管該鎮在公共服務和住房補助上的市民記錄要比該地區大部分地方要好。搖搖欲墜的村舍和維多利亞時期的貧民窟現在都已基本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公屋和高層公寓樓。但是，當漢默鎮的男孩和其他地方的女孩約會時，他們還是喜歡稱他們來自緊鄰漢默鎮的大城市，恰好漢默鎮也用那座大城市的郵編。

這個鎮的人口在20世紀50年代初達到頂峰，此后雖然有很多黑人移民遷入，但人口數量一直在減少。現在的人口大約是6萬人，有趣的是，它還是英國“活躍率”[［8］](#_8_155)最高的市鎮之一——尤其對婦女而言。漢默鎮的年齡／性別結構和英格蘭以及威爾士其他地方相似，但它的階級構成有著顯著不同。它基本上是座工人階級的城鎮。只有8％的居民從事專業類和管理類工作（這是全國比例的一半），絕大部分人口從事體力勞動。每天有約3000位中產階級人士從南邊和西邊到漢默鎮工作，但他們不住在那里。以下的事實亦反映了這個鎮缺少中產階級：只有不足2％的成年人接受全日制教育（這又是全國比例的一半）。

這里的就業結構顯示了這個工人階級社區特有的工業性質。這個鎮共有約36000名勞動力，而79％的人從事制造業，相比之下，全國的比例是35％，而整個城區的比例是55％。金屬及金屬部件的制造提供了大半的就業。其他主要就業來源是食品、飲料和煙草業，以及機械工程、機車、磚、陶器和玻璃制造以及分銷。在漢默鎮，就業前景總體不錯，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它的失業率也總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個百分點。

盡管這個鎮在兩百多年前就已工業化，而且基本維持了原先的基礎工業——特別是金屬和金屬加工，但是，它并不像許多類似的城鎮一樣擁有小公司或家族企業的基礎結構。事實上，它的工業組織結構相當現代化。漢默鎮大部分人在大工廠里工作，而這些工廠也常常是全國性或者跨國性公司的分支。60％的工人在雇工數超過1000人的大企業里就業。少于5％的制造業工人在雇工數少于25人的小工廠里工作。58％的工業車間集中在38家面積均超過10萬平方英尺的工廠里。這座鎮總面積的20％以上用于工業用途。

漢默鎮總的來說是一座典型的工業鎮。它具備所有典型的工業特質和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特征，并擁有可能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工人階級。

注釋

[［1］](#_1_186)許多數據都表明英國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存在系統性差異。這些數據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近一期的《社會趨勢》（Social Trends, no. 6, 1975, HMSO）對大部分官方數據進行了匯總。63％的家庭的男主人從事著某種體力勞動。社會階層越低，收入越低，失業的可能性越大，工作的環境越糟糕，并且因病曠工的情況越多。參見財富和收入分配：A. Atkinson, Unequal Shares, Penguin, 1974; F. Field, Unequal Britain, Arrow, 1974。

[［2］](#_2_179)參見“Control experiment”, The Guardian,18 March 1975; “They turn our schools into a jungle of violence”, Sunday Express, 9 June 1974（by Angus Maude MP）;以及“discipline or terror”與“In our schools...defiance, gang war and mugging”, Sunday People, 16 June 1974; 以及安吉拉·波普導演的電影《黃金時代》（The Best Years）,1977年3月23日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全景》節目中播出。

[［3］](#_3_172)對“提高離校年齡”計劃第一年情況的官方報道相對于其他評論，以積極性著稱，但它也承認“存在核心的異議”，并寫道：“品行不端增加了，這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引自DES Reports on Education, The First Year After RSLA, April 1975。

[［4］](#_4_170)參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Masters, “Discipline in Schools”, 1975; NAS, “The Retreat from Authority”, 1976;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Executive Report,“Discipline in Schools”, in 1976 Conference Report。

[［5］](#_5_162)報道見The Guardian, 27 June 1976。也參見J. Mack“,Disruptive pupils”, New Society, 5 August 1976。

[［6］](#_6_156)前首相卡拉漢先生于1976年10月在牛津羅斯金學院做了重要演講，他呼吁人們展開“大辯論”，以討論新教學法、父母的“憂慮”，以及“核心課程”和“通過用好6億英鎊的已有資源（……）以（教育）特權（……）保證高效率”。

[［7］](#_7_154)A.H.哈爾斯雷最近認為，即使經合組織關于“教育、不平等和生活改變”的研討會很有幫助，“我們仍遠未理解……［為什么學業］成績和社會出身關系如此緊密”。（“Would chance still be a fine thing”, The Guardian, 11 February 1975）。

[［8］](#_8_154)活躍率就是十五歲以上經濟方面的活躍者在人群中的比率。這條以及下面的大部分信息都來自自治市的結構計劃。大部分數據是1970年的。

# 第一部分　民族志

##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 抵制權威，擯棄教條

反學校文化最基本、最明顯、最明確的表現是對“權威”根深蒂固的徹底反抗。這種感覺很容易被“家伙們”（the lads）[［1］](#_1_189)（這是反學校文化分子的自稱）表達出來。

［談論教師的小組討論會］

喬伊　（……）他們能懲罰我們。他們的個子比我們大，他們代表的機構比我們的大，我們就是小混混，而他們是大人物，你就是要拿回自己的東西。嗯，我想這就是憎惡權威吧。

艾迪　老師們覺得因為自己是老師所以就高人一等、厲害一些，但他們其實什么都不是，他們只是普通人，不是嗎？

比爾　老師們認為他們就是一切。他們懂的更多，也比我們高一等，但他們只是自以為高人一等，其實不是。

斯潘克斯　我們希望可以直呼他們的名字……他們自以為是神。

彼特　要是那樣就好多了。

PW　你們說他們高你們一等。那你們承認他們懂的比你們多嗎？

—

喬伊　是，但不能僅僅因為他們稍微聰明點，就壓著我們啊。

比爾　他們對待我們就應該像他們希望我們對待他們的那樣。

（……）

喬伊　（……）現在我們得聽從他們的每一個奇思異想。他們想讓我們做什么，我們就得做，因為，呃，呃，我們就是，我們就是在他們下邊。我們這兒有個女老師就是這樣，我們都戴戒指，有一兩個還帶手鐲什么的，就像他戴的那種，但是，她會毫無理由地說：“都給我摘掉。”

PW　真的？

喬伊　是啊。我們說：“這個摘不下來。”她說：“把你的也摘下來。”我就說：“那你得先把我的手指砍下來再說。”

PW　她為什么要你把戒指摘下來呢？

喬伊　就是作秀唄。老師們就愛干這些，忽的一下他們想讓你把領帶系好，諸如此類。你得應承他們所有的要求。如果他們想讓你做件事，而你覺得這件事不對，你如果反對的話，你就會被帶到西蒙斯［校長］那兒，或者挨頓揍，或者晚上多干點活兒。

PW　你認為學校大部分職員都是敵人？

—　是。

—　是。

—　大部分是。

喬伊　這能給你的生活加點料，如果你以后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話。

這種反抗包括對權威所支持的常規價值觀的明顯反抗。勤奮、謙恭、尊敬——這些都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解讀。

［一次小組討論］

PW　伊萬斯［職業規劃導師］說，你們很粗魯（……）你們（在一次職業規劃講座中）很不禮貌，不好好聽講座。他說，為什么你們沒意識到你們的成長正使世界變得粗野？當你們自己有孩子的時候，他們只會更糟。你們想過這個嗎？

喬伊　他們不會。他們只會很直率。媽的，他們不會是言聽計從的笨蛋。他們會是坦白正直的人。

斯潘克斯　如果我的小孩能像這兒的這些人一樣，我會挺高興的。

這種反抗主要表現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體現在無數細節中，已經成為這些孩子們日常生活中幾乎儀式化的一部分，與學校制度格格不入，能夠被老師們一眼識別出來。老師們不得不成為精明的陰謀理論家。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他們熱衷從“疑犯”中找出“真相”。他們生活在顯而易見的陰謀中，盡管沒有通過言語表達出來。這很容易使得很多老師整日提心吊膽。[［2］](#_2_182)

當“家伙們”走進教室或參加集會的時候，他們總是相互點頭示意，似乎在說“過來坐，和我們一塊兒找點樂子”，臉上帶著笑，斜眼瞅著老師在哪兒。這些小動作可能因為老師的命令或注視而停止一會兒，然后“家伙們”又四處走動，臉上擺出一副“老師，我只是剛好走過”的表情。若再受阻止，他們總有一堆理由：“老師，我得把大衣脫了。”“誰誰誰讓我去見他，老師。”集會開始后，被同伴落下的孩子會從椅背上爬過去或者從禮堂的窗簾里鉆出來，一路上踢著別的孩子，或者試圖把別人坐的椅子拆散。

“家伙們”擅于節制，在激發正面沖突前收手。教室里，他們扎成一堆，不斷磨蹭著椅子，被問到最簡單的問題時只會氣呼呼地發出“咳咳”聲，并不斷在椅子上擺出各種坐躺的姿勢。自習時間，有些人把腦袋靠在課桌上，想以公開睡覺來顯示他們的不屑；有些人則背靠著課桌呆呆地盯著窗外或是墻壁。教室里彌漫著一種漫無目的的桀驁不馴，滿嘴托詞和借口，讓人難以抓住把柄。如果有人坐在暖氣上，那是因為他的褲子被雨淋濕了；如果有人在教室里穿行，那是因為他要去拿紙寫作業；如果有人離開教室，那是因為他要“像往常一樣”去倒垃圾。半開的課桌里，連環畫、報紙和色情圖片混雜在課本中。教室里，竊竊私語聲像不斷拍打沙灘的海浪一樣綿延不絕，滴溜打轉的眼睛和夸張的口型間傳遞著鬼鬼祟祟的秘密。

課堂上，正式命令總是遭遇學生們暗地里的對抗：“不，我聽不懂，你這個笨蛋。”“你說什么呢？”“操，才不可能呢。”“我現在能回家了嗎？”要是不小心有任何關于性的雙關語出現，后排就會發出咯咯傻笑和故作驚訝的“哇嗷”聲，同時某人抿著嘴唇色迷迷地在腦袋上邊用雙手做著夸張的手淫動作。如果這些陰謀遭到挑戰，他們就在老師背后擺出勝利的“V”字手勢，把指關節扳得“咔咔”響，而前排則裝出一臉無辜的模樣。學生都盯著領帶、戒指、手指，或是桌上的污點——反正不會是老師的眼睛。

走廊里，校長經過時，拖著腳走路的人要么過分熱情地打招呼，要么突然安靜下來。有人走過時，會爆發出嘲笑或者瘋笑，也許是針對過路人，也許不是。無論你停下來還是繼續走，都會十分尷尬。你常常可以看到一排學生集體站在走廊兩側，形成“印第安人式夾道攻擊”的隊列，但你永遠無法證實他們的企圖——他們會說：“老師，我們只是在等斯潘克斯。”

當然，個體情況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教學方式多多少少能控制或者壓制住這種言行上的對峙。但是，學校規則的遵循者——家伙們眼中的“書呆子”——態度顯然不一樣。這并不是說他們支持老師，他們支持的是老師這個概念。他們認同教育的正式目標，支持學校制度，并從中獲得自我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放棄了自己找“樂子”的權利——于是他們要求老師至少應該敬畏同樣的權威。這與忠實信徒提醒牧師恪盡職責完全相同。

［和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一次集體討論］

蓋瑞　好吧，我不認為他們現在足夠嚴厲（……）我是指格雷西先生還有其他一些老師，比如格勞喬，連一年級的學生都能耍他（……）他們那些“家伙們”應當受罰，這樣他們長大了才不至于厚臉皮（……）其他一些老師還行，你能和他們處到一塊兒去。我是說像彼得斯先生那樣，一開始上課每個人就會保持安靜，如果你沒做作業，你就必須回來做完。但也有一些老師，從第一年開始，他們雖然布置作業，但是如果你不做，他們也從不過問，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實際上，正是對直接權威的熱情，并成為直接權威的同謀使他們——“書呆子”或“軟耳朵”——成為“家伙們”的第二大攻擊對象。“書呆子”這個詞本身就暗含著好學生在“家伙們”眼中的消極和荒誕。他們似乎總是聽從，而從不行動：他們過得死氣沉沉，順從權威，毫無個性可言。耳朵是人體最不具備表達力的器官：它只接受他人的表達，蒼白無力，易屈服于淫穢之語。這就是“家伙們”對那些遵循學校教育正規理念的學生的印象。

關鍵是，“家伙們”不僅排斥“書呆子”，而且自認為高人一等。這種優越感最明顯的顯示途徑也正是“循規生”恰好放棄的樂趣、獨立和刺激：找“樂子”。

［一次小組討論］

PW　（……）為什么不像那些“書呆子”一樣，為什么不試著參加并通過中學畢業考試（CSE）呢？

—　他們不開心，不是嗎？

德瑞克　因為那些人是傻瓜，有個傻瓜，他現在的成績單上有五個A，一個B。

—　誰？

德瑞克　博查爾。

斯潘克斯　我是說，他們的學校生活能記住的有什么呀？他們以后回顧現在，有什么東西可回顧呢？坐在教室里，坐到屁股冒汗，而我們可是……我是說看看我們能夠回顧的東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買加佬打架。還有我們對老師所做的惡作劇，我們以后回過頭來看這些的時候可是樂事啊。

（……）

珀斯　你知道的，他沒什么樂趣，你看斯潘克斯整天玩耍，找了不少樂子。班尼斯特就整天在那兒坐著，屁股直冒汗，而斯潘克斯無樂不做，而且開心得很。

斯潘克斯　第一、第二年，我學習真的很不錯。你要知道我拿過兩三個A呢。以前我回到家，我常躺在床上想：“啊，明天還要上學。”你理解吧，我還沒做功課呢，對吧……“我還得把功課做完”。

—　對呀，就是這樣。

斯潘克斯　但是現在我回家的時候，很安靜。我不用想任何事。我就對自己說：“噢，好極了，明天上學，會有樂子。”你懂吧。

威爾　可你還沒來過呢！

斯潘克斯　誰？

威爾　你。

［哄笑］

（……）

—　你沒法想象……

—　你沒法想象［聽不清］進普勞酒吧說“給我上一品脫啤酒”。

弗雷德　你想象不出來博克利泡妞回家，和她干上一場。

—　我能，我見過他。

—　他泡上妞了，哦，博克利這家伙！

—　就是。

弗雷德　但是我沒法想象他泡她，你知道，像我們泡妞那樣。

“家伙們”特別愛在性方面展現相較于“書呆子”的優越感。“鉆出你的殼”，“丟掉你的羞澀”，這是成為“家伙們”一員的一部分，這也是“泡妞”的成功途徑。這是一種對老師和“書呆子”之間關系的扭曲反映。“家伙們”覺得自己和老師一樣在優越性和經驗方面在權威結構中占據了相似的位置，但是以一種不同的、反社會化的方式。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我們［家伙們］都泡過妞……有一天我們數來著，有多少人真正和女人有過一腿，我們認識的孩子中那些真正有過一腿的，在五年級一百多個孩子中，我們好像只數出二十四個來，這才四分之一。

PW　但是你總能知道這種事嗎？

喬伊　是，我能（……）你要知道，這種事情總能在我們當中傳來傳去，還有我們認識的那些“半吊子書呆子”，他們和我們或者那些“書呆子”都不一樣，他們是另一伙的，就像德福、西蒙斯和威利斯那幾個。他們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混，但是他們走路、行事的那副德性，還是他媽的一股孩子氣。他們沒法讓我們開心，我們卻能逗他們樂，有時候他們看我們鬧都能笑出眼淚來，但他們就沒有那個能力讓我們笑。這就是我們（……）他們［“半吊子書呆子”］當中一些人泡過妞，我們知道這種事。那些“書呆子”，他們就等著吧。我的意思是說，看看湯姆·布萊德利，你注意過他嗎？我總是看著他，然后想：好吧，我們經歷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煩惱，我們喝過酒，我們打過架，我們體驗過挫折、性、憎恨和愛所有這些玩意兒，但是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從來沒有過女人，他從沒去過酒吧。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猜想是這樣——我敢說，他如果干過肯定會來告訴我們——但是他從沒有過女人，他從沒喝高過。我從沒聽說他打過架。他對我們經歷的那些情緒一無所知，這一切他慢慢等去吧。

喬伊是公認的小頭頭，時不時喜歡扮演飽經滄桑的年長角色。就像以上訪談及別處所顯示的，他也是個相當有洞見和表達能力的家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或許可能不足以使他成為典型的違反校規的工人階級子弟。但是，盡管喬伊可能不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子弟，但他無疑是他們的代表。他住在一個工人階級社區，來自于一個以打架出名的大家庭，一家之長是個鑄造工人。他離校時不會得到學歷文憑，是老師們公認的惹是生非的學生——這更加深了“他有股那個勁”的印象。盡管可能有些夸張，但他著力表達的那些經歷只可能來自他親身經歷的“反文化”。他所描述的文化系統具有代表性、核心性，即使他以一種獨特方式與這種文化關聯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喬伊以自己的語言，并通過這個群體的調解，對本學年和本校的社會風景構建了完整的理解和看法。他認為信息會傳到“家伙們”那里去，因為他們是這道社會風景的焦點。“公開反叛”的一個鮮明標志就是建立一套諸如此類的社會觀點和評價系統。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家伙們”所建構的非主流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老師們認可——至少是私下里認可。在教師辦公室里，你常能聽到年輕老師褒獎某些男生的男性魅力：“他實際上比我說的還要行。”

遵循學校價值的學生沒有形成類似的社會圖景，他們也沒有發展出描述其他團體的暗語。他們對“家伙們”的反應通常是偶爾的畏懼、不安的嫉妒和普遍的焦慮，唯恐自己被牽扯進違紀的圈子，并對“家伙們”阻礙正常教學流程感到無可奈何。學校中的循規生接受了正式體制，放棄了其他人所享受的樂趣，這意味著他們期望學校體制承認的領導和教職員工能來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而不是由自己出面阻止。

［與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小組討論］

巴瑞　……你知道，他［一個老師］總是說“每個人要……”我不喜歡那樣，他們總說“每一個人……沒有人喜歡這個，沒有人喜歡那個。你們都遇到麻煩了”。他們應該說“你們幾個……”像彼得斯先生，他就這么說，他不會說“每個人”，他總是點那幾個人的名字。這樣更好，因為我們有些人還是感興趣的（……）

奈杰爾　問題是當他們開始鬧、耍弄老師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浪費寶貴的上課時間。這就意味著他們浪費了我的時間。有時候我真希望他們直接打包走人（……）

巴瑞　他們現在這樣可能更好（……）他們把他們都放在一個班［CSE班級不是混合班，是按能力分班］。他們做不做作業都無所謂，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在自己班］管好自己就行，因為這兒如果有人講話，他會讓你閉嘴繼續做功課。

PW　（……）你有沒有曾經覺得自己應該試著阻止他們？（……）

巴瑞　我從來都不管他們（……）現在是五年級了，他們應該……你知道，你不能在教室里走到某個同學面前大聲嚷嚷，你知道，你得說話理智些。［老師們］應該更嚴格一點。

“家伙們”行為做事，總愛顯示他們對教職人員的反抗，以及與“書呆子”的格格不入，這形成了他們特有的整體氛圍；但是，我們有必要更具體地討論一下這些工人階級子弟如何使資本主義提供的三種消費商品——服飾、香煙和酒精——為其所用，從而形成了我們所說的某種“風格／象征的話語”。服飾作為反抗老師和勝過“書呆子”的最明顯、最個人化，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元素，對“家伙們”意義重大。一個“家伙”“公開亮相”的首要信號是服飾發型的迅速改變。這種另類服飾的特定風格受外界——尤其是更廣泛的青年文化符號體系的流行趨勢——影響。當前，一個“家伙”的裝備包括：梳理整齊的長發、厚底鞋、寬領襯衫——領子翻到馬甲外面、牛仔上衣，還有必不可少的喇叭褲。不管什么樣式的衣服，他們有一樣肯定不穿——那就是校服，他們也很少系領結（如果校服沒法強制，很多學校就會退而求其次，要求系領結），而且利用色彩來制造沖擊力，與單調乏味、統一的校服形成鮮明反差。他們對制服有深深的成見——比如，斯派克描繪制服領子的形狀時說：“你知道的，那個就跟老師的一樣！”

我們也許會注意到，外界整個商業化的青年文化系統為這些孩子提供了一套關于時尚的詞匯，這些詞匯早有內涵，能被這些“家伙們”用來表達他們自己更個人化的含義，盡管這些服飾以及相關音樂可能純粹是商業產物，并不能代表其追捧者的真正渴望，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年輕人崇尚和使用時尚的方式具有個性表達的真實性和直接性，而這在最初的商業生產中是缺失的。

教師和學生之間就服飾問題而產生沖突并非偶然。對一個局外人而言，這種沖突可能很傻。但是，焦慮的老師和牽涉其中的學生都明白：服飾是他們爭奪權威的陣地之一。這是文化沖突的一種現代形式。歸根結底，這是關于學校作為機構的合法性的問題。

與服飾緊密相關的當然是“家伙們”的個人魅力問題。穿著時髦是他們向學校豎中指的一種挑釁，也是將自己和“書呆子”區分開來的方式，這為他們制造了機會，使他們在異性面前顯得更有吸引力。客觀事實的確如此，和同齡學生相比，“家伙們”約會女孩的數量確實要多得多；而且我們也已看到，他們中大部分都有過性經驗。性吸引力以及其隱含的成熟，加之學校禁止性行為，這些都使得服飾穿著不僅僅是膚淺的炫耀，而是表達制度／文化認同的一種機制。這種雙重的表達是反學校文化的特征之一。

如果說著裝方式是教師和學生發生爭執的主要明顯原因，那么吸煙僅居其后。我們能再次從中看到“家伙們”與“書呆子”的區別性特征。他們大部分都抽煙，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被人看到在抽煙。男生抽煙的要點是在校門口抽。“家伙們”的很多時間都用來商量下一次怎樣抽煙，或者如何“翹課”去“抽一口”。如果“家伙們”抽得洋洋得意，并炫耀自己的魯莽行徑，那么資深教師至少不能視而不見。一般說來，學校會經常頒布嚴格的禁煙規定。正因為如此，如果“家伙們”繼續在公共場所吸煙而且視之為榮耀的話，學校領導就會覺得這是對他們權威的挑戰，因而惱羞成怒。如果和另外一個挑戰——撒謊——同時發生，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最近和教師發生的小沖突進行的小組討論］

斯派克　我們就進去了。我說：“我們沒抽煙。”他說（……）然后就變得特別生氣。我以為他會揍我一拳什么的。

斯潘克斯　“竟說我是騙子。”“我不是騙子。”“那回來。”我們最后承認了；我們確實吸煙了（……）他氣急敗壞，說：“還說我是騙子啊。”我們說我們沒抽煙，想扛到底。但是西蒙斯大發脾氣。

斯派克　他確實看到我們點煙了。

對學校領導而言，對抽煙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孩子自然明白。

斯潘克斯　好吧，他［副校長］沒法怎么樣，他不得不打了我三下。我挺喜歡這個家伙的，我覺得他工作干得不錯。但是我在校門口抽煙，博特從我后面過來。我一轉身就被抓住了，然后我就直接去見了他，挨了板子。星期一早上，我一到學校，我就挨了三下……你知道他不能放過我。

鑒于上述事實，在學校這種持續發生“游擊戰”的環境中，對于“家伙們”而言，發現同情者或者敵對陣營中薄弱和“愚笨”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哪些老師——通常是年輕老師——會在看到一支點燃的香煙后不采取措施。

法茲　我是說阿徹，他幾乎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在帕德洛克那里抽煙，因為我在等我泡的馬子，他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可他一句話都沒說過。

威爾　他在注冊的時候跟我說過。

PW　（插話）這個阿徹是誰？

威爾　阿徹啊，他說：“別在吃晚飯的時候上那兒去。”他問道：“你去那兒干什么呀？”“在那上邊，就在那上邊，周圍。”我說：“哦，去小灌木叢。”哦，但是他就那么著了，我們都樂了一回。

同樣，當學校和外界意義相結合時，對“家伙們”而言，抽煙象征著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和言行，因此，抽煙就好比在學校面前作亂。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階級的世界，成為他們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來源。

除了能產生“好的”效果，“家伙們”公開喝酒也是因為這對教師和“書呆子”們而言是最具決定性的信號，以此宣稱個人已經從校園中獨立出來，加入了一種更另類、高級、成熟的社會生存方式。他們興奮地復述著被老師目擊出入酒吧的故事，這比談抽煙還要有滋有味；要是哪位老師看到他們“連夜酗酒”卻沒有作為的話，那么學校陣營里誰是“背叛者／同情者／弱者”就更加顯而易見了，而且要比對“抽煙”無動于衷更甚。他們對這種特殊意義的領悟力導致一些進步的年輕教師身處困境。有些老師采取了奇怪的解決辦法，搞得“家伙們”不明所以：以下這個例子就涉及到一位擔憂、進步的年輕老師。

［關于老師的小組討論］

德瑞克　然后阿爾夫就說，哦，“老師好”［在一家公共酒吧里遇見教師時］，但他沒有回應，然后他就說：“老師好？”于是他轉過身，就那樣看著他，哦……他還不回應。第二天，他說：“我找你，阿爾夫。”他走到跟前，他就說：“昨天晚上是你在那兒嗎？”他說：“我在參加一個足球聚會。”他說：“好吧，你難道不覺得你那樣做就像侮辱某人？”他說：“不會啊。”他就問：“那如果我羞辱你，你會感覺如何？”“你這是什么意思？”他說：“在那種地方跟我打招呼，你覺得我應該怎么回應你？”他繼續說：“好吧，下次不要跟我講話，除非我先跟你說話。”“好的，老師，我以后不會再打招呼了，”他說，“哪怕走路時碰見，我也不打了。”

“家伙們”當然很清楚喝酒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義，即加入成年人行列、反抗學校。對他們來說，最后一個學期的最后一頓晚餐應該在酒吧里吃，而且必須喝到盡興。正是在這一刻，他們終于擺脫了學校，在未來的日子里他們會將這一刻銘記于心。

［工作中的個人訪談］

PW　為什么最后一天喝醉那么重要？

斯潘克斯　這很特殊。一生只有一次，不是嗎？我是說，那天我還在學校，是學校的學生，但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PW　當然，你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斯潘克斯　是啊，我喝醉了，睡一覺，然后我就去上班（……）如果我們沒喝醉，你知道的，我們就不會記得那一天了；我們也可以留在學校（而不是去酒吧），但那只不過又是一天。不過我們那樣做了，我們的最后一天就有東西可以回憶了，我們離開學校的那刻就有回憶了。

這些漢默鎮的“家伙們”在酒吧里確實制造了很特殊的氣氛。斯派克總是解釋說，盡管他有時候看起來像個“可惡的笨蛋”，但他真的很喜歡他的同伴，以后會想他們的。艾迪下定決心要保持“紀錄”，喝掉八品脫酒——按照校長的話說，艾迪在學校被抓時“爛醉如泥”，很不體面地被他開車送回了家。法茲解釋說他那天早上如何差點把桑普森（一位老師）弄瘋，結果被送去見校長，“但是他沒怎么樣，就是開了點玩笑”。更重要的是，酒吧老板和成年顧客都接受了他們，還買酒給他們喝，詢問他們今后的工作。即將離校的時候，他們會像大人一樣許諾幫別人修理管道、砌磚，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承諾并不可信。

這些“家伙們”到校遲到，渾身酒氣，甚至有時微露醉態，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肆意胡鬧，學校老師也強調了這點。為了表明學校的權力有法律和國家強制手段為后盾，校長叫來了警察。校長和一名警察等在校門口。這個架勢嚇到了“家伙們”，當他們試圖避開警察的時候，奇怪的一幕發生了。

［之后的小組討論］

威爾　我正走在［去學校的］路上，當時我拽著斯派克和斯潘克斯（……）你知道吧，我是想保證他們倆能走。喬伊看見警察走過來（……）我走到小泥塘邊［路盡頭，后邊只有圍墻］。我看見了警察，“如果他沒看到我，我就能從圍墻那兒跳過去，免受懲罰，因為要是沒人看見我，我就沒事”。但那時我想：“如果他過來了，我要盡量看上去沒怎么樣。”所以我就脫了褲子假裝撒尿，好像我只是上學遲到了。然后比爾跑過來，我想“天啊”，就翻過后面的圍墻，爬出去了（……）西蒙斯看見比爾了，他說：“啊，我想我看到了你們倆。”他說：“你們倆。”我不知道，你要知道，我只是在走路。

最后，“家伙們”被趕攏到一起，送到校長辦公室，在那兒，警察數落了他們一頓；但后來斯派克說：“他把我提起來摔到了墻上。”（我沒有親眼目睹這件事。）接下來，校長寫信通知他們的父母，說如果不來道歉，學校就會扣留他們最后的學歷證明。對斯派克，他是這么寫的：

……你的兒子顯然喝醉了，隨后的行為也非常不配合，很無禮，甚至是挑釁。他似乎堅持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還說學校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集中營科爾迪茨城堡……作為校長，在最終決定該采取何種措施之前，我希望給家長一個與我溝通的機會。[［3］](#_3_175)

即使是同情學生的年輕教師也覺得這次事件“令人吃驚”，納悶為什么這些“家伙們”就不能等到傍晚再出去喝酒，這樣才“真正合宜”。當然，關鍵就在于必須在午飯時間去喝酒，這樣才是反抗學校的行為。這么做不僅僅是為了標志某種中立的轉變——一種儀式。這是一種決定性的摒棄和隔絕。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最終用一種“書呆子”和教師們都不能理解的方式擊敗了學校。這對他們而言是脫離在校備受壓迫（在他們眼中，“書呆子”和老師們的行為就是壓抑的象征）的青春期而進入成熟、真實生活的一次跨越。

有些“家伙們”的父母對這個情形的看法和他們的孩子一樣。當然，沒有一個家長應邀去見了校長。

［一次小組討論］

威爾　我媽把所有的信都收起來了，就像西蒙斯寫的［關于喝酒的］那封。我說：“你留這些干什么？”她說：“哦，以后回過頭讀讀挺好的，不是嗎？”“哦，給你孩子看啊，你以前多可怕。”我會保留這些信的，我會。

［工作中的個人訪談］

PW　你老爸知道你學期最后一天喝酒的事嗎？

斯潘克斯　哦，啊（……）他笑了，說：“虧他們想得出還要寫信。”喬伊的爸爸來我家，也拿這取笑了一通。

盡管受到威脅，擔心法律制裁，這整個插曲對“家伙們”來說“很值”。在之后的工作環境中，這件事是他們最常提起并添油加醋的校園插曲。這很快成了一種個人化的傳說。隨著學校制度日益開明，校服和抽煙不再是校園沖突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們也可以預見，喝酒將成為今后校園對抗戰中的主要焦點。

### 非正式群體

某夜我們出門

上街

滋擾他人，

我想我們是反社會的，

但我們很享受。

年長的一代

他們不喜歡我們的發型，

或者我們穿的衣服

他們好像就喜歡

把我們說扁，

如果沒有交這一幫朋友

我不知道我會干什么。

——摘錄自德瑞克在一堂英文課上寫的詩

從很多方面看來，我們看到的上述種種對峙可以理解成正式與非正式之間對立的經典案例。學校是正式的領域。它具有明確的結構：學校的建筑、學校的規則、教學實踐、國家認可的教職工權力等級——我們已于細微之處見識到了這種權力、法律的威嚴，以及作為國家鎮壓機器的警察。“書呆子”接受了這種正式結構，并希望通過犧牲部分自主權以換得官方監護人對神圣法規的維護，但這通常超越了他們的職責范圍。信徒心甘情愿的犧牲必然被不忠者所利用。

反學校文化則屬于非正式領域。在此，正式制度的入侵要求遭到反學校文化的拒絕——哪怕代價僅僅是在時尚、微觀互動和非公共話語中表達出的對抗。在工人階級文化中，對抗通常以撤退到非正式領域為標志，并以超越規則可及范圍的方式來表達。

即使反學校文化中沒有公共規則、物質結構、等級關系或制度化約束，它也不是空談。它必須擁有自己的物質基礎和自己的基礎結構。當然，這是一個社會群體。非正式群體是這個文化的基本單位和抗爭的基本來源。這也是該文化其他要素存在和成為可能的基礎，同時，它的存在也使得“家伙們”和“書呆子”涇渭分明。

反學校文化的成員對這個群體的重要性了然于心。

［一次小組討論］

威爾　（……）我們每天在學校都見面，不是嗎（……）

喬伊　就是，我們已經形成一套說話、做事的方式，我們對那些巴基斯坦佬、牙買加佬以及所有別的學生都很不屑……那些小人物，和他媽的書呆子們……我們學會了鉆空子，比如怎么逃課之類的，我們知道去哪兒抽煙顯擺又不惹麻煩。你可以來青年中心玩，對吧……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這兒，你知道嗎，感覺就像現在這樣，明年還會如此，對吧，然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得不上學，如果你感覺不爽，你那些哥們兒很快就能讓你興奮起來，因為你在這兒上學，要是十分鐘內找不出什么東西開個玩笑、找點樂子，你就上不下去了。

PW　現在，在學校你的哥們兒真是那么重要嗎？

—　是。

—　是。

—　是。

喬伊　他們真的是最棒的。

成為“家伙們”的關鍵是融進這個圈子。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一個人沒法制造樂趣、氣氛以及社會身份。加入反學校文化意味著加入一個群體，享受這種文化則意味著能夠在群體中打成一片。

［就如何成為“家伙們”的一員而展開的討論］

喬伊　（……）你自己一個人打盹，沒意思，但是你和你的哥們兒一起打盹，你們就是一塊兒的，一起找樂子，這才是打盹。

比爾　如果你不做別人做的事，你就會感覺離群。

弗雷德　你覺得脫節了，沒錯，對啊。就像，你感覺別人在做什么……

威爾　在第二年……

斯潘克斯　我能想象……當我一天沒來學校，但第二天回來的時候，你不在的那一天發生了什么事，你就會覺得“為什么我那天沒來學校呢”。你知道吧，“我本來可以過得挺開心的”。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嗎？你回來了，但是他們說：“哦哦，你昨天應該過來的。”你知道吧。

威爾　（……）就像在第一、二年，你可以說，哦……你那時有點書呆子。然后你想試試看，變成他們那個樣子……就是說，一個男孩，你想嘗嘗他們那種滋味，而不是當書呆子，然后你很喜歡那種感覺。

盡管不正式，但這樣的群體卻有一些規則——不過這些規則照例與一般意義上的“規則”相對立。

PW　（……）你們之間有什么規則嗎？

彼特　我們不過是破壞其他的規則。

法茲　我們之間沒有規則，是吧？

（……）

彼特　常常變的。

威爾　我們沒有規則，但是我們之間有些共識，我們這兒，你知道，哦，就像，我不會去泡別的哥們兒比如喬伊的“馬子”，他們也不會對我這么干，你知道我說什么嗎？情況是這樣的，哦……你要是給他一個苦差事，你就要料到他會以牙還牙，就是這樣。

弗雷德　這不是什么規則，只不過是一種協議。

威爾　不，這就是規則。

PW　（……）這些協議包括哪些？

威爾　哦……我想想……我自己不是，但我想我們當中大部分人第一、二年的時候都沒怎么玩盡興，就是這樣，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說弗雷德來看我，說：“我剛剛在那兒和那個二年級的搞了兩回。”我就會想“多騷的娘們兒”，你知道吧。

（……）

弗雷德　我們可親了，就像他們說的，總黏在一塊兒。

在非正式群體中，將牽連到其他成員的信息向正式權力告密是一個普遍[［4］](#_4_173)禁忌。告密違反了非正式群體的核心本質：為了抵制“規則”的滲透而維護對抗性的意義。漢默鎮的“家伙們”稱之為“告發”。教職工則稱之為說真話。“真話”是官方對“告發”的正式補充。只有找到人“告發”——強迫他們打破這個最神圣的禁忌——正式組織的地位才能得以維護。因此，難怪整個學校可能因為對一次重大事件的突然打擊以及之后的整肅而變得人心惶惶。這是一場爭奪權力和權力合法性的斗爭。學校必須在這場斗爭中獲勝，而某個人最后必須“告發”：這是學校自身得以再生產、“書呆子”的信念得以修復的途徑之一。但是，不管“告密者”是誰，他都會成為特殊、軟弱和受人矚目的人。“家伙們”常回顧這些事情，不斷重新評估自己性格中的致命弱點，這些弱點普遍存在，但直到關鍵的當口才真正暴露出來。

［有關臭名昭著的“消防栓事件”的小組討論。在那次事件中，“家伙們”從學校偷出一個消防栓，拖到當地的小公園里玩］

PW　這件事一發生就成了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是不是？

喬伊　這事被搞大了，有點可怕。當時不過就像這么一下［他打了個響指］，在我看來，我們干的不過是小事一樁，就好比在街角抽煙，或者跑到商店買點薯條。

PW　發生了什么事（……）？

—　威畢［處于反學校文化邊緣的人物］告發了。

喬伊　西蒙斯單獨找到我，他說：“你們中的一個供了，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法茲。”但是那會兒只有威畢在那兒。

斯潘克斯　我們當時在抽煙。

斯派克　他就那樣。你抽過煙，是吧？［對法茲說］

斯潘克斯　威畢想跟著抽會兒煙，所以法茲就給了威畢一根煙。羅杰斯［一位老師］走進門來，他就像我學的這樣［模仿］走著，威畢就說：“老師，這不是我的，我只是替法茲拿著而已。”

威爾　之前在那個公園（……）這個沒用的家伙和我，還有艾迪把消防栓打開了，是吧？看守公園的人走過來了，他撒腿就跑，隨后我和艾迪朝另一個方向跑了，我們坐在那兒，像兩只猴子一樣。然后威畢就站在那兒，看守公園的人走過去，對他說：“行了，出去。滾出這個公園，我禁止你來。”他走過我和艾迪兩人的時候，說：“我知道你們不在那兒，你們當時正坐在這兒呢。”然后威畢就說：“不是我，是……”他就要說出來了，對吧？

艾迪　就是，我當時說“噓”，他才記起來不能告發我們。

加入這個非正式群體讓每個成員對生活中看不見的非正式領域都變得相當敏感。在官方定義之外，一個新的領域被打開了。他們發展出一種雙重的能力，一方面領會公共的說法和目標，另一方面識破這一切，考量其暗含之意，然后再去弄懂實際情況。這種闡釋能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種成熟的標志，顯示他們開始“精于世故”，知道“事情來的時候該怎么處理”。這種能力讓真正的“局內人”掌握知識，幫你順利度過每一天。

PW　你覺得你在學校學到東西了嗎？你學到的東西改變或者塑造了你的價值觀嗎？

喬伊　我不覺得學校對我有他媽的什么用（……）學校對誰都沒什么影響，我覺得你也就學到點基礎知識。我覺得學校每天的四小時真夠受的。塑造你的不是老師，而是你遇到的那些孩子。你和老師相處的時間不過是你在學校時間的30％，另外那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花在他媽的聊天、爭論和胡鬧上了。

這個群體也為他們提供了不少與外界的聯系，使每個人都建立起了有關社會現實的另一種認知，獲得了信息，以了解事情發生的原因。基本上只有通過這個群體，其他群體才得以相互接觸并維持連續性。學校的各種群體相互聯合，并和社區內其他群體彼此聯系，形成一個網絡，傳遞某些獨特的知識和觀點，從而逐漸將學校在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地位推向邊緣。正是這種非正式群體的基礎結構，使一種區別于主流的、獨特的階級聯系或者階級文化成為可能。

以“哄騙”、“欺詐”和“局外人”為基礎，反學校文化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物物交換的交易方式——當然，這種方式在成年工人階級世界里更為明顯。

法茲　如果誰說“我想搞盤便宜的磁帶”，好吧，他說了，我們中一個聽說便宜的磁帶這件事，對吧，所以我們就達成一個交易，然后說“啊，我去給你搞磁帶”。

和商品交換一樣，文化價值和闡釋就這樣非正式地“暗地”流傳。

### 打盹、哄騙和逃學

對抗學校主要表現為與學校制度和規則爭奪象征空間和物理空間，并擊敗學校公認的主要目標：讓你“工作”。作為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的形式，獲勝和獎勵發展出了非正式的文化意涵和實踐。關于教師／學生的力量關系，后文將進行探討。當反學校文化發展成形時，其成員已經很善于對付學校這個正式系統，能把學校要求限定在最低限度。他們利用現代制度包容不同能力人群的復雜性，阻礙學校執行課程表和“提高離校年齡”計劃提供的各種選擇；在很多情況下，底限僅僅是上學注冊而已。[［5］](#_5_165)

［關于學校課程的小組討論］

喬伊　（……）周一下午我們沒課，是吧？基本上沒有什么和學校功課有關的；周二下午我們有游泳課，其余時間他們就把你們集中在教室里；周三下午是游戲；只有周四和周五下午我們要做功課——如果那個算功課的話。周五下午最后一節課，我們常常就是去打盹，我們一半人搖搖擺擺地開溜，另一半進教室坐下，然后直接睡覺（……）

斯潘克斯　躲過這節課，到河堤上走走，抽根煙，然后再去上下一節課，因為那個老師會點名（……）

比爾　其實要回家也很容易，像他［艾迪］……上周三下午，他被點到名之后就回家了（……）

艾迪　今天下午我本不該在學校呆著，我應該在社區學院［按要求，學生每周要花一天時間在學院內上相關課程，接受職業指導］。

—

PW　你最后一次寫東西是什么時候？

威爾　我們最后一次寫東西？

法茲　哦，我最后一次是在職業指導課上，因為我在一張紙上寫了“是”，當時我的心都碎了。

PW　這為什么讓你心碎？

法茲　因為我本來打算什么都不寫就過完這個學期的。自從回來之后，我就什么都沒干過。［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學期］

用曠課來衡量是否摒棄學校非常不準確，甚至沒有意義。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在“逃學”（這已發展成為“家伙們”得心應手的一種技藝）之前還是得到學校注冊，而且這只能用來衡量非正式學生流動性的一個方面。一些“家伙們”自由出入學校的能力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實際上，他們把學校提供的日程表變成了自己的安排。相對而言，曠課只是一種不怎么重要、相當粗糙的自主表現，自主性有多種體現，表現在各種活動中：隨意離開課堂、呆在教室里卻什么事都不做、走錯教室、在走廊里閑逛四處尋求刺激、偷偷睡覺等。體現這些的核心技術是能夠自由離開任何一堂課：保留個人機動性。

［一次小組討論］

PW　你們不在教室里，難道沒人擔心嗎？

法茲　我從廚子那兒搞了張條子，證明我在給他們幫廚（……）

約翰　你只要走到他［老師］跟前，說：“我能出去干點活兒嗎？”他會說：“當然，怎樣都行。”因為他們也想擺脫你。

法茲　尤其是我問他們的時候。

—

皮特　你知道走廊里有些洞吧，我不想去運動會，他讓我替他取鑰匙，我就把鑰匙放進走廊的洞里，他只好去找電筒來掏鑰匙。

對于那些成功叛逆的人來說，屢屢得手也可能是種困擾。一天內，頻頻在自主的道路上做取舍并非易事。

威爾　（……）我們一直在這間房里打牌是因為我們能鎖住這扇門。

PW　現在這間房做什么用？

威爾　資源中心，我們本來要在這兒搭框架的［為副校長做新舞臺］。

PW　哦！你們還在做那些框架！

威爾　我們早該做好了，但我們整天就躺在那個架子上打牌或者睡覺（……）不過，我們開始覺得無聊了，我寧愿到教室里呆著。

PW　你想去哪堂課啊？

威爾　哦，我想大概是科學課，因為那課有時候還挺好玩的。

這種自我導向和阻礙正式組織目標實現的行為也是一種對官方時間觀念的攻擊。副校長最艱巨的任務就是制定時間表。在大型學校里，有若干課程供五年級學生選擇，因此，每個細節都必須考慮周到。剛開學的幾個星期會不斷地修改時間表，因為有些年輕老師抱怨，有些安排難以實現。時間好比金錢，非常寶貴，不能浪費。每項安排都必須與學校的方便大多數人的目標相吻合。各個科目被分成時間塊，并保證相互之間搭配合理。就像學校建筑的布局，課程表是學校制度對于時間的安排。校長辦公室的墻上懸掛的復雜圖表展示了課程的運作機制。理論上，檢查一天中每個人在特定時間所在的位置是可行的。不過，這些對“家伙們”而言可不管用。如果想找他們，你應該知道和掌握他們自成一套的行動節奏和模式。這種節奏摒棄了官方時間表所含的明顯意圖和時間觀念。教師和“書呆子”對“家伙們”抱怨最多的就是他們“浪費寶貴時間”。然而，時間對于“家伙們”而言不需要小心節約，不是為實現設定的目標而謹慎使用的東西。對“家伙們”來說，時間是他們想標榜為直接認同和自我導向的一部分的東西。時間是用來維持“家伙”這種狀態的，而不是用來實現某種目標或者獲得文憑的。

當然，他們有時也會有緊迫感，尤其是當他們看到學期即將結束而需要找工作的時候。但是，就他們的文化而言，時間的重要性僅僅來自于不受制度時間的約束。在這個文化的時間觀里，時間以相同單位均勻流逝。時間沒有計劃，不存在浪費或者可預期的兌換。

### “找樂子”

連共產主義者都會找樂子。

——喬伊

非正式群體從學校及其規程中贏得了屬于自己的空間，并在其中形成和發展了專門用來“找樂子”的獨特文化技巧。“樂子”是反學校文化中一個多元性工具，格外重要。我們之前也已看到，能逗樂是成為“家伙”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可以逗他們樂，但他們就沒法逗我們樂”。但是，“樂子”也用于很多其他情境：打發無聊和恐懼、克服困難和問題——總之是可以解決幾乎所有問題的法子。在很多方面，“樂子”是非正式群體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則是正式機構特有的工具。“家伙們”自然知道“樂子”的特殊重要性。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我覺得他媽的樂子是所有事情里頭最重要的。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笑（……）我記得有一次，我和約翰還有另一個家伙在一起，有兩個小子不知為了他媽的什么事情過來猛揍了我一頓。約翰和另外一個家伙在遠處（……）我想還擊，但我總是后退，所以我就跑了，跑著跑著，我抄起他媽的一巴掌雪，摁在自己臉上，當時我就笑死了。他們一直說：“他媽的你不能笑。”我本應該嚇得半死，但是我卻他媽的在笑（……）

PW　笑有什么好（……）為什么那么重要？

喬伊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想笑，我不知道笑為什么這么重要。只是（……）我覺得這是不錯的天賦，就是這樣，因為你能化解任何情況。如果你能笑，如果你能讓自己笑，我是說如果你能笑得非常令人信服，那你就能擺脫無數的麻煩（……）如果你不能時不時地笑笑，你會他媽的發瘋的。

一般而言，學校是產生“樂子”的沃土。學校是“家伙們”形成、塑造其特有幽默的重要環境。在后續章節中，我們將探討那些充當他們搞笑和文化發展素材的教學方式。但是，現在我們需要關注的是他們的幽默是如何測探、玩弄和利用學校權威的某些特定主題的。他們的很多惡作劇和玩笑在其他場合并不具有同樣的意味，而且根本不好笑。當一位老師走進教室的時候，他被告知：“好吧，先生，副校長會來代我們的課，你可以走了。他說這段時間你可以休息。”在學校，“家伙們”把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攔下來，說：“阿蓋爾先生想見你，我想你遇到麻煩了。”很快，阿蓋爾先生的房間擠滿了憂心忡忡的學生。一位新老師會被攔住并聽到這樣的話：“我是學校新來的，校長問你能否帶我參觀一下校園。”新老師剛要開始這么做，轉過臉去的竊笑暴露了這個把戲。有謠傳說，校長為了找出是誰污損了新街區的石膏像，正在核對每個人的字體。法茲就吹牛說：“那個笨蛋不會來核對我的，我什么也沒做。”通過告密這個神圣的禁忌，他們幽默地測探著權威與非正式準則相遇時的情境。關于假裝告密的故事有一大堆，他們是要以此刺激老師更有效地去扮演他們的正式角色：“老師老師，喬伊在說話／在擰羅盤／在摳鼻子／要殺死珀西瓦爾／在手淫／在放你車輪胎的氣。”

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看，“樂子”是一種不遜的、搶劫式的不端行為。猶如一支從事秘密、非正式活動的軍隊，“家伙們”滿鄉下尋找可以用來消遣、搞破壞和煽動的事件。即使在像禮堂集會這樣嚴肅、巡邏嚴密的正式場合，他們也能制造出很多類似的事情。集會中，斯潘克斯把坐在自己前面的人的夾克衫側兜掏空，然后故意問：“這些東西是誰的啊？”喬伊把夾克衫釘在座椅上，而其他家伙則在合唱中搗亂：

喬伊　當我們聚集在這間禮堂的時候，我們的主要消遣就是玩弄那些固定椅子的小夾子。你把它們弄下來，然后把某人的外套夾在他的椅子上，然后就等著看他站起來……你永遠不會認真聽……你必須很小心，這樣克拉克［副校長］才不會看見而把你叫出去，其他老師就無所謂了。

（……）

喬伊　即使是唱圣歌的時候……他們強迫你唱。

PW　但是他們真的強迫你唱了嗎？我沒看見你們有多少人在唱啊。

—　我就站在那兒，動動嘴。

—　我們整個班只有一本圣歌。我們二十五個人才有一本……

—　我們即使真唱，也要弄個笑話出來。

法茲　比如唱錯段落……假設應該唱第一節，你就唱第三節。

［大笑］

在禮堂里看電影時，他們把投影儀的線繞成死結，用手在熒幕上比劃動物影像或者下流姿勢，無緣無故地戳坐在他們前面的“書呆子”的后背。

午餐時間，他們在學校旁邊的公園里閑蕩，把公園看門人自行車上的發電機打開，因為“這樣可以讓那笨蛋慢下來”。他們只要看到任何松動或者可以移動的東西，就會推搡一下，把垃圾桶倒空，污損各類標志。要是沒人看管，私人財產也是他們的對象。

［一次關于蓄意破壞的小組討論］

皮特　門！

喬伊　門是最新的破壞對象。從門上跳過去。從這里搞個門下來，然后安到別人家去。

比爾　我們盡干這些。我們準備去布朗普頓路那邊打十柱保齡球，突然我們看到路上有幢房子正在出售。我們就把“出售”的標志牌拿了出來，放到隔壁家，然后把這家的牛奶箱搬到隔壁家（……）我們把花箱從門廊上弄下來，然后塞進隔壁家。我們這樣交換了好多東西。

斯潘克斯　還有垃圾桶！［笑］……每天晚上，我們就溜進花園，搞一個矮人雕塑出來，到最后，有一家的花園里放滿了東西：小矮人雕塑、日晷、小橋，還有一個矮人釣魚的小雕像。然后，路盡頭有一個很大的日晷。他就拿著日晷的一頭，我拿著另一頭，兩個人一路把它抬到（……）

對教師而言，組織校外參觀堪比噩夢。例如，去參觀博物館。大巴后排的座位毫無意外地空著，留給遲到的“家伙們”。很快，大巴后座會籠上一層藍色煙霧，盡管從來看不到燃著的紅色煙頭。當大巴返回車隊時，車隊經理發現后座那些椅子上涂滿了用永久性墨水寫的名字和涂鴉。第二天，校長只好把肇事者送到車庫，讓他們“為了學校的名聲”把大巴清理干凈。

在博物館里，這些“家伙們”就如同成群的蝗蟲把壯觀和莊嚴一掃而盡。在一個仿維多利亞風格的藥劑師商店里，清楚、顯眼地寫著“請勿觸摸”，但只要是看得見的東西，“家伙們”就會東摸西碰，這里拉一下，那里試一下。他們從柜臺上拿走了好些裝在大廣口瓶里的老式止咳糖；還坐在高背椅上，把椅子前面兩條腿翹起來，說是“要看看這些椅子到底有多牢靠”。

十五個人在一個村莊模型四周擠成一團，貌似看得很認真。斯潘克斯用手使勁地搖晃車模型，口里模仿著警報：“哦，注意，一輛有軌電車撞上了。”同時，喬伊拿起了一個精心擺設的小人模型：“看，我綁架了一個村民。”

他們只要能躲開老師，就跑到街上抽煙。喬伊正在解剖那個小人，要“看看里面是什么東西”，而斯潘克斯擔心那些止咳糖會把他吃死。他們聚在一起，指著天說“看啊，就在這幢樓上面”，或者目不轉睛地盯著地板，當別人也聚過來的時候，大家就笑成一團。他們在一家電視機商店前停下，盯著正在裝飾櫥窗的女士，說：“我們一起盯著那個女的，看到她不好意思。”他們達到目的后才會離開。最后，那些有點閑錢的“家伙們”就脫離其他人，到酒吧里去喝一杯，大聲談論他們的學校，要是有人看他們，就懷疑地竊笑。回到大巴時，他們又是遲到的一撥，后座還是空著，他們就假惺惺地向年輕老師“相互告狀”：“老師，斯潘克斯有點問題，他的嘴里有股味。”“艾迪的嘴著火了，老師，你能把它滅了嗎？”

第二天回到學校，他們被叫到校長辦公室，因為巴士公司剛打來電話，但是在校長辦公室門口他們不確定“這次犯了什么事”：“可能是那些止咳糖”，“可能是在大巴上唱歌”，“可能是喝酒”，“可能是在公園的草地上放火”，“可能是叫那些巴基斯坦佬滾”，“可能是我們破壞了村莊模型”。當發現原來是車座上墨水涂鴉的問題時，他們頗為驚訝，也舒了一口氣。“家伙們”中無論哪個人被叫去見校長，第一件事都是在腦子里列一張可能被問及的事件清單，第二件事就是如何給每件事編個聽得過去的故事。當正式權威與非正式力量對峙時，他腦中的愧疚和混亂要比校長腦中認定的罪惡感強烈得多。他們常常驚訝地發現“所有引起小題大作”的罪責其實都很瑣碎、微小——尤其是與他們那個可能被發現的隱秘國度相比。

當然，這些“家伙們”不總是從外界刺激或受害者身上找“樂子”。群體內的互動和談話經常以“嘲弄”的形式出現。他們之間經常相互動粗，對某一個人踢一腳，掄一拳，空手道對打，扭胳膊，長時間的推推搡搡，直到那人快要流出眼淚來才罷手。這種玩笑或“嘲弄”頗為粗暴，常常為同樣的緣由針對幾個人。通常這是因為有些人被認為比較蠢。鑒于“家伙們”通常擯棄了學校功課，這種行為頗具嘲諷意味，顯示了傳統價值觀陰魂不散，即使這些“家伙們”急于否認這一點。盡管“家伙們”通常拒絕用傳統方式來展示他們的能力，但毫無疑問，那些最能干的會被視為“聰明機靈”。某些文化價值，如談吐聰明、幽默風趣，還是會在文化課上表現出來。比如說喬伊，他在英語這門課上就小心地平衡著：和“家伙們”一起“逗樂”，同時偶爾寫篇“才氣出眾”的散文。在某些方面，“家伙們”對愚鈍同伴的懲罰要比那些“不抱希望”的教師來得更為嚴苛。盡管什么都可以嘲弄，但充滿性暗示的嘲弄最常見：越個人化、越尖銳貼切越好。風趣的精髓在于貶損得恰到好處：不斷找出對方的弱點。提升這種攻擊力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文化訣竅；若要抵擋這樣的攻擊，那要求就更高了。

［一群“家伙們”在課間休息時的對話］

艾迪　X撒尿的時候讓他的“馬子”給他拿著雞巴。［哄笑］

威爾　問問他，誰給他擦屁股。［哄笑］

斯派克　這惡心的混蛋……我打賭他給她換他媽的破布。

斯潘克斯　對，用他的牙！［更多哄笑］

［X來了］

斯潘克斯　你是不是剛剛撒尿爽呆了。

比爾　還是拉屎啊。

斯潘克斯　你這惡心的小屁孩……我可干不了那個。

比爾　等一下，我待會兒撒尿的時候想讓你幫我拿雞巴。

X　誰？［哄笑，打岔］

—　你啊。

X　誰？

—　你。

X　什么時候？

斯派克　你干的，你告訴喬伊，喬伊告訴我的。

他們不斷計劃著如何拿那些不在場的人開涮：“他來的時候我們別理他”，“他說什么我們都笑話他”，“我們假裝我們什么都不懂，然后一直說‘你是什么意思’”。有些人會因為“臟”、“笨極了”，甚至總是穿“同一件破夾克”而出名，而遭嘲弄。這個群體所使用的語言，尤其是嘲諷和“欺負”，比“書呆子”所用的要粗暴得多，充斥著隨口而出的咒罵，用起本地方言和隱語時亦力道十足。對于“家伙們”而言，至少在他們自己的圈子里，這般說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次關于走神的小組討論］

喬伊　（……）［走神的時候］你總是會注意某個人，然后你總是能就某事說些……什么。

PW　是什么事讓你不再感到無聊？

喬伊　聊天，我們可以一直聊下去，當我們聚到一起的時候，我們就聊啊，聊啊，聊個沒完。

### 無聊與刺激

PW　與無聊相反的是什么啊？

喬伊　刺激。

PW　但什么是刺激呢？

喬伊　違紀違規，就好比犯法、喝酒什么的。

斯派克　偷東西。

斯潘克斯　在街上晃蕩。

喬伊　破壞公物（……）這些就是無聊的反義詞——刺激，違反法規，去普勞酒吧時和領班講話，站在領班旁邊買酒喝，盡管他知道你才十四或者十五歲，而你應該十八歲才能進去。

“樂子”、聊天，還有劫掠，這些不良行為通常都能有效，雖然并非完全地打發無聊——有時雖然“捉弄這個系統”成功了，但無聊感反而會增強。

成為“家伙們”一員的刺激和榮譽更多來自于反社會的實踐，而非上述活動。那些更為極端的行為才是把他們與“書呆子”以及學校完全區分開來的標志。打架、通過威脅挑起爭端、談論打架和打架中的策略，這些都帶給他們絕對的樂趣。很多重要的文化價值都是通過打架來表達的。他們反復強調男子氣的傲慢，戲劇化的表演，群體的團結，以及頭腦反應的快捷、清晰、不過于道德化。通過身體上的侵犯，他們也明確、精準地表達了他們對“書呆子”的態度。就好比知識之于老師，暴力以及對暴力的判斷是“家伙們”凌駕于校園循規生之上的核心。

“家伙們”通過暴力最完全地表現出他們對盲目或扭曲的反抗的熱衷，即使這種熱衷并不明確。暴力打破了傳統專制的“規則”。他們以男性氣概來對抗專制。這是破壞一系列令人不滿、自上而下或者環境強加的意義的最終方式。這是一種讓平凡事物突然變得重要起來的方式。從過去到未來的有關自我的一般假設被中斷：時間的辯證性被破壞。打架，以及其他事故或危機將你痛苦地截留在“當下”。無聊和瑣事因此而消失。如何度過接下來那幾秒鐘變得分外重要。而且一旦經歷，對打架的恐懼，以及之后安然無恙繼續前行所帶來的興奮會讓人上癮。這些都成為消解無聊的永久可能方式，亦成為陽剛風格和存在的基礎要素。

喬伊　沒有什么騎士精神或者別的，不是你所想的那樣。打架不過是……你去打架，怎么說都是野蠻的爭斗，所以你也就得用盡辦法去打，不管你想到什么辦法，叫別人幫你也好，用你能想到的最卑鄙的手段也好，摳他眼珠啊，或者咬他耳朵啊，反正獲勝就行。

（……）

PW　你是怎么看學校里不打架的學生的？

斯派克　那樣會把我搞瘋的，就像你打了人家一下，可是他們卻不還手。

PW　為什么？

艾迪　我討厭這種人。

斯潘克斯　是啊，“我不會揍你的，你是我的朋友”。

PW　好吧，你怎么看這種態度呢？

喬伊　那就全看你和他有什么過節，如果只是很小的事，比如他踢了你一下，那你要是打他頭的話，他就不會跟你打；但是如果他……真是有什么和你過不去，不管他還不還手，你都要扁他。

PW　你在打架的時候感覺怎么樣？

喬伊　（……）很爽，很害怕……不過那是后來才有的感覺……我知道自己打架的時候是什么感覺……就是覺得我要殺了他，要用盡力氣把他干掉。

PW　但是你在打架的時候真的覺得害怕嗎？

喬伊　是啊，剛開始打架的時候我會發抖，我真的是害怕，但是一旦你站在那兒，你就開始集中精神，就會打得越來越好，如果你狀態夠好，你能把那家伙給打扁。你把他摁在地上，然后在他的頭上亂踩。

我們應當注意，盡管暴力具有破壞性和反社會性，并充斥著非理性，但是暴力并不是完全隨機的，也不是對社會秩序的徹底擯棄。甚至在針對外群體（當然這有助于定義“內群體”）時，暴力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恰恰是它在“家伙們”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它標志著正式進入這個非正式系統并得到最終承認。它決定了某種“榮譽”，哪怕這種榮譽是錯位或者扭曲的。打架的時候也是你在另類文化中接受考驗的時候。如果你拒絕打架或者做得非常外行，那你的非正式成員地位和男性聲望就會嚴重受損。雖然成為“家伙們”的一員并不一定要能主動挑起爭斗——這往往是“重磅人物”做的事，他受人尊敬，雖然未必招人喜歡，不太可能成為別人的“樂子”——但是同伴們至少可以期望他在受羞辱或威脅的時候能夠主動出擊，能夠“照顧好自己”，不一副“沒精打采的熊樣”，能阻止別人對他“作威作福”。

在領軍人物和最具影響力的幾個頭頭中——未必是那些“重磅人物”，打架的能力決定了他們最終的權力等級。正是這種不常受考驗的打架能力決定了他們的地位；有趣的是，這種地位常常建立在諸如男性化外貌、“有名”的家庭背景、風趣幽默、擅長哄騙、廣泛的非正式社交網絡等的基礎上。

但是，暴力被認為是危險的、不可預測的最終裁決，同齡人之間不允許出現暴力失控。他們傾向于使用言語或者象征性的暴力，而且即使一場真正的惡斗在所難免，他們也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控制和既定的地位聲望體系。

PW　（……）喬伊，你最后一次打架是什么時候？

喬伊　兩個星期前……大概一個星期前，星期一晚上，這個愚蠢的傳言不脛而走。這其實真的很傻，不知怎的傳到了這個家伙的耳朵里，說我要猛揍他一頓，其實不是我說的，他聽了不想讓步，放話說他要搞定我，于是我們打了一架，然后就被阻止了。我把他的臉打花了，他把我的嘴唇打腫了，他拿頭撞我的鼻子，傷了我的鼻子，就傷在這兒。但我用拇指挖他的眼睛，把他的頭給敲破了。后來，他們把我們倆拉開，我抓住他，把他拉到角落里，告訴他：他知道我不害怕他，我知道我不害怕他，他也不害怕我。然后就這么完了。不是什么……他家和我家一樣都是大家庭，他們都是瘋子，他們是很能打的瓊斯一家，而且……哦……我不想和他們挑起什么事端，所以我就是抓著他告訴他啥叫力量。

寬泛地說，整個反學校文化都彌漫著暴力的氣氛及其男性氣概的內涵。交往的肉體性——不管是假的推搡斗毆、在女孩子面前的炫耀、貶低奚落校園循規生，還是展示自己的優越感，所有這些都是從真正的打架場景中借用過來的語法。要是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暴力，很難模仿這種風格。打架這一主題經常出現在正式的學校作業中，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崇尚革新和關聯的時代。比爾在一篇英語作文的開頭寫道“如果只有四個人，我們就不會去揍巴基斯坦佬”，接著寫道“我看見他的腳抬到腹股溝那兒”，然后“踢到了那個家伙的頭上”，最后寫道“天都黑了”（作者自己則“玩的差不多了”）。在“提高離校年齡”計劃設置的電影選修課中，學生可以自己拍小電影，這些“家伙們”總是拍些關于搶銀行、打劫和暴力追打的故事。當喬伊導演一個打架場景的時候，他在課上的表現要比這一年其他任何時候都積極，而斯潘克斯不會真的挑戰他的攻擊者，“適當地挑釁他，適當地挑釁他，你得說‘我受夠你了，你這個混蛋’，而不是說‘來啊，我們來打呀’。”后來，當艾迪跳到一個人的身上結束毆斗時，喬伊厭惡地說：“你不應該這么做，你只要踢他就行了，免得把你自己的衣服弄臟。”

象征性的和實際的暴力、粗野的舉止、顯示著某種男性氣概的壓力，這些永恒的主題一旦到了夜晚的街頭就彌散開去，這些“家伙們”也表達得更為明確，尤其是在商業舞廳里。盡管這些商業舞廳相對來說比較貴，和青年俱樂部里提供的內容沒有很大區別，而價格是俱樂部的十倍，“家伙們”還是偏愛商業舞廳里的娛樂。這主要是因為青年俱樂部沒有商業舞廳里那種充斥著危險和競爭的氛圍和社會關系。我們可以在諸多層面，尤其是價格和對客戶所采取的工具主義方面來批判商業供給。但是，它至少滿足了客戶的欲望——正如他們所感覺的那樣，而不是對他們的訴求進行道德上的限制。在某種意義上，“家伙們”在商業舞廳確實享有某種自由。舞廳里那種疏離、利用的形式，至少讓他們擺脫了正規娛樂機構里那種不相關的或者壓迫性的道德戒條，脫離了那種禁閉場所的恐懼和壓抑。在舞廳里，本土文化形式才有可能浮出水面，相互作用，而不受上層的指揮。

斯派克　如果舞廳里有吧臺就好了。

威爾　是啊，我覺得如果那兒有吧臺，你就會變得更……注意自己的行為，不能太囂張，因為有些人喝了點啤酒（……）他們瞧見那兒有些妞，他們就想“我要賣弄一下自己”，就會到處走，就像那些“重磅人物”一樣（……）他們在哪里都能挑起架來。

斯派克　像比利·艾維瑞特這樣的家伙，他到處晃蕩，別人要是多看他兩眼，他就會用皮帶打那個人（……）

PW　你怎么挑起架呢？就看某人一眼？

斯派克　不，是別人看你。

威爾　就是這樣，你四處走走，就會有人看你。

斯派克　或者如果你從某個人身邊走過時，故意撞他，然后你咬定說是他碰你的。

PW　所以如果你在舞廳，你想避免打架，你就得隨時留意你的腳，是嗎？

—　不是。

—　不真是這樣。

斯派克　（……）看著他們，然后退開。

法茲　如果你在那兒認識很多人，你可以跟他們聊天，你就會覺得安全點，如果你認識很多人的話。

威爾　如果你在那兒認識很多人就沒問題。

斯派克　如果你去什么人都不認識的舞廳，那就比較困難。

（……）

斯派克　［學校的青年活動中心］那里沒有氣氛，那里沒有吧臺。你只能喝他媽的汽水，整晚吃瑪氏巧克力棒。

威爾　我覺得……這個俱樂部好像來了些新人，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

斯派克　那時候才叫棒呢。

威爾　那時候才叫棒，因為那里有種氣氛，你知道嗎，你會看著對方，然后你退回來，說：“我不喜歡那個混球，看他看我們那樣兒。”之后可能到外面去干點什么……但是在這兒，你總是看到朱爾斯［青年指導員］走來走去，你知道吧。

在傍晚和周末的活動中，服飾、音樂和動作風格突顯出了學校內各個群體之間的差異——有時候這些分別相當模糊，尤其是牽涉階級差異的時候。在學校里，作為“家伙”，他們就得晚上“出去”，并發展出一套對學校、社區、城鎮以及街道的社會認知。

威爾　分類很多，像那些穿著時髦的孩子，你知道吧。還有“重磅人物”，然后是那些安靜的分子（……）但是他們能照顧自己，學著穿時髦衣服，跟“重磅人物”混。還有那些撒錢的人，你從他們那兒能哄騙點錢出來，因為他們想花錢買友誼。然后你能碰到那幫娘娘腔，基佬（……）

PW　你說的娘娘腔不是同性戀吧。

威爾　不是，娘娘腔是指那些“書呆子”、社會改良空想家，他們從來沒聽說過邪惡，也沒見識過邪惡（……）我覺得“重磅人物”和雷鬼，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嗎？雷鬼和靈魂樂，他們不聽這種畸形的東西。那些娘娘腔、基佬喜歡……像美國奧斯蒙音樂家族、搞迷惑搖滾的蓋瑞·格里特這種。

PW　（……）古怪、畸形、嬉皮這些類型（……）威爾，他們是怎么對號入座的呢？

威爾　啊，好吧，我也不知道（……）你會發現這些怪胎很多都挺聰明的。

斯派克　他們和我們的興趣不一樣。

法茲　舉個例子吧，你到普勞酒吧，那兒迪斯科開著（……）在放那些重金屬音樂的時候，你會看到那些留長發、穿著邋遢衣服和牛仔褲的孩子都在那兒；如果你在放靈魂樂的那個晚上去，你就會看到穿肥腿褲和寬領襯衫的孩子，對吧，你就能看出區別來了。

（……）

威爾　我想你也能感覺出來這種區別，因為我去過會合點酒吧，在城北邊，那是個重金屬的地方，毒品之類的東西那兒都有，每個人都穿得很奇怪（……）我覺得自己在那兒格格不入，就好像，你知道嗎，我覺得就是處在那個圈子外頭，你知道我說什么吧，我覺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要聰明，就好像我去參加婚禮，或者我在一個婚禮上，但他們都在農場干活兒。

黑夜比（在學校的）白天具有更廣闊的活動空間，更多的自由和尋求刺激的機會，“家伙們”自然更喜歡黑夜。從某些方面來看，學校是夾在各種機會——在街頭尋求刺激、和哥們兒一起去舞廳，或者試圖泡妞——之間的空隙。在“家伙們”保存的日記里，提及學校的也就“我去上學”這一句話（威爾只用碩大的括號表示），盡管這些日記的本意是讓學生記下“一天中發生的主要事件”，但他們記下的大部分細節都是放學后的事，包括非常重要的“回家，換行頭，出去玩”。不過，雖然學校被很多“家伙”排除在生活之外，但我們不應該誤以為這種“隱形”意味著學校在他們的經驗中就毫不重要了（詳見下一章）。

這些“家伙們”晚上出去，到商業舞廳而非青年俱樂部玩，去酒吧耗著而不是待一會兒，還要買時髦的衣服，買煙抽，帶女孩出去玩，所有這些都被視為“生活真正的意義”，同時也給“家伙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他們放學之后的生活中最大的壓力恐怕就是缺錢花。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畢竟，沒有面包，你就沒法生活，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他媽的錢是生活的調料，錢就是生活。沒有錢，你就得死。我是說你就沒吃的，你總不能吃樹、啃樹皮去吧。

他們利用所有可能的資源：親朋好友、泛泛之交，他們亦遍尋社區里所有能干的活兒：做小買賣，給商店打工，送牛奶，打掃衛生，配鑰匙，賣冰激凌，在超市里堆貨。有時他們同時兼幾份工。一個星期工作十個小時以上并不為奇。從四年級起，斯派克覺得他在床單批發店里的工作比功課重要得多。他樂得向學校請幾天甚至幾周的假，好去打工。他為自己賺來和花掉的錢感到自豪：他甚至幫他父母“在情況不妙的一星期里”付了煤氣賬單。夏天的時候，喬伊和他的哥哥當油漆工。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上學是一種強迫性的假期。毫無疑問，在“真實世界”里“自食其力”、處理大筆現金（斯派克一星期經常能掙二十多英鎊，雖然其他人平均只能賺不到五英鎊）、和成人平等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家伙們”的自信心，他們覺得至少在這點上他們要比學校“懂的多”。

他們甚至覺得自己比老師優越。老師們不知道“現實中的規矩”，因為他們一輩子就呆在中學或者大學里——“告訴我們，他們知道什么？”正如下一章將要顯示的，反學校文化和工人車間文化之間有很多根本上的相似之處。“家伙們”將工人階級世界的工作視為唯一真正的世俗來源，這直接哺育和強化了不斷彰顯的反學校文化。

但是，這種與工作世界的接觸并不是為了文化熏陶。這種接觸發生在因現金需求而生成的特殊網絡中，在這個網絡中這種接觸既有回報，也被利用。在這個階段，接觸工作世界的方式再生產了這種接觸的特色之一：現金統治。例如，“家伙們”幾乎都“欺詐”和“騙鬼佬”，這是出于緊迫的需要而不是什么繼承傳統：因為他們需要現金。正如斯潘克斯說的，“你出門，要是口袋里有錢，哪怕是剛夠買一品脫啤酒的錢，你就會感覺不同”，要掙錢，只有兼職打工，還有耍耍“欺詐”，這在他們的世界里也算一種額外的能力。從小接觸工作有助于他們形成一些參照系，從而決定他們今后對勞動和報酬、權威及其平衡的認知，也培養了他們對那些管理、指揮他們的人的怨恨。

［關于兼職的小組討論］

斯派克　（……）大概早上八點的樣子，他［屠夫］有一部電話，他有一個裝著十個先令的大包，他從電話上抽出了兩根電線，要是我碰包，電線就會掉下來，你知道。我打開那個包，把那十先令拿了出來，把包拉上，然后就把包放在那兒。他說：“他媽的你動了那個包，電線本來在電話上面的。”好吧，我也不能多說什么（……）所以他就叫我滾（……）

威爾　（……）對了，［他曾工作過的一家蔬菜水果店］外面有個廁所，但是廁所里堵滿了發臭的蔬菜和亂七八糟的東西，我過去常把它們［花椰菜］放在水箱上，對吧（……）他說，我看見他在數那些菜，他說：“哦……少了一棵。”我說：“我不知道。”（……）他說：“少了一棵。”我說：“沒有啊。”他說：“就是少了。”我說：“我肯定在那兒放了一棵，那兒有一棵。”然后他又數了一下，我是對的。我覺得他是想找我的茬，我想那是周五晚上的事。第二天（……）我在后邊點火把那些垃圾什么的給燒了，結果我把什么都給燒了，所有的堤壩。那有點像鐵路邊上的堤，就在后院，特別干，干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拿了塊厚紙板，像那么大的紙板箱上的一片，我把它點著扔過去，把后院全給燒了，算是報復他。后來我走進去，說：“堤岸也要燒掉嗎？”［笑］他氣瘋了。他說：“是你干的嗎？”我說：“不是我，肯定是那個屠夫，因為他們剛點過火。”然后消防車就來了。

有時候他們從晚飯開支中省點錢，也會從“書呆子”和年紀小點的男孩身上搜刮點東西，不過“哄騙”一二年級的新生不怎么光彩。最后“把錢搞到口袋里”的手段往往是偷竊。我們不可低估現金短缺給偷竊帶來的物質動力。但是，在解釋偷竊背后的復雜動機時，他們把“做賊”看成是和打架一樣的刺激源頭。偷竊讓你冒風險，打破對自我的管束。偷竊破壞了“規則”和正式制度的日常控制和限制。在某種形式上，偷竊挑戰并擊敗了權威。反抗成規并從中獲得好處給他們帶來了奇怪的自由，盡管這種自由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你“被瞄上”了，那得動用“瞎編一通、蒙混過去”的技巧，如果你“蒙混過關”，會備感興奮和滿足。當然，有時候你沒法“蒙混過關”。在我調研期間，兩個漢默鎮的“家伙”因為偷汽車上的收音機而被判緩刑。這種情形很糟糕。父母被牽涉進來，官方出具報告，還有各種對法庭程序和官僚冗長訴訟的擔心，以上種種都將刺激化為郁結。這一刻，正式在與非正式的對峙中再次贏得了決定性、不可反駁的勝利。當然，鑒于“家伙們”中偷竊行為普遍，被定罪的可以說少之又少。還有不少勉強脫罪的案例，害怕“被抓”給“家伙們”增加了刺激感，當你“蒙混過關”后更是自覺機敏熟練。

［一次小組討論］

比爾　這兒就是毫無生趣，什么事都沒得做。當你有錢的時候，對吧，你就可以去酒吧喝杯酒；但是，當你沒錢的時候，你只好到那兒逗留一會兒，或者在街上閑蕩，但這兩樣實際上都不好玩。所以你就四處閑逛，找點樂子。

喬伊　這不只有趣，你在那兒，你覺得你能混過去……你從不考慮風險。你就去做了。如果有機會，如果倉庫的門開著，你就進去，看看能偷點什么出來，然后當你出來時，如果你沒有立即被抓，你出來的時候就會特高興。

比爾　因為你要讓人看到你做得到，這是一個原因。

喬伊　因為你又違犯法律了。法律可是非常強硬的權力啊，而我們只不過是小人物罷了，但是我們就是能蒙混過去。

（……）

法茲　（……）我們都［因為在一家體育用品商店偷東西］去了警察局，他先叫了我們的父母來。然后他讓我們和自己的父母站在一起，他，這個警察說，當時我們都站得筆挺，他四處望了望，說：“你！你口袋里有多少零花錢？”他問：“你希望有人偷你的嗎？”他喊到：“不！”他接著說：“你們誰有話要說嗎？”他說：“是，混蛋，讓我走。”［低聲］“你應該說‘對不起’。”“如果有東西沒還回來的話，哪怕一個飛鏢不見了，你們就有罪受了。”班尼·博內斯家里有兩桿氣步槍，史蒂夫有一只彈弩和一把刀，我家里有兩把刀，他說：“要是有東西丟了！”

（……）

喬伊　整個晚上我都在干這個［扒皮包］，然后我就去喝酒花錢，我沒好好坐在那兒，乖乖把手放在背后。我把椅子舉起來，然后跪在下邊，把錢拿出來，這時一個小妞走過來，說：“你在那下面干什么？”我說：“哦，我剛掉了兩先令。”然后她還在那兒問錢的事，我就跑到舞廳的另一邊。她去告訴了警察，警察守在廁所外頭。我出去的時候，他們正好把我堵到這間小清潔室里，他們把我摁在那兒，把我所有的錢都搜出來。她說被偷了四英鎊，這明顯是謊話，因為我只偷了三英鎊，而且我已經花了近一半的錢，身上還剩一英鎊。如果我身上有四英鎊——即使錢不是她的，他們就能懲治我。但我身上沒有足夠的錢，所以他們就沒法拿我怎么樣。

當偷竊對象是學校時，刺激感變得格外強烈，更突顯出他們挑戰權威、敢于冒險又深思熟慮的氣魄，當然能弄點錢也是成就之一。偷學校不但是對教師的直接羞辱，也能把你同“書呆子”完全分開。那些“書呆子”既不需要多余的錢，也沒有那種要踐踏傳統道德的想象力，更沒有那種蒙混過關的機敏。闖入學校行竊包含了很多關鍵的主題：對立、刺激、排他、金錢的驅使：

X　我沒法想象我們［前幾天闖入學校行竊時］怎么會被抓住。如果，你知道的，我能想象［最近學校剛被強行闖入后］其他人是怎么被抓的，他竟然就把門打碎，走了進去。這里到處都是他的腳印，他砸碎了一扇窗戶，到處拉屎，還把書扔得滿地都是……

Y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戴手套，我們離開他家前，我們甚至清空了口袋，以確保不會在那兒留下任何可以暴露身份的東西。我把所有的東西都留在他家，他也這么干了，我們就那樣走了進去，我穿著一件褐色的高領衫，牛仔褲，手套，對吧，他渾身都是黑的。

X　一身黑，臉也上了彩。［哄笑］

Y　不。我們本來打算這么著的。不是嗎？我們到你家去涂臉，我們本來是這么打算的，但是我們后來一想不好。

PW　你們做那事的時候緊張嗎？

Y　嗯，緊張。

X　哦，啊。你知道的［發抖］。因為你知道的，我總是……哦，我扒過別人的口袋，對吧，我看見兩個先令在地上就拿走了，但是我以前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我喜歡。

Y　我也做了，真的很享受！

X　之后走在路上，我們就是感覺很爽，不是嗎？我們是，對吧，就這么干成了。

Y　然后我們把錢都花在那家泉水酒吧了，是吧？在老船酒吧撒野。

X　哦，呀……我省下十個先令去溜冰場，記得嗎？

—　記得。

PW　為什么你們不想干點別的，而要闖進學校行竊？

Y　他媽的沒錢啊（……）

X　我們對學校很熟悉，如果你闖入別的房子，不能確定里面有沒有人，這有點冒險，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吧，但是你知道沒有人晚上睡在學校，你知道幾乎沒有可能被抓住。

### 性別歧視

“家伙們”的排他性意味著另外兩個人群也被排除在外，而且“家伙們”自視優越于他們：女孩，以及少數族裔。

他們對異性的態度是最微妙復雜的。他們對女性的看法充滿矛盾：女性既是性交對象，也是居家良人。本質上，這意味著女性必須具有吸引力，但又不能有性經驗。

當然，“家伙們”的性欲顯而易見。談話中，性是常見話題，他們用充滿色情意味的故事和玩笑來談論女人的被動性，或者討論男人特有的性欲。故事的中心通常是他們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女孩的感受或者他們之間的關系。他們討論女孩子時只關注女孩子們的性吸引力，她們的身份則微不足道：

X　這個派對上，我在親這個小妞，正要往她上身摸，突然感到有只手放在我雞雞上，逗我……我想：“操，我們還在這里呢。”然后我試著把手伸到她的短褲里，但是她阻止了我……我想：“這倒好玩了，她逗我雞雞，卻不讓我把手伸進她的短褲。”反正后來我們走回家的時候，喬伊問我：“你和那個小妞玩得爽不爽，她是不是在挑逗你？”我問：“呀，你怎么知道的？”他說：“那不是她的手，是我躲在你后面，是我把手伸到你兩腿中間去的！”［笑］

Y　我可不會操那心［用避孕用品］，我想我一定不能生育，我也來回射過好多次了。你知道，我可不操那心……我不想把那玩意兒抽出來，盡管之前有幾次我抽出來過。你那時和她糾纏著，打架似的干那事，你已經把她的短褲脫了，你剛把它拿出來［他做了個演示：兩腿分開，在拉鏈上來回比劃］，然后“噗”地射了［停止不動地演示］，你射得到處都是，糟糕透了。

盡管女性是性欲對象，但是她們不允許有直接、明確的性欲。這里的情緒很復雜。一方面，她作為性的對象和商品，實際上因為性而遭受貶損；毫不夸張地說，她們一文不值；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浪漫或者物質的消費品。享受這種貶損被視為自毀行為。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女性被壓抑的性欲，所以擔心女孩一旦有過性經驗，體會過性的樂趣，她的性欲閘門就會打開，從此變得淫蕩。

Y　好吧，你要是和一個玩過之后，就像你干過那事之后，她們就跟妓女似的，跟誰都能上。我想，她們一旦有過那個之后，就總想要，不管是跟誰一起干。

當然，“隨便”的名聲——不管是真是假——傳得很快。“家伙們”在舞廳里的目標就是那些“隨便就能上的女孩”，雖然他們不怎么愿意被看到和她們“出去約會”。

和“隨便就能上的女孩”相比，“女朋友”屬于截然不同的范疇。女朋友代表著未被淫蕩辱沒的人類價值。她是忠誠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經驗——至少不能和別人有過。“老婆們”的風流韻事一旦流傳開去，就會對男性氣概和自尊帶來極大的挑戰。他們必須用男性化的方式應對：

［一次個人訪談］

X　他總是說三道四的，之前他就跟我的“老婆”出去玩過，然后他總是說些我不想聽的話，然后你知道的，事情就傳出去了……他還不他媽的吸取教訓，他做了什么，他說了什么，好吧，我因為這些狠狠揍了他一頓，他都不帶還手的，他這色鬼跑了，然后他又說了點別的（……）他從周五就沒來過學校（……）我要是抓到他，就要把他殺了，如果我把他摁到地上，他必死無疑。

求愛是很嚴肅的事。“家伙們”常把女朋友叫“老婆”，這可不是隨意為之的結果。鄭重的求愛過程涉及一系列新的意義和內涵。它們所指的對象是家：可靠，居家——與場面上那種性感小貓截然相反。如果最初的吸引發自于性，那最終敲定則是靠否定性——當然，這主要是否定女孩對別人的性欲，同時也否定性是他們之間關系的主要內容。居家規范嚴禁了淫蕩的可能性。

［一次個人訪談］

斯派克　（……）我找對了妞兒，到現在為止，我和她好了十八個月。她很乖。她不會看其他男生一眼。她做得不錯，也很干凈。她愛做家務。我昨天買的褲子拿過去，她今天就幫我弄好了（……）她好極了，我想盡早把她娶回來。

女朋友的模范自然是母親，本質上就是限制的模范。盡管“媽媽”很受敬愛，但她無疑扮演著低等的角色：“她有點笨，比如她從來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不懂這些玩意兒，只有我爸懂”。在家里，很明顯，男人認為自己有權被母親伺候。

［一次個人訪談］

斯潘克斯　（……）你不該那么做，你在家不應該幫你媽干活兒。當然，你應該把鞋子放整齊，把你的大衣掛起來，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該去打掃衛生，為她鋪床，干這類的家務活。

既要具有性吸引力，又不能有性經驗，夾在其中的工人階級女孩只能順服，這繼而增強了“家伙們”的優越感。女孩的出路是走青年雜志宣揚的浪漫主義。在非正式的女性群體中，她們說的是“迷戀”，把性欲升華為聊天、謠言和互傳信息。[［6］](#_6_159)這不是說她們從來沒有過性經歷——很顯然很大一部分人一定有過，但是她們與男孩關系的主要社會形式是小女孩式的性感，現代的求愛方式，不存在真正的求歡。這樣一來，最初吸引男孩的性刺激就能轉化為體面的居家價值觀和一夫一妻式的服從。可既然他自己能夠“干上”，為什么別人就不能干呢？即使男孩子突發奇想遇到這樣的問題，他也能平靜地想：“她可不是那樣的人，她內心溫柔。”這樣，浪漫主義在父權社會中中和了性欲。這使得女孩可以展示性感但不允諾性交，變得性感但不肉欲。

但是，“家伙們”卻把女孩這種浪漫行為看成社會關系中簡單、馴服、柔弱、愚蠢和迂回的表現，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整天像鄉下丫頭一樣傻笑”。女孩們一旦放棄了自信、肉欲的角色，這場游戲就任由男孩們擺布了。男孩子們上演性沖動的戲劇，掌握主動權，展現男性氣概。他們對自己的意圖毫不保留，也毫不羞于展示他們的色欲。但是，他們認為，他們之所以對于自己的欲望這么坦率直接、不忸怩作態，是因為這是他們男性天生優越感的一部分。女孩子們扭曲、奇怪的儀式被看做是女孩子氣的一部分，是女性天生軟弱、糊涂的表現。他們之所以容忍女孩的浪漫主義，是因為他們自認有男性氣概，對這個世界了解更多。這種男性自尊亦延伸到“家伙們”反學校文化的其他方面，彰顯其自信。這給他們平添了樂趣，無論是在語言、形體、相互之間的暴力關系上，還是在羞辱“書呆子”，甚至是在動用暴力時。

以上各種因素的綜合給兩性之間的交往奠定了特殊的基調。“家伙們”通常開始對話，提出建議。女孩子們則報以癡笑，在自己的圈子里聊天。如果女孩子作出評論，也都是很嚴肅、充滿關愛或者十分人性的評論。她們任由“家伙們”開玩笑，作出苛刻的評論，進行粗暴的總結，或者制造一場鬧劇供女孩子們欣賞。女孩們顯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她們參與了共謀：

［晚飯時一群男女“在車棚邊上”討論］

瓊　今天下午我們都要哭了，這是最后一星期了。

比爾　你只有兩個星期了嗎？我們走的時候都要大笑一通（……）

瓊　我喜歡你的毛衣。

比爾　你要喜歡你可以鉆進來！

威爾　你看到那些老太婆腳踝上綁著繃帶，不覺得糟糕嗎？

瑪麗　我又沒綁，而且我不胖。

威爾　我沒說你綁著，我說那挺糟糕的。

比爾　我要把瑪麗的香煙都給偷來，抽光它。［咯咯笑］

（……）

艾迪　你們該回學校了，走吧。［女孩們咯咯笑，悄聲談論著某個“暗戀”艾迪的人］這些娘們兒就在你背后叨你閑話，我的耳朵都紅了。［“家伙們”中有一個打了個飽嗝］

瑪琪　哦，你這豬頭，閉嘴。

比爾　［四處遞煙］給你。

瑪琪　不用，謝謝，我呆會兒會抽根大的。

比爾　哦，她喜歡大的！他的那個很大，你找他，他會讓你看看他的家伙。

其他人　［哼唱］他有個大雞雞，他有個大雞雞……［比爾把大衣脫了下來］

艾迪　亂搞。

比爾　［對瑪麗說］你有沒有亂搞過？

威爾　今天我已經亂搞過兩次了。［笑］你喜歡亂搞嗎？［對瑪麗說］

瑪琪　你這個不要臉的家伙。

威爾　我說的是你的外套。[［7］](#_7_157)

有趣的是，這種打趣可以用在母親身上，但從不用在父親身上。他們跟母親打趣時，語氣更為和善，往往是談家務事而非性話題，但仍舊由他們挑起玩笑，開玩笑的那股勁頭和口吻依舊：

［一次關于家庭的小組討論］

威爾　（……）我就這樣逗逗她，比如，起床以后，我會躺在那兒。她什么話都不說，我就說“閉嘴”，就這樣，“閉嘴，別說話”（……）她有一次對我說：“我覺得你瘋瘋癲癲。”比如還有一次我把我家的煤氣烤箱給點著了。她在廚房，我把烤箱的門拉下來，確保煤氣沒被點著，她進來看到了，問：“你究竟在干什么？”我說：“我在找我的香煙。”［笑］（……）好吧，我就會躺在那兒說，我把收音機打開了，要是放好的音樂，我就會到處跳，拼命制造噪聲。

PW　你媽怎么看？

威爾　她就坐在那兒，我不會在我爸面前這么做。

PW　為什么呢？

威爾　他就是，他不會看到……其實，他會覺得出了什么問題，你知道，然后，哦，我回家看到我媽，我會說：“親我一下，親我一下！”……她會把我推開，說：“走開，你這個傻瓜。”（……）讓她真正生氣的是，對了，是你進來把外套掛上，然后我把她推到墻角，她試圖出去，她往哪兒走，我就堵到哪兒，然后我們就好比在走廊里玩躲避游戲，不到兩分鐘，她就真的氣瘋了。

### 種族歧視

在大部分學校里，我們都能看到三個鮮明的族群：高加索人、亞洲人和西印度群島人。盡管學生中有個體接觸，尤其是在青年活動中心里，但到了四年級，不同族群明顯分開了。在非正式場合，這種區分更為明顯。有一段時期，高級中學的校長讓五年級學生在放假期間用活動室進行“小組聯誼”。盡管這項舉措具有防備性和容納性，但這仍是為了阻止對抗而進行的又一種堅持不懈的微妙掙扎。其結果清楚地顯示了種族歧視文化的非正式模式，盡管這些模式有時被學校的官方結構所掩蓋。

高級中學校長　我們把馬丁斯（比爾）、克羅夫特（喬伊）、拉斯廷、羅伯茨（威爾）、彼得森（艾迪）、杰夫斯（法茲）和巴恩斯（斯派克）放在“歐洲”室；巴克諾、格蘭特、塞繆爾斯和斯賓斯放在“西印度群島”室；辛格和哈吉德放在“亞洲”室。那么多種族混在一塊兒！有三間各具特色的活動室。你到那間白色房間，可以坐下享受一杯茶；你去“印度”室，他們都在打牌，嘰嘰喳喳聊天；然后你走到“西印度群島”室，他們都跟著音樂節奏跳舞轉圈。

在“家伙們”看來，隔離當然是對別人的排斥。他們經常對“中東佬”或者“狗娘養的巴基斯坦佬”實施言語暴力。膚色不同這一事實就足以為他們的攻擊或恐嚇辯護。不同群體之間界限分明，對其他種族的鄙視被簡單地視為種種言行的根據：這是知識運用的一種日常形式。

斯潘克斯　我們嘗試攻擊那些牙買加佬，因為你知道，我們人數比他們多。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想和他們打架。我們在數量上超過他們。

斯派克　但是他們總湊在一塊兒。

斯潘克斯　他們都在那兒，但他們一半人都走了，不是嗎，只留下幾個人。我們大概四個人扁了這個人。

喬伊　我們沒一個人身上有被打的痕跡……那次真是超爽。

對“家伙們”而言，種族身份取代了個人身份，以至于他們在給朋友講故事的時候不說“這個孩子”，而是說“這個中東佬”。在漢默鎮男子學校，族群之間的緊張關系日益加劇、令人憂慮，尤其是在高加索人和亞裔之間，他們有時會陷入暴力沖突。副校長當時把每個人都叫到大禮堂進行教訓，但是這只是一時抑制住了相互厭惡的情緒表達而已。

［就學校最近發生的騷亂進行的小組討論］

喬伊　他［副校長，事件發生后在大禮堂里］甚至一度說起以色列戰爭，說什么“這就是為什么戰爭爆發……要停止”。

PW　（……）他有沒有說服你一點？

喬伊　他就是說說，我們也就是聽聽，心想：“好吧，你這個黑鬼，下次你開始講，我們就把你了結了。”——我們真的會。

無論公眾聲明怎樣說，“家伙們”還是認為教師有共謀的傾向，這加劇了他們隨時表達厭惡情緒并采取行動的自以為是。這甚至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結果，當然，如果教師中存在種族歧視，那也要比反學校文化中的種族歧視溫和得多。但是，總的來說，教師（大部分都是白人）和少數族群學生之間的同情和關系要比教師和白人學生之間的弱很多。在幾乎是自發的文化反映中，少數族裔被視為陌生、不文明的人——不“喝茶”，總是“相互間嘰嘰喳喳含糊不清地說話”，“四處亂竄”。當然，許多年長的教師顯然把20世紀60年代大規模移民涌入和20世紀50年代那種“社會秩序和安靜”被打破聯系在一起，認為這對當初看來平靜、成功的學校是一種顛覆。因此，“家伙們”和教師對打亂秩序的入侵者確實都懷有一種怨恨之情，只是方式不同。這對“家伙們”中的種族歧視予以了雙重支持，鼓勵了充滿敵意的態度。這一次，非正式群體至少得到了來自正式組織幽靈般的支持。

反學校文化中的種族歧視正是由這種具體且有差異的偏見建構的。亞裔處境最糟糕，經常是被欺負的對象，“家伙們”最擅長對他們進行小規模恐嚇、糾纏不清的攻擊，以及對他們薄弱或未防衛的地方進行實際的和象征性的攻擊。亞裔學生被看成是“臭烘烘”，可能“不干凈”的外星人，并具有一些最遭人厭的“書呆子”特征。他們在對待作為標準的英語文化模式時，一方面顯得很親近，另一方面卻顯得很疏遠，因此更遭厭惡。他們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卻想要獲得他們不該擁有之物的入侵者，哪怕那些東西在其他時候備受厭恨和不足稱道。

在“家伙們”手下，西印度群島裔學生的處境略微好點。盡管他們顯而易見是“外國人”，有時候“臭烘烘的”，可能“很臟”，但他們至少更適合當地的文化地形。他們不像循規生那樣成績好，這被看成是符合他們的低等地位；同時，他們自身的對抗性、男性化和激進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與“家伙們”的文化相一致。各年級男生之間有限的互動，是以他們共享的文化興趣為基礎的，比如“出去玩”、注重名聲、舞廳、靈魂樂、節奏布魯斯及雷鬼音樂。但是，當種族厭恨與一些共同的文化興趣相結合時，在性關系方面，“家伙們”感到了直接的性競爭和嫉妒，總是懷疑西印度群島裔的男學生的性欲意圖和行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自己對性的手段和利用女性的態度異常坦率。當然，“家伙們”很少意識到自己在潛移默化中，至少在“求愛”這一嚴肅階段被一些不成文的、去性欲的、一夫一妻的規則所束縛，而這些在西印度群島文化中并不為人所顧及。

典型的西印度群島裔的學生對待女性的方式令人艷羨和懷疑，但他們也被認為很愚蠢。“家伙們”自有一套什么算“機敏”、什么是“常識”的定義，他們嘲諷和公開指責“蠢笨”的對象一般都是西印度群島裔的學生。對“書呆子”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些模棱兩可之處，但拿“中東佬”開涮，說他們“愚蠢”、“像蠢驢”和“笨蛋”就肆無忌憚了。這一系列偏見真實存在，充滿敵意，尤其在涉及性時往往能引爆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比起對亞裔的偏見，這些偏見使“家伙們”更舒服。

##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 階級形式

到目前為止，本書的重點還是在于學校中自發自創的對抗形式和文化風格。本章將把反學校文化情境化。反學校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的聯系并非偶然，它的風格不是獨立的，它的文化技巧亦非獨特。盡管反學校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很明確，但我們必須在更大的工人階級文化背景下來理解它真正的本質和意義。這部分以我在“家伙們”離校進廠上班后進行的田野調查以及在他們家中采訪他們父母所獲得的資料為基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反學校文化與工人階級的車間文化有很多根本的相似之處——大部分反學校文化成員注定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盡管我們必須考慮地區和職業的差異，但工人階級車間文化的核心是：無論條件多么艱苦，上級指導多么苛刻，人們總是在尋求意義，并為之搭建參照體系。他們運用自己的才能，即使在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動中也能尋求到樂趣。矛盾的是，他們能從死板的工作經歷中活出一種生動的文化，這絕不是對失敗的簡單反映。在反學校文化中，我們亦能看到這種在令人疏離的環境中立足的根本理念，同時，他們都試圖在枯燥的制度下編織出屬于自己的興趣和娛樂。這些文化不只是人類與不快之間層層疊疊的填充物。這些文化自有其邏輯，使用各種技巧、動作和行為，以達到特定目的。

就如同加入反學校文化一樣，僅僅擁有失敗者的資格是遠遠不夠加入車間文化的。加入車間文化，需要有一技之長、反應機敏、充滿自信，最重要的是能增強，而不是減弱現存的社會力量。正式命名的機構所支持、建構和組織的不是這種進行中的力量，因為那些機構要求按書面規則行事。

反學校文化所推崇的男性氣概和強硬風格反映了車間文化的一個中心主題：男性沙文主義。貼在堅硬、油膩機械上的爆乳封面女郎是赤裸裸的性別歧視的一個例子，車間里更是普遍充滿了象征性的男性氣概。下文是喬伊的父親，一位鑄造工，在談論自己的工作。他不善言辭，但這可能更說明問題，他證實了做好艱巨工作所帶來的自尊以及名聲——在我們的文化里，這基本上就是男性自尊：

我在鑄造廠工作……你知道嗎，落錘鍛造……你懂不懂這個……好吧……廠子就在貝斯納街上，很吵……你走在街上就能聽到……我在大錘子上干活兒……是個載重六噸的落錘。到現在為止，我在那兒已經干了二十四年。那兒吵極了，但我現在已經習慣了……那兒很熱……我不覺得無聊……總是有新的流水線進來，你必須想法子把它做好……你總得不停地干……活兒很重，那些經理們都干不了這個，沒幾個強壯到能一直提著這個金屬疙瘩……我一星期賺八九十英鎊，不壞吧？……這活兒不容易……你絕對可以說我賺的每一分錢都是實實在在的血汗錢……你要知道，你必須跟上機器。總經理，你知道我會對他說“你好”，還有跟進度經理打招呼……他們會來看看，我會說“沒問題”［豎起大拇指］……他們都認得你，你知道……一幫人站在那兒看你……工作……我喜歡那樣……是那么回事……看著你……干活兒……我喜歡……你必須不停地干才能有足夠的產量。\*

車間里綜合了沙文主義、強硬態度和男性氣概，這種獨特的綜合并不落伍，也不會隨著產業生產模式的變化必然消失。和這些態度最為密切相關的是那些艱巨、令人不快、吃力的工作，這些工作目前仍有很多。從建筑工到煤爐工到深海捕魚工，這一系列工種依舊要求面對相當艱巨的體力任務。現在，與這些工種最相關的基本態度和價值觀仍舊活躍在工人階級文化，尤其是車間文化中。這種態度的普遍性和力度與真正從事繁重工作的人數其實不成正比。即使在所謂的輕工業，或者高度機械化、體力勞動強度大大降低的工廠中，象征力量、男性氣概和名譽的人物形象依舊潛伏在車間文化更為多樣、可見的形式中。盡管工廠雇傭了越來越多的女工，其根本風貌依舊是男性化的。

車間文化的另一個主題——至少就我在英國中部地區加工制造業所觀察記錄到的而言——是為了獲得對生產過程的非正式控制所進行的大量嘗試。從管理的特定角度來看，自泰勒[［8］](#_8_157)以來，限制產量或者“系統性怠工”以及“逃避工作”時有發生，但現在有證據顯示，出現了更為統一協調，盡管仍舊是非正式的獲得控制的嘗試。出于種種意圖和目的，這些工人實際上有時已經至少控制了人員配備和生產速度。我們可以再次從工人階級子弟的種種嘗試中看到反映：那些孩子借助他們的文化資源，試圖控制課堂，用自己的非正式時間表替代學校的正式時間表，并控制自己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空間。當然，這種相似之處有一定局限，那就是“家伙們”可以完全擺脫學校，但“活兒”必須在工廠里干完，至少要為基本生活費而工作，一定量的工作被視為是必須而且正當的。下面是一個“家伙”的父親在家接受訪談時談及的內容，他在一家工廠操控一條生產汽車引擎的生產線。

事實上，工頭和領班他們管不了這里，是我們工人在管理這個地方。好吧，我是說，你對某個小伙子說：“這樣吧，今天你干這個那個。”你不能和他爭。領班并不分配工作，工人自己相互交換，輪流著干。啊，但我的意思是說，活兒還是都得干完的。如果領班給你活兒，你就得干……他們想要一個早上干完，你知道吧，把活兒交給一個小伙子，但他一直在干這個，你要知道，我想他整個星期都在干這個，他們剛磨過工具（……）這條生產線上有四個難活兒，還有一打那種……你知道的，老實說五歲小孩都能干的活兒，但是每個人都能輪到。這都是我們工人自己組織的。

車間文化和反學校文化一樣，基于相同的組織性團體。非正式群體奠定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文化要素。正是這個團體生成并傳播著那些與官方權威爭奪符號控制和真實空間的策略。這個非正式組織無處不在，并將車間文化與中產階級工作文化區分開來。

在工人當中，非正式群體也是物物交換、搞定“外人”，以及“哄騙”的基礎。這些都是“家伙們”在校行徑的衍生和擴展。

車間里的非正式群體對循規者和告密者的態度與“家伙們”如出一轍。車間里盛行“贏來”東西，這就好比“家伙們”的偷摸行為，而且都得到了模棱兩可的非正式贊同。對那些沒能維護、保全這個世界的人，他們給予的懲罰是放逐，這樣他們才能免受正式制度的不斷侵擾。以下是另一個“家伙”的父親談論工廠生活：

工頭嘛，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們想要成功，想要升遷。他們要把每個人都逼急了自己才能成功。工廠里就有這種人。當然，他們都被工人們弄得很慘，他們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耍很多把戲。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他們不喜歡看到任何人卑躬屈膝（……）就好比，本應該［從倉庫里］拿一副眼鏡，但吉姆拿了兩副，你看吧，他還拿了一對面罩，大概六副手套。因為那個馬丁看見了，事實上兩天以后我們發現他跟工頭說他看見了。工頭把吉姆叫到辦公室問這事，然后（……）好吧，我的意思是，他不值得活下去了，對吧？哦，沒人再跟他講過話，他們不會給他點煙，沒人會給他點煙——好吧，他再也不會干那事了，他再也不會做了。我是說，有一天早上他把他的水壺放在爐子上，他們就把它踢飛了，你要知道，他們把水倒出來，放沙子進去，盡搞這些玩意兒（……）如果他去領班那兒說：“有人把我的水打翻了”，或者“他們在我杯子里放沙子”，諸如此類的，“那是誰干的？”“我不知道是誰干的。”他永遠都找不出是誰干的。

車間里獨特的語言形式和高度發達、具有威脅性的笑話也和反學校文化極為相似。車間里很多言語交談都很不嚴肅，也與工作無關。他們說笑話、“嘲弄”、“開玩笑”或者“找刺激”。要流利運用這種語言需要真正的技巧：你要能辨認出什么時候你被“涮”了，還得及時給出合適的反應，以免上當被嘲弄。

這種打趣很難靠錄音機來再現，但是它給車間談話交流帶來了獨特的氣氛，車間里的成員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有時候他們在描述車間情形的時候也會重現這種氣氛。以下是另一個鑄造工，也是漢默鎮一個“家伙”的父親，他在家里聊他所在車間的氣氛：

哦，我們有各式各樣、成千上萬種［笑話］。“想聽聽他是怎么說你的嗎？”其實他什么都沒說過，你要知道。在那些地方工作，你當然要知道這些話。“你剛才說我什么來著？”“我什么都沒說。”“哦，你這個騙人的家伙。”諸如此類。

與這種具體、極富表達性的口頭幽默相配合的是發展成熟的肢體幽默：基本上就是惡作劇。這些玩笑帶勁、尖銳，有時候甚至殘酷，而且惡作劇經常圍繞車間文化的基本信條展開，比如中斷生產、顛覆老板的權威和地位。下面這位在一家汽車引擎工廠做工：

他們開你的玩笑，把箱子上的螺絲擰下來，他們在他的錘子下邊涂漿糊，軟糊糊的小玩意兒，他們把他的錘子放下去，撿起來，沾了很多漿糊，你知道的，諸如此類的事。所以他過來拿了個注射器扔進裝漿糊的大桶里，桶就那么深，恰好落在桶底部，你不得不伸手進去把注射器拿出來……這個把戲夠惡心，但是他們照做（……）他們說：領班叫X去泡茶。好吧，他已經在那兒工作十五年了，可他們還總是讓他“去泡茶”。他去廁所，尿在茶壺里，然后用它泡茶。我是說，這是你得知道的事。他說，對吧，“如果我泡茶，我就把尿撒在里邊，如果他們讓我去泡茶的話”（……）所以他起身，往茶壺里撒尿，然后把茶葉包放進去，然后他再把熱水倒進去（……）Y，一個領班，第二天感覺不舒服，“我的胃今天早上不舒服”。之后他告訴他們，他們就把他做的所有事講了，“你再也不需要給我們泡茶了”。他說：“我知道我現在再也不需要了。”

有趣的是，在反學校文化中，很多玩笑也圍繞權威這個概念本身及其非正式補充：“告密”。還是上面那個男人，他說道：

他［約翰］說：“托尼［一個新來的工人］，給我拿幾塊面包布丁來，今天我們喝下午茶的時候吃。”那個女的給他在包里裝了一些，他說：“把它們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出去的時候不用付錢。”（……）托尼把面包放進口袋，帶著他的晚飯走了（……）我們從餐廳回來后，約翰告訴了每個人，說他［托尼］偷了兩塊面包布丁（……）他跟一個工頭弗雷德說了，因為弗雷德知道了，我是說……約翰說：“我必須告訴你，弗雷德，”他說，“托尼偷了兩塊面包布丁。”真的，你能想象現在他們看你的樣子（……）他盤問約翰托尼所做的一切，弗雷德繃著臉，說：“二十分鐘后到我辦公室見我。”哦，約翰，他幾乎要哭出來了（……）我們說：“這回鬧大了，你有麻煩了，你會被開除的。”就這么回事（……）他們沒有笑。他說：“你覺得接下來會怎么樣？”“好吧，會發生的嘛，你可能得拿回你的工作卡。”（……）“哦，那我該怎么辦？上頭有該死的史密斯，他這回把我搞慘了，我下次要回敬他。”“啊呀，托尼，”我說，“那不行，如果別人偷東西要受處置，那你為什么就能不受處置？”“噢。”不管怎么樣，弗雷德來敲窗戶，說：“告訴托尼我要見他。”他說：“我不知道我該怎么辦。”（……）他們出來以后就笑了，我問：“他對你說了什么，托尼？”他說：“他問我是否真的偷了兩塊面包布丁。我也不好抵賴，我就說是。他說，我想要知道的是為什么你不給我和其他人也帶兩塊回來呢。”

“家伙們”拒絕完成學校功課，總感覺自己知道的更多，這種情緒也能在車間里找到；工人階級文化普遍認為實踐比理論更重要。一個工人從火柴盒背面抄來一句話，寫成很大的標語放在車間里：“一盎司的敏銳直覺可以媲美整座圖書館的學位證書。”車間里充斥著關于純粹理論知識愚昧不堪的虛構故事。實踐能力才是首要的，是其他知識的基礎。在中產階級文化里，知識和文憑被視為個人在各種實踐中實現提升的途徑；然而在工人階級眼中，理論是附屬在特定生產實踐上的。理論如果不能維持其相關性，就會遭丟棄。下面是斯潘克斯的父親在家里所做的評論。他講的故事正突出了工人文化看待“理論”時的不偏不倚、習以為常。

在托安德路上有一個車行，我曾經在那里兼過職……那兒有個老頭，一輩子都是機械工，他那時一定有七十歲了。他是漢默鎮的老專業工，以前曾經做過職業拳擊手，是個老家伙，他很實際，他是實際的人，對吧？……是他給我講的這個故事（……）我正在和他說話呢，在說什么事，然后他就說到了這個（……）“這個小子光知道理論，什么都要靠書解決，”他說，“你知道嗎，”他說，“他有一次訂了一本書，書寄來的時候是裝在一個木箱里的，書到現在還是在那個箱子里，因為他打不開那個箱子。”好吧，這不是真的故事，對吧？但是講的道理是真的。故事不是真的，那沒發生過，但是意思是對的。他沒法拿出箱子里的東西，因為他不知道怎么打開那個箱子！那還有什么用處？

這可以看做是知識的階級功能，明確但通常不被注意。如果不是處在階級社會，工人階級的觀點可能才是理性的看法，即理論只有在真正能幫助做事、完成實際任務、改變自然時才是有用的。理論必須與物質世界形成緊密的辯證關系。然而，對于更在乎自身在階級社會中所處位置的中產階級來說，文憑作為社會性的掩護，是攀登社會階梯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理論即使從未被應用到自然中，它還是值得擁有。理論的目的在于明確判定要把理論應用到哪里，或者哪里根本不需要理論。矛盾的是，工人階級對理論的反感和排斥，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一種認識，即理論在社會偽裝下空洞無物，即使是在這種認識被壓制的時刻。

甚至那些在大城市高級社區的重點文法學校上學的違規生也認同理論在社會實踐中所表現出的社會本質。對他們來說，文憑是階級社會的一種選擇和社會流動性。它不僅僅是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能力。事實上，正是這種核心認識抑制了他們的反學校情緒：

拉里　……我想做的啊，我想上高中高級課程［他才剛剛完成普通課程考試，決定繼續讀高級課程］，然后環游世界，那就好啦，過幾年苦日子，就是隨便找個地方睡，然后再繼續，但是至少那時我可以選擇到底我是想繼續，還是想回去找份體面的工作。如果你有各種文憑，那你就可以選擇你想做什么：是想放棄，或者是想繼續呆在這個系統里。但是如果你沒有文憑，你知道的——如果我沒有這些文憑，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只有獲得這些文憑我才能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得到文憑了，至少我會知道我的選擇，到底是找份穩定的工作、享受養老計劃、買車、養兩個孩子、討老婆、按揭房貸這些東西，還是我就是想周游世界。

當然，更廣泛的階級性在風格和對抗力量上賦予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以獨特的氣場和共鳴，并作為重要經歷使他們為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做好準備。盡管所有形式的制度都可能產生自己的非正式補充，盡管無論什么階層的學校里都會產生對峙性文化，但是，恰恰是制度性對立與工人階級背景和模式的關鍵結合，使“家伙們”的文化具有了獨特的個性和意義。制度性對立因其階級處境和表達而具有不同的意義。盡管重點文法學校里的違規生對學校的態度和“家伙們”的相似，但他們知道自己和漢默鎮的“家伙們”不一樣。他們不能光靠制度手段來超越自己的階級地位。最終，他們不僅對文憑的看法不同，而且勢必也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認知。

拉里　和你［在漢默鎮］聊天的那些孩子，他們很多人都把我們看成是娘娘腔，因為我們上文法學校。不僅因為我們上文法學校，也因為一開始我們就來自這個被看做很勢利的小區。

事實上，文法學校里的違規生群體中有一些成員來自于工人階級家庭。盡管他們出身工人階級，抱有反學校態度，但是他們的學校文化中缺乏工人階級氛圍，因此他們的經歷也與“家伙們”極為不同。這也可能導致他們刻意試圖在街上和其他人顯示團結。對抗學校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具有創造性和獨特性，并由特定的個人和團體在特定的環境里再生產——雖然這些形式具有階級性，但是突顯了這群孩子文化上的笨拙和孤立。即使有工人階級背景和反學校傾向，由于缺乏集體的、以學校為據點生成的階級文化形式，他們的工人階級認同還是受到嚴重削弱。

約翰　那些小孩（……）隨意地把我定義成那種［勢利鬼］（……）我住在一所叫“靈克斯”的學校旁邊，那里有很多小孩，“哦，他上文法學校呢。哦。”好吧，我的態度是，我永遠不想被那樣叫，我覺得實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沒有努力提高過我的英語。我有一些做事的基本原則。這只是為了確保每個人都知道我不是個典型的珀西瓦爾·瓊斯（……）他的口音可漂亮了，“老克勒”那種，是拜倫·雷恩夫人［指中產階級口音］那種人，你知道的，不是我們這種，是特為學校自豪的那種（……）我曾對那些實在讓我心煩的小孩說，“我知道我比你們好”，你知道吧，但是當我故意糟蹋自己的時候，我是要確保大家知道我不是那種人。

或許可以說，中產階級學校里違規生——不管他們各自出身如何——所為之努力的就是把制度性對抗轉換成一種更能引起共鳴的工人階級形式。一旦他們成功，受到本書后續部分提及的種種過程的影響，他們的未來就要“受罪”。如果他們失敗，或者假設工人階級出身、循規的男孩不受工人階級文化影響，不經歷成為工人階級的過程，那么他們就更可能“成功”。文化定位，尤其是在不同模式間轉換的文化定位，是解釋社會流動性更為有效的模型，要比用機械的、缺乏辯證的“智力”來解釋更為有效。

### 制度形式

無論反學校文化的形成、自我奮斗、贏得勝利是多么艱難，這種文化必須放在工人階級文化的大模式中去理解。但是，這不應該使我們誤以為這種文化是一個整體，沒有內部差異，并由可以無性繁殖般進行自我復制的標準文化模塊所構成。

各種階級文化是在一定環境中從特定的對峙中被創造出來的。它們在與其他群體、制度和趨勢進行長期斗爭的過程中得以產生。一種文化的獨特表現受特定環境的影響，并在某些熟知的主題上有其特有的配置和發展形式。這些主題共存于某些特定表現中，因為在階級社會中處于同一層級位置的人共享著相同的結構特質，工人階級面臨相同的問題，都處在相似的意識形態中。除此之外，階級文化得到了諸多非正式群體網絡以及無數相似的經驗的支持，因此其中心主題和思想都能在實踐中得以發展并產生影響，哪怕它們的直接邏輯可能并不是最合適的。一整套風格、意義和可能性被不斷地再生產，當有人拒絕被格式化、被官方限定地位而試圖尋求對統治更為實際的解釋或關聯的時候，他們總能從中獲得自己要找的東西。當這些主題被采納并在具體環境中被再創造時，他們就被再生產、被強化，進而作為一種資源被其他處于相同結構位置的人所使用。

但是，這些在特定社會區域內借用、再生和歸還的過程通常并不被相關的人承認是階級過程。無論是結構性不平等產生支配關系的各種制度化、約定俗成和習慣性的形式，還是它們被突破、遭到反抗和被改造的地域性形式，本質均未被真正認識。這部分是因為各個社會區域及其制度性支持以及社會關系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分離和自主的，并獨立于社會系統的其余部門。它們有自己的程序、規則和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平衡。它們有自己特有的正當信念以及自己特定的反叛、非正式的圈子。

因此，盡管它們有相似之處，但是如果我們草率地把特定社會形式和社會區域簡化為明顯的、控制與反抗之間的階級力量對比，那我們就錯了。它們既有地方性或者制度性的邏輯，同時也有更寬泛的階級邏輯。如果沒有這些區域性抗爭，廣義的階級邏輯就不可能得以發展和表達；但是，如果這些區域性的抗爭脫離了廣義的階級邏輯，就不可能出現內部分化和系統的結構化，整個系統也不可能被再生產。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立學校，以及學校中對抗性工人階級文化最鮮明的表達，向我們提供了一個資本主義秩序下階級沖突和階級再生產的重要案例。尤為重要的是，這個案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意外后果的循環，最后不但再生產出一種區域性文化，而且還再生產了階級文化及社會結構本身。

對峙的出現

即使初級中學中存在社會分化，但每個人在初中頭幾年看上去都像“書呆子”。即使是少數幾個進校時就已有不良行為、熟悉社會環境的學生，因為沒有群體給予幫襯支持，他們的表現也相當循規。

［一次小組討論］

斯派克　第一年的時候……我能看出哪些是書呆子。第一天到學校我就知道誰是高年級男生，因為看他們在操場走路的樣子就知道（……）我頭兩個星期挺安靜的，我就一個人呆著，因為我誰也不認識，我花了兩年時間才交了幾個哥們兒。但是，呃……后來，第三年才是正當時候的一年，我們打架，總被老師叫去訓話……

但是，有些人在四年級第二學期脫離了這種循規模式。從學生的角度來看，這種脫離是學校生活的一道顯著分界線，所以他們對此記憶猶新、興致勃勃。“公開”成為“家伙”是一種個人成就。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第二年的時候，我想，“真是該死的損失”，因為我一個哥們兒都沒有，我看其他孩子互相打鬧，我就想，“真是該死的損失，你得有個互相打鬧的伴兒”。所以我就去找諾亞和班森開玩笑，他們兩個現在都不是我們一伙的了。他媽的班森，發生了一些事，一些糟糕的事，他現在確確實實成了個“書呆子”，不過我還是喜歡他，他還能讓我開心。他發不準“r”這個音（……）但是我記著呢……我以前跟他倆見面是因為我媽當時還在工作，我爸晚上經常出去，所以我就抓上他們倆：“今天晚上你們想來我家玩嗎？”當時光頭黨剛剛開始流行，我覺得班森他們是最早有李維斯牛仔褲和猴靴那種大頭軍靴的人。然后我就開始跟他們一起玩鬧了，他們第一天晚上來我家，我們喝了很多威士忌，然后我假裝喝醉了，其實我沒有，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的。后來我們不怎么在一起玩了（……）我們以前總是坐在一起，我們曾經一起瘋玩，那時候玩就是用尺子互相打對方，老是聊天，就是這么開始的。后來比爾開始跟著我們玩，然后是弗雷德，接著是斯派克……從那會兒開始我們的隊伍就壯大了，也變得越來越散。我們以前總是在晚上出去，老是用尺子打對方，我們還用瓶子扔對方，我們主要干的就是在大街上晃蕩，四處找瓶子來扔對方。從那以后，我們開始搞破壞，這里搞一點，那里搞一點。

［一次小組討論］

弗雷德　我是在第二年開始變野的。我和斯派克最先開始，第一年還是第二年的時候，我的成績還是第十二名呢，然后我遇到了比爾他們（……）有一天晚上我們和他們出去，我們撿了一大箱空瓶子，比爾他們撿的。我覺得如果我不照著做，他們會覺得我是個傻逼……我就收集了一箱瓶子，朝他們扔，你要知道，我和斯派克當時挺怕的，他們還沒開始跑的時候我們就跑到了馬路盡頭，然后比爾開始扔磚頭，然后就什么都干，刮汽車上的油漆，可帶勁了。

“家伙們”說起這些變化時有聲有色，但自己很少思考其后的深層原因。顯然，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個尋求友誼的問題，甚至有點隨機性——恰巧在一個班上，坐在誰的旁邊，晚上碰巧遇上一幫“家伙”，或是意外“受到邀請”。當然，這些講述證實了群體對個人轉變的重要性。

老師們也注意到了這些巨大變化，對此有不少解釋。學生們開始“變得倨傲”，形成“壞的態度”，是因為他們受了“壞的影響”。首先，“壞的影響”來自于個人性格導致的行為：“他是橡膠做的，腦子里什么都沒有”，“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就把他說的話反過來聽吧”，“他是個頭腦不清的家伙，我都不知道他會發展成什么樣”，“他盡讓我操心，他的性格有缺陷”。反學校文化源自這些性格缺陷的排列組合，相比之下其他“易受影響”的人則沒有這種缺陷。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經典模式：少數“麻煩制造者”身后跟著被誤導的多數。

副校長　就我們校長擔心的來說，喬伊是最突出的一個（……）斯派克像是軍師，什么都會幫他，就他們兩個能鬧事（……）威爾容易跟風。

有趣的是，老師們在觀察這些孩子時一般都將其表現歸結于個人性格的具體特征上，評價很個人化，忽略了社會化過程和階級過程。做口頭評論時，他們一般以“我喜歡”或者“我沒時間談”開始，說的時候常常插入“……其實是個好孩子”或者“……一家子都不行，你看見過他爸嗎”這樣的話，這些話其實頗具意味。書面的離校報告或者其他報告清楚地表明了校方如何運用病理學概念建構了一個領導者與跟隨者的基本社會模式：

［喬伊］證明自己是個聰明、能干的年輕人，他本可以在大部分科目中都考出好成績，但是，他不想發揮自己的天賦，除英語以外，其他科目成績均下降了，而且出勤率和行為表現也每況愈下（……）他的領導才能總是用錯地方，沒有在學校里好好表現。

［斯潘克斯］前三年里他本是學校里最合作、最積極的學生。他參加了學校理事會，參加學校話劇演出和合唱團，并代表學校參加曲棍球、足球和越野長跑比賽。

但不幸的是，這個好的開始并沒有持續下去，他整個舉止和態度都變了。他放棄了發展自己學術和實踐能力的努力（……）他以前愉悅、快樂的態度不見了，他成了學校里最不合作的學生之一（……）他的發展受阻于他的消極態度。

［艾迪］的品性和行為前后很不一致，有時候表現是學校完全不能接受的。他顯然缺乏自律，跟從群體行為的傾向明顯。

用隨機的因果性或者病理學來解釋，可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也可能沒有。當然，老師需要這些解釋來維持學校的日常運作，及時作出相應決斷；但是，這些解釋并不能很好地從社會角度解釋反學校文化的發展。

分化和教學范式

工人階級文化創造性地把自己表現為特定制度的具體形式，并把自己與影響自己的這個特定制度區分開來，我稱這種特定過程為分化。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感受和意義對正式的制度范式中所預期的交換進行重新闡釋、區分和差別對待，這就是分化。分化的動力來自于與制度的對抗，這種對抗被階級文化的主旨和問題所接納并做出回應。同化是分化的反面，是階級對抗和階級意圖在一系列正當的制度關系和交換中被重新定義、刪節和重塑的過程。如果說分化是非正式向正式制度的入侵，那么同化就是逐步把非正式納入到正式或者官方范式中的過程。可以說，所有制度都保持了分化與同化的平衡，而且分化絕不是功能衰竭或者失敗的同義詞。事實上，我在后文中將會說明，正是在制度建構中分化的某些作用，以及分化對某些特定社會領域的影響使分化在社會再生產中發揮富有成效而令人驚奇的作用。一方面，經歷分化的人將分化視為學習的集體過程，由此將自我及其未來從制度性界定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在制度代理人看來，分化意味著莫名其妙的崩潰、反抗和對立。一方面，分化產生的是工人階級主題和活動被不斷再作用和再生產到特定的制度形式中；另一方面，分化產生的是正式制度范式的萎縮、硬化或軟化——這些都是對喪失合法性的種種反應。在學校這個制度里，基本官方范式關注的是教學，而這種教學的分化產生了反學校文化的各種形式。

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有很多種可能性。最近幾年，英國在卡拉漢首相的教育“大辯論”的推動下，學校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和開拓，對教學也進行了縮減和自我反省。[［9］](#_9_149)在此，我想概述一下基本教學范式的含義，我認為這個范式給其他所有問題提供了基礎，即使它們企圖超越這個范式，我認為這個范式在我們的學校中仍然占主導地位。無論修飾與否，無論從表面還是透過表面來看，其結構在各種課堂教學形式中很常見。

教師們清楚地知道，教學在本質上是潛在競爭者之間爭奪霸權地位的關系。所以他們談及“輸和贏”時，不但講得通，而且也是真實的感受：

副校長　有趣的是（……）你會遇到這樣的情形，你面對一個班或者一個男孩，你想的是“上帝啊，他把我打敗了”，但這只是一線之差，你要是稍微強硬一點你就越界了，你就站在那兒（……）那些被視為愚鈍的學生令人吃驚。他們和其他任何學生一樣，能迅速發現老師的弱點。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老師真正能夠直接使用強制手段的權力十分有限。學生們在人數上遠遠超過老師，處罰是稍縱即逝的事。年輕老師經常想靠強硬手段來幫助自己；但經驗豐富的老師知道重力火炮只能射擊一次：

副校長　你看我們能用的約束和懲罰少之又少。事實上幾乎沒有。所以，問題是怎么把他們分隔開，盡量給他們壓力。現在我們和教師有一個通報系統，消息最后能傳到我這里，校長是最后一關，我們范圍內的最后一關（……）你不能每時每刻都給停學處分。就像現在的足球裁判一樣，我說他們日漸式微，是因為他們出示終極裁判太快了（……）黃牌先出，一旦出了黃牌，他們就只能把球員罰下場或者忽略他在比賽中干的所有事（……）

校長　如果很多學生向我們挑釁……如果明天我們學校里所有的男孩都決定犯點事，我還能有什么機會？

因此，老師必須用道德而非威脅的手段贏得并維持其權威。他們必須得到學生的認可。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爭奪個人道德高地的戰爭令人疲憊，從長遠看并不是真正的解決策略。有時需要技巧。技巧標志著老師經驗豐富。這也是一種對相對自主的教學范式的學習：他們逐漸認識到理想的教學方式并非一成不變，且與特定個體相關。具有合法性、要求學生順從的是老師這個概念，而非教師個體。

老師這一概念認為教學是一種公平交換——即用知識獲得尊敬，用指導換取控制。因為知識是稀有商品，所以老師具有道德優越性。這種主導的教學范式獨立于個體老師之外，但使得教師能夠合法地對學生施加控制。這之所以具有普遍合法性，是因為它為后續的交換提供了等價物，而這些交換又有利于個體。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交換鏈是用知識換取文憑，用需要文憑的工作換取高報酬，用報酬換取商品和服務。因此，教育交換是許多其他交換的關鍵所在。

所有這些交換都受到結構的支持，這些結構有助于定義這一特定轉變，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這個轉變創造并維持的。教育交換保持在一個定義性的框架中，這個框架以特定方式建構了老師的優勢的軸心。交換及其“公正性”公開可見，亦是雙方達成共識的基礎，但是支持和界定這些交換條款的框架相對模糊、卻更強有力。我們必須把它看做構成我們對教學范式的基本看法所必需的部分。這種交換如同銀行的轉賬制度，在這個框架下流轉，并幫助穩固這個框架。但這個框架也必須借助其他方式得以穩固。它必須既能強化這種交換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交換本身無法生成定義（當然，對“家伙們”而言就是如此），又能通過保證其他交換、具體指示物、外界符號和可見支持行之有效地強化這種交換。

學校借助各種物質基礎，包括教學樓、組織、課程表和等級關系，掌握著這個框架或者軸心。（正常情況下）該框架受到主導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約束，有廣義上的國家機器作為后盾。廷代爾[［10］](#_10_147)的最終崩潰、公眾調查和七位老師的停職，這些都向我們顯示了其他學校繼續開放所依賴的根本基礎。在學校里，“優秀教學”只有靠恰當建立并再生產這個軸心才能得以維持。含蓄的結構軸心對明確的教學范式來說必不可少，通常在缺乏任何直接強力的情況下，軸心建立在“滴水穿石”的潛移默化之上，抑制其他或者私人意義，因為這些私人意義可能會扭曲這個軸心，使老師的知識貶值，使學生對老師不敬。

副校長　在斥責他們的時候，你得讓他們感覺自己非常渺小，要他們覺得“哦，我很抱歉，我沒意識到”。如果你能讓他們感覺如此，不是說讓他們畏手畏腳或者讓他們哭，而是你要有法子讓他們意識到你對發生的事情感到心煩，或是我感到心煩，然后好好告訴他們你心煩的原因，你知道的，如果你愿意，到了這個時候，你要讓他們確信他們很可惡，我是說啊，這才是斥責他們的辦法。如果你罵一個孩子“狗屁、蠢蛋”，就達不到你要的效果，因為他會罵回來。

學校是最卓越的實施面對面控制的機構。老師詢問時嚴厲的表情；把對“真相”的不懈探究置于良好行為之上；作為常用武器的諷刺手段；漸漸掌握的能讓個別鬧事者“窘到哭出來”的技巧；副校長泰然自若、腦袋低垂、手指戳著犯事者的模樣；校長意外地出現在走廊里，向一群學生逼近的景象——這些都是暴露、破壞或者阻止私人意圖的策略。所謂成功的傳統教學，不能容忍學生有個人意見，事實上，大部分學生一開始都自愿服從。那些第一個舉手發言、搶著回答問題的孩子都是為了在這個特定的制度形式中尋求上級權威的認可。在為獲得承認而進行的個體競爭中，如果學生之中有任何個人意見，并在共享中形成對這個制度的對抗性定義，那么學校必然采取控制措施。

這一范式相對獨立于個別教師，這種分離的重要性在老師刻意轉變老師／學生關系時已明顯顯現出來。這些老師是在測試教育范式被學生內化的程度——至少是教育范式合法性的程度。

校長　真要懲罰一個五年級學生……你要試著避免采取任何舉措，因為你得把他們放在那個位置上，然后你……我認為你能讓他們從你的角度看問題。我經常對這些孩子說：“我對這件事該怎么辦呢？你說你已經夠懂事了，那我們該怎么處理這件事呢？你來坐在我的位置上，現在我站到那邊去，現在你來告訴我你會怎么做。”

紀律不再是《舊約》意義上對犯下的錯誤進行懲罰，而是維持制度軸心，是再生產學校內的社會關系，是使人尊重基礎框架，以達成其他交換。

副校長　如果你當場抓住他們了，你懲罰他們，你要抓住這個時機。當然，這只是想讓他們記住一輩子不能隨心所欲，不能破壞規則（……）每次你讓他們認清有些事做錯了，那么這就會在別的地方產生好的效果。

我們同時應當注意到，這個基本框架和教學范式也在向上延伸。教師如果背離這個框架，也會被視為病理問題。所有老師，尤其是年輕老師，既要學習成為抽象教學范式的化身，又要維持和再生產使這種框架成為可能之物，還要處理好與其他教師的關系，實在是相當吃力的工作。

副校長　你必須看起來是個很正直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公正的人……現在，如果你在同事面前做到這些，你就可以撕人衣服但依然受尊重（……）他們非常清楚如果他們做錯了什么事，他們是真的做錯了什么事。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做錯了，如果他們受到斥責，他們不會有立足的可能，所以……他們中有些人當然會爭辯，純粹是出于辯護，這都是性格缺陷使然，但是事實是他們內心深處知道，你不能在打高爾夫的時候作弊，你在這場游戲中也不能作弊。

為了維護這個軸心，試圖排除或遏制與日常生活矛盾、逆行的暗流，教師們必須具有強烈的道德意識，而正是這種意識在學校里制造了一種青春期被抑制的厭膩、幽閉和恐懼的感覺。每件事最終都以公平交換為主題，并維護了使之成為可能的軸心。在這個意義上，學校是一種極權主義制度。學校里幾乎沒有直接的強制或壓迫，但對道德可能性的范圍進行了極大的限制。每件事都緊湊有序，每個故事都有相同的結尾，每個類比都用相同的類比物。“合作”這個詞——在常見用法中指的是“對等物”——無處不在。在一個人被懲罰時，合作是不會發生的。合作發生在獲得獎勵之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獎勵往往意味著早日從他擅長的系統中被釋放出來。

或許學校制度中仍被廣泛視為儀式基礎的晨會最能說明這種公平交換的本質、支持這一交換的軸心特質以及試圖維護這種交換的本質。以下是有人闖入校長辦公室并在校長椅子下邊拉屎之后，校長對學校全體學生的講話：

我尊重你們，我尊重你們的能力。在某些領域，你們的能力比我強。我接受這個事實（……）上周五，當我發現這事的時候，情緒頗為低落，我想，這沒什么可尊重的……但是我周六去看足球，好幾個學生和老師在那邊，他們都奮力踢球，為學校榮譽放棄了自己的時間，然后我想：“也許畢竟不是那么糟糕。”……我確實尊重你們的天才和能力……但是，我期望你們也尊重我作為一個老師的才能，接受我說的話……如今很難分辨出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假的……最容易吞咽的東西不見得是最好吃的。包裝最漂亮的并不總是最好吃的。我們真的是想幫助你們，做到最好，而不是給你們一條輕松的出路……\*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解，從其自身邏輯來講，教育范式中的交換關系并不是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或是老師們有意識地試圖支配、壓迫工人階級個體或工人階級文化。教師，尤其是漢默鎮男校的資深教師，都很專注、誠實和坦率，他們滿懷耐心和仁慈地做一份很吃力的工作。把任何惡毒動機，諸如教壞、壓迫工人階級孩子歸于他們身上都是非常錯誤的。國家賦予教師對自己的學生進行正式控制的權力，但他是通過教學范式，而不是階級范式來施加其社會控制的。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社會中的物質結構、組織和學校的實踐是如何通過無數微小，當然也有龐大的建筑方式，為教學范式，尤其是使教學范式成為可能的控制和定義的軸心提供聯系、支持和保障的。

從簡單的物理意義來看，學校學生對教學環境的看法受限于他們所占據的狹小、低劣的空間。他們坐在排列緊密的課桌旁，前面是老師的大書桌；他們被剝奪了私人空間，進入教師和校長辦公室前必須小心敲門、等待許可；他們被大門緊鎖或禁止入內的房間、健身房和器材櫥柜包圍著；課間休息期間，他們必須離開學校，連學校公用廁所都不能用；他們與老師開的車保持至少兩英尺的距離——所有這些都給學校的物理環境以及某種社會組織定下了基調。這些也說明了學生所處的位置。[［11］](#_11_143)

學校的社會組織強化了這種關系。鈴聲準時按時間表響起；在教師辦公室門口，學生必須遵循一套繁復的儀式來表示耐心和尊敬，哪怕他們說些放肆的話都要以“先生”開頭；強制的出勤和顯見的人員等級——所有這些都強調了教師和教師世界的優勢。當然，歸根結底，即使出現了所謂的各種“資源中心”，教師才是知識這一稀有、珍貴商品的控制者。在教學范式中，用于交換的知識所具有的價值，不僅僅源于它能換取資格、實現向上流動，還源于其保護制度的作用：知識是有權人的特權。教師發課本時，他們儼然是書的主人，書要是弄丟、破損或者污損，教師就會像是財物被破壞的房東一樣惱羞成怒；教師們保管櫥柜、圖書館和辦公桌的鑰匙和使用許可；他們備課、帶領討論，上課和下課都是他們決定的。

當然，這些事例很多都顯而易見，也常常是出于“必需”。我們可能很難想象學校會出于其他“必需”而以不同方式運作。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中學校制度的熟悉不應該模糊我們的視野，其被默許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形式決定了對特定教學方法的選擇，并嚴格限定了可能改變的范圍。此處“顯而易見”的事例不能在彼處被遺忘。

尤為重要的是，如果要討論“基本教學范式”能夠在何種程度上被實踐所修改，我們必須牢記上述物質限制。當然，很多老師否認他們的教學關系是如此簡單或結構化，而且確實有很多自下和自上的要求變革的壓力。在學校中，排除個人化的、堅忍克己的或是英雄式的解決辦法，主要有兩套（相關聯的）基本范式的變體：那些“自下”的和那些“自上”的。我要說的是，本質上這兩套都是對分化的回應或是對分化的恐懼，不管這是對對抗的直接反應還是學校整體政策的一個方面。這兩者都沒能對學校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形式做出任何有意義的調整。我認為，無論是出于何種內部意識形態或理由，它們都是在嘗試用不同方式重新整合相同的基本范式。

許多在工人階級學校任教的資深教師感覺到，在“不怎么能干”、興趣不大、躁動不滿的學生身上使用基本范式存在潛在缺點，所以他們試圖用某種方式修正該范式。也許此處經典的、在老式中學里絕對典型、在工人階級綜合學校里相當常見的做法就是從用客觀基礎改為用教師天賦的道德基礎來換取學生的服從、禮貌和尊敬。這是在后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領域之間的許多文化和社會交換中的關鍵轉變和神秘化過程：“對等”的客觀本質被轉化成道德約束、人道主義和社會責任的迷霧。真正的交換成為了理想的交換。當然，所有這些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其中的價值和態度令人贊賞或厭惡，正確或錯誤，或者別的什么。關鍵的原因是正式的問題：不同于客觀標準，道德標準能夠無限延伸、闡釋，因為除了自身，它并非真實存在。真實的世界無法對它進行仲裁訴訟。道德闡釋自有其動力。就基本教學范式而言，值得學生努力爭取的不再是知識和資格的承諾，而是順從和禮貌本身——這些和學業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功有聯系，但事實上只是成功的代價和前提。這個轉變意味著禮貌、順從這樣的品質自身就令人贊賞，已經脫離了特定項目，在工作和社會尊重的市場中成為了可談判的品質。

“態度”，尤其是“正確態度”這個關鍵概念應運而生。這個概念的存在應當一直提醒我們，基本交換關系被神秘化成虛幻的、理想化的交換關系。如果某人用“正確態度”對待學校和學校權威，那么他也會用“正確態度”對待雇主和工作，這樣他就能獲得社會和經濟上的改善——所有這些都不需要依靠出色的學業。當然，這一關鍵轉變導致基本范式具有循環性和重復性，因為在交換關系中雙方都用同樣的東西交換，關系的循環沒有任何斷裂或改變。學生兜來兜去就是對權威的順從和服從。他可以學會這些。圍繞著這個未經審視的同義反復，“正確態度”不必然會破壞基本范式，只要其本質仍被掩蓋或神秘化。事實上，只要它保持看似公平交換的節奏，強化在制度上被定義的軸心，阻止其他趨勢的發展，這種修正就能強化基本范式，讓交換繼續下去。

老師通常頗為認同對這些教學范式的修正以及對生活機會和回報本質的看法，這并不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當然，這些修正之所以有效是有原因的。一般而言，人們強烈信守的關于有機、和諧社會的倫理道德將所有人整合在一起。

漢默鎮男校的一位資深教師　樹林里總得有伐木工，海上總得有制圖員。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人們總是看不起“家伙們”，“好吧，當然他每天送牛奶”。但是你想想給你自己送牛奶的人。他在社區里工作得好嗎？他是個友善的人嗎？他給你好建議了嗎？如果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是”，那他到底有什么錯，我們為什么要看不起他呢？我覺得這很可怕，我不是社會主義者，但是我覺得這很可怕。我們大多數送奶工都是年輕力壯、迷人的小伙子。“早上好，先生”，我這么跟他打招呼，為什么不呢？通常他也會用同樣的話回應你，這也增強你的自尊。但事實是，你還是可以對送奶工說“先生，早上好”，為什么不？我是說，你尊敬他這個人和他做的工作，你向上帝祈禱希望他也同樣對你（……）說到純粹的學術能力（……）小吉米的腦瓜笨得像兩塊厚木板似的，（但是）他可以做個很不錯的送奶工或者面包師。而且你知道的，有人這么認為：“好吧，他以后不得不做送奶工，不是嗎？”而不是說：“這個工作適合你，你的個性合適，你在錢上很誠實，你喜歡跟人打交道，這個工作很理想。”哎，那樣這個孩子就會這么想：“我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我會獲得成功。”為什么他們不該這么想呢？他們確實不錯，現在不是掙錢比別人少的問題，因為他們掙的錢不少。

基本范式的另一個草根變體也是長期學校經驗的產物。這牽涉到對預期交換中另一件事物的修正：學生應該表現出的尊敬和禮貌。簡單來說，老師沒有太多的期望，如果學生沒有做到也不會導致特別的道德憤慨。與之相關的是，老師常對在可能的情況下提供有用信息很感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不是有計劃的。盡管這表明他們對教學關系不抱幻想，而且提供了用來判斷如何對待叛逆學生的要素，但是這依舊處于基本范式之內，因為制度控制仍然是關鍵，并沒有真正改變學校的物質安排和組織形式。對學生以及他們的定義和興趣做出一些讓步，是因為想要確保更為基本的控制。為了維護教學關系的基本軸心，必須在某些對峙中甘拜下風——并確保真正重要的戰役永遠不會打響。可以說，這樣的教育觀點經常可與工人階級實用主義、不過度樂觀、勉強維持的團結關聯在一起——這種團結是他們對壓迫的不安卻又宿命的感知。

漢默鎮男校一位資深教師　我從來不覺得我是教那幫家伙的人（……）即使他們在學校外邊進行反抗，他們照樣經歷，照樣成長，而我們的工作是傾聽，在他們身邊，讓他們相互爭論（……）我們在一邊還能很快達到些目的（……）在第五年，我認為遏制政策是很謹慎的，你要知道我們對他們的控制很少，要讓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是強壯的男人了，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在大方向上他們還是按你期望的做……你要知道，不要和他們對峙，要讓他們覺得他們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做。\*

在學校，另一種有跡可循的教學范式的基本變體可以說是來自“上頭”的。它們的源頭更為公開、更有影響力，但我認為它們依靠的仍是交換關系的寬泛定義，依靠人們對略有修改、但本質相同的學校物質基礎和組織形式的接受。在這個情況下，至少這種變體關注的是如何重新整合遭分化或受威脅的教學范式。

對于那些教無心學業的工人階級子弟的老師而言，“有意義”的教育應該是從孩子的興趣出發，而不是從學科的要求出發。對男孩來說，他們學習的課程應該包括社區、工作、稅收等事務，還有怎么和官員以及社區居民打交道；對女孩來說，她們則要學習做家務、管理家庭生活、養育孩子；另外，男孩女孩都應該學點流行音樂、藝術和大眾媒體。“進步主義者”建議鼓勵，而不是強迫學生們參加這些活動；要采用“以孩子為中心”而不是“以科目為中心”的方法；通過“個性化”項目讓孩子決定自己的學習進度；“小組化教學”使得學生享受盡可能多的資源。在英國，這些技術在小學教育階段推廣最甚，并開始逐漸向高年級延伸。至少在非學術學校，進步主義和強調學生相關性的措施通常齊頭并進，代表了那些最初從專家研究中心、大學和學院發展出來的新的、有針對性的自由主義技術。

這些想法和技巧經歷了一場徹底的政治理論討論。[［12］](#_12_141)這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民主思想的轉變有關，以此為課題的研究亦產出了大量文獻并支出了大量經費。這些是特定的決定因素，長期以來也形成了一系列清晰明確、相對獨立的理論發展，并由此在那個層次上發展出了具體的方法和教學目標。當然，整個辯論和學術研究成果可能為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形式和限制，但我認為：他們并沒有真正在“向下”的新型教學實踐中起決定作用。在實際的學校運作中，兩種主要的方式總是和我所說的“自下”方式有著“選擇性的密切關系”。盡管它們是相互關聯的，但相關性主要在于教師能貢獻什么，進步主義的核心也是孩子應該如何回應。老師們從一套現成的解決問題的教學風格和發展模式中挑出自己能用的。這些仍舊以維護基本教學范式為宗旨——這個范式看似是唯一的可能性，那些只是稍作改動的物質基礎依舊時刻支持著這個范式。“新”技術或許有過激進的起始（當然，激進主義的起始可以說就是這樣），但是它們依據的是非常不同、更為古老的基礎。如果這些新技術看上去具有革命性，那么本質上它們是對前革命（pre-revolutionary）問題的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解決方案。在現實情形下，這些方案常常被用來達到控制的目的，或者為現存趨勢進行辯護，使其合理化。有人擔心采用“新”技術會導致學校出現“放任”、“崩潰”的問題，那他可能會覺得我上述的論斷很奇怪，即這些技術事實上是用來重新整合失敗了的或受威脅的傳統模式的。某些學校在大辯論的壓力下迅速整頓了環境，回到了一種更為獨裁主義的氛圍，這進一步把教學范式整合或試圖把教學范式整合成和原來模式極為相似的模樣，這使他們確信無論在其他層面如何顯現，根本問題總是同一個。其實，“修正”、“阻止”、“疏導”和“新的放任”要比通常設想的容易。從根本上說，“大辯論”是一個騙局，不可能觸動牽涉教學范式和其物質支持的真正問題。

在分化過程中，基本范式（無論做了何種修改）的合法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教師的優勢遭到否認，因為其依附的軸心已被部分移除。這個框架的建立曾經確保了教學交換的有效性，但因為教師所能提供的東西少了，所以如今遭到懷疑，越來越明顯地被視為壓抑的模式。“家伙們”對自我以及其他可能的交換形式自有一套評估方法。教師的權威越來越像是監獄看守的隨意的權威，而不是教育系統所必需的支柱。“私人空間”被滲透、被控制，現在成了共享的、強有力的對抗。在一個將知識交換和教學范式作為社會控制形式的系統中，對知識的否定、對“尊敬”這一教育“等價物”的拒絕可以成為抵擋控制的屏障。“家伙們”變得“無知”、“笨拙”和“不遜”。應當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智力測試和考試成績更多是基于學生在知識的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而不是其“天生”的能力。此外，學生的“個人性格”也應該從社會意義而不是個體意義去理解。

至少，對正式范式的挑戰、對自己和群體的重估都來自那些“私人”領域，它們以前受到約束，現在則是共享、可見的。當然，這些私人領域正是工人階級子弟的階級經驗，從根本上源于校外。基本范式把階級從教育領域排除出去，但其分化過程又把階級請了回來。

追溯個人最初是如何加入“家伙們”這個群體的，描繪個體及其文化在學校里是如何發展成為“家伙”，又是如何逐漸走向街頭和社區、吸取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價值觀、態度和實踐的，這些都是有趣的話題。很顯然，正是這個日益擴張的領域為學校教學范式的分化提供了非正式、非官方的材料。如果學校的文化不定位于工人階級，那么情形當然不同：教育范式相應也就沒有那么多可以被分化的地方，因此這個范式更可能長期穩固。

不過，在工人階級領域，一旦對學校的信任被抽離，那么學生的訴求可以從階級情緒中得以滿足。社區、街道和更多象征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的表達為反學校文化提供了主題，同時又在反學校文化中得到了鞏固。當然，父母和家庭也是極為重要、有影響力的工人階級文化的承載者。家里談的都是有關車間文化的事，以及車間發生的事和那兒的主導態度，尤其是對待權威的態度。家中使用的語言再生產了（除去那些臟話）勞工文化的語言。在家里，同樣存在典型的勞動分工和男性至上的形式。男人掙錢養家，負責一些房前屋后的實際工作；妻子則賺點“額外”零錢，照料整個家的需求。在家庭中，反學校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的另一個共通之處在于，父親可以偶爾向兒子“使眼色”，教他在打架爭執中該做什么（“打敗他，然后再問問題”），或者如何看待偷竊（“兒子，小錢挺好使的”）。

父母雖然重要，但他們只能被看做是工人階級文化的眾多承載者之一。不是所有的父母表現都一樣，都擁有相同的價值觀。父母和階級主題之間自有復雜、創造性的關系，他們絕不會用一種簡單、標準化的工人階級模式要求自己的孩子。父母與孩子之間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一些非常循規蹈矩、“受人尊敬”的父母，如果自己的孩子“學壞了”、混跡于“家伙們”中間，那么他們會走訪學校，試圖支持學校的措施。其他一些認為學校并不重要，甚至對學校懷有敵意的父母，如果自己的孩子是“書呆子”，他們有時就會感到不安和反感。我們對任何一種基于特定變量，如“家長態度”得出的機械分析都應保持警惕。

然而，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和情緒——父母往往是重要的媒介，但并非總是如此——與學校對立，并為分化提供了具體的原料，這不容置疑。例如，斯潘克斯的父親從工人階級角度出發，指出了他對正式制度及其工作模式根深蒂固的懷疑。最終他也不愿意承認教師的權威。他覺得這種權威雖然嚇人，但從本質上來說是虛偽的。下面是他對自己最近參加的學校開放日的評價：

父親　我特煩那個校長，現在我說不出來那種感覺……因為我能看出來……我，我能感到，我是他，我是他，我站在那兒，然后我是他。我想：“哎呀，哎呀，他在自言自語呢。”你要知道，他沒在跟我說話（……）他讓我覺得很不爽（……）然后還有一個人，對了，一家子，或者也是個父親，他沒站出來，卻問了老師一個他知道他會問的問題，他也知道他想要什么樣的答案，你看吧，我不知道該怎么解釋這回事。我就是想：“哥們兒，你問這個問題只不過是要讓別人知道你在這個房間。”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嗎，因為他沒有聽那個家伙回答，不管那個家伙說的是對還是錯，他都會接受，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我該怎么解釋這個呢。我不知道該怎么解釋……這么說吧，我不能跑到房間里去和老師們爭辯吧，就像我不會和你爭辯，因為我會很驚訝，我會“嗯啊”、“啊哈”，說不清，我會擔心變得很呆板，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怎么說，該怎么說，因為我看看四周，心里想：“反正這些人也不想知道”（……）如果我和他［校長］在一個房間，就他一個人，要是沒有人能聽見我們說話，我會說……

PW　會說什么？

父親　你說的都是無稽之談。

母親　他們說，這是“孩子之夜”，得了吧，事實上他們對你要說什么根本沒興趣，不是嗎？他們不想知道。

PW　那這是要做什么呢？

母親　我不知道。

父親　我想是為了秀給你看他們對你的孩子都做了哪些好事（……）他們不會說他們對孩子做的錯事，只會告訴你他們如何為孩子著想，做了什么好事。

學校開放日的邀請信上有一欄可以撕下來，上面寫道：除非家長填好表格并交還給學校，否則校長就認為家長不來參加。信上還寫道，家長必須把問題寫在紙上提前交給學校，而且學校只會選擇性地回答部分問題。連教師都在信息單的一段話上劃了線、標了感嘆號：“來學校走走，親眼看看學校的日常工作究竟是如何開展的。”這種傲慢、含糊的句式也用在通知家長孩子行為不端的信件中（斯潘克斯的父親收到過一封這么開頭的信：“我希望能和您討論一下您的兒子在這個學校的可能出路。”），可見這種工人階級對學校的不信任是出自對某種真實存在的反應。這不一定是對學校的批評。學校在自己的職責內做得很好。但是，為學校奠定和把握風格的道德權威軸心與工人階級文化那種世俗的混亂、妥協和隱含的反抗精神大相徑庭。一旦工人階級子弟開始把自己從學校權威中分化出來，他身后就有強有力的文化推動力促使他完成這個過程：

［一次個人訪談］

斯潘克斯　他［父親］不想讓我頂撞老師，但是他也不想讓我成為一個討厭鬼，坐在那兒做功課，你知道吧……我那老頭子有一次叫我“書呆子”，就是第二年的時候，當時我踢足球，準時上學。這讓我很郁悶，我很驚訝（……）我想變成他那樣的人，你知道吧，他受不了無稽之談，如果有人跟他胡說八道，他會恨死的。我也是這樣，我想我會變得像他一樣又矮又胖，我挺想這樣的。我想變成他那樣，他是個很棒的老頭子。

這并不是說父母在分化和再生產工人階級主題的過程中變得更具影響力。嚴格說來，他們的世界變得越重要，他們的父母就變得越不重要。男孩的成長和他日益增長的文化信心，通常把他置于同父親競爭、試圖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母親的位置上。他變得不再喜歡自己的父親，而是要和父親處于同一個世界：那是崇尚獨立、身材健碩和象征性威脅——而且也要勇敢面對這些挑戰——的男性工人階級世界。男孩成了需要被這個世界認可的一股力量。盡管父子情深，家庭氣氛中還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像老爸那樣”意味著能夠“勝他一籌”。父母常說：“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們就是這樣”，或是“你不能差使他做任何事”，或者宿命論似的承認一些深層次的文化過程早已就緒，尤其因金錢需求而被強化。

斯潘克斯的父親　這可能是你想不到的一個因素……人們現在可能不覺得錢很重要。這兒有一幫小伙子，他們每天都出去（……）然后這個小家伙［他的兒子］，因為他上學，他必須得靠我給他一英鎊。我沒能力給他更多的錢，但是他在那一伙中會怎么想呢。教育現在都已落空了，他們都出去玩，不是嗎。總有去的地方，迪斯科舞廳或者別的，他們去買三明治、冰激凌、蛋糕什么的……但他不行，他沒法買，他和他們一樣的歲數，可能比他們小幾個月，你知道吧（……）你看吧，教育被他們拋在腦后。他們的口袋才是他們腦子里想的東西。

從男孩的角度看來，這種宿命論可表現為漠不關心。這突出了自己找尋出路的艱巨性和重要性。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我問我老媽……“你難道不操心我以后會變成什么樣嗎？你難道不擔心這些事嗎？”她從來不問：“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我的老頭子也從來不說這些事。但她簡單地回我幾句。她說：“就算我說了，又會有什么區別呢？”她說：“你還是會成為你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所以我對自己說：“哦，好吧。”

中產階級的模式截然不同。盡管有時他們會對學校產生幻滅感，或和某些非正式群體結幫，但這些與某種獨特的外部文化相關。權威沒有因為階級的力量變化產生分化。新興的文化沒有得益于工人階級主題的力量。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教育軸心完全有恢復其早先統治地位的有利條件。產生制度分化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基本上是缺失的。

當中產階級的孩子被拽回其固有文化時，他找到的不是強化、證實對抗性的主題，而是與之前相同的文化。向心力將他推回制度的懷抱。

中產階級孩子與父母的關系不是競爭性的，而是依賴性的。家中的軸心與學校里的軸心如出一轍。在上／下層的關系中，知識和指導用來交換期冀中的尊敬。因為父母具有支持孩子的經濟能力，這個關系尤其穩固。因此，不管有何危機，父母總抱有應該對被監護者負責的觀念，而不是像工人階級那樣對獨立自主的孩子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再生產了學校中的關系。有關知識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觀點尤其得到了強化，雖然這些看法在某些方面還是不同于學校中更為理想化的范式。事實上，中產階級父母比老師更強調學校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學校不是具體實踐應用的理論源泉，而是文憑的源泉，從而確保在我們社會特有的交換鏈中實現流動。

在高級文法學校中，盡管那些被老師視為反學校群體（“學校里所有問題都是他們搞的”）成員的十個學生在四年級的時候均表示他們會盡早離開學校，但事實上，只有兩個人在五年級末的時候真的這么做了：其中一個去當了助理高爾夫教練，但也通過函授課程上高中高級課程。[［13］](#_13_137)他們最終意識到了文憑的重要性，因此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職業指導，并能夠出于純粹實際考慮，回歸到主流的制度范式中去。

［五年級期末的一次小組討論］

PW　給我描繪一下“家伙們”的前景吧。

奈杰爾　繁榮與憂郁（……）頭兩年，我們都在大學的時候，離開學校的人都會過得很不錯，如果你看到他們，他們都有足夠的錢。我想差別是在你大學畢業之后才開始顯現的（……）我覺得，一般來說，我們會有更好的工作可選（……）我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向上爬，而那些“家伙們”，如果他們不喜歡他們的工作，他們就只能四處換工作（……）我和他談了四十五分鐘［與職業指導老師的個人訪談］，他說的對我來說都是信息。整個談話沒有停的時候，完全沒有停的時候，就是不停地說啊說，他跟我講的都是我想知道的。他總結了我的個性，告訴我為什么某些工作不適合我，為什么我更適合一些別的工作。我真的覺得這很有用。你要知道我進去談的時候（……）心里三心二意的，一半是想去工作，一半是想繼續上學，談完出來的時候我對自己繼續上學的決定很滿意。

出身工人階級的“家伙們”對自己未來的決定則不會那么容易被轉變。

分化后的關系

我們不能低估分化后學校環境中可能發展出來的敵對狀態。正因為我們已經了解這些“家伙們”的文化反應是多么“豐富”，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反應的指向。當知識被貶低，甚至變得一文不值時，被剝奪了教育合法性的權威會顯得非常嚴苛和赤裸裸。這是權威遭到反抗的原因。教學范式看起來越發具有強迫性。整個學校經歷成了“家伙們”最想逃離的對象。

最具壓迫性的力量之一就是一些老師貶低、諷刺人的態度。這種態度源自階級和制度的結合，隨著分化的出現逐漸暴露出來。我們可以稱之為“階級侮辱”：雖然發生在教室，但是指向了社會階層。可以理解的是，當既定的教育范式崩潰時，很多老師相當憤怒。他們把這種崩潰看做一種冒犯：他們希望學生遵守的習慣被破壞了。正如我們在上文中看到的，教育交換中的基本等價物是尊敬。因此，“家伙們”在分化之后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對教師表示尊敬——至少這成為了師生關系的基本模式，這種改變根植于其文化的總體風格中。當然，某些教師看到的只是他們的無禮和粗魯，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師生關系改變后的必然邏輯。他們的挫折感和憤怒表現為從“知識”——尊敬的交換物中退出，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重估了知識的本質，這使得“家伙們”無論交換什么都無法獲得“知識”。雖然這種做法自有其邏輯，也可能在分化還未完全實現時成功恢復之前的師生關系，但是其根本的制度動力被“家伙們”視為階級原動力。這種對含義的雙重表達是階級社會中的典型制度。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神秘的、日益惡化的轉化和再轉化過程：從制度含義到階級含義，再從階級含義到制度含義。在這段改變后的師生關系中，老師備感挫折，試圖重新定位自己，并轉變了他對“知識”的看法——這種看法對維系師生關系至關重要。雖然這些轉變都發生在學校這個制度中，卻被“家伙們”看做對其整個階級身份而非制度身份的侮辱——“家伙們”在摒棄學校制度后，轉向其工人階級身份并對它進行重寫。這些階級侮辱因其表達的途徑而多了份殺傷力。老師依舊掌握正式的詞匯和表達。這個領域正日益被“家伙們”放棄。類似嘲諷的例子相當普遍：

不同老師對全班學生說　“《被詛咒之村》（The Midwich Cuckoos）講的是一群具有可怕意志力的孩子——不過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兒。”

“X剛剛問我這道考試題目：‘如果這里只有我們其中一人，老師該怎么討論？’”

“Y剛問我：‘兩個部分都必須做嗎？’第一部分是說明。”

“Y，你真幸運不需要學習怎么呼吸，不然你現在也不會在這兒。”\*

“家伙們”對這種方法非常敏感。當然，要是這個方法失敗，或者使用不當（比如“你和我講話的時候閉上你的嘴”），他們就會發出“嗨”的嘲弄聲。但是，這種方法常常確實擊中要害。他們日漸把那些最刻薄的話看成是學校權威專制本質的體現。

斯潘克斯　那些老師最讓我厭煩的［是］他們總想在課堂上讓你難堪，比如，就像［他們對待］法茲。

比爾　在你所有的同學面前。

斯潘克斯　他們對他說，你知道吧，“下星期我給你弄個沙坑”，是吧？［笑］他們開始大聲讀我的作文，那篇真是狗屎不如。

德瑞克　讓文章聽上去比實際更糟。

“家伙們”試圖用任何方法來還擊對其文化的打壓，這構成了一個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

喬伊　任何這兒能用上的，你知道吧，你都能用來跟他們對抗。好吧，我是說，你破壞書本。

斯派克　對，你砸碎椅子，把螺絲擰出來……

喬伊　真的，事后你想，“好吧，這些玩意兒，我老媽付了錢的，很多都是從稅里來的”，但是在你做這事的時候你不會這么想，你也不會真的在乎。

PW　但是你覺得這和砸碎酒瓶或者偷竊一樣嗎？

喬伊　你要是挨了板子或者別的，這是你報復老師的機會。如果你認為，如果你能報復他，你就會什么事都干得出來（……）報復，就是這么回事，要報復。

隨著壓力的增大，反抗權威、破壞公物、利用部分老師的弱點或錯誤等不端行為也在增多。尤其是在學期末的時候，他們威脅要壓倒教師。但是，任何一所“好”學校及其信念的標志就是拒絕讓步：

一位資深教師　你不得不面對這個趨勢，你無法阻止它，我們試圖阻止它……在有些地方，他們屈服于這個趨勢。\*

在教職工等級的最高層，類似舊范式的東西得以維持，盡管強迫和共識之間的平衡略有改動，可能傾向于對交換關系持“正確態度”。高年級班主任、副校長、校長與日常課堂生活的距離逐層遞增，這意味著他們享有一定的敬畏。學校的物質結構和組織形式，正式、壓迫性權力所依賴的“知識”，這些通常能使“家伙們”在他們面前屈服，如果不是馴服的話。對于真正關鍵的問題，資深教師必須維持現狀。只有作為對他人的訓誡、對制度合法性的保護，基本范式才能得以強化。在最后一次午餐時間，“家伙們”從酒吧返校時酩酊大醉，資深教師決心不能讓他們“免受懲罰”：

高年級班主任　他們沒有意識到，最后一個中午他們還在上學，我們還是能管他們的。我們可以去找他們的家長，我們這么做的時候他們非常吃驚，“你不能來這兒，我已經離開學校了”；我們可以把這件事寫進他們的成績單，或者干脆不發成績單。

在消防栓事件之后，高年級班主任用“家伙們”最后的“招供”對全校其他學生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后來解釋說，他壓制喬伊的異議正是維持范式現狀的關鍵點。“家伙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不能越過這道界線。

［一次小組討論］

喬伊　彼得斯一直試著暗示什么，我覺得非常生氣，彼得斯把我們一網打盡，他說什么“大男孩們”，他不想讓任何一個學生認為自己可以免受懲罰，每個孩子都是大男孩了，所以當他知道所有一年級學生都在場，知道懲罰能對他們產生影響時，他就想讓我們每個人都哭哭啼啼。什么事都沒發生［指“招供”期間］（……）他［校長］說：“學校的名聲怎么辦？”我說：“你這又不是普勞酒吧，”我說，“你又不需要聲望排名（……）不管你丟了多少消防栓，你要管的是怎么教育孩子。”我本打算告訴他［大禮堂里的高年級班主任］那是一幫笨手笨腳的工人干的，我舉手想告訴他。“哦，”他說，“有誰想少扣掉幾分？”我把手舉起來，說：“對，我想我們可以少扣一分，”我說，“我們都沒有哭，我們都沒有抽泣。”

德瑞克　“馬上閉嘴。”他說。

喬伊　他制止了這一切。

資深教師給“家伙們”所在的班級上課，大致還能維持他們的權威，很少有學生搞破壞。“家伙們”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抑制，傳統范式的具體形式得到加強。

當原來的教育范式無法維持，但年輕教師還抱著不放的時候，課堂紀律反倒受破壞最嚴重，因為教育交換的道德基礎已經消失不見。沒有什么比強權陷落更能顯示出工人階級文化特質中的惡意。沒有什么比學生搞破壞更讓教師惱火。

在這些課上，“家伙們”齊聲高唱廣告歌，像電視節目那樣預告課間休息時間。常見的“新聞閃播”都是些想要激怒老師的惡意瞎掰。有一次，老師再也不準“家伙們”騎學校的那輛機動自行車，因為他們一直纏著他，想讓他準許他們騎；也不準再提畢加索，因為他在一次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騙形容了半天畢加索。刺耳的廣告歌《Davenports—在家暢飲啤酒》中會插進一段“重要通知”：“有人目擊畢加索正騎著學校被盜的機動自行車穿過校門。”這次老師花了二十分鐘時間才把這五個肇事者送到校長辦公室，因為當老師把他們拉到門邊站齊后，他們就不斷跑回自己的座位。

還有一次，“家伙們”正在讀一個劇本，這算是象征性地順從了教育范式，但是他們慢慢開始用自己的話篡改劇本。他們先是替換個別詞匯，用“雜種”替換“炸毀”，把“毛巾”換成“衛生巾”，然后就開始篡改整句臺詞，“我媽媽從超市買了個洗滌槽”，加進很多笑話，比如“熊爸爸說‘誰吃了我的粥’，熊寶寶說‘誰吃了我的粥’，然后熊媽媽說‘你們都閉嘴，我還沒做粥呢’”，最后再乒乒乓乓的大聲敲打課桌，奮力跺腳，搞了一出混亂的戰斗模擬場面作為高潮結尾。

在這場持久的游擊戰中，“家伙們”絕不放過弱勢對手。他們特有的文化提供了一套常識系統，以此判斷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沒有成功挫敗權威。

［一次小組討論］

艾迪　現在誰要是總是容忍，他們就會一輩子被欺負。如果有人開始找你的茬，而你不立即顯示你的權威，那他們就會一直欺負你，如果他們知道有些孩子可以欺負，那只要他們認識他，他們就會一輩子欺負他，他們會一直耍弄他。你得秀給他看，從一開始就讓他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

斯派克　這在我們身上發生過，就在第一、二年，斯普拉特就是這樣，我過去挺蠢的。我見每個人都怕得要死，我就是個膽小怕事的蠢蛋，尤其怕他，斯潘克斯，他過去總到處欺負我，斯潘克斯四處欺負我（……）然后有一天，我受夠了，因為當時斯普拉特是強硬的大家伙之一，你知道吧，他有點毛毛躁躁，我們當時在上科學課，他搞得我很煩，他踢我的背，哪兒都踢，所以我就追著他跑，真是搞了他一頓，真的搞了他，他整張臉都被打花了，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欺負過我，你要知道，如果你顯出點權威，要告訴他們你不怕他們。

基本范式發生變化時，很多教師看待學生就像看待精神分裂癥患者似的。他們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家伙們”從制度身份到階級身份的轉化，于是，他們把“家伙們”看做同時具有兩種身份的人。這導致“家伙們”陷入兩難。典型的評語是這樣的：“你開始幫助自己的時候，我就開始幫助你”，“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你能否對我有點禮貌，你甚至不聽我講話，那么你憑什么要享受人的待遇？”仿佛學生由兩個自我組成，其中一個自我可以拯救另一個自我。他們不斷被告誡，行為舉止要符合那些他們不可能遵循的方式。在“家伙們”看來，這種嘮叨就是一種侮辱，其試圖重建舊式權威的努力進一步削弱了學校的權威。

最“成功”、沒被“家伙們”折磨、不用拉上資深教師來解決問題的老師，多少采用了基本范式，哪怕這不是他們通常的風格，只要足以將反學校文化控制住，一方面不激發學生肇事，另一方面保證制度不崩潰就行。用策略性的退讓換取戰略性的控制，這種方式經常被進步主義和“關聯式教學”所褒揚。理由包括“個性化學習”、“探索”、“自我引導”和“相關性”，但其真正邏輯關注的是控制。雖然這種課堂可能顯得有點吵鬧、漫無目的和缺乏紀律，但是不會退化成一片混亂或者發生針對老師的象征性或真正的暴力。

對“家伙們”而言，這種課就是“駕馭”正式制度來擴展、運用和頌揚他們自己所推崇的獨立、找“樂子”和對峙的價值觀，但又不會因過度激怒老師、導致沖突而受罰。如果事情變得很糟糕，那就可能重回舊的范式。不過，一旦避免了沖突爆發的威脅，最初的問題或突發的興致就了無蹤影了。他們遵從指令也是心不在焉、只按字面意思來，老師不得不限定，甚至反駁自己的話。“家伙們”比教師更了解非正式世界的本質，尤其深諳如何用非正式的技巧來對抗正式機構及其弱點。“家伙們”一直在試著戲弄并遏制權威。下面的例子來自科學課上對下學期教學大綱草案進行的討論：

法茲　老師，喬伊在和比爾說話。

老師　你為什么要告訴我？

法茲　哦，我就是想給您泄露點秘密。

艾迪　讓我們來量量足球場，然后再量量女子籃球場……然后量女校的禮堂。

老師　是，好吧，這挺容易的……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你用這些量出的結果干什么呢？

斯潘克斯　［諷刺性地］好吧，就好比，老師，我們會拿一張大紙——如果你喜歡可以拿綠紙——然后在上面畫球場、半圓什么的，［笑］然后我們在上面放上足球運動員的小模型，開始玩桌上模擬足球游戲。［更多笑聲］

法茲　不，老師，我們可以找到那些半圓的區域，以及球場上的不同區域。

老師　那你的遠期目標是什么……你們打算做什么？

斯潘克斯　我們可以在學校里轉悠，量量距離什么的。

老師　現在［對斯潘克斯說］我不希望你用愚蠢或者是毫不在乎的態度對待這事，這個大綱應該是有用的。

法茲　會的，老師，我們必須找出所有區域的大小，然后再到女校去測量。［笑］

喬伊　老師，我寧愿呆在教室里。我認為，無論我們呆在里面享受暖氣還是出去受凍，可能都是在浪費時間。

（……）

老師　好吧，如果你們要做測量，就需要一些儀器……也許我能給你們幾樣。如果你們真的要做這個，我可以給你們提供儀器。

法茲　老師，我現在就去拿膠帶。［大步走向門口］

老師　這是干什么，你要去哪兒？

法茲　去拿膠帶，老師，去做測量。

老師　從哪兒拿？

法茲　從青年活動中心，老師，我知道那兒有一卷。

老師　但是你不能想站起來就站起來，想出去就出去（……）

法茲　［還是站著］但是你剛才說了我們需要一些儀器，老師。而我知道膠帶在哪兒。

斯潘克斯　老師，我們想做點事，做完決定后就采取行動，而不是整天討論這個決定。

老師　我知道你們只是想走出教室。

法茲　老師，我們不是，我們只是想去測量，把所有測量都做了。

老師　請你坐下來，我會組織拿儀器。

法茲　這沒用，我只不過想開個頭。\*

以下是“家伙們”對這類課程的討論：

PW　（……）你們能擺布老師到什么程度而不受責難？

喬伊　真的，這是天生的本事。實際上你總是知道（……）阿徹先生，你就不能捉弄他，你可以和他開玩笑，但不能找他麻煩。伯德先生有種影響力，如果你找他麻煩，他會大叫……我們上他課的時候總是說話，就是坐在那兒和比爾說話，只要你不打擾課堂上的其他人，他就不會介意（……）

PW　你能判斷出什么時候算是玩過火了？

喬伊　你只要看他們的臉就能知道，只要根據他們對你說了什么，你就知道可以回什么話。

斯潘克斯　當他們開始發怒時，你可以從臉上看出來。［繃起臉］

喬伊　塞繆爾斯先生的脖子會變得通紅，你看他的脖子。

法茲　看他的脖子，而不是他的臉，就到這兒。［指著他脖子上的一個位置］

（……）

PW　我是說，當你們說你們可以跟某人“說”時，你們是當真的還是只是假裝合作一下？

—　是假裝合作。

—　假裝合作，試著得點好處。

那些試圖接近“家伙們”的技巧完全遭到排斥，因為這些技巧出自“老師們”之手，而且飽含“教學”在制度中所代表的含義。

斯潘克斯　有些老師試圖跟你套近乎，試著變成，你知道吧……像卓別林似的，他把我們都叫到健身房。

斯派克　他叫他艾迪。

艾迪　呀，我受不了這個，一個老師叫我艾迪。

斯潘克斯　他跟我們講話，他用很粗魯的“忒”這個字眼，你要知道，他管校長西蒙斯叫“老板”。

PW　你對此怎么看？

斯潘克斯　我們那時候覺得還不錯，你要知道，現在我們意識到他只不過是想讓我們跟他走近點，聽他的話，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吧？把我們搞得四分五裂。

弗雷德　里根過去會過來坐在我旁邊，他過去會跟我們講話。有一次我實在是受不了了。我就叫他滾開。他說：“你去見校長。”我因此挨了四下［鞭打］，是吧？

盡管傳統方式和現代方式有諸多不同之處，但在現實情況中，兩者基本上都是為了盡可能控制軸心并獲得學生的認同。正如我們所見，那種認為傳統范式就是單純壓制學生的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即使是在傳統模式中，過于遵從老師的命令也被看成是“娘娘腔”和“沒骨氣”。教育交換的核心還是在于學生贊同參與交換——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資源來交換。在這個意義上，通常采用的進步主義可以看做是傳統主義的延續，因為它也試圖維護傳統方法中至關重要的學生認同。針對具體情況，進步主義面對現實并對其措辭進行了擴展，但沒有擯棄傳統主義。

這些“新”方法的主要影響之一是使反學校文化及其發起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合法化、常規化。盡管這些方法阻止了這種文化的完全對抗或爆發，但是事實上，不停地妥協和策略性退讓所帶來的阻礙過程，從長遠來看使其存在更加廣泛，且更具合法性。不僅如此，課堂交流中曠日持久的小沖突也不斷賦予反學校文化廣泛的物質基礎，逐漸形成一些可以隨時化解沖突的方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進步主義在構成學校與工人階級文化的關聯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例如，學校和工廠的真正差別就在于前者具有受保護，甚至被縱容的本質。“提高離校年齡”計劃和教育家們真誠的自由主義理想一并在學校制造出了比在工廠更受保護的空間。我并不是要為“去除學校教育”辯護。從一個層面上來看，學校是為了幫助這些孩子的。但是，這種“幫助”的本質并不清晰，而且看似產生了一些意外結果。學校這種利他的、安慰的性質沒有把這些孩子帶到安全的循規生陣營并促使他們以主流方式取得進步，而是被階級文化以特定方式進行了重新闡釋。我們很難相信現在的工人階級子弟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也難以相信“提高離校年齡”計劃（在最初的劇烈波動后）和那些更為自由派的學校體制反而產生出了更成熟、更自信、要離開學校的年輕人。但是，這種成熟的方向和意義遠沒有穩定下來。這些變化很可能會朝強化對立性階級文化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注入到在傳統上被認可的素質和感情中去。例如，本研究中的“家伙們”在很大程度上在學校里采納并發展了反抗文化中的工人階級主題：對抗、破壞權威、對正式制度的缺陷和虛妄之處的非正式洞察，以及獨立創造消遣和樂趣的能力。

當然，每一學年都是囊括了從“家伙們”到“書呆子”的各種學生在內的復雜總合。違規生還是少數——盡管他們沒有報道的那么少——而且還有一些未被提及的師生關系模式和線索，尤其是在運動場上的師生關系。[［14］](#_14_133)大型的工人階級綜合中學里，情形可能更復雜多樣，很多仍舊和“家伙們”保持往來的工人階級子弟也完成了學業目標。而且，學校里有不少的工人階級子弟實現了向上流動，進入了大學，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書呆子”的看法也可能有所改觀。所有這些都可以很好地削弱我們在漢默鎮男校發現的存在于循規生和違規生之間的完全對立，使得我們的社會認知圖式變得更為復雜。另外，在那些社會階級高度混合的學校里——當然要比公布的少很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書呆子”的價值觀之間，以及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家伙們”的價值觀之間出現了一些有趣的趨同。

此外，隨著很多學校成為多種族機構，我們可以想見，學校里西印度群島裔、亞裔和白人群體之間會有更近一步的對峙和相互影響。尤為重要的是，最近內城區的學校中迅速涌現出一種源于西印度群島裔學生、比“家伙們”更甚的文化。他們與反學校文化中的白人學生的主要區別在于，制度分化與從西印度群島借用過來的主題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很清楚，新文化不只是對舊文化的再生產，而是在特定環境下對一些舊有主題的改寫，針對的是特定制度的特定問題（當然，之后是西印度群島裔學生面臨的就業處境）。盡管這些新的對抗性文化形式具有明顯的西印度群島特色，但與其母文化相比，這些文化形式更為尖銳、發達和英國化，因此常常讓他們的父母緊張擔心。比起那些對應的白人文化形式，這些新文化對于勞動力儲備和工作態度的影響甚至更為深遠。特別是在欠發達環境中挪用過來的沒有薪水、沒有工作亦勉強維生的問題，很可能被轉化成在發達環境中拒絕工作的問題。在這個社會里，我們第一次要面對這種摒棄現代工作形式和結構的可能，至少在第二代移民中有很多少數族裔有這樣的傾向。[［15］](#_15_133)

雖然我們無法在此一一討論每種學生文化和教學關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基于對白人男性工人階級違規要素的關注，我們就可以假定在學校中真的存在嚴格、排他性的分隔。違規生的文化為思考其他立場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考量工具。任何課堂環境都是一個復雜的組合：接受、對立、合法性、老師們行使教育范式的特定方式。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從制度生活隱晦、費解的日常模式中分離出一些核心、強勢的模式。我認為讀者的目的（尤其是教育實踐者）應當恰恰相反：用我所列舉的概念去驗證事實；把問題置于具體環境中；分辨不同過程以不同力度，在不同時間、不同情況下所發揮的作用。寫作目的和讀者目的其實并不矛盾。

##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和制度

考察完在學校這一國家制度中心懷不滿的工人階級子弟的背景和經歷之后，我們現在可以更仔細地來觀察勞動力的主觀準備過程，這一過程導致了他們反學校文化中最為深遠和獨特的結果，也是其文化的核心邏輯和動力。

### 官方準備

按法令規定，英格蘭和威爾士所有地方政府必須為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在校生提供職業指導服務，并為畢業離校生提供就業服務。[［16］](#_16_133)

傳統上，職業指導主要是為學生排除在從學業向職業轉變的過程中的困難。這需要把學生個體的能力和天賦與可供選擇的工作進行匹配。職業指導老師和官員們一般會將這個過程標準化，使用心理測試[［17］](#_17_127)“客觀”測試學生的能力和資質，并依此提出建議，或上或下相應調整他的期望。

最近幾年，尤其是在美國作家[［18］](#_18_125)的巨大影響下，職業指導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是對缺乏人性的傳統學業成績排名及其對職業選擇的影響作出的反應。新一輪職業指導的基礎是在這個模式上增加一個橫坐標。該觀點認為，學校和職業環境中的人類潛能無法用學業成績排名說清楚。在傳統學業成績排名之外還應關注：多樣性、豐富性和興趣。[［19］](#_19_126)

這種做法具有兩面性。人們對工作世界的探索和研究是為了展示工作的多樣性，足以滿足人們各種性格的關注和需求。這種方式賦予個人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的機會，即使他們在成績排名中“墊底”。畢竟“青菜蘿卜，各有所愛”。[［20］](#_20_124)

值得贊賞的是，這種做法亦把學生看做具有多種興趣和能力的完整個體，而不僅僅是知識的容器——看起來工人階級子弟就像是破損的容器。個體“觀念”的發展不僅和工作有關，更和與工作相關的整個“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21］](#_21_125)

現在的學術范式在本質上大多屬于社會心理學范疇。測試依舊是發現、定義個體差異和特殊性格能力的首選方式。但是，至少在書面文件中，官方對心理測試相當坦率，并建議應該讓學生自己測試，使測試成為他們“自我觀念”發展的一部分，而不是由“專家”用傳統、排他和神秘的方式進行。此外，改編自美國心理治療學，特別是卡爾·羅杰斯的著作的“以顧客為中心”的“輔導”技術強化了這種民主方式。[［22］](#_22_125)

或許新式職業指導浪潮中最為驚人、誠懇的善意之舉是強調——至少在公認的文件中——職業教育不應該將整個經濟及其人力需求納入考慮。職業指導的明確責任是服務客戶。[［23］](#_23_125)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評論員建議說，職業指導不應該為行業需求服務，而是可以（通過其對未來工人及他們對工作成就感的需求的影響）對行業提出挑戰，并迫使行業進行改變。[［24］](#_24_123)這無疑逆轉了其他領域那些堅信教育和職業指導只應服務于行業需求的觀念。

應當注意的是，職業教育就自身而言是失敗的，因為它并未有效觸及到大部分工人階級子弟。最近的一份官方調查[［25］](#_25_121)發現，近三分之一的學校沒有在職業培訓上花時間，而且只有14％的學校把職業指導老師任命為部門主管。更有甚者，75％的三年級學生、28％的四年級學生和52％的五年級學生根本沒有接受過職業指導教育。調查總結說，作為“為生計所做的準備”的職業指導教育，“除了在少數學校，普遍未被接受或實施”。[［26］](#_26_121)因此，在大部分學校，若純粹從數量上看，有關職業指導教育的進步想法與現實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27］](#_27_117)

但是在漢默鎮男校，職業教育是很嚴肅、認真的事。職業指導老師都是全職教師，經驗豐富，近來都取得了“顧問”資格。他可能是學校里最努力工作的老師；盡管人手不夠——這意味著他經常不得不一次接待整個五年級的學生，他還是努力使用現代方式的語言：以孩子為中心的教學；為學生的人生所做的準備；工作經驗，鼓勵發展與工作相關的“自我觀念”。

漢默鎮的職業服務對英才模式進行修正，從而有助于強化這種方式。職業指導辦公室的布告欄上貼著畫有兩個人物的圖片。一個是邋遢的學生，另一個是洗漱干凈的傳統工人階級子弟。圖片說明上寫著：“誰能獲得工作？”兩個人像的周圍貼著一些用對句方式書寫的評語：“骯臟、頹廢的草窩／精短、梳理整齊的頭發；二十四小時胡子拉碴／剛刮過臉的健康表情；‘少跟我啰嗦的表情’／面帶微笑、坦誠（好小伙）；摳鼻孔／目光清澈的直視；沒精打采地坐著／雙手緊握（表明堅毅決心）；短小不整的T恤衫／穩重的套裝，干凈的襯衫（尊重英國傳統標準），帶折縫、筆直的西褲；破舊邋遢的棒球靴／擦得锃亮的黑皮鞋。”這里意思很明確。如果無法掌控智力，那你至少可以掌控外貌；能力不是一切。

老式的按能力分配工作的英才模式當然依舊持續，尤其是校外來的演講人講座時還是這個論調。下面這位談論建筑行業的演講人就很典型：

我們招各式各樣的孩子，那些有中等教育證書（CSE）的和沒有的我們都招，當然，如果你有中等教育證書更好。如果你參加工作時是工藝級別的，可以進學院念書，去拿城市行會證書（……）這是第一個等級。如果你現在已經拿到了工藝證書，你就能繼續往上升（……）如果你到最后一級，你就能成為工藝技師（……）如果你真愿意，你可以繼續，你有機會上阿斯東大學，拿一個學位（……）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升上去，你應該能升上去（……）［回應喬伊的一個問題］“上漆”，你問“上漆”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學會漆墻，那是你想要干的嗎？為什么不想做點別的，走得遠一點，比如當個室內裝修工，那你就不得不考慮你的顏色設計，計劃好，有個留給你干的工作，而不是光站在那兒把油漆潑上去（……）如果你真的很想干這個，我們當然不會阻止你。\*

學校中主要的教學范式早已在工人階級價值觀方面產生分化，“家伙們”的反抗——或者常被記錄為“粗魯無禮”——也顯而易見，因此這種職業指導／建議的方式會讓位于一種更為生硬粗暴的方式。若是學生不斷喝倒彩、拆臺哄鬧、明顯缺乏興趣，學校就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復習未經修正的英才模式，迅速重新評估老師所代表的含義。以下評語雖然使用了“相關的”個人類比，但仍帶有很老式的嘲諷。

給五年級提供職業指導的老師　你們有些人認為你們只要走進來，憑你們的水平就能當上學徒。你們的水平！你們有些人都不怎么會寫字、讀書、做算術吧。可你們認為你們有權利當學徒……讓我告訴你們吧，你根本沒有權利，簡直差遠了，你根本沒有權利做什么，你越早意識到這一點，你就會做得越好。我自己也沒有權利期望得到一份好工作，盡管我受過所有的培訓，我沒有要求升職的權利……我必須辛苦干活兒，干活兒才能得到。\*

老師經常會訴諸相關性／進步主義中片面、強有力，甚至低劣的形式來維護控制和教學保障的軸心。因為相關性主張的是回歸工人階級主題，而工人階級的主題是以工作為中心，所以老師顯然傾向于通過回顧自己在學校文化中的工作生活，而對工作態度和工作條件發表意見。雖然違規生可以逃脫學校之網，但是他們無法逃脫行業內嚴苛的要求。工作的價值觀被帶回學校，用來斥責違規生的行為。這經常以脅迫的形式出現，老師一方面說“如果現在你不樹立正確的態度，你就不會在工作中成功”，另一方面又更為實際地說“如果你現在不合作，你就拿不到好的離校評定報告”。因此，這種讓學生為上崗做好準備的主題經常與備受爭議的“合作”主題聯系在一起，使得第五年的氣氛充滿了道德憤慨的火藥味。“家伙們”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自私、粗魯和不合作的表現，最終很不利于他們未來的工作生活。

給五年級提供職業指導的老師　我剛聽說一件事，一個“家伙”在三個星期后被炒了，就在復活節那天。他厭惡權威，不守規則。他的態度是錯誤的，經理剛炒了他魷魚，他說“滾出去”，他不準備繼續忍受下去，他為什么要忍受呢？我之前就告訴過你，在學校養成的壞習慣很難改掉。如果你在這兒不滿權威，對紀律抱著壞的態度，那這些都會被帶到工作中去，工作時會顯現出來，而他們沒有時間來處理這些。現在是開始做出努力的時候了，讓別人看看你現在怎么樣了（……）（當你開始工作時）你會用一堆問題換回一堆更糟糕的問題，這些都是由你自己的態度決定的，你現在在學校的態度會讓你的工作變得更難。\*

然而，不管是用新的、進步的、修正過的，還是用傳統的模式，“家伙們”總是排斥、忽略、顛倒、取笑或改變他們在職業指導課上學的東西。那些表征[［28］](#_28_117)層面的直截了當的訓誡，包括認真對待找工作這回事、仔細準備面試、在工作中爭取成就，甚至包括了解不同工種的簡要信息——除了那些他們早就決定想干的事，都受到嚴格過濾。

［關于職業指導課程的小組討論］

斯潘克斯　過一會兒你就不會注意他了，他不斷重復同樣的東西，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意思嗎？

喬伊　我們總是太忙了，摳鼻子，或者彈紙片，我們就是不聽他的。

（……）

斯潘克斯　他總是說同樣的東西。

法茲　他總是說如果你去找工作，你就必須做這個，你就必須做那個。我找過工作。你根本不需要做那些玩意兒。就是去一個地方，問問主管的人，根本不像他說的那樣。

喬伊　真是荒誕可笑。

PW　你指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樣的文憑呢？

法茲　文憑這些玩意兒，你不需要，你就是去找活兒干，然后他們就給你活兒干了。

（……）

PW　（……）他們強調努力工作、積極進取有多好（……）

威爾　那是你老的時候，對吧，如果你沒有辦法干這個活兒了，但是……就像，對你來說太難了，你想坐下來歇口氣，那就讓其他伙計替你……當你還年輕的時候……有些工作一旦你老了，你的工資就減少了。

PW　那個從教育學院來的演講者怎么樣？

弗雷德　他們就是想讓你去工作……喬伊，他對喬伊說：“你想做個油漆工和室內裝修工？”給墻上漆，你隨便找個傻子也能給你漆墻！或是說：“你想做裝修，或者寫標語。”

斯潘克斯　好像還得當個什么社會人物才能去給墻上漆……我想站起來對他說：“隨便哪個傻子就能給墻上漆。”

新的信息當然不會被注入自我評估的理性系統，或是正在形成的、與“生活方式”和“工作概況”有關的“自我觀念”中去。即使“家伙們”記住了一些信息，那也是根據他們文化中高度選擇性的準則篩選過的，并根據自己的目的——其目的往往具有顛覆性、嘲諷意味和對抗性——重新闡釋過：

［一次討論求職指導影片的小組討論］

珀斯　我納悶為什么電影里從來不拍我們這樣的孩子，看他們對這個的態度都是什么。他們什么樣，我們什么樣。

PW　好吧，電影里都是些什么樣的孩子呢？

法茲　都是些好學生。

威爾　是啊，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都是按照教的說。你要知道，他們可能來自什么藝校，給其他孩子拍職業指導電影是個工作機會，你得等他說完他的臺詞，你才能說這句話。

PW　我是說，你怎么知道的？

威爾　啊，他們就是站在那兒，而且就是在等著他說那句話，然后再接著上……

—

法茲　你在那兒看過所有電影了，對吧！他們都會拍些傻學生，“哦，是的，我想做這個活兒”，“哦，輪到我了，是我出去賺錢的時候了”。斯派克　你看不到一個搗亂的學生（……）沒一個是那樣的。

當然，他們的態度必須和他們對學校其他方面的排斥聯系在一起來看待。如果職業指導老師能力挽狂瀾、做到其他老師做不到的，那才會令人吃驚。顯然，整個反學校文化的大規模爆發可能引發更為咄咄逼人的職業指導方式，但這也使“家伙們”對學校整齊劃一的道德觀更加疏遠，單在職業指導領域是無法控制的。對職業指導的排斥是對抗學校這一中心主題的一部分。[［29］](#_29_115)

“家伙們”也從根本上排斥文憑這個概念。對他們而言，正如制度界定的那樣，“文憑”就是知識權力的爪牙。因為他們反抗知識，所以他們也必然抵制和懷疑文憑并使其失去信用。正如其他情況那樣，使正式標準失去信用的主要方式是用非正式的模式“看透這些標準，了解它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他們靠經驗，至少是聽來的經驗與正式定義周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懂的更多。不做功課、沒有文憑照樣能過活，因為真正有用的是“了解點世界”、“腦子清楚”、必要的時候“撒手”。當然，成人工人階級世界中，英國車間里盛行的實用氛圍及對理論的不信任都大大強化了他們的這種觀點。這一基本文化資源在學校的分化過程中被磨煉得更為堅固。

“家伙們”從心底里認為肯定有更簡單的方法。文憑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對直接行動的偏離或替換。他們覺得他們總能“在崗位上”展示必要的能力，而且做一件事總比描述它或在考試中陳述它容易，或者比正式說明它容易。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我光靠這個　［學徒］工資根本沒法活，第一年或頭兩年每周大概十英鎊，每過一個生日就漲點工資，我可沒法干下去。我屬于精力旺盛的那種，我總是想：如果某個地方能夠跳過，為什么要繞遠路呢。我總是跳圍墻（……）我現在對自己不拿任何離校資格證明很滿意，如果我足夠聰明，早晚會表現出來（……）或者我可以讓他們明白我是塊料。我會讓他們看到我值得投資，然后可能送我去上什么課（……）我是說，面對現實吧，這很容易，真的太容易了，因為你要做的就是學會怎么開車床，一旦你會做了，所有的測量和別的就都是例行公事了（……）任何人都能當學徒。

他們通常覺得這種洞察力是不為“書呆子”所知的。那些循規生不得不“苦干”。因為他們沒有使用想象力或機智，才需要文憑：

［一次個人訪談］

PW　你覺得什么是你有而“書呆子”沒有的？

斯派克　膽量、決心，不光是膽量，還有狂妄（……）我們比他們更了解生活。他們可能更懂點數學和科學，但那些都不重要。這些對誰都不重要。他們得去試，然后才意識到……他們二十歲的時候，可能才和我們現在懂的一樣多。因為他們還得經歷那些事。好吧，我是說我現在就已經經歷過生活的不少階段了，我已經有過得意失意，你嘗過失望的滋味。我已經接受這些事，我已坦然處之。就是這樣，對吧，但是“書呆子”們，當他們找到工作，他們，我該怎么形容呢……他們只不過是遵守規則，把工作做到最好（……）有些方面他們很聰明，他們在數學、科學和英語上很聰明，但是在生活方面不怎么聰明。在我看來他們是輸家。

### 連續性

盡管“家伙們”排斥老師對于學校與工作之間存在連續性的看法，另一種連續性對他們卻很重要。在實際選擇工作方面，是“家伙們”的文化，而不是官方職業指導資料，為未來提供了最具影響力的指引。因為個體加入違規生群體之后會經歷一整套態度和觀點上的變化，這些變化亦會或多或少提供一些穩定的看法：想和什么樣的人一起工作，什么樣的情形能使正在發展中的文化技巧得以充分發揮。我們已經了解，車間文化與反學校文化具有一些相同的決定因素和明顯的相似之處，而且車間文化在以多種方式影響著“家伙們”——尤其是通過父母在工人階級家庭中傳承。事實上，在“家伙們”和家長的想法中，學校和工作之間經常有直接聯系。這確立了不同環境間經驗的延續。我們可以把這看做經歷和反應的連續底線，工人階級文化整體受其哺育，才得以長期應對敵對環境，并在工作中發展出特定的社會關系：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他［他父親］把它說得就像個大學校，他把它說得就像這個地方。有一天他跟我說，因為我們實際上在討論消防栓事件，我想對話是從這里開始的。我們正在討論怎么胡鬧，然后老媽就說：“得了，你不應該胡鬧。”老爸就說：“我們就是這么干的。”（……）他告訴我們，有個家伙找了一個巴基斯坦佬，把他的褲子扒了下來，揪著他的雞巴拉著他在車間走，就那么揪著他的雞巴，拽著他繞著車間走，諸如此類的蠢事。你可以拉他一下，他可能掉進爐子了，或者摔到一個錘子底下了。他說你到下邊去，然后你就拿著一個鏟子的把手那頭，然后你把鏟子放在他們腿下邊，把他們舉起來，就在那個地方（指陰莖處）舉著他們……他們下不來。他認為他們總是搞這些事，我覺得這一定就像是學校的延伸，在工廠里工作，和一樣的人，每天和一樣的人，你就每天胡鬧，你來這兒，每天都是同樣的人。

作為階級文化的一部分，“家伙們”的文化提供了一套“非官方”標準，以此判斷通常哪種工作環境和個體最匹配。在匹配的工作中，他必須能坦陳有關欲望、性意識、喜歡豪飲和盡可能偷懶的想法。在這種工作中，人們必須可以相互信任，不會有人“爬到”老板那兒告“外人”或“偷東西”的狀——這實際上也是“書呆子”最少的地方。事實上，這種工作場所肯定有老板以及“他們和我們”對立的局面，這樣就總會出現告密者背信棄義的危險。未來的工作環境必須張揚男性氣概。人們在這里不能“娘娘腔”，要“自己搞定”，瞧不起“筆頭工作”而崇尚真正“干事”的人。在這種環境中，你可以發表個人意見，不需要表現順從。首要的直觀標準是這份工作必須很快發高工資，可以搞點“詐取”和“額外津貼”好維持他們早已養成的抽煙喝酒的習慣，滋長那種“占優勢”、“了解現實是怎么回事”的優越感。基本上，工作必須是同事都“不賴”、相互之間能共享一種文化身份的地方。

不僅非正式文化建立了這些標準，而且以非正式文化為基礎的非正式群體也強化了這些標準。之前所有討論過的過程——“開玩笑”、找“樂子”、“嘲弄”——為當前的學校環境、也為未來的工作環境設定了規范：

［一次關于未來工作的小組討論］

艾迪　我想當寶石匠。

PW　當什么？［笑］

艾迪　寶石匠。

PW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笑的。當寶石匠有什么可笑的。［笑］

——　他是個傻逼。

——　他是個搗蛋鬼。

——　他，他會把一半的珠寶偷走，他會。

斯派克　他想在六個月內成為一名鉆石鑲嵌工。

德瑞克　他會把一顆寶石鑲在戒指上，把六顆揣進自己兜里。

PW　你對寶石匠這行了解嗎？

艾迪　不了解。［笑］

自我評估的技巧和心理測試只是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層面的差異，而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揭示個體內在品質的差異。校外演講者沒有如期到場時，職業指導老師分發了“自我評估”問卷：可以用“大部分時間／一半時間／幾乎從不”來評價諸如“誠實／善良／慷慨／勤奮／干凈／順從／聰敏”等項目。調查問卷完成后，他讓學生自告奮勇地讀出答案。“家伙們”的肢體動作一如往常，象征性地推推搡搡：他們碰對方的胳膊肘，轉頭相互看，在各自的卷子上改答案，對照筆記，拿彼此的答案開玩笑，然后大致上對這個測試達成共識。當志愿者讀他們的答案時，“家伙們”就表明了自己的分化標準。他們嘲弄譏笑“大部分時間”“順從”這樣的答案。比爾對一個被“家伙們”認為邋遢不整的“書呆子”喊道：“先生，他‘干凈’和‘機敏’這兩項的答案是什么？”聽到答案是“大部分時間”時他們報以哄笑。比爾也自告奮勇讀自己的答案。當他回答說自己“大部分時間”“體貼”時，老師讓他解釋這一點，“因為我沒在你的功課和對待老師的態度中看出這點”。但在課后解釋時，比爾當然還是認為他對“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我的哥們兒”還是很“體貼”。

“家伙們”在文化上為某些工作所做的系統的自我準備，使他們不僅在學校功課方面，也在預期上與“書呆子”區別開來。循規生和違規生之間的區分就是不同前程、不同滿足感以及相關的不同工種之間的區分。這些差異不是隨機或者毫無關聯的。一方面，他們系統性地源自校內群體間的對立，另一方面，這也和離校后明顯不同的工種分類相關。“書呆子”／“家伙們”之間的區別被看做未來熟練工／非熟練工或者白領／藍領間的區別。“家伙們”欣然地將學校內部文化景象中的區別移用到未來的工作區別中，盡管他們不一定接受對各工種的傳統評價：

［一次小組討論］

喬伊　（……）我們想活在當下，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活得痛快，希望有錢出去玩，想現在出去泡妞，想現在就有車，然后想想，這些都成真得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是其他人，像“書呆子”那些人，他們考試，他們工作，他們沒有社交生活，沒有樂趣，他們要等十五年才結婚，諸如此類。我覺得這就是不同。我們想的是眼前，現在就要找樂子，而他們考慮的是未來，將來對他們來說才是最好的時光（……）他們是遵守規則的人。他們是公務員那種類型，他們會比我們先買房子和其他東西（……）他們會是有錢人，我說他們會成為公務員，有錢人，而我們會是磚瓦匠那種。

斯潘克斯　我覺得我們……多多少少我們是干苦活兒的那種，但他們不是，他們會是辦公室人員（……）我沒什么野心，我不需要有……我只想拿不錯的工資，那就夠我活了。

（……）

喬伊　我不認為這是明智之舉，我認為對我們來說，對我們這種人來說，這更好，因為我們嘗到了，我們嘗到的不是好的生活，我們嘗到的，你要知道，是你老了以后就不能過的特殊生活。我覺得我們就是太喜歡這種生活了，我知道我還是會這么做。我不覺得你現在可以把自己和這種生活割斷，去當個學徒好好干……只是維生。

對于偱規生而言，他們更認同老師的權威；他們對職業指導電影和預期目標有強烈的興趣；他們甚至有時候對于老師采用的嚴厲的、脅迫性的方法表示贊同，因為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他們的利益。

［一次關于職業指導電影的小組討論］

托尼　它們使你大開眼界。比如當送奶工是怎么回事，早上五點起床，起來，出去，天不亮時就得起床。

奈杰爾　郵局的那份工作，我覺得不錯。他們幫助人，干那行的人（……）

PW　（……）當他［職業指導老師］對五年級學生不停地說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被羞辱？

奈杰爾　不，真的沒有，因為我知道大部分時間，你知道的呀，大部分時候他說的確實是對的，因為那兒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你要知道，他說話的時候他們根本就沒在聽，對吧，他就挺生氣的。

出于自身考慮，循規生基本上接受從學校到工作是連續統一體的說法。盡力完成學校的官方目標是值得的。這是為工作做的最好準備。但是順便說一句，應該注意到，雖然這是傳統反應，但是如果工作不努力、缺乏理性和執著，那也無法實現或“贏得”成功。

［和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小組討論］

托尼　首先是你的態度。比如，如果你在學校表現得好，你離校時就能拿到好的報告（……）這有利于我們，因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必須上學。我們也必須工作，不然你沒法活下去。所以你多多少少要把自己培養成那樣的人。但是我覺得那些沒做到的人，你要知道，那些不在乎這些的人，他們工作時會想：“哦，我不喜歡干這個，我不干了。”而不是堅持下去。他們在工作上進展不會好。

奈杰爾　你要知道，我覺得事情就是這樣發展下去的，如果你一輩子享受做某件事，你就一直做下去；但是如果你不喜歡上學，那你就干不好工作。我覺得這種態度會延續到工作中去，你不會干得很好（……）［工作］就像上學，你離開學校之后，比如，我會去當個學徒，你當你的學徒，你夠資格了，那接下來的一輩子就繼續不斷學習，我是這么想的（……）正如你知道的，他們有些人，他們實際上不需要上學，因為他們只是去當送奶工或者干類似的工作。

### 職業

總的來說，對于學校內發生的基本文化轉移，“家伙們”發展出一套完整的非主流的生活期望態度，因此，他們并不怎么在乎對特定工作的選擇。事實上，我們也許可以看出，就其文化所擯棄的標準以及這種文化意味的連續性形式而言，體力工作和半技術性工作確實沒有差別，用既定標準尋找兩者的物質差異只是浪費時間而已。因此，從他們在校的最后幾個月這段時間來看，個人的工作選擇確實看似很隨機，不受任何理性技術或者手段／目的的影響。但是，把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上崗工作硬說成是特定的工作選擇其實是很迷惑人、神秘化的說法，特定的工作選擇本質上是非常具有中產階級色彩的構想。我們已經說過他們反對其他更為循規的對待工作的看法，也探討過他們群體的團結性，所有這些都把工作選擇變成了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家伙們”并不是選擇職業或特定工作，他們熱衷的是一般勞動。大部分人工作——或者是面對他們接受的“苦活兒”——是因為他們急需用錢，他們認為所有工作都令人討厭，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工作的環境能夠讓他們表達自我，尤其是他們的男性氣概，允許他們干活兒時能搞點從反學校文化里學來的消遣和“樂子”。這些需求與任何工作的性質都沒有什么關系。

“家伙們”明確拒絕了職業指導項目所假定的工作多樣性（以及這些工作所需的品質才能）—至少就他們自己的未來而言：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工作就是個……掙錢的途徑。掙錢有很多法子（……）各種工作最后的結果都一樣，就是讓你掙到錢，沒人找工作是因為熱愛那個工作（……）你不會白干活兒。我不覺得有誰會白干，你需要面包活下去（……）你干活兒的時候有一些區別，但是不大，最后這些達到的目的都一樣，它們都能掙錢，它們其實都一樣。

［另一次訪談］

斯派克　每種工作都是一樣的。不，我這個可能說得有點過了，不是每種工作都一樣，因為你的工作不同，醫生的工作不同，律師的工作不同。都一樣的工作是那些你必須苦干的活兒，當你就是個苦工的時候，所有的工作都一樣（……）沒有什么多樣性，都是一樣的工作。就是分室內和室外兩種。

這種觀點并不和他們目前期待工作的強烈情緒相矛盾。我們不應當低估“家伙們”想要擺脫學校的程度——更應該把“過渡”到工作稱為“翻身”出學校，同時，他們自己文化中流露出的對掙錢的向往，以及成為“真男人”文化一分子的誘惑也很大。

文化慶典過后，廣義上的階級文化會借父母之口向工人階級子弟不斷證明，期望工作能帶來真正滿足的念頭是愚蠢的，也不斷會有揭示工作真相的灰暗而未經驗證的提醒。但就目前而言，階級文化的校園形式所產生的對未來的承諾抵消了廣義階級文化所傳遞的信息，盡管校園形式是階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最終還會再生產廣義的階級文化：

［同一次訪談］

PW　你期待開始工作嗎？

喬伊　是啊，如果人們還沒有讓我失去興趣的話。我們的老媽今天早上叫醒我時，說的第一件事就是這個，她說：“哦，我不想去上班。”我就回她：“我想去，我不介意，我想開始工作。”然后她就說：“你會討厭工作的，你會討厭干的。”

這種認為所有工作環境都基本一樣的觀點在“家伙們”真正找工作時表現得最具戲劇性。對具體工作的特定選擇真的頗為隨機。下面對如何選擇工作的描述相當典型。對“家伙們”而言，所有的工作都意味著勞動，選擇付出勞動的地點并不重要：

［一次關于工作的小組討論］

珀斯　我和我的哥們兒，約翰的哥哥，一塊兒去的，我和他去的，呃……他想找個工作。啊，約翰姐姐的男朋友在這個地方找了個工作，他就對艾倫說：“到那兒去，他們能在那兒給你找份活兒干。”他就去了，然后他們說：“你歲數太大，接受培訓太遲了。”因為他現在二十歲了，他對艾倫說：“站在那兒的是誰？”他回答說：“我的一個哥們兒。”他問：“他想要找工作嗎？”他說：“我不知道。”他就說：“問問他。”他出來，我進去，他把這件事跟我講了，他說：“如果你想要這個工作，你離開之前回這兒一趟。”

PW　你在那兒干什么？

珀斯　木工，接縫。一個月前我回那兒去，哦，好吧，其實不是一個月前，是幾個星期前，我去找他了。

PW　啊，那純屬巧合。我是說，你曾考慮過做細木工這一行嗎？

珀斯　好吧，你得去那兒看看我的木匠活兒，我干夠了，我不會干幾年木匠的。

［一次個人訪談］

斯潘克斯　你知道的，我不過就是把栓放進去，我干這個不是因為我一直想干管道工。起初我想做油漆裝修工，然后想過磚瓦匠、電工、管道工（……）那是個星期五——我去學校，我老媽對我說：“你為什么不自己去委員會找個工作？”好吧，當我，當我去學校的時候，我想：“那我就去當個管道工吧，就這么著吧。”所以我就去了職業指導辦公室，我說：“我能去委員會找個工作嗎？”（……）我就打了通電話，騎自行車去那兒，他們說：“你得到這份工作了。”然后告訴我什么時候去上班（……）我就在去學校的兩個小時內搞定了工作。

自我

主觀地意識到現代勞動的普遍性，對勞動的具體表現無動于衷，這是“家伙們”以學校未察覺的方式從其反學校文化核心學到的基本東西之一。反學校文化允許這種意識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浮出表面，因為除了在工作中尋求（或需要尋求）滿足感和特定意義之外，這種意識也為他們提供了另一條出路。它能引發外在的、以群體為基礎的滿足感，從而給予自我支持和價值。這種能力反之又取決于某種根本的、相關的、完全被反學校文化主觀挪用和確認的東西。這要求對勞動有一定的主觀認識，了解如何恰當地、以男性化方式付出勞動。

從根本上說，這需要在經驗上把內在自我與工作區分開來。勞動力是對現世要求的一種障礙，而不是一種內在關聯。不要期望在工作中獲得滿足感。他們拒絕為了在工作中求得內在滿足感而動用一部分自我。這就好像剝離一部分自我，以更好地把握自我的其他部分。工作和對工作的期望被抑制、限制和最小化，而在文化和象征層面上附屬于它的東西均得到了維持、發展并盡可能被變得有意義。縮減工作的內在要求意味著可以用獨立、世俗的方法發展、頌揚自己的能力，而不用受制于責任和新教倫理。隨著反學校文化在學校內逐漸成形，他們以非正式的方式使用工人階級文化的資源，尤其是那種強調男性氣概和強硬的文化，在群體中樹立起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這個社會領域使他們的部分自我變得非常活躍并具成就感——這些都不是從具體從事的工作中獲得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反學校文化就是要發展并維護不同于官方的文化態度和實踐。

影響個體未來的關鍵問題不是工作的內在本質或技術屬性，而是工作中的感覺，這在學校中已有非正式的準備（盡管是以一種特殊方式）。他們最終認識到是文化消遣使所有工作變得可以忍受：

［對工作的近期展望的討論］

威爾　第一天我就是特別害怕。你知道的，擔心和誰結伴啊，誰是“書呆子”啊，誰會向領班告狀。

喬伊　（……）你總得把工作變得有趣些。是你自己把工作變成不高興的事……我是說，如果你在通下水道，那陣子你可能會覺得不高興。不是每份工作都是愉快的，我應該這么想。沒人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除非他們是喜劇演員或者別的，但是，呃……沒有一份工作是愉快的，因為早上你必須起來，原本你可以躺在床上，但你必須出門。我覺得每一份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愉快，但關鍵還是看你……能不能把其中的不愉快變得盡可能愉快。

對“家伙們”而言，在現代社會中勞動抑制而非發展自己的主觀意識。這是通過把勞動定義為強調體力而非腦力的過程而實現的。當工人階級的主題被提出、分享和形塑的時候，勞動的恰當使用形式和意義也直接從反學校文化中生成了。

是學校增進了對腦力勞動的某種反抗和對體力勞動的傾向。至少體力勞動處于學校范疇之外，并帶有一種——雖然不是內在的——真實成人世界的光環。腦力勞動的要求太高，并且會侵占太多——就像學校一樣——私人的、獨立的領域。“家伙們”深知，腦力勞動的特定社會形式是在交換中換取他們想要的自由的不平等“等價物”。因此，雖未說明，但腦力勞動總帶有強求服從和循規的威脅。他們在學校里習得的對腦力勞動的反抗成了對權威的反抗。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抗和教育范式的結合把教育變成了控制，把（社會）階級反抗變成了對教育的摒棄，把個人差異變成了階級區分。正如比爾形容自己和“書呆子”之間在前途上的差別：“其實就是筆頭工作和干苦活兒之間的差別。”這是有關階級分化的知識，雖然這是在學校里學到的。雖然這是學校教育的產物，但其影響是社會性的。

矛盾的是（本書第二部分將會具體闡釋這一矛盾），雖然在“家伙們”對勞動的理解中，自我是與在工作中獲得內在滿足的期望分離的，勞動是體力活動，但是他們的優越感并未因此減少，他們并不覺得自己的洞察力和個人學識受到任何損傷。這也沒有減弱“家伙們”的樂觀期望。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一心急于脫離學校的結果。但是，這些也是“家伙們”主觀認為自己已通過經驗看透、學會并懂得很多“書呆子”不懂的事情的結果。當然，正是這種經驗的誘惑——對傳統邏輯明確、非計劃和出人意料的逆轉——將這些工人階級子弟綁在了體力工作的前程上。只有揭示這種主觀上的認同，我們才能理解他們那些顯示自己權力的行為，并領會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對他們（以及其他人）而言至關重要的那種充滿矛盾而半真實的自由觀念。“家伙們”對勞動力的定義是獨立的、體力的，我們在此只能對他們最小化的勞動力給予明確的限定。

盡管勞作與工作的滿足感沒有內在關聯，但是勞作確實具有某種意義。勞動力是其他事物（除勞動力的直接作用對象外）的重要性得以表達的物質途徑。盡管勞動力切斷了工作的經驗反射，但它擴大了其他經驗。畢竟盡管體力勞動代表了與學校和腦力活動的隔絕，它也意味著對“書呆子”更為積極主動的排斥。“家伙們”覺得他們能在真實的成人世界中工作，而“書呆子”沒有這個能力。因此，如果要穩定其價格，勞作——其本身毫無意義——必須反映出其周邊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相矛盾的是，一種文化之所以可能，正是因其對自身的限制）。

最為重要的是，體力勞作是代表、表達男性氣概和反抗權威的途徑——至少像在學校里習得的那樣。體力勞作傳遞的是好勝、機智、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不敬和顯而易見的團結。它為成年人的喜好埋單，展現了對女性的吸引力和潛在控制力，即一種男性氣概。

“真正干事”，身體活躍，以某種方法出賣勞動力，以上這些的本質在“家伙們”看來不是一種防御手段或消極反應，而是對先前創造性地學到的手段的一種確認和表達。它顯示了一種獨特的成熟，一種能力和觀點的實踐，而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備的。盡管體力勞動本身沒有意義，但至少在他們生活的這個階段，體力勞動對漢默鎮的“家伙們”來說是聲張自由、顯示某種力量的途徑。

［一次個人訪談］

斯派克　（……）看到那些孩子在一個辦公室里干活兒，我就特惱火。老實說，我就是沒法了解他們怎么能干這活兒。我有自由，我有……我能掙到錢，很難解釋……

［一次個人訪談］

威爾　戶外工作、體力活兒和……寫東西這些事，把筆拿出來……你要知道，還有自由。

［一次個人訪談］

喬伊　我不會當老師（……）除非我去教足球隊，但我不會踢足球。你看，我精力充沛，我得不停地走動，使勁……不是消耗我的意志力……媽的……我得不停走動，精力太充沛，沒辦法做辦公室工作。但是大概十年、十五年之后，當我變得肥肥胖胖的時候，也許我會去做辦公室的活兒。

當然，在主觀上有多種不同的出讓勞動力的方式。漢默鎮學校的循規生更可能相信他們能在工作中找到滿足感，通過工作構建他們的前程，借工作活動的內在本質來表達自己的價值和成就。他們被官方連續性的趨勢帶著走，期待這些連續性能給他們帶來十分恰當的回報。對他們而言，勞作表達的是勞動力本身的性質，而不是其他間接的文化價值：

［與漢默鎮男校循規生的小組討論］

托尼［最近獲得了去工具制造廠當學徒的機會］　你必須工作，所以現在就得努力，找個好工作，做點你想做的事，不是制造汽車或者整天安裝車輪這種事。你知道你能掙到錢，但那種活兒不值得干。你的生活將毫無生趣。如果你……比如說我吧，我會成為一個工具制造工，你看得到最終成品，哪怕是些螺絲，但你知道是你給這些東西做的鑄模。我會喜歡干那種活兒，看到成品。

奈杰爾［最近獲得了去英國鐵路公司當學徒的機會］（……）直到你真正立足的時候，哪怕用手背干活兒都行的時候（……）你才不會擔心，比方說，你可能會想著明天早上會怎么樣（……）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火車司機，一開始總是先開普通的小機車——每次培訓都是不同階段。你可能從小機車換到大火車頭。你可以在你熟悉的每輛車上開，你是個司機。我想我能看到自己慢慢升上去，你知道吧，升上去。我有盼頭。

在另一極端，對“家伙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工作可以成為他們的愛好。對他們而言，出賣勞動力直接表達了他們甚至最私人的生活。這就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一方面“家伙們”將工作中的個人涵義刪減到最少，另一方面他們可能完全沉迷于工作，視之為私人感情生活的軸心。“家伙們”非常小心地在自己的文化里學習削弱、打倒這種軸心。他們自有其軸心。

這里提到的還是那位在高級文法學校念書、十六歲離校去當助理高爾夫教練的工人階級子弟。這名男孩完全將高爾夫看做上進和表達的媒介。作為“家伙們”的一員，他的發展軌跡有點奇怪，他排斥學校，將工作而非一種文化作為提升、自我表達和肯定的方式。

［一次個人訪談］

兩個月前我打得很差（……）我的比賽一塌糊涂。我沒辦法把球從開球處打出去。我不會用鐵頭球棒擊打，根本不會打低飛球，也不會推桿。我真的覺得特別沮喪，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我晚上都沒出過門。就是那么簡單，你坐在家里，整天想“該死”。你感覺好像你的世界跌到了谷底。你想著：“下一次我要怎么做？把我的握桿稍微移動一下，改換我的站姿？”你就坐在家里，想著你的比賽（……）你要是打得好，你就變得特別高興，好像除了高爾夫，世界上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你知道吧（……）大概隔了兩個月的時間，我才開始打得很好很好，你知道吧，我能向任何人挑戰，我贏了很多錢，我真的覺得自己幸福到了極點。我幾乎就像在一個繭里，每個人看上去都有點模糊不清，你簡直就是在夢幻世界里。

### 上崗

他們就像那邊的孩子，在那兒干了大概十年，其中一個人竟然在那兒待了三十九年。他們大部分人走動的時候都發出輕微的聲音并無緣無故地叫喊。他們相互破口大罵，他們互相辱罵，給彼此取綽號。這就像是學校的延伸——他們都在那里胡鬧。

——喬伊評論車間

“家伙們”從事的工作包括裝配輪胎、鋪設地毯、家具廠機器操作實習工、管道工、磚瓦匠助手[［30］](#_30_113)、汽車座椅公司裝飾工、鉻金屬板材廠棒料裝卸工和油漆裝修工。在1975年復活節和夏天，他們都相當輕易地找到了工作。大約一年以后，也就是1976年9月，他們中有一半人辭掉了第一份工作。兩個人已經換了兩份工作，兩個人當時還沒找到工作。[［31］](#_31_109)上崗和換工作的經驗對“家伙們”而言不是大挫折。他們為工作所做的非官方、非正式的自我準備不僅引導他們，而且使得通向某些工作的道路變得通暢無阻，使他們比其他群體的處境要好得多。

這不是說他們沒有適應問題，也不是說職業和區域差異不會影響他們的文化形式，更不是說現在工作很好找，或是說他們在校后期和工作早期的文化表現早已預示了他們與工作的長期關系。這里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討論從長遠來看他們對車間文化的物質和文化本質所做的自我準備到底有多充分。知識的社會強化具有不同的形式，與不同規章交換關系的權威聯系也不同。循規和反抗之間有著不同的平衡和含義，男性氣概和控制也有不同的優勢。未來相關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車間外勞動力的再生產在何種程度上匹配、改變或者反駁了早已存在的文化形式，到底是充分滿足、超出還是背離了生產過程在客觀體力、腦力和情感上所需的條件。

在以某種方式儲備勞動力時，學校的非正式和正式過程起了關鍵作用，但是總的來說，家人、家庭、社區、媒體和非生產性工人階級經歷對勞動過程的持續再生產和日常再應用同樣重要。反之，車間的客觀層面和它釋放出的反抗性非正式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反作用于勞動力再生產的非生產方面，如何以某種方式影響它們，從而產生如我們在反學校文化中所看到的那種意義和方向的不可見的、意外的循環，最終得以保留、維護一種特定的構造——也許再次背離了官方政策的意圖，這些都值得我們評估。

到1976年9月，雖然漢默鎮的“家伙們”對工作掙錢還是感到很興奮，并深感自己是文化選擇的結果，但是，我們可以斗膽猜測他們離幻想破滅不遠了。他們所從屬的工人階級文化并不是一個值得贊賞、具有優勢的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工人階級文化是一個充滿妥協與和解的文化：如何創造性地充分利用艱苦、殘酷的環境。我們看到“家伙們”的文化不是鐵板一塊，這個文化既有強勢環節，也有長期充滿絕望、脆弱和赤裸裸控制的低谷。在他們生活中的特定階段，“家伙們”相信他們住在與悲傷隔絕的高樓之上。在堅不可摧的信心背后，他們為生活所做的主要決定都不利于他們，這正是工人階級文化和社會再生產的核心矛盾之一，公立學校和校內過程在這個矛盾中牽涉很深。

不管工人階級文化的廣泛形式及其持續再生產的循環如何，不管“家伙們”長大后幻想破滅的嚴重程度如何，他們的人生旅程不可逆轉。在生產車間里當完文化學徒之后，他們就得在糟糕的環境中為他人辛勤勞作，當這一事實愈加清晰時，他們看待車間的態度就如同以前看待學校，仿佛陷入了雙重困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車間變成監獄時，回過頭來教育又被視為唯一的出路。

首先，年輕工人很可能早早結婚成家，背負經濟壓力，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重返學校。從廣義上看，雖然體力勞動對他們而言可能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但他們至少還對它保留著特定的經驗性依戀，體力勞動仍是他們與整個群體保持非正式關系的獨特方式，這使得他們除了干體力活兒之外沒有什么資格干別的。鑒于對待工作任務的態度，他們通過工作獲得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哪怕之前他們視這種態度為自我絕緣的方式并趨之若鶩。當工人階級子弟發現自己之前的自信其實靠不住時，很可能已經為時已晚。反學校文化中的勝利色彩在把工人階級子弟送進緊閉的工廠大門時就戛然而止。事實上，可以這么說，正是對這些矛盾（好運與不幸、知識和無知）的認可最終定格了工人階級的宿命論和固步自封：這就是反學校文化的天真之處，以及與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之間的差別。等他們知曉答案時已經太遲了。表象之下，明顯的誘惑之后，結局恰恰相反。這些是工人階級文化的常見主題，預示著車間里成年工人的命運：他們來工廠工作的時候無一不是想積攢點錢，償還一點債務，或者計劃“有一天”開始自己做生意，但他們就這么日復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他們錯失良機，抓住的機會又靠不住，這些都成了進廠工作前的集體迷思。但是蹊蹺之處在于，這些活在其中、有機會改變的人卻不清楚迷思的意義。下面是工程機械廠的一位中年車間工人的自述：

我那時大概是十三歲吧，正是易受影響的年紀，我想是吧，有件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我和我老爸在動物園里，我們看到小山上有一群人，人們拍著手，都圍在一個大猩猩籠子邊上。我們擠到了前頭，我老爸比我更好奇，他擠到前排，看到這只大猩猩在拍手跺腳，四處張望，玩得很歡。所有的人都在拍手煽動大猩猩。然后，它突然走到籠子的前邊，朝我老爸吐了一大口水。它又走到籠子的后邊，吸了一大口水，走上前，拍著手，然后把水吐向別人。

我老爸退后一步，十分震驚……然后他回到人群中，等著其他笨蛋沖到前頭去。我那時沒意識到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個孩子……但是我現在知道了。我們都不是一下子長大的，看吧，這就是生活，我們不是在同一個時間長大的，當你學會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每一次這些進廠的孩子也是這樣，他們都覺得工作棒極了。“哦，這是什么，我想到那兒去”，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吧。你永遠改變不了，每件事都是這樣，來工作，結婚，任何事——凡是你說得出的。\*

但是，這里的重點是，短期到中期內，“家伙們”在反學校文化中的經歷很大程度上使得他們順利上崗，培養出的欲望也恰能從體力工作中得到滿足。收入突然猛增，他們得以每天晚上都出去玩，買新衣服，隨時買酒喝。能夠和年長、強硬的人在艱苦環境中一起工作，在他人潦倒的時候得以生存并被接受，這些都給他們帶來興奮感。

這不是說“家伙們”就不需要“文化”見習期，或者他們在所有方面都被快速接受了。車間里總是有人試圖對年輕工人進行身體上的恫嚇，找他們的茬很快就能成為其他工人的消遣，不許幫助這些年輕工人是工廠里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惡意的大男子主義，比反學校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總是挑年輕“家伙”當犧牲品，這讓“家伙們”很不安：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斯潘克斯　你不想在他們［同事］面前看上去像個小娃娃似的，你想顯得懂點什么，懂點生活，知道吧（……）我在工作中就遇到了這種情況，你看這些家伙們，他們討論性，然后就說：“我打賭你從來沒干過。”我就這樣子笑笑，然后他們就說：“看他呀，還笑呢。”好像我對性一竅不通似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不過“家伙們”至少從他們自己的文化經驗中知道了最重要的考驗來自于文化而不是技術，他們也知道生存的規則。他們早已知道成年人真的會罵人、像孩子一樣胡鬧、講粗俗的黃段子。他們知道一些顛覆權威、規避正規體制、從枯燥環境中擠出一些樂趣、私下里弄點外快的方法。他們知道一切不是都像書里寫的那樣。

他們在剛開始工作的六個月中至少有這種感覺，認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他們的工作，或能在艱苦的工作中堅持下來，這種感覺正來自于他們對反學校文化資源和技巧的發揚光大：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威爾　這么說吧，如果我以前沒有出去喝過酒，沒有當過“家伙們”中的一分子，或者我沒有練出幽默感，或者別的，那到建筑工地上工作，你根本不可能適應（……）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兒需要有幽默感。必須開得起玩笑，你知道吧（……）幽默感我天生就有，但也得培養，這聽起來可能挺搞笑的，但是這玩意兒就是越用越行。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比爾　［在一家大型家具廠當實習機械技師］當你認識每個人之后，你知道那就和學校一樣，找個樂子，說個笑話（……）你活絡了不少，當你是“家伙們”一分子的時候你就變得大膽放肆了，你認識所有的人，你知道吧（……）如果你總是安安靜靜、羞羞答答，你就不會跟任何人說話，除非他們先開口。

作為“家伙們”成員的工人階級子弟之所以對某些特定工廠工作感興趣、對自己的選擇深信不疑，還有另一個可能更為隱蔽的原因。這就是新雇主和老板們對他們所了解的、早在學校就已形成的“家伙們”的文化所給出的回應。“家伙們”在非正式過程中形成的“他們和我們”的態度，其反面是對既有權力關系的接受：在這個框架中“他們”和“我們”同時存在。盡管“家伙們”的文化試圖直接在不愉快環境中獲得文化興趣和資本，但是，他們的文化同時也完成了對權力和等級的承認和適應。在他們建立文化對峙的一瞬間，他們也放棄了提出直接或半政治化挑戰的希望。“他們和我們”這種見解既是對直接、人際與社會關系的營救和確認，同時也是在意識層面上對控制這些事物的真正權力關系的放棄。[［32］](#_32_107)

“技術工作”青睞招聘循規生，當他們在毫無文化支持、缺乏消遣和習慣性闡釋模式的情況下開始乏味的工作時，他們被那些掌握大權的人視為更不愿意接受現狀、更具威脅性的群體。因為這些男孩還如同以前一樣，習慣于學校或多或少地傳講給他們的那些平等、任人唯賢和個人主義的觀念。因此，盡管表面上沒有對峙，沒有大膽無禮的舉動觸怒傳統意義上的旁觀者，但是，在關于對立形式的反思中所締結的秘密協約并不會接受永久的權威結構——永久的“我們與他們”。因此，這些孩子更希望從工作中獲取真正的滿足和晉升的機會。他們期望權力關系最終反映出的只是能力上的差別。所有這些期望，加上社會娛樂絲毫沒有減輕個體的苦惱，使得循規生招人討厭、“難以對付”。就體力工作和半技術工作而言，當權者經常傾向于招聘“家伙們”，而不是“書呆子”。“家伙們”的“粗魯”背后，是他們對自身位置很現實的評價，是他們與人相處、打發一天生產的能力，是他們對工作和未來的得過且過。最終“家伙們”更討人喜歡，因為他們“能為自己找借口”，“維護自己的利益”，當然這也有底線，就是不能從“我們”的戰壕倒戈到“他們”的陣營中去。對“家伙們”的成員來說，不僅車間文化要比他們想象的更熟悉，而且新上司也很歡迎、認可他們，他們可以盡情表現自己的個性，而之前學校恰恰禁止這些——這種最初的肯定更使得從學校到工作的轉型成為一種對學校的逃離。

當然，車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生產活動和男性崇拜。這兩者在學校是不存在的，因此標志著從反學校文化到車間文化轉型中的幾個最重要因素。這兩者結構相似，但在具體情境下的差異則源于反學校文化中已有的因素，從而保證工作中相對平穩的生產：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威爾［磚瓦匠助手］　你會被炒魷魚，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這和學校不一樣。你在學校不會真正被炒魷魚，除非你被開除，況且你也不介意被開除。

PW　那老板們有什么不同？

威爾　他們對待你的方式不一樣，不是嗎？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你說了什么，說了你不喜歡聽的話，那你會回幾句（……）但是在學校，那些老師，他們對你什么都說，什么泄氣話都講（……）或多或少，當你工作的時候，規矩對兩邊都有制約性。但是在學校，你要是頂撞了哪個討厭的老師，那你知道的，后果是他們會拿規矩壓你。就好像老師們有特權似的，他們可以對你粗聲粗氣，打你耳光，揪你頭發。

剛開始工作的幾個月，從事自己選擇的工作、對晉升抱有憧憬的循規生也比較滿足。他們遵循官方定義的連續性，并從中獲得指引和報酬。工作剛開始的幾個月被看做是學校的延伸，盡管和上學相比時間更長，工作之后晚上更容易覺得疲勞。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在鍍金般的學徒期中需要在工廠接受全職培訓，所以和學校確實有直接的相似之處。當托尼離開漢默鎮男校時，他去了一家知名的大型國際機械制造公司當工藝學徒，還有可能轉為技師學徒。他要在實習生培訓室呆上一年，培訓室墻上掛滿了大幅流程圖表，展示整個課程的不同階段和時期，底下嵌有很多空白框，留待記錄每個實習生一年中的個人評估。這里要比在學校更具競爭性——至少在工作四個月之后：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托尼　（……）如果有什么事被拖延了，你等你的指導員來，開始十分鐘你這么等沒問題，你什么事都沒做，但是當你等了一個小時之后，你要知道，你會意識到你原本可以在那一個小時干很多活兒（……）他們的確會胡鬧，但他們一直工作也不假，你要知道他們不會偷懶（……）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會努力把工作做好。如果手頭有工作，他們會一直做下去（……）比方說，有人擔心自己做的產品不行，他說：“好吧，我不能把這個拿給吉姆［指導員］看”。所以他們就拿他做的與別人做的進行對比，然后他們會讓他按別人做的樣子做。他們就把那些產品拿回工作臺，給產品做記錄，或者對它進行修改。

那些介于上述兩類之間的學生在短期或中期所經歷的問題可能最為嚴重。循規生、邊緣人或者處于反學校文化邊緣的成員，他們會發現自己承擔著某類體力工作——那里的車間文化特別容易發展出根本性的文化沖突，而非“轉型期”的困擾，他們很容易因從事不愉快的工作而備受折磨。他們是最不介意公開嘲諷、諷刺和威脅的一群人，但是他們缺乏合適的方式保護自己。他們很容易成為受害者。下面這個孩子處于反學校文化邊緣，在一家家具廠做裝訂、剪裁工作，毫無技術可言，但他并沒有受到反學校文化邏輯的保護：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我對他們沒什么興趣，他們就像孩子似的。在我后面的那個孩子湯姆，他是個傻大頭，他對剪裁一竅不通，但是他覺得我們有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吧，叫我們白癡，他盡干這種事（……）那個負責打掃的家伙，他們用刀［從泡沫上］切了一塊下來，把它粘在他背后……你知道我總是很小心，當他們開始切東西的時候，我就會留意誰在我身邊（……）有一次他們想在我身上放一根尾巴，但是我感到他們在我身上放東西（……）他們玩得太過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這么搞一次還算是樂子；但他們不停地搞，這就讓你心煩，然后他們還繼續……他們有一次把縫合車間的一個女工搞哭了（……）你知道嗎，他們不停地吹口哨，我不會吹，但是他們一直吹，一遍又一遍，搞得她很心煩，就開始哭起來。他們不得不把工會的人叫過來處理這事（……）他是我的哥們兒［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來自同一個地方的朋友］。如果他們那些人不和我說話，我也不介意，因為我只要有人能說上話就行了，我指的是和亞歷克，我們的想法一樣。我們不介意，我們不和別人打交道也自得其樂（……）我會向他們其中一兩個人問好：“你怎么樣啊？”但很多人就是玩玩的。

不僅在處理社會關系中存在這樣的困難，而且文化參與的缺失也消除了自我與工作之間的調解機制。當工作基本上不用動腦筋、高度重復的時候，工作也更加無情地折磨、扭曲著人類毫無庇護的感性認知：乏味、無聊和灰色讓人覺得每天都永無止境，每周都單調重復，娛樂也成了虛偽的承諾。以下是上面那個孩子的說法：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一天中最糟的時候是早上八點三刻，那實在是爛極了，你一想到還有那么長時間才能把這一天打發完，尤其是才剛剛過去了四十五分鐘而已（……）我開始工作，然后我就看那個鐘，如果是九點之前，我就覺得應該是九點半左右了，這真是讓你心煩的時間，“天啊，時間過得真慢啊，我希望我不是在這兒，我希望我能待在家里，躺在床上”（……）你知道嗎，工作時，比如說裝訂東西，你到那兒就會想：“天啊，我在這兒到底是干什么呀？”就是類似的事情。我想象著十年以后我還做同樣的事，我就受不了，你知道吧……要是一直，一輩子干這個的話，我想我會瘋掉的。我想生活得好一點（……）一周的亮點就是周五晚飯領工資的時候……他們把工資放在托盤上。不過挺滑稽的，整個星期我一直在想：“周五快來吧，周六我們就能去市中心了。”然后你就一直期盼這一天。當你周六去城里的時候，你想的卻是：“我的盼頭是什么呀？”但是我每個星期照舊還是期盼周五。

如果認為“家伙們”從來不會感到這些壓力，或者他們不會因文化保護膜日益薄弱而逐漸感受到這些壓力，那就大錯特錯了；但是，他們確實在一開始就對勞動力抱著幻滅的態度，這阻礙并減慢了上述主觀感受的形成。不僅如此，他們還采取了更為積極、樂觀的方式，通過在工作中加入非正式群體，而不是充當被嘲弄的對象，來獲得一些外在的滿足感。盡管存在破壞——這些破壞目前還相當受限制，但他們依舊認為體力勞動代表了某種東西，有助于形成并維系一種生活觀念，讓他們能夠批評、嘲諷和貶低他人，同時使自己置身游戲之外。這些感覺恰恰來自于他們對勞動力的認識，源自反學校文化，并被作為一種洞察力和自我提升，從而在制度環境中發展成為特定的階級形式。很難想象這種看待力量和非正式及個人正當性的態度能以其他方式出現。正是反學校文化中的這些態度，而不是正式學校教育，把“家伙們”帶到生產過程中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接受在西方資本主義中的從屬地位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自我支配要素。但矛盾的是，這種前途的葬送是以學習、侵占和反抗的形式被經歷的。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點？

注釋

[［1］](#_1_188)lads是非正式英語，意為“伙伴，小伙子”，本書中lads是那些不愿學習、聚眾玩耍、反抗權威的學生的自稱。關于這個詞的譯法，中文譯著中存在分歧，臺灣學者何明修譯為“小子”，大陸學者如李康在翻譯吉登斯《社會學》涉及此詞時譯為“哥們兒”。為兼顧表達的口語性和語義在不同語境（采訪自述、對話互稱、理論分析）中的通順，本書采用了“家伙（們）”。——譯注

[［2］](#_2_181)有報道指出，一些在學校中擔任教職的教師的日常生活被嚴重擾亂，這已成為日益嚴重的問題。參見J. Lawrence, “Control experiment”, The Guardian, 18 March 1975。

[［3］](#_3_174)斯派克的道歉信措辭小心，以保證既能拿到結業證明，又能維護自己的尊嚴：“我希望您能接受我誠意的道歉……學校本身和‘科爾迪茨集中營’毫無相似之處……現在，我認識到我的所作所為有些愚蠢，但是在當時我并不這么覺得，所以，我現在已經準備好接受您認為合適的處理結果。”（楷體為作者所標）

[［4］](#_4_172)最近一篇研究英格蘭西部進步私立學校達廷頓學校的報告指出，該學校的孩子對告密不存在禁忌。這相當不同尋常，（報告）解釋說是因為非正式群體和反學校文化受到了這所學校的一致性、開放和民主制度的抑制（詳見The Guardian, 1 January 1976）。

[［5］](#_5_164)大多數人認為，按學生成績分班、傳統的以學科為基礎的課程安排、考試以及綜合成績測評容易導致反學校或者類似小流氓的群體出現。

在漢默鎮男校，對抗性群體是在第三學年末成績分流時出現的。但是，第四學年初引進混合班之后，反學校文化群體與之前按成績分流時一樣，而且愈演愈烈。此外，并非只有學習能力最差的學生會加入這樣的反學校群體。群體中一些核心人物能言善辯、精明自信，參與各項活動。對于他們那個年齡階段而言，“家伙們”的生活比傳統方式要豐富得多。盡管繼續按成績分班可能對學習能力差的學生有強化作用，正如我們預期的那樣，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取消按成績分班能夠帶來一個富有創造性的社會混合體，這不僅能促進整個學校的社會系統的發展，同樣也能夠促進非正式的激進對抗勢力的發展。新型的成績混合班、以問題和學生為導向的教學方式、一天中多次換班造成的混亂，尤其是加上“提高離校年齡”計劃為學生提供的多種選擇，這些都是好事。參見D.H. Hargreav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RKP, 1967；M.D.Shipman, Sociology of the School, Longman, 1968；R.King, School Organisation and Pupil Involvement, RKP, 1973。

[［6］](#_6_158)在主要個案研究的田野調查中，我關注的是男校里的男孩。但是，這所學校隔壁就是一所女子學校，“家伙們”常常在午飯時間在公園里和女生們聊天。安吉拉·麥克盧比第一個提醒了我浪漫主義在工人階級女孩的經歷中的重要性。

[［7］](#_7_156)原文中艾迪用了“have it off”，俚語中有“亂搞男女關系”的意思，比爾就接了這個茬，說“Have you ever had it off?”而之后威爾的辯解用的是“have off（the coat）”的正式含義：脫下。——譯注

[［8］](#_8_156)F. Tayl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Greenwood Press, 1972.

[［9］](#_9_148)1976年10月，在牛津大學拉斯金學院的演講中，勞動黨首相對當前教育實踐中的問題和憂慮發表了意見。他號召就教育問題展開“大辯論”，這一號召得到了教育職業部（DES）的響應，該部組織了一些地區性會議，撰寫了一份背景調查報告，列舉了四大主要問題：學校課程設置，5—16；標準考核；對老師的教育和培訓；學校和工作生活。見DES, Educating Our Children, 1977年1月。

[［10］](#_10_146)倫敦威廉·廷代爾初級中學在1975年的夏秋季遭到一些教師和家長抱怨，他們埋怨學校缺乏紀律、新教學方法低效，隨后進行了教師罷工，調查報告出來之后學校停止正常運行。參見R. Auld, William Tyndale Report, 1976；J. Gretton and M. Jackson, William Tyndale: Collapse of a School – or a System, Allen & Unwin, London 1976; T. Ellis, J. McWhirter, D. McColgan, B. Haddow, William Tyndale: the Teachers’ Story, Writer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London 1976。

[［11］](#_11_142)喬伊在一次整肅中說：“我們也許得戴上狗脖套，我們也許得系上狗皮帶，被繩牽著從操場跑到沼澤。”

[［12］](#_12_140)部分討論可見于一系列官方報告。參看R. H. Tawney,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Allen and Unwin, 1922; Hadow Report,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the Education of Adolescent, HMSO, 1926; Spens Report,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rammar Schoo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s, HMSO, 1938; Norwood Report, Curriculum and Examinations in Secondary School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 Council, HMSO, 1943;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 for Education （England）, Early Leaving, HMSO, 1954; G. Crowther （Chairman）, Fifteen to Eighteen, Report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 for Education （England）, HMSO, 1959—1960; Newsom Report, Half Our Future: A Report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 for Education (England), HMSO, 1963; Robbins Report, Higher Education, HMSO, 1963; Plowden Report, Children and Their Primary Schools: A Report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 for Education (England), HMSO, 1967。

[［13］](#_13_136)這個“家伙”很有意思。他是工人階級子弟，拒絕上學，但是在選擇高爾夫這項運動時也流露出他熱心獲得向上流動性的心理。

［討論工作的一次個人訪談］

男孩　讓自己成為一個更高階層的人使我感到很糾結（……）你看那么多和我爸歲數差不多的人干得都比他好，比他好很多，他們都有好工作，你事實上是羨慕他們的，也羨慕他們能給家里掙回那么多東西，所以你就得出去試著成為那樣。

PW　［什么算］更好的人？

男孩　就是能受到別人的尊敬，我是說我爸作為一個工廠工人很少受到尊敬，然后你也知道，一般來說你發現中產階級獲得的尊敬更多。

雖然他屬于那種典型的想要實現向上流動的工人階級子弟，但他對自己文化的摒棄不等于他全盤接受了中產階級文化：

PW　他們［中產階級的人］仍舊是“他們”，還是你早就覺得自己是……

男孩　不，我還是當他們是“他們”（……）你要知道，我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我自己這么想：“煩，我的天啊，你才是正常的那個，不是嗎？”諸如此類，你知道吧。他們有些人進來的時候，像你剛才看到的那個家伙，就是那個帶著新高爾夫球桿的花白頭發家伙，你知道吧，趾高氣揚的那個，我是說，我真的很看不起他。在我看來，他意味著高人一等的傲氣。

運動是他向上流動的途徑。從真正的意義上說，所謂“殺手本能”就是階級本能：

我想要證明，人要是沒有他們那種所謂的智力或者經濟能力，會被比他年輕、愚笨、缺少背景的人打敗（……）你必須要有一種殺手本能（……）我在打球的時候，我根本不在乎我是跟誰比，我就是要打敗他們，如果他們出錢和我打，并且只是想要打一場友好的比賽，我也不在乎，我就是要打敗他們（……）要贏的那股勁就好比饑餓，可能是種原始本能，就好比對食物的饑渴。你伸手去抓食物，別人也會伸手抓，他們會不停地試，不停地練習，直到他們贏了為止（……）中產階級的人沒有這種殺手本能，他們不具備那種天生的進取心，也不會在大冷天里出來練習。

[［14］](#_14_132)體育是區分“書呆子”和“家伙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內，教師能夠通過操控既包含傳統教學要素又包含對抗文化要素的范式，來掌控深植在“家伙們”文化中的獨立性，這其中的要素有：嚴格的紀律、男性氣概、身體靈巧。下文出自一位公認的學校運功員之口：

如果真是那樣，我不會介意承認自己是個“書呆子”，但是我想我介于兩者之間……我想一年級時候的我有點像“書呆子”，你知道吧，那時候更像點，我和體育老師們處得很不錯，因為我喜歡體育，而且我進步很快，因為我不介意開玩笑。我不怎么把這當回事，他們也看到這其中有趣的一面。他們看上去和“書呆子”沒有這樣的關系。他們教他們，教那些好孩子。他們好像把我當成是一個可以說得來的人。

[［15］](#_15_132)請參看Farrukh Dhonely于1974年6月4日在《今日種族》（Race Today）發表的文章。這個話題亟待依照本書提出的一些線索展開研究。

[［16］](#_16_132)參見1973年的《就業和培訓法案》。在之后的章節中，我指的主要是學校職業指導老師和就業指導官員。這兩者的主要區別是老師更關心讓學生做好就業準備，而就業指導官員關心的是就業安置（DES, Careers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 Survey 18, HMSO, 1973，第25頁）。但是這兩者用的基本職業指導技術是一樣的。

[［17］](#_17_126)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倫敦大學貝伯克學院職業心理學系亞歷克·羅杰發展出來的“七點計劃”仍被廣泛應用。這七點是：身體狀況，包括外貌、語言或體格上的任何缺陷；學業成績；智力；才能；興趣；性情；家庭背景。

[［18］](#_18_124)特別參見E. Ginzberg et al., Occupational Choice, An Approach to a Gener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D. Super, The Psychology of Careers, Harper and Row, 1957; E. Ginzberg, Career Guidance: Who Needs It, Who Provides It, Who Can Improve It?, McGraw-Hill, 1971。

[［19］](#_19_125)在增加了興趣這個橫向范圍之后，通常的升降率范式被修改，具體啟發性的闡述請參見DES, Careers Guidance in Schools, Education Pamphlet No.48, HMSO, 1965，尤其是第42頁和第43頁上的“……正如每個青年就業指導官員知道的，所有就業的男女青年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找了不需要特別教育文憑、目前也不需要任何培訓的工作。他們需要知道的是，開始工作時會意識到，要學的東西驚人地少，就連這點東西也很容易掌握（……）很多工作看起來非常相似，不需要多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學習能力，幾乎每個人都能做，這種印象也因為很多成年人換工作時毫無困難而被強化。此外，隨便看一看，很多中下資質的年輕人看上去很相似，沒有什么出眾的特質，對學校事務也沒有什么興趣，而且很樂意盡早離開學校。如果工作和學生都沒有明顯特征，那么職業建議還有用嗎？這當然是很膚淺的看法，因為事實是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立個體，并且即使每種工作都可能有很多個職位，但工作不同、工種有別。那些資質不高的學生也應當享有平等的機會過令人滿意的生活，而那些資質高的學生應當受到鼓勵，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這兩者都很重要。”

我認為，這和前一章討論的對基本教學范式自下而上的修正有明顯的關聯，修正之處就是用“正確態度”替換了教師的等值物“知識”。但是職業指導的方法確實試圖找出、羅列各種工作間的真正區別，而非強調態度的重要性，至少在文獻中是這樣。

[［20］](#_20_123)引自對職業與就業信息中心的介紹，Publications and Services, 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 1976。這個中心代表了對職業的新的進步看法。這篇介紹還說道：“我們的關注點之一是要加強考察各工作的決定性特征，并需要用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傳達我們發現的信息。”

[［21］](#_21_124)現已成為英國經典著作的《職業指導》（Careers Guidance）（J. Hayes & B. Hopson, Heinemann, 1971）一書對此有清晰的概述。

[［22］](#_22_124)參見G. Rogers, On Becoming a Person, Constable, 1961; C. Rogers, Freedom to Learn, Chas. E. Merrill, 1969; C. Rogers, Encounter Groups, Penguin Books, 1970; C. Rogers, Becoming Partners, Constable, 1973; C. Rogers, B. Stevens et al., Person to Person. The Problem of Being Human, Souvenir Press, 1967。

[［23］](#_23_124)例如，Hayes and Hopson, 同前引文，第234頁寫道：

……指導者不應當用這些［人力數據］信息把年輕人引導到幾個緊缺的特定科目或工種上。指導者的工作不是確保社區未來的人力需求得到滿足。他的責任是面向學生。

[［24］](#_24_122)參見M. P. Carter, “Teenage workers: a second chance at 18?” in P. Brannen（ed.）, Entering the World of Work: Som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HMSO, 1975。

[［25］](#_25_120)DES, Careers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26］](#_26_120)同上，第61頁。

[［27］](#_27_116)也可參見Training Services Agency, Vocational Preparation for Young People，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 September 1975; Social Evaluation Unit, “All Their Futur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75, 第25頁; K. Roberts, From School to Work: A Study of the Youth Employment Service, David and Charles, 1972, 其中有一句這樣評論職業指導的話：“提供的太少，僅有的那點也提供得太晚。”

[［28］](#_28_116)若要詳細解釋這個概念及其與“含蓄”訓誡之間的關聯，請參見R. Barthes, Mythologies, Paladin, 1977; R.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Cape, 1967。我會在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職業指導信息的“含蓄”層面。

[［29］](#_29_114)盡管就業指導官員不是很有影響力（當然決策達成之后發布信息是他們的工作），但他們似乎不用面對“家伙們”的敵意，因為他們沒有陷入同樣的惡性循環——至少他們不用致力于維持基本教學范式，而且甚至可能對分化后“家伙們”的文化有幾分同情。有趣的是，這有時會導致對個體出現完全相反的評價。

漢默鎮男校的就業指導官員　我同情這些孩子的時候，我可能就是笑笑，但是我會想：

“哦，還是不要牽扯進去比較好。”是吧，所以他們可以從我的臉上看出來我同情他們。有時候，他們對老師的總結評論很準確（……）我覺得他（“家伙們”中的一員）挺友好的，有點個性，有點魅力（……），我實際上寫了“有魅力”。他在我面前這么展示自己（……），但是他的報告糟得一塌糊涂，他們是怎么受不了他，他是多么討厭（……）。比起一般的（……）孩子，我覺得我更喜歡你這個研究小組里的所有孩子。如果我找人來面試，跟我面談，那我立即會偏向他，你知道吧，我喜歡那些能反駁我的人。我挺喜歡那樣的，但是如果我必須從孩子身上弄點信息出來，我就不會喜歡這種面試。

[［30］](#_30_112)這兩份工作（斯潘克斯和威爾獲得的工作）采用的是正式學徒制，找工作時沒有任何測試，對文憑也沒有任何要求。斯潘克斯和威爾很高興他們這么快、這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因為循規生拼命想要這樣的工作。這進一步使他們確信，他們“一直就懂的更多”。

[［31］](#_31_108)盡管本項研究不涉及青年失業問題，這里還是可以加注幾條評論。正如“提高離校年齡”計劃使原先更為隱蔽的反學校文化的對抗性暴露出來那樣，我們同樣可以預測，大量或長期的結構性失業以及遍布街頭的散漫和結隊活動將進一步助長和暴露這種高對抗性的文化形式——尤其是以挑釁的方式呈現。這就是說，大量失業可能進一步激化青少年的不滿情緒，加劇潛在的社會分化。這樣的發展會給職業指導和就業服務的傳統“問題”增加新的維度。

[［32］](#_32_106)關于這一邏輯的詳盡、有趣討論，請參見Richard Hoggart, Uses of Literacy, Chatto & Windus, 1957。

# 第二部分　分析

## 第四章　洞察

盡管通過個案研究，我們已對于男性、白種人、工人階級、肄業生、叛逆者有所了解，亦對其步入當代資本主義體力勞動者大軍的經歷與文化過程做了較為詳盡的考察，然而在這其中，仍存疑惑之處有待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講，一組隨機性的因果關系，即個體病理學和文化剝奪似乎已然被另一組因果關系，即文化的創造力和持續性所替代。我們已經解釋了這些來自于工人階級家庭的“家伙們”是如何將自身與制度分化開來的。然而因何使然呢？我們已知他們對自身在文化選擇中所持的觀點、洞見和所懷的情感堅信不疑，但是這種主觀提升的基礎又是什么呢？這些“家伙們”對于職業結構的態度顯而易見，然而我們又該對他們逆轉傳統價值判斷的現象作何解釋呢？我們深知他們所篤信不疑的洞見和信仰最終如何將其帶入某種客觀實在的勞動環境——這種勞動環境與其說是一種解放，不如說是一個陷阱。而這又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已考察了這些文化形式的諸方面——張力、逆轉、持續性以及最終結果，然而其基本決定因素又是什么呢？

### 分析之要素

為了對上述問題和矛盾做出解釋，我們必須以一種更具闡釋性的方式來挖掘民族志表面之下的深層內涵。我認為，我們可以借助于“洞察”（penetration）和“局限”（limitation）這兩個概念，對已考察的文化做出更為深入的理解。

“洞察”是指一種文化形式中的各種念頭，這些念頭有助于洞察該文化形式的成員及他們在社會整體中所處的位置，而這種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質主義的或個體主義的。“局限”是指混淆和妨礙這些“念頭”全面發展和表達的那些阻礙、偏離和意識形態影響。另一個相當笨拙、但又極其精確的術語“部分洞察”，是指“洞察”與“局限”兩個概念在一個具體文化范疇內的相互作用。民族志所要描述的活動領域，就是這些“念頭”與“局限”擁有交集、但又無法在理論上將它們分隔開來或單獨展示的地方。

洞察不僅遭受了極大的扭曲，被剝奪了自身的獨立性，甚至由于內在和外在的局限，而最終被限制在了其正在以諸多復雜方法探索的結構之中。從根本上說，洞察中存在著一種錯誤的、尚未被承認的關聯，或者準確地說是一種“部分”關聯。正是這種文化“洞見”和偏見的結合，將個人合法性和認同的力量直接注入個體行為，而該行為最終使人陷入困境。誠然，在某種層面上來說，對于那些似乎完全不合理和倒退性的結果，確實存在著某種合理的、潛在發展的基礎。因此，我可以斷言，唯有這種矛盾的雙重整合體，才得以使階級社會以自由、民主的形式存在：有制約條件地自由進入。更具體地講，我們已考察的勞動力在特定文化和主觀方面的自我準備，都涉及一種更趨理性選擇的潛在進步，而這種進步由于某些關鍵性的局限，抑或停滯，抑或失衡，抑或失去保護。最終，那些勞動力既沒有在傳統上下注，也未將寶押在其他選擇上——而是對體力勞動力的具體定義做出個體主觀性的理解與定位，從而加速了進步。這是一種以被阻礙和扭曲了的文化洞察為基礎，（同時又）具有確定性和選擇性的沉降。本書試圖呈現的那令人驚訝之處在于：當勞動力的體力支出不只代表著自由、選擇和超越，還代表著工人階級嵌入剝削與壓迫的制度之中的時候，工人階級文化中就出現了一個重要時刻——在這一時刻，所有通向未來的大門都關閉了。前者向人們允諾未來；后者向人們揭示現在。正是這個蘊含于當下的未來，將自由楔入了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平等。

本章的其余篇幅將概述反學校文化中（所蘊含的）一些洞察念頭。接下來的兩章將對那些內在的和外在的局限加以討論，這些局限阻礙并扭曲了他們對文化形式的整體情境和決定條件的洞察。此后的很大篇幅大體上與工人階級文化相關。但是，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涉及“洞察”這個概念的一些要素給予更為密切的關注：在世界上真正的作用形式、作用范圍，以及在人類能動性中的基礎。我們特別需要界定在何種意義上，對社會類別和主要社會關系的文化洞察是理性的，抑或是具有創造力的。

反學校文化的產生及其演變過程，是在特定的歷史關系中由特定的環境所引發的，并非偶然。但是，承認決定論并不意味著排斥創造力。而且，我們還必須堅持以下兩點主張：第一，創造力并非蘊藏在個體行為之中，并非存在于某個人的頭腦之中，也并非是有意識的目的的產物，如我后文所論，創造力唯有在群體層面上才能合理存在；第二，創造力不能被描繪為一種獨特的能力，或是被界定為個人創造無限結果的能力，更不能被視為對未來或現在的主宰。事實恰恰相反，主觀確定性的閃念越強，由創造力所導致的迷障就越深不可探。

雖然上述兩項內容已提請讀者注意，但是我們還要強調一點：這種文化形式的形成，并不是簡單地由外界因素所決定，它也產生于新一代人的活動與斗爭之中。現在，我們來處理集體意志與活動的問題。如果集體意志和活動未被有意識地引導，那么此二者將彼此重疊、相互作用，富有創造力，并最終再生產出我們所稱的“外部決定因素”。正是這些文化的主體性過程和行動本身，真正生產和再生產出了我們稱之為結構的方方面面。只有順利通過這一時刻，各種決定因素才能從根本上在社會世界中發揮效力。個體才能在社會世界中“自由地”做出決定，并獲得贊同。此時，任何形式的外部指導均不會出現。如果即將步入工作的工人階級子弟對其自身行動的合理性存疑，那么外界的任何人、任何事都無法使他們——特別是從傳統評價的角度來看——堅信其所作所為和未來選擇是合理的。因為文化為個體活動和行為提供了基本準則。

然而，在文化層面上，工人階級以某種創造力（我仍希望這樣指稱它）所生產出來的洞察絕不是開放式的。洞察依循著特定的路線，其根本決定因素存在于個體、群體或階層之外。例如，并非偶然的是：不同學校的不同群體會提出相似的洞見。盡管這些洞見均為群體各自單獨努力的結果，但它們卻結合成為不同階級內部的聯系紐帶。所有的群體均在洞察著相同的決定條件，正是這些決定條件把握著它們現在和未來的可能性。因此，創造力的客體應是那些將被發現的事物，而不是想象出來的事物。對將被發現的事物的限定，及這些事物的內在關系是既定的。但在另一個社會里，“家伙們”的未來道路可能早有安排，而不必自己去探索。

當然，討論至此可知，文化層面的全部特性就在于，這種洞見不僅是其所學過的那些必修課程，也不僅是其吸收的消極信息。洞見經過實踐，是具體且不確定探索的產物。唯有以向縱深發展的洞見為基礎，那些其他形式的行為、活動和享樂才具有意義，即賦予文化最燦爛的外觀和最明顯的創造性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文涉及的最為核心的觀點就是一種文化華麗外表之下缺席的，或至少是無聲的中心。人們無法證明其合理性，也無法通過直接詢問從文化參與者那里獲得答案。文化形式的多樣性和對文化表層的各種質疑，使人們迷惑：這些形式和質疑或許有一個共同的起因。這就是為什么民族志的可見形式非常有限的原因所在。對于那些外在的、更顯而易見地富有創造性的、變化的、有時具有隨意性的特征，我們必須抓住其核心本質來理解。如果要了解某一文化的社會創造力，那么我們就必須在其概念關系的核心中去探尋生存的邏輯。在某種層面上來說，這通常會涉及到要在一個確定的社會結構內部，承認其地位的獨特性，并以此為基礎行動。

為什么這種社會的創造性不能在該文化的表層得到合理表述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以特定文化為核心，以純粹的表述為目的，那么對該文化的社會創造性的研究就無法進行下去。我們必須假定洞察是一種純粹的、連貫的真知灼見，這樣我們才能解釋其為何物。但是，正如民族志一直提醒我們的那樣，各種形式的文化并不承認唯一的純粹動因，因為在其形成的過程中，這些“真知灼見”被扭曲、轉向、積淀成了其他形式——如對體力勞動的主觀肯定。這使得人們難以相信曾經或可能存在一個“理性核心”的概念，也從不在意其是否應該易于表述。這就意味著，當包括其他諸多事物在內的時候，我們必須在關于創造性和理性的詳細敘述中，對文化層面和實踐意識層面加以區別。

日常話語可能以一種可變的、自相矛盾的，或是無意識的方式對洞見的產生帶來啟發性，縱然如此，洞見也并不是在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甚至并不是在一段時間內在同一個人或同一群人的頭腦中有意識地形成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的那些直接且明確的意識，可能是最缺乏理性引導的。這種直接且明確的意識，或許只能折射出文化過程的最終階段，以及各種神秘而又矛盾的文化形式——這些文化形式正是基于洞見的實踐方式。此外，在不同時期，意識可能代表著它之下的文化沖突和過程的各種矛盾時刻。就此而論，口頭提問導致言語矛盾就不足為奇了。不僅如此，實踐意識也是最可能導致困惑和瞬時影響的。不斷重復指定行為模式，努力取悅他人，表面模仿，嚴格遵循各種抽象規范，如禮貌待人、老成持重或智者之道等，這些行為都可能被人們與真正引發文化共鳴的那些評論與回答混為一談。各種調查方法，以及主要依靠口頭和書面作答的所有形式的方法，無論多么復雜，都始終無法辨別這些類屬。[［1］](#_1_191)

從任何意義上說，這都不意味著要摒棄意識。在適當的情境下，意識是信息與意義的首要來源，也是最終決定意義的最佳手段。意識作為文化準則的直接表達，也是文化層面的一部分，并在最根本上與文化層面相關。意識的一貫性、有效性、直接發展作用均與文化的復雜性有關，意識與文化緊密地纏繞在一起。只有在脫離了可變的文化情境，并被要求回答問題的時候，意識才能在可想象的意義上被視為“虛假的”。

因此，反學校文化的創造力和理性念頭，既不是想象力的理想主義的或脫離實際的產物，也不是以行動著的個體及其意識為中心的，更不可能如其所愿地隨意發展變化，或是最終以任何方式去預想未來。[［2］](#_2_184)在各種工人階級文化形式中，存在著一種浪漫主義觀點，該觀點堅稱工人階級文化正在以某種方式實驗未來。這意味著，當資本主義被推翻的時候，工人階級文化將為人類生活提供具體的藍圖。然而，此類設想根本不可能向人們做出承諾或兌現承諾。如果樂觀地將工人階級文化或意識視為實現理性和社會主義的先鋒，那么就大錯特錯了。本書的核心個案就是要說明，正是工人階級文化——特別是學校中的工人階級文化——所蘊含的這些理性因素和未來因素，最終以其當前的社會形式和復雜的、非預期的方式，阻礙了理性和社會主義的實現。正是顯而易見的工人階級的文化提升，使其現實生活陷入地獄。[［3］](#_3_177)

對于上述否定性觀點的討論就到此為止。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工人階級的文化創造力和洞察力確實具有某種獨特且常不為人所認可的潛能。這種潛能是嵌在工人階級中的，該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過程中唯一一個不借助結構性基礎的既得利益來實現自我神圣化的階級。雖然要真正理解這一點還有很多障礙，還存在著許多意識形態方面的顛倒和扭曲，也常常缺少分析工具，但不爭的事實是：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未被復雜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意識形態關系從內部結構化的階級。因此，工人階級沒有掌握、也不需掌握文化和社會的“主動權”。只有這樣，工人階級才可能不受意識形態約束而更加自由。

工人階級無需相信主導意識形態，主導意識形態也無需用民主的面具來掩飾其壓迫的真面目。中產階級的真實存在及其意義，已與那個賦予自身絕對優勢的結構深深地融為一體。沒有人會像那些壓迫者一樣，對此深信不疑。又有哪一類資產階級會在某種程度上懷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呢？那就是自我否定。如果自身既是難題，又是難題的解決辦法，那么按照邏輯推理，下一步將是自我毀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唯有工人階級無需將資本主義合法性作為自身生存的條件來信奉。

然而，我們仍須劃出明晰的界線。由于缺少預想其他形式的能力，去神秘化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人們必須等待一次根本的結構性轉變，才能反思性地決定自己的文化實踐、模式的穩定形式，以及預期和非預期的循環。我們唯一能說的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和自我欺騙的去神秘化，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先決條件。然而，我們至今也沒有這方面的范例可引證。目前，特別是從我們的直接研究對象來看，在現實的社會形式下，文化洞察這種更為強大的能力，已使資本主義秩序中產生了一個更深、更錯綜復雜的陷阱。無論這種能力以何種方式被加以運用，人們都無法說清楚這究竟是一件幸事，還是一個禍根。[［4］](#_4_175)

因此，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為某種創造力提供證明。然而，除非我們可以明確說明產生這種創造力的人類基礎，以及這種創造力作用于世界的獨特形式和實踐形式，否則這種創造力就仍是不確定的。

我認為，作為文化洞察的基礎而發揮作用的最小獨立單位，是非正式群體。這一群體非常獨特，總體大于各部分個體之和。它尤其具有一種相對獨立于問題和定位、先入之見和偏見的社會動力。我們可能會將這種社會力量簡單地稱為“忠誠”，但是這種做法在對待該群體存在的具體條件和先前的態度方面，顯得過于武斷。這點在美國的微觀社會學中已有體現，如領袖、領袖目標、群體的維系和個人意見的集中，都是群體的（至少在西方資本主義中）長期性特征。[［5］](#_5_167)群體得以存續下去的必要條件就是堅持群體意見和目的。社會心理學稱之為“高昂的士氣”。因而，產生于群體之中的力量和非特定的開放特性，構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更為廣泛的象征性文化接合產生的部分根源正在于此。

因此，在非正式群體中，個人利益會相對受到限制，同時，個人要為群體現狀和群體目標承擔義務，但是這些都不會在成員履歷或群體定位中被明確地說出來。群體擁有屬于自己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講，群體可以被視作一個主體。群體具有一種尋找與自身水平相適應的目標的內在本能，而這種尋找不囿于個體成員早前的知識、經歷或意識形態。[［6］](#_6_161)我想說明的是，工人階級的反學校文化受到了來自于非正式群體和各群體間的一系列聯系的支持。而且，在階級社會中，該文化以其成員的現實狀況和未來潛力為獨有方式，表現出了一種內生的、開放的力量，而這種表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去神秘化實現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可以斷言，任何像這樣的意圖或理解的最終內容，實際上就存在于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是個體主觀意愿的產物，或者甚至表現為個體理性的形式。我們的討論以群體為單位，牽涉文化“洞見”的特定層面。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洞察的偏見阻礙了其自身完全理性的發展和表達——這是我們應該記住的。[［7］](#_7_159)

我們已經對創造力的基礎、力量和范圍做了說明。下面，我們還要討論創造力作用于世界的特有方式——實踐，正是實踐引發了我所謂的文化洞察。我認為，這一力量作用于世界的獨特表現就是某種產品。文化洞察不能簡單、機械地標示出社會矛盾，也不能在某種簡單的意義上實踐社會矛盾。它依靠自有資源作用于社會矛盾，從而實現：部分解決、重新結合和有限轉變。所有這些都是不確定的，但是相對于文化洞察自身的水平，以及對更廣泛的社會秩序來說極為重要的行動和決策基礎，這些又是具體而確切的。

為了說明此類作用和產品，我們也不必然從外部獲取相關材料。事實上，我所指的實踐，在可用形式的約束下，部分地生產了自身斗爭活動所需的經驗材料。[［8］](#_8_159)正如本書第一部分所研究的那樣，意義的主導模式——語言，逐漸轉變為對抗性行為的、可視的、文體性的表達形式，這一重大轉向帶來了從群體力量到具體形式的文化洞察的轉變。洞察以文化為模式，產生于群體這個基礎結構單元，但是洞察的材料并不能完全被常用詞匯所利用和表達。因為詞匯是在資產階級統治的特定條件下被創造出來的，所以它不能表達超出其范圍的那些事物。部分對學校制度的反對，至少是對詞匯的擯棄，并且將語言視為對精神世界的表達。因此，這些極具創造性的洞見賴以表達的方式，就是對語言——屬于資產階級的意義的支配性模式——表示反抗。誠然，對于工人階級而言，文化洞察就是與語言戰斗。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將文化洞察簡化成反抽象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假定文化洞察是一種表達抽象精神生活的對抗性方式，而這個抽象精神生活不是以個體主體為中心，而是以群體為中心；不強調既有語言，更關注生動的證明、直接的參與和實際的控制。

我并非意在否定個體意識和語言在它們與階級實踐間的辯證關系中的作用，而是意在指出：在階級社會中，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對稱的、相互保持一定距離的關系形態的可能性。反學校文化的語言一點也不比正統文化的語言遜色——甚至可以說，反學校文化的語言更加犀利、更加生動，只是反學校文化的語言不是按照正統文化方式來表達，因而人們也不按照那種方式來使用它；但無論如何，比起人們普遍接受的語言，精神的洞見擁有太多的含義。批判性意涵源自于非正式群體的創造力，轉而又回歸到該群體及其文化洞察之中，從而形成了很多其他類型的物質和語體風格層面的實踐。相對而言，自主的文化實踐，諸如衣著、習慣、行為方式、個人外表和群體互動等方面的轉變，皆可在這一更寬泛的實踐活動中被覺察。

與其他事物相比，這一層面的文化活動利用自身特有的材料和實踐，“表達”、傳遞或宣布了一個世界的概念。在這個世界里，棲居著各類社會群體，社會群體構成了該世界的領地范圍。由于這種社會地位、具備的資格和前文所論及的自我神秘化，基本洞見的各種要素——或許是扭曲的，或許是錯誤的——就可能會存在；而且，這種洞見會隱藏在獨特的文化活動之中。這類活動通過作用于特定情境下的真實材料，獲得令人驚訝的、意想不到的，或是變化了的結果，并使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制度，甚至整個社會的結構關系的運轉能力受到質疑。[［9］](#_9_151)實現上述結果無需任何指責、意向或目的。它就像副產品一樣，幾乎只是在對每日文化的關注中，順便被生產出來。盡管如此，它仍然會起到鞏固文化的作用，可能還會改變文化的基礎，并強化其信心，擴展其作用范圍。另外，文化洞察也提高了成員間的相互理解和肯定，并為其文化活動、行為方式和態度提供了更全面、更細致合理的基礎，而這種基礎，實際上比我們的直接解釋更中肯，更能引起共鳴。根據經驗，這只是文化對其成員發揮作用的一種方式。但是，這兩類文化成果（意識與語言）的結合及互動，有助于激發我所謂的文化洞察，特別是在與重大人生決策和轉型有關的時刻。

闡釋性分析使得對這一層面的探究成為可能。人們可以對文化洞察背后所隱藏的那些不言而喻的假設提出疑問。使這一態度合情合理的基礎是什么？使那一行為合理的情境是什么？通過何種移置或投射，客體、藝術品或象征性情結又在表達什么意涵？正是通過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才可能對反學校文化中引發理性念頭——最終形成洞察——的各種情境和條件做出解釋。當然，我們現在處理的是分析范疇的問題。但是，我們所說的“洞察”絕不會出自社會行動者之口，因為洞察在文化及其獨特的集體層面上是有具體所指的。各種文化形式可能均無法將其所知表達出來，或者也不知道其所要表達的意涵，但是至少在其實踐的邏輯過程中，文化形式的所作所為就是對其意涵的最好注解，且在這個闡釋的過程中，無半點欺騙存在。

### 洞察

教育和文憑

鑒于本書第三章對有關教學范式洞察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那些“家伙們”對學校的拒絕和對教師所持的敵對態度。在他們的文化中，無論在何種意義上，知識對于大部分工人階級子弟而言，都絕不是一個有意義的“等價物”。該文化“看透了”對這一基礎教學范式的各種重復性的、操縱性的修飾，而無論它們是否被美其名曰為“社會實用性”或“進步教育”理論。[［10］](#_10_149)與新型就業指導[［11］](#_11_145)相比，這一文化對就業市場的真實狀況有更深刻的“認識”。

因而，反學校文化也在關注著學校中常見的制度混亂。該文化不但有其獨特的實踐方式，而且還在教育領域內尋找到一些重大的社會交易和矛盾，并予以曝光。上述這些反學校文化的實踐活動可以分為三類，這三類都旨在揭開日常生活中的“等價物”的真相。

首先，反學校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對循規和服從的回報進行一種相當微妙的、動態的，也可以說是“機會成本”的評估，而這種循規和服從正是校方試圖強加于工人階級子弟的。另外，反學校文化中還特別包含了一種對于文憑價值的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即獲得這些文憑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最終犧牲掉的不僅僅是時間，還有行動、參與和獨立性。文憑的直接報酬不僅僅是即時的，還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在未來十年中將一成不變。做一名聽話的“書呆子”，獲取那個價值可疑的文憑，可能會使人永遠失去那種在任何階段獲得各種直接報酬的能力。

因此，這種犧牲可能非常荒唐，而且犧牲的目的也可能是毫無意義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取向表明：文憑所帶來的結果并不總是純粹的幸事。無論如何，文憑還可能貶值，可能對職業選擇毫無影響（“當其他學生都不及格時，中學文憑又有什么用呢？”——斯派克），而且在“家伙們”可能獲得的工作中，文憑作為一種選擇標準，并不像看起來那么重要（“我總能向他們證明，我干得了這份工作。”——喬伊）。不管怎樣，學業上的“成功”又有什么意義呢？是不是意味著可以在職業等級中平穩地向上流動呢？這種真實的向上流動的可能，看起來又是如此遙遠，以至于毫無意義！對這些“家伙們”而言，學業上的“成功”意味著當學徒或從事文書工作。這類工作似乎向人們索取很多，但回報很少。顯然，這種評價是在某種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做出的。為了獲得形式上的、但卻不真實的獎賞（文憑），人們可能完全喪失自由的文化參與、社會集體感、街頭和車間里的歷險，以及精神上的獨立。文化的選擇應追求公民社會中不確定的冒險經歷，對抗循規所帶來的有限安全，以及那種相對的、甚至是幻想般的官方進步。

我認為這些文化洞察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文化洞察的形式為直接的文化活動，且具有即時性，除此之外，它還揭示了比它所掌握的更多的知識。首先，存在著一個常見的教育誤區，即教育可以創造機會，向上流動從根本上來說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文憑提供了成功的良機。[［12］](#_12_143)一部分對教育持社會民主觀念的人甚至認為，由教育的向上推動力所創造出來的所有這些機會的總和，實際上改變了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各種可能性，并構成了對階級結構本身的挑戰。

事實上，毫無疑問的是，唯有經濟增長才能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而且這種機會只對工人階級中的少數人開放。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本質就在于，各階級已結構化并長期存在，即使是相對較高的個體流動比率，對于工人階級的存在或地位也毫無影響。工人階級獲得再多的文憑，也不能開創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也不能說服企業家和雇主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即使他們有能力這樣做。

我們可以充分說明（正如在文化層面以特有方式、針對不同的直接目標所進行的洞察那樣），工人階級內部各種文憑的激增，與其說是創造或反映了要求更為苛刻的工作崗位的增長，不如說是掩蓋了工作的無意義本質，構筑了虛假的等級制度，并用意識形態將人們束縛于其中。

第二，反學校文化對于可獲得的工作的特性做出某種評估。雖然文憑能否保證工人階級就業有待商榷，但是我們可以想見，文憑向其工人階級持有者所允諾的，可能也是工人階級所期望的工作特性，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制造業中的絕大多數工作基本上都是無意義的。此外，我們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了解文化洞察的總體準確性：所有形式的現代勞動的共性、對循規者的道路及工作熱情的質疑——正當文化洞察產生于其特有的、直接的文化領域時，這些都使其與另一層面（該層面又反映到生活層面上）保持關聯。

絕大多數工作的具體形式從未像今天這樣趨于標準化和形式化。這些工作對于在職者的技術和所受培訓幾乎沒有任何要求，也不能為他們的內在滿足感提供實現的機會。盡管工作崗位的重組和細化[［13］](#_13_139)仍在負隅頑抗，但毋庸置疑的是，越來越多的工作正在趨于去技術化、標準化和高強度化。[［14］](#_14_135)如果將勞動力市場描繪成向年輕人開放，并受其技術和能力水平影響的話，那么這種描述就是不切實際的。一個人只需提及當前年輕工人空前的失業規模[［15］](#_15_135)，以及無技術年輕人[［16］](#_16_135)中令人擔憂的結構性失業的趨勢，就足以質疑年輕人在職業市場中所擁有的有意義的權力。

因而，人們的確有客觀依據提出這樣的疑問：當文憑的效力和目標備受質疑的時候，將自我及其能力投資于文憑之中是明智之舉嗎？反學校文化至少在文化層面上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學校文化卻沒有。

布迪厄和帕瑟隆指出，制度化的知識和文憑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術或人本主義的進步，而在于社會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識和文憑，階級社會得以合法化，并實現了再生產。一種表面上更民主的貨幣取代了真實資本，成為現代社會中的社會仲裁員。布迪厄和帕瑟隆認為，正是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群體所獨有的“文化資本”，即在對語言和數字的象征性操縱中的知識和技能，保證了該群體后代的成功，也因此實現了階級地位和特權的再生產。這是因為，教育進步是由“文化資本”所提供的那些“公平”、“嚴格”的精英測試技術來控制的。[［17］](#_17_129)

如果這是對文憑的作用和重要性所做的準確的評估，那么人們有理由認為，工人階級子弟寄希望于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正如官方報告所言，文憑和證書并非要提升人們的社會地位，而是為了維護那些早已經居于社會結構頂端的人的優勢位置。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18］](#_18_127)，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并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而努力，但正是通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中產階級得以享受特權，并不是因為世襲或出身，而是因為他們被證明具有更出色的才能和品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種暗含在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于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于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

最后，反學校文化對個體邏輯和群體邏輯之間的差異，及它們在現代教育中意識形態混亂的實質進行了現實的洞察。有關學校的文化洞察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依其特有的實踐和目標，以非自我意識的方式做出的，而且決定了自身具有一種固有的集體視角。該文化洞察的核心就是，階級或群體利益的邏輯是有別于個體利益的邏輯的。對于每個工人階級的個體而言，個人在這個社會中的流動或許是有意義的。一些工人階級的個體確實實現了向上流動，于是任何一個特定的個體可能都希望成為成功者。然而，對于整個階級或群體而言，這種流動毫無意義。因為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流動可能意味著整個階級社會被摧毀。

循規或許能為工人階級的個體提供某種邏輯，但是對整個階級而言毫無益處——為了無階級的虛幻理想，人們要放棄所有獨立和創造的可能。工人階級個體可能會被教育的表象說服，相信那些應該在社會中發生的事情，即任何人只要努力就會進步，但是反學校文化比國家及其機構對于這種期望有更深刻的認識——正是借助于站不住腳的“才能”，精英主義者才實現了對大眾的排斥。反學校文化和其他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包含了對當下主導意識形態——個人主義——進行深刻批判的成分。他們在某個層面上，甚至可能在其成員個體仍然以個人主義的或競爭的方式行事和度過個人生活的領域中，展示了其成員屬于某一階級的各種結果、可能、現實和錯覺。特別是當它們在學校中發揮作用的時候，反學校文化就會鑒別出主導意識形態所做出的虛假的個人主義承諾。

正是在以此為基本教學范式的學校中，個體成功所需的那些態度被宣揚為普遍必不可少的。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而且對不成功者而言，追逐成功的訣竅——努力工作、勤勉、循規、把知識作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毫無意義的。當然，這一悖論從未獲得承認。在學校里，個人主義邏輯被概括成群體邏輯，但群體邏輯的不同特性和抽象性并未被承認。

當然，基本教學范式的各種職業形式、某些變體，以及理論發展都相信，成功不能只用文憑或職業地位的高低來衡量，也可以進行水平比較。一份習慣上被視為社會地位很低的工作，如果它與其他同類工作相比，需要、利用并允許表現能力，那么人們就可能在這份工作中獲得成功。舉例來說，即使是一份毫無意義的工作，人們如果滿懷自豪、誠實地完成它，也可以算是取得了一頂成就。在道德層面和現實層面，工人階級子弟實際面臨的職業階級等級被轉變成一種差別化的、多維度的結構；這個結構承諾所有人都會變得富有。

關于辛苦工作和循規，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歪曲，即將辛苦工作和循規作為通向成功、獲取財富的具體方式。對待學業梯度的態度則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認為有必要提升學業水平，另一方面又絕不愿為此耗盡價值和成就之源。另外，努力的目標也包含矛盾性，即甚至于個體自我發展的潛力和價值滑落出學校的學業測量圖譜時，仍然試圖將其納入關于人的所有能力之中。上述所有這些都以某種方式承認了將個體邏輯擴展為階級邏輯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但是，它們又都在試圖以更加神秘的形式，重構從個體邏輯向階級邏輯的擴展。這些也給核心制度造成了極大的不穩定，反學校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很快地察覺出了這一現象。有關教育核心矛盾的文化洞察是啟動并強化個體分化的巨大力量。反學校文化作為階級文化的可見形式之一，表現出了特有的階級邏輯，并為解釋其成員的地位提供了認同，而這種認同并不是通過對占支配地位的學業和職業梯度進行欺騙性調和實現的，而是依賴于某種改變和轉化。對于作為一個階級的特定層級的人來說，學業和職業上的梯度變化并不能測量能力，而只能衡量其固定不變的受壓制狀況。無論其成員個體的位置如何改變，工人階級就是處在這個層級梯度的底部。個體在這一梯度中向上流動的才智，已被其作為工人階級一員而運動的愚蠢所替代。通過對工人階級學校的核心矛盾進行洞察，反學校文化幫助成員從循規和傳統成就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成員的能力和潛能在其他方面發揮出來。

勞動力：一種獨特的商品

反學校文化與現實的學校制度發生了正面對抗，并揭示了學校制度企圖進行的不正當交換——特別是以文化為名的其他形式的交換。除此之外，反學校文化還在自身層面上探究了人類勞動力的獨特性，指出行動的潛在無限性，尤其向人們證明了勞動力是一個不固定的可變量，而且無論有關勞動力的一般或官方的描述如何，個人都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其支出。

在學校里，勞動和循規的義務并未被明確限定，如一段測定的時間和注意力。這種義務意味著以某種不可測量、不可控的方式，使人放棄使用一系列的潛在行為或替代行為。不做筆記，混過考試，不斷規避教師的權威，在教室、樓道里打“游擊戰”，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自我的要求，也是個體實習某種勞動力的重要方式。當“家伙們”到了工廠后，人們不必囑咐他們“放松”，“別理會”，或“他們［管理層］總是要求不斷，如果你讓他們為所欲為，你就有的受了”。的確如此，通過這些重要的方式，工人階級子弟按照自己的興趣，精力充沛地在外部系統需求條件的制度轉向中得到了鍛煉。而且，這些孩子在認知、決定和控制自己的行動方面，要比其未來的同伴更熟練。之所以這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最終其勞動力是否被限制在學校中并不重要，相反，那些卷入車間文化的人要在更為嚴密的控制下從事生產；而且，其努力的目標是至少可以滿足旨在延續自身生存的再生產的需要。

教育交換與資本主義的基本交換形式相似。對教育交換的否定采取了文化洞察的形式（其表達不借助于文字或直接說明，而是借助于特定層面上的特定文化實踐），即認識到盡管勞動力可以在市場上買賣，但它卻不同于其他商品。之所以說它與其他所有商品都不同，是因為勞動力的價值不是固定的。無論是從道德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判斷，勞動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中唯一一個可變要素，這是永恒的真理。因此，勞動力一定是擴大的資本和利潤的來源。從根本上來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遠遠大于其工資所代表的價值。[［19］](#_19_128)對勞動者的可變能力施以“更好”的管理手段或資本化，即增大勞動強度，可使勞動者創造出更大的價值。[［20］](#_20_126)勞動力是具有這種可變能力、且可被買賣的唯一自然物。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個體勞動者對其所出售的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的無知，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核心所在，并使剝削過程和利潤的來源被隱藏起來。可是，反學校文化卻以其特有的方式對勞動力的特殊性做出了回應。仿佛是出于本能，反學校文化限定了勞動力的特性。依照反學校文化的獨特邏輯，這也是成員在感覺上、身體上和精神上參與到反學校文化的實踐活動之中的先決條件。

我認為，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這種文化本能也構成了一種對重要且普遍的意識形態關系和物質關系的洞察。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講，這種成功最終反作用于文化，以一種特殊方式推動其發展，并確保其長期重要性和成功。

這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框架：勞動者在市場上像出賣其他商品那樣，公平、自由地出讓自己的勞動力，但是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是，此后勞動力并不表現為固定的量，而是作為勞動者與生俱來的可變能力的充分表現。因此，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遠遠超過其價格，即工資。勞動力在與資本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表面上與工資建立起了等價關系，這使勞動者相信，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獨立，即資本主義國家和司法部門宣稱的自由和平等。這種體現于個人（勞動者）、國家和法律尊嚴之間的表面上的等價關系，不僅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也掩蓋了勞動者與其階級的共同特點，以及可能形成階級團結的基礎——同樣的剝削。從本質上看，有限的資金購買了一種無限的能力，而且由于人們允許、也不反對將這種行為繼續下去，勞動力的買賣被社會合法化。正是由于對可變能力的合法獲取和合法剝削結合在了一起，才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失去限制。只是出于對封建制度下莊園主和農奴之間赤裸裸的剝削關系的怨恨和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才有所顧忌。資本的生產力，就是勞動力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不是一種數量，而是一種能力。[［21］](#_21_127)

目前仍很常見的周薪制，就是揭示這一經典意識形態趨向的絕好范例。在中產階級的職業中，年薪顯然是為獲得持續的彈性服務所進行的一種交換性支付。此處，報酬并不由耗費在工作上的特定時間的總量所決定。雇主當然希望職員在家中加班以省去支付加班費；而這類職員的工資是按照其本身的情況，即能力的使用狀況、成為經理或會計等的總體潛能來支付的，其工資形式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周薪制的社會含義則完全不同。年薪這一薪金形式所承認的勞動者的總體能力，在這里被強行分割成若干周薪的總和，并固定為一種直接的、定期的回報。正是這種周薪制，而非年薪制，標示著勞動力的付出。工資總額就是對工作所耗費時間的量化。工資的減少表明可測時間的減少；工資的增加則反映了加班的時間。人們的注意力為此所吸引，因而更加容易忽視勞動力所具備的持續的、可變的真實特性，也更加容易忽略這一事實，即依時間標準所支付的豐厚報酬激發了人們的巨大能量，而事實上，這個能量是不可測量的。

周薪制就是那每周拿到手的緊緊密封的棕色信封，就是人們手指輕彈信封口時所顯示的貨幣的支配力，就是裝著錢幣的沉甸甸的信封底部，就是周四下午招搖的人群。人們對于周薪制那近乎迷戀的情感，打破了周的連貫性，將人們的努力成果量化，并將勞動力的巨大作用和潛能作為一種簡單明確、每周給付的“合理”工資的等價物呈現給意識。這種固定的周薪制包含了長期努力的可變潛能與固定的工資回報之間的分離，反之，那看不見的按月匯入銀行賬戶的工資，則可能打破上述兩者間的分離。

盡管將所有批評或分析性動機歸咎于“家伙們”個體的做法可能是錯誤的，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家伙們”的集體文化，不僅是對人類勞動力的獨特性的回應，同時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否定有關勞動力的某種意識形態定義的嘗試。我們可以通過民族志中有關文化部分的材料看出，這些“家伙們”將自身的勞動力視為對抗職業領域不合理要求的屏障，而并不認為在勞動力與不合理要求之間存在著特殊的、有特權的聯系——這種觀點直接助長了對抗性的車間文化。而車間文化的目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限制資本主義生產，限制生產可能對個體所施加的貪得無厭的苛求。[［22］](#_22_127)

必須再次強調，這種文化洞察是與文化的全部本質聯結在一起的，遠比一個簡單的精神類別更加豐富。特別是在文化回應中，文化洞察構成了質量的基礎。對于那些從對不受約束的承諾的需求中積極釋放出來的能力，確實存在著一種相反的、有目的的利用。這種利用是工人階級的特質，相對而言，是不受迷信、宗教信條、神秘化影響的，而這些通常被資本主義生產的循規所吸納。[［23］](#_23_127)

資本主義虛偽地向所有人承諾的自由，可以片面地、具有諷刺性地被個體的集合所解救，正是這些個體共同認識到，只有靠自身的作用才能免受生產的同化。對這些“家伙們”而言，在商業舞會中、在街頭、在斗毆中、在揮霍金錢的時候、在拒絕他人的時候，都存在著一種被扭曲的自由，且這種被扭曲的自由唯有靠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制度，才能得到保證。這不能歸咎于工人階級，恰恰相反，諸如此類的自由是為階級的文化目的服務的。

工人階級這種獨立的能力造就了對正式的、尖刻的、非具體化語言的世俗的檢驗，對抗性的團結，以及不以正式的職業地位為基礎的幽默表現、風格和價值。就具有顛覆性或潛在顛覆性的形式而言，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盡管不能夸大或浪漫化上述這些工人階級獨立能力的產物，也不能超出最低限度的自由或物質基礎來認識它們，但它們仍然產生于對資本主義要求的創造性回應，而不是消極忍受。

一般抽象勞動

我們在民族志部分可以看到，實際上，即使只是在內在層面上，這些“家伙們”也基本無法辨別出他們認為向他們開放的那些具體的工作之間的差異。只要最終選擇的工作符合社會和文化上的限定，而非技術層面上的限制，他們就會對該工作持有一種近乎漠不關心的態度。有時候，現實選擇完全是偶然間做出的。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的共性與職業咨詢指導機構所設計的職業類別和多樣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此，我想指出，可以把這種觀點（盡管產生于自身特有的文化模式）當作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結構中對勞動作用的一種真實洞察來加以理解。做出此類洞察，是以為文化活動保持空間與活力為基礎，但其對現代工作無意義性和共性的假設，在更廣闊的背景下仍具有重要意義。毫無疑問，正是這種更廣泛的有效性長期強化、維持了文化洞察，并為文化洞察注入了一種獨特的共鳴和成功。

實際上，所有周薪制工作的共性要比差異更重要。此類工作的共性就在于，勞動力在生產中為資本所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購買勞動力的費用。毋庸置疑，資本主義制度是為了利潤而非用途組織起來的。社會中絕大多數需求并不是直接得到滿足的，而是借助于利潤的刺激這一中介得到滿足。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于商人或管理者而言，行動的源泉是對于利潤的追求，而不是人類的物質需要在發揮作用。只要能夠真正獲利，生產什么產品并不重要。當“市場條件”發生變化時，勞動者將會被敏捷地從一種商品的生產轉移到另一種商品的生產，而無論其技能和當前的活動如何。事實上，很多企業集團都包含了一些看起來不大可能的聯合，如肉類包裝和空間探索，這種不斷延伸的特性，生動地證明了企業的關鍵是利潤，而不是對人們所需商品的生產。

由此可見，人們對產品的用途毫無興趣，只關心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利潤。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唯有使用勞動力，才能產生利潤。盡管問題的本質在于對勞動力的剝削，但對于資本而言，產品所包含的特定的勞動形式遠沒有其特性重要——只要產品有利于獲利。由于勞動的具體形式無關宏旨，因此我們可以將“抽象勞動”視為所有周薪制勞動的共通之處。[［24］](#_24_125)

抽象勞動是所有勞動力共有的一種獨一無二的特性，即可以創造出比自身作為商品時人們所需支付的費用更多的價值。所有具體形式的勞動都包含了對抽象勞動進行剝削的可能。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它們都可以被標準化——此即為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這也將所有不同的生產部門和勞動形式聯結起來，并使得勞動的具體形式、產品的特定用途要依其作為抽象勞動的狀況這一核心事實而定。[［25］](#_25_123)

從資本的觀點來看，這種共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從勞動的觀點來看，這種共性就不甚清晰了。因為就如職業咨詢和職業指導[［26］](#_26_123)所強調的那樣，在擦窗戶、園藝工作、承辦酒席和工廠勞作之間確實存在不同之處。正是服務行業、公共部門的擴張和產業部門的收縮使人常常誤以為，從未像今天這樣，有如此多的就業機會向年輕人開放。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可以說在所有，有時候甚至完全不同的職業中，資本主義的工業模式占據了支配性地位。當前，政府要復興制造業并“使之有利可圖”的策略，就充分證明了社會民主國家承認工業優于其他就業類型的首要地位。而且，與這種簡單的量化方式相比，工業資本主義以一種更為深刻的方式占據著支配性地位。在其外部的企業及活動中，在許多明顯不同的具體勞動形式中，工業資本主義都在強化其有效利用抽象勞動的核心邏輯。它為勞動的使用提供了重要范式。鑒于這種重要的支配地位，我們必須對這個新的、范圍更廣的被支配者的實際含義提出疑問，而不能將其作為多樣化的具體證據。

不論所包含的勞動的實際形式如何，“標準分鐘”正在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逐漸變成所有雇傭部門中各種工作時間記錄卡的基本單位。其主要目的就是將各種各樣的工作分解，并使之具有可比性。這也使得管理層能夠更為直接地控制用于勞動力的支出，如此一來，各種“技術”或慣常的浪費時間的做法被禁止，而實際上，在特定種類的具體勞動中，它們是非常重要的區別要素，人們沒有懈怠時間，也不能妨礙管理層對抽象勞動的利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甚至連社會團體、公共服務或非盈利機構所從事的工作，都完全可與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工作相提并論。

教育和福利事業中的那些合理化建議、成本——收益運營計劃均向人們證明，資本主義的工業邏輯正在向數量比制造業更龐大的服務性和公共性職業領域蔓延。我們談及這些，并非意在討論服務和公共部門的縮小或擴張，也不是要否定社會需要對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決定作用。而是想指出，這些新領域的擴張在根本上仍然受到資本主義準則，特別是通過有效利用抽象勞動的種類來調節需求的準則支配。正如通常所討論的那樣，它并不受尚未成熟的社會主義支配。在削減國家支出的壓力下，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更加迅猛的福利化進程。其中，福利被界定為社會工作者以最小的成本、為最大數量的委托人提供最長時間的服務；而教育則被界定為教職工和學生之間的最大化的“接觸時間”——無論在這些單位成本時間里實際發生了什么事。這種管理取向抑制了其他可能采取的方法。教育和福利的開展，可以通過直接承認集體需要，并對那些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痛苦和“不適”的結構形式和文化形式進行調查來完成。這種方法取決于對人類需求和目的的規劃，而不是對“抽象時間”的有效利用。實際上，我們每天在考勤卡上填寫“標準分鐘”的時候，這一天正在來臨。而且，雖然形式不同，但考勤卡就是教師和社會工作者職業生活的最根本體現，這就如同它現在是水暖工、木匠每日工作的體現，如同它一直是資本主義產業工人工作的體現一樣。

抽象勞動的計量標準是時間。雖然我們已對分鐘這一計量單位做了考察，但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人們已經普遍注意到，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中興起，是與時間觀念的轉變聯系在一起的。[［27］](#_27_119)四季輪回的自然規律、太陽在天際中的方位、腹中的饑餓感，或是有待完成的任務，全然被基于時間的時鐘邏輯替代。時間不是日、月、四季之往復，也不是再次進行某項活動的信號，而是一種標準的、有限的數量。時間無情地流逝，帶走了無數的機會。在資本主義中，時間沿直線運動，而非循環往復。因此，既要利用時間，也要節約時間。正是這種計量標準，使復雜的工作得以同步開展，價值和利潤可以被測量和創造。“時間就是金錢”，但真正將此二者聯結起來的是抽象勞動。

這種無法阻擋的線性時間的一致化運動，既具有資本主義的時代特征，也具有某種意識形態作用。它表明了一種同質性社會的意涵：正如記述的那樣，該社會正處于緩慢發展的進程中。這其中暗含了一個成熟和連續的普遍概念。這使人用一種漸進主義、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思考統一的社會何以構成。在這個統一的社會中，所有人共享相同的時間坐標，并以小心翼翼的步伐試探著前行。而且，統一的社會也顯示出了壓制人們如下想法的趨向，即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擁有不同的時代，或者有些群體沒有屬于自己的時代，或者其他群體試圖粗暴地推動時代前進。

雖然我們不能夸大社會的作用，但是完全可以將反學校文化的諸要素不僅僅視為文化洞察，也視為對這種占優勢的時間觀念的有限征服。在對其成員時間表極為成功的非正式指導下，在對官方文化的瓦解過程中，反學校文化直接構成了文化活動的自由空間，并拒絕了中產階級時間的人為秩序和按部就班的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家伙們”的活動與經歷被中產階級時間所掩蓋。當然，這也帶來了一種影響——即使不是有意直接為之，也進一步強化了文化環境中的文化實踐活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考察了抽象勞動的共性。然而，更為顯而易見的是，抽象勞動作為現實社會關系中的一條生動準則，每天都在生產著有關自身趨勢的明顯的經驗形式。[［28］](#_28_119)如前所見，去技術化是一個極其現實的過程。具體勞動正在日趨退化成一種標準的去技術勞動。盡管雇主明顯傾向于要求雇員具有更多、更高的學歷，但在實際工作中，雇員所應用的技術內容卻顯現出相反的變化趨勢。例如，即使是工具制造業中需要高超工藝的工作，其多樣化、不可分割的特性也正在讓位于專業化、重復性的流水線技術。

現在，工廠中絕大多數的機械化工作都被標準化，一個孩子就足以完成。[［29］](#_29_117)現實的標準化勞動的生產速度，是由機器或生產線的節奏來決定的，既不需要計劃，也不需要技術。個體生病與否，是否具備中等教育文憑，這些根本都無關緊要。只要不使生產線停下來，他們個體勞動力的具體形式就毫無意義。具體勞動力之所以重要，并非因為它固有的或特殊的貢獻，而是因為它消除了潛在的負面因素，即不會中斷或終止生產。在現代機器制造和批量生產中，我們可以看到抽象勞動通向具體勞動最表層的方法。

就某種重要意義而言，現代組織技術與諸如時間、運動研究之方法的全部要旨，就在于縮小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鴻溝。在此，所有勞動的抽象共性均體現于具體形式之中，并迫使所有勞動轉化成一種中庸之道——做某項工作的最佳方式。資本主義想象中的黃金國就是這種最佳方式。特定形式的勞動趨同于某一具體標準是抽象勞動準則的發展趨勢，這一趨勢在某位學者的著作中或許得到了最佳證明，該學者也因在時間研究中增加了動作分析而享有盛名。吉爾布雷斯明確地將抽象勞動當做改進具體勞動的模型。[［30］](#_30_115)先前的方法是將現有的完成一項工作的捷徑細化、標準化。吉氏則對基本動作要素進行分類，而不考慮具體的模型，他將這些要素稱為“基本動作單位”。[［31］](#_31_111)這些“基本動作單位”可測量到千分之十分鐘。因而，在用這些建筑磚塊完成工程之前，現實的具體工作可能已預先完成。我們透過對完成一項特殊工作的最佳抽象方法所進行的深入分析可知，該方法確實趨向于適度抽象化。資本主義再一次取自身發展之精華。這種方法即使最終未能成功實施，但也明顯對資本主義體制內部固有的特定工作的標準化過程產生了最為深遠的促進作用。而吉氏的“基本動作單位”，從根本上是要將人轉化為機器，即將人類獨有的各種具體能力轉變成最優的標準勞動。從“基本動作單位”表面看，我們很難推斷出現代勞動的多樣化！正是在它千分之十分鐘的自動化過程中，資本主義顯示出它將所有人機器人化的強烈欲望。

這些“家伙們”對自己即將步入的工作崗位的獨特形式漠不關心；他們假定工作本身具有一種無意義性，而不管他們應對工作持何種“正確態度”；他們相信自己所面對的所有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相似性。這些都是“家伙們”作為階級成員，對他們賴以生存的現實條件進行文化洞察的形式。反學校文化對工作所持的看法確實要優于學校所持的官方觀點。在文化上承認勞動力是一種商品形式，承認抽象勞動是各種具體形式勞動的基礎并與具體勞動相聯系這一基本準則，是在主觀上被這些事物同化并產生局限性的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也是“家伙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依靠自身能力進行文化開發、舉行文化儀式的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這種被釋放的人類能力和興趣，為該文化層面的活動提供物質基礎。同時，這一文化層面的活動也為維持和發展文化洞察帶來了其特有的各種生產形式。文化洞察是對社會中的一些基本社會關系／結構關系所做的創造性的、多樣化的、具有潛在變革力的理解，而不是苦難的經歷。反學校文化與一般抽象勞動之準則相對立，它揭穿了該準則背后的秘密，并作出回應。這使人們在內心深處擔憂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如何才能運轉和維持下去。此處不僅僅存在著一種部分洞察或文化洞察的潛能，也存在著一種實現社會總體轉型的潛能。什么才能阻止這種潛能的發揮呢？

## 第五章　局限

如我們已知的，反學校文化對其成員的生存條件進行了某些文化洞察。此處還有一些材料，我們可以借此對社會和政治行動做透徹的批判性分析，從而另辟蹊徑。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文化洞察及與之相關的實踐之所以缺少具有變革能力的政治活動，原因是缺乏政治組織。沒有一個群眾政黨試圖在文化層面上進行解釋和動員，顯然這并非難事。政治組織本身的缺乏可以看做是部分洞察的結果，但反之不必亦然，即部分洞察不必一定缺乏政治組織。[［32］](#_32_109)顯而易見的是，這一文化層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內部被打亂的。

民族志的描寫一再提醒我們，只存在一種社會結果。矛盾沖突中的巨大力量可分解成一個現實，而不是一系列讓我們研究其決定因素和本身結果的連續的多個現實。文化洞察的純粹邏輯只普遍存在于那些值得記載的事件之中。實際上，扭曲、限制和神秘化的力量同時將這種純粹邏輯分解成一種部分的邏輯。反學校文化對當前社會組織的半抵制和文化洞察，通過一種確實有效的方式，開始時總是變成暫時的、不加掩飾的質疑，但是最終還是接受并適應現狀。但矛盾的是，甚至在接受了這種從屬關系之后，個體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對自身的行動、洞察力和主觀正確性深信不疑。在當代資本主義關于意識形態迷障的復雜難題中，對這一矛盾最引人注目的證明就是，關于抽象勞動的不成熟的文化理解和那些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中的階級團結，被轉變為一種特殊的主觀斷言和對體力勞動力的“自由”出讓。

### 分工

由于存在著深奧的、基本的、使人混亂的分工，文化洞察受到了抑制和破壞，且無法實現其全部潛力或政治表達。兩個最重要的分工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以及性別之間的分工（此處，種族也極為重要，我們將在后文加以討論）。

拒絕學校，以及對學校中不公正之事的文化洞察，均可被視為對個人主義的擯棄。這同時也是對腦力勞動的普遍拒斥。戰勝個人主義的時刻，也是分離出現的時刻。個人主義之所以被擊敗，原因不在自身，而是由于其在學校中的作用。在學校里，腦力工作是與不合理的權威，以及作出虛假承諾的文憑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對個人主義的洞察是以犧牲人類能力的實際分工，以及屈從于才能的部分發揮為代價的。贏得某種團結，就意味著失去了更深層結構的聯合。雖然這些“家伙們”團結在一起，但是他們的團結是基于個人主義的，并與腦力勞動對立。人類世界被劃分為“善于動手的”和“善于動腦的”兩類人。“所有工作皆相同”這一文化洞察的要旨，大體上轉變成了“所有體力勞動皆相同”。體力勞動開始以某種方式，呈現出對有關體力勞動者的社會地位、認同的重要的批判性表達，但是這種社會地位和認同并非體力勞動的特有性質。

此處，我們可以看到，學校制度具有深刻的、非預期的、矛盾的重要性。在學校中，主導意識形態被非正式地擊敗，但是它卻更加無意識地、更加自然地超越了一個更大的結構，歷經考驗，獲得了（代價慘重的）勝利。資本主義能夠承擔在工人階級中生產出個人主義，而不是分工。個人主義被反學校文化所洞察，并在現實中造成分工。

使文化洞察陷入混亂的另一個重大分工是男女之間的分工。性別分工，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性別自身帶來的分工。男性反學校文化支持其特有的性別歧視，甚至將性別歧視作為其整體信念的一部分加以稱贊。

即使在女性缺席的情況下，這些“家伙們”講話和動作的獨特方式也總是在展示男性氣概。敢于挑頭，使他人開懷大笑，做意想不到或滑稽的事情，自然主動地取悅自己所欣賞的女性，所有這些能力都是反學校文化的男性特征，也是該文化中“家伙們”永遠追求的目標。不僅如此，作為男性反學校文化一員的一個更加具體的特征是：要么擁有性經歷，要么至少懷有濫交或偽善的抱負。“家伙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性快感，有時候會粗魯地追求女孩；而女孩一旦獻身，就常常會遭拋棄，并被冠以“放蕩”之名。人們要求女孩必須性感、吸引人，同時還要純潔和忠誠：把握欲拒還迎的平衡。反學校文化在強調性別分工的同時，也對個人主義分工的人為性加以洞察。

在性別歧視方面，反學校文化反映了更廣泛的工人階級文化。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當學校教育范式出現分化的時候，反學校文化會求助于一些更廣泛的階級模式作向導。例如，當其中一個“家伙”對學校不抱幻想時，他會在工人階級家庭中找到一種最根深蒂固、最持久的性別分工模式。與那些循規的人相比，反學校文化的成員出于需要，更有可能找到工作，也更有可能經歷某種性別歧視。這種性別歧視既指向他們個人，又是整體工作環境的一方面。對于這些“家伙們”而言，性別歧視成為了其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成為了工作場所中整個工人階級文化的優勢風格，而這種優勢風格正是“家伙們”所贊賞的，他們也正忙于在學校中重建與特定對抗和決定性因素相關的這種優勢風格。

盡管在我們的學校中可能存在著一種制度化的性別歧視，但是與非正式的工人階級男性對抗文化所再生產出來的性別歧視相比，學校中的性別歧視并不那般強烈。我們必須對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自由主義和形式平等的學校給予贊譽。但是，一旦其權威被打破，性別歧視和自然分工就會以更為致命的形式出現。這種結果當然不是學校和我們所期望的。即便如此，性別歧視仍然在階級社會的再生產中發揮著關鍵性的、系統性的作用。

### 勞動力與父權制

如果上述分工只停留在抽象層面上，或是彼此分隔，那么我們所考察的文化洞察在面臨由這些分工所引發的混亂和分裂的時候，就完全可能幸免于難。但實際上，在這些分工之間存在著一種更為復雜的融合，這種融合在微觀形式上呈現出如下特征，即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性極為重要的那些意義與分工的各種表現形式結合在一起。下面我們就來剖析這個結合點。

單單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就足以為建構人類能力的自然分工提供一個富于創造力的場所。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構成社會整體的那些人中，包括這些“家伙們”在內的一部分人甘愿承受體力勞動者這一身份帶來的限定和物質結果。這之所以令人訝異，是因為在關于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資本主義動員中，依照主導意識形態，腦力勞動者一直享有合法權利，以保證他們占有優勢的物質和文化地位。腦力工作需要勞動者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理應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一來，為什么人所追求的目標應該符合意識形態的判斷標準，并在物質上回報豐厚，也就不難解釋了。但事實上，并非所有人都追求腦力勞動所帶來的回報和滿足感，這才是真正需要我們作出解釋的問題。單單資本主義需要一種這樣的分裂這一理由不能解釋其需求何以被滿足。只有在一個完全反思性的經驗世界中，需要的形式才能決定其得到滿足的必然性。而且，真正在滿足該需要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制全然被掩蓋、被神秘化，并為某種觀點所遮蔽，這種觀點認為，主導意識形態和精英主義觀點——例如學校里的英才教育——似乎認定所有人都在為實現大抵相同的目標而努力。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相同的目標，這種預期表明，那些身處階級社會底層的人之所以陷入如此狀況是因為他們自身缺少實現目標的能力，而且就連他們自己也對這種自我歸因的解釋深信不疑。可以說，所有人都接受了相同的游戲規則、意義和目標，也接受了同一個輸贏準則。當然，事實上，伴隨著教育領域人本主義的發展，職業咨詢機構也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但卻錯誤地解釋說，該模式絕不可能在現代社會中真正地發揮作用。它假定，工人階級中地位較低的群體實際上是一個亞群體。與其說他們是資本主義的，不如說他們是封建主義的。盡管經常被誤識，但是確保資本主義制度穩定的因素之一，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復雜奇跡之一，就是在從屬階級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接受自身能力在持續下降這一既定現實。與此相反，他們將用來測量腦力／體力梯度的價值標準顛倒過來。本書所研究的這些“家伙們”更喜歡（就目前而言）通過體力勞動來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當然，這就為造成階級差別的社會鏈條提供了所缺的一環。基于此，所有其他階級都可以在主導意識形態通用的腦力模式中贊美、證明自身的優越性，并為這種優越性找到一種比較的基礎。譬如，當“書呆子”被指責自我取消加入“家伙們”的資格時，他們的表現更加理性化。無論這些“書呆子”實際從事的工作是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他們都可以通過界定工作，界定工作與自己的關系，在相對更趨腦力勞動的模式中界定自己的身份，從而贏得一些優勢和社會認可。

這種與過于學術化的差別完全相反的分化是對主導意識形態的巧妙補充，對社會最底層之上的所有階級而言，也為主導意識形態提供了在勞動中創造主觀認同的宣傳機制。就勞動力的特性而言，如果意識形態上的順序沒有在社會最底層發生倒置，那么資本主義體系就不可能穩定。即使創造再多的條件，國家機構也不能為那些身處階級結構最底層的人提供一個完整的人的身份：強迫或長期斗爭，而非自愿的屈從就是這個社會秩序的基礎。

然而，這種重要的倒置不會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邏輯中，也不會在勞動分工的過程中自然形成，而是產生于兩種結構的社會階級相互關聯而形成的有機整體之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兩種結構只能在抽象層面上被分隔開來，它們的形式則已成為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就是父權制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種關聯的形式，是兩組結構中對男／女性別和腦力／體力勞動兩對關鍵詞進行交叉評價和聯合。可見，這兩個結構的兩極分化是十字交叉的，即體力勞動與男性的社會優越感相關聯，而腦力勞動則與女性的社會自卑感相關聯。體力勞動尤其充滿了男性特征和氣質，毫無疑問，體力勞動在這方面比在工作的內在核心上更富于表現力。

性別差異、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區別使這些過時已久的分工被發展成當代具體的文化形式和關系，但是人們所知僅限于此：分工并不總是自動為一部分工人階級帶來劣勢，阻礙他們將分工視為壓迫。對于這些“家伙們”而言，他們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中本處于劣勢，但他們卻將自己所偏愛的性別分工覆蓋于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之上，并使之逐漸成為腦體分工中的一部分，從而最終部分地改變了腦體分工的效價。[［33］](#_33_107)

人們常常忽視的是，這兩組分工處于相同的空間中，且各自無法單獨存在。意識壓力和文化在它們各自的位置上對它們特有的材料發揮著作用，并尋求某種統一。此二者不可能分別存在于兩個均受到生活空間擠壓的思想體系中。而且，此類體系只能在抽象層面上被分離開來。正如民族志所提醒我們的那樣，是經驗規律，而非理論能力，將各個體系連接起來。勞動和性別這兩組分工得以接續在一起，其奧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兩者在資本主義階級體系的世俗生活中的相互連接，而不在于純粹的抽象推理。在這個交叉的連接點上，男性氣概——在它自己的領域內，就是有關優勢地位的正式的或形式主義的規則——成為了運動、行動和斷言。可以證明，男性氣概的本質是超越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男性氣概則具有一種獨特風格和世俗的表達形式。體力勞動——在其自身的領域內，是以自然為對象的、中立的甚至是完全分離出來的體力工作——變成了一種優勢和選擇形式，并被賦予一種表達性目的。

如果某種形式的父權制鼓勵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那么這種分工反過來也會鞏固各種新型的性別分工和壓迫，并有助于性別分工和壓迫的再生產。準確地講，這是由于在學校和工作中存在著各種分工，盡管這些分工客觀上導致了部分工人階級失利，但就父權制而言，這些分工又是可以被理解和轉化的，性別條件本身必須不斷地被復制和合法化。如果女性特質大行其道并被重新評價，那么腦力勞動也將隨之大行其道并被重新評價。既然妻子、女朋友和母親被視為受束縛、地位低下且對某些事情無能為力的人，那么反學校文化的成員就唯有相信白領和辦公室工作的女性特質了。如我們所知，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這些“家伙們”中間存在著這種信條。他們強加于女朋友身上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模式，如要守家愛家，要具備家庭生活和從屬文化需要的能力并缺乏它們不需要的能力，這些都保證了女性受束縛的角色地位。而這些行為真正的決定因素和根本原因，來源于勞動在意識形態上的分工，并非僅僅來源于守家愛家的觀念或父權制的意識形態。[［34］](#_34_105)就我們的直接目的而言，這種交叉評價的結果就是，持續不斷的文化洞察，特別是對于一般抽象勞動的正確評價，被轉化為一種令人驚訝的對勞動力的肯定。上述結果的形成包含了兩個重要過程。首先，不同類型的工作與不同性別之間的聯合強化了勞動領域分工的本質。這些“家伙們”的腦力活動之所以被阻止，不僅是因為他們對學校制度的獨特體驗，還因為腦力活動被視為缺少男性氣概的標志。他們自己的許多腦力活動和情感是以文化、時尚和具體的形式來表達和發揮作用的。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決定性的經典轉變中，在這些“家伙們”看來，所謂的腦力勞動只是“動動筆桿子”，“并不是真正做點事”，最為重要的是，腦力勞動是“女人的差事”，根本不是男人的工作，也不屬于男人的行動范疇。如此一來，我們起碼知道了為什么那些“書呆子”可能被視為毫無男性氣概的、順從的“娘們兒”，為什么循規的人又被稱為“脂粉氣十足的男人”、“搞同性戀的男人”或“手淫的男人”。無論這些“書呆子”成績多好，未來成功的希望多大，他們及他們的行動策略還是遭人輕視，因為他們的成功方式被貶斥為被動的、腦力的，缺乏強悍的男性氣概。

其次，男性氣概所代表的全部意涵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有關勞動力和現代工作本質的文化洞察卻矛盾地帶來了對于體力勞動的肯定，而且為體力勞動注入了一種本不屬于其內在特性的含義。

對這些“家伙們”來說，體力勞動充滿了男性氣概，并被賦予了某種感官上的寓意。[［35］](#_35_103)在勞動分工的過程中，無論是就體力勞動自身而言，還是就體力勞動那本質上毫無英雄氣概或顯赫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而言，體力勞動和努力中的吃苦耐勞、笨拙都承載著男性的觀點和深奧意涵，并表現出一種超越其自身的意義。可以說，無論這一艱巨工作的具體問題是什么，其本質始終都是男性范疇的問題，需要用男性的能力來解決。我們也可以這樣表達：一般抽象勞動的基本原理從內部使工作失去意義之處，正是轉換了的父權制從外部為工作注入意義之處。對工作的不滿使人們的關注點從政治不滿上轉移開來，并由于迂回進入象征性的性別領域，而使自身邏輯陷入混亂。

在一定程度上，惡劣的工作環境被重新解釋為：為了充滿男性氣概地對抗工作所進行的英勇演練。人們之所以如此理解艱苦的、不適的或危險的環境，并非因為環境本身如此，而是因為該環境與男性的隨時迎戰狀態和剛毅極為相稱。由此可見，人們更多是透過在惡劣環境中掙扎求生所需的堅忍不拔，而不是一開始就不得不面對的強迫性來理解這種環境。

雖然很難通過工作本身達到某種道德境界，但是工作所提供的和完成工作所需的那種犧牲精神和力量，卻為自尊提供了物質基礎。這種自尊來自于目標的達成，但并非所有人——特別是女人——都具備實現目標的能力。工資袋就是自由和獨立的提供者，也是在工作中對男性氣概的特殊嘉獎。這就是對工資袋崇拜的補充，也是崇拜成為可能的原因所在。人們對一個職業的評判，并不看職業本身的情況，甚至也不怎么關心職業的一般回報率，而是關注該職業為在職者提供有影響力的、充滿男性氣概的家庭角色的能力。顯然，金錢只是其中一部分，可以作為一種測量標準，但不是其本質所在，如斯潘克斯的父親所說的“你可以靠擦皮鞋養活一家人”。男性的工資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簡單地取決于其中容納金錢的數量，而是因為工資袋標志著男性在與“真實世界交鋒的過程中，以一種男性氣概的方式取勝，而對于女性而言，這個真實世界則過于殘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勞作者、養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擔一些“額外”的工作。當然，女性工資在物質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可能通常要遠遠大于“額外”的含義；毫無疑問，女性所從事的家務勞動也是整個家庭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資袋作為一種男性氣概的象征，對于男人和女人來說，既支配著家庭的文化和經濟，又構成欺壓。

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在體力勞動所包含的男性氣概中，完成工作的決心和真正工作的意愿被假定為一種男性的邏輯，而不是一種剝削的邏輯。喬伊的父親在談論其繁重的落錘鍛造工作時是這樣說的：“一個男人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是他的愿望即將實現的時刻。”改造自然的過程和其中所包含的物質力量，它們的真正目的是借助于男性氣概與體力勞動的合并，轉變成一種男性氣概的財富，而不是生產的財富。就其自身來看，男性氣概當之無愧是一種力量，但是如果男性氣概的直接表達是通過完成另一事物來實現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男性氣概是人類的一種特性，因此它必須在某處被表現出來。這就是宿命，某種自尊和尊嚴似乎是自然而生的。工作中的重重困難或許會帶來軟弱，或是集體反抗或質疑，哪里如此，哪里就會產生一種壓倒一切的男性氣概——一種被轉移了的生產目的論——來抑制疲勞，并對目的進行理性評估。[［36］](#_36_103)

如果工作中男性氣概的特性成為目的論的一種類型，那么工作的完成和女性特質就與一種固定的狀態聯系在一起了。女性的勞動力被視為一種存在的本體狀態，而不是一種目的論的形成過程。家務勞動并不是狀態的結束，而是狀態的持續。做飯、洗衣和清潔工作總是復制著從前的狀態。毫無疑問，從某種意義上講，家務勞動永遠不可能完成，而且也不像男性工作那樣被視為充滿困難或是有生產價值的。女性的家庭工作只是被簡單地歸類為做“母親”或“家庭主婦”。“媽媽”總是做這類工作，而且也總是被期待做此類工作。這就是母親身份定義中的一部分，就像是工資袋和有生產價值的工作就是“爸爸”的身份一樣。

父權制及與之相關聯的價值觀念，完全不是既往社會中未被解釋的殘留之物，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復雜的、非預期的勞動力預備和社會秩序再生產過程的關鍵所在。事實上，父權制及其價值觀念以其不斷被毀壞和重建的、脆弱的、不確定的、非預期的和矛盾的方式，提供著現實的人性和文化條件，使自由民主國家中的人們“自由地”承擔起從屬者的社會角色。我們掌握了現實經驗條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盡管它們最終都是不切實際和顛倒的，但不可否認，它們對于意識得以“自由”發揮作用大有必要，并將最終決定總體形勢。在“家伙們”和反學校文化中，有關勞動力出讓中的共同特征和工人階級認同中共有的洞察力，或可能成為洞察力的那些觀點，僅僅被拆解為對體力勞動的維護，隨后又被曲解為對體力勞動的奇怪肯定。勞動力展現的其某一精髓或是特質的方方面面，并非其本質特征或與資本之關系。具體來說，在某種重要意義上，由于這些“家伙們”熟諳求偶、街頭、酒吧和家庭等方面的分界和優越感，所以他們理解并接受學校和工作中的分工，且在最不利的方面求得短期的歡樂，從而獲得長期的適應。

但是，我們在處理男性氣概這一問題時絕不能過于簡單化，因為男性氣概是多維度的，具有多面性。一方面，男性氣概是一種有些魯莽、倒退的大男子主義，這就帶來了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傷害和攻擊，并造成工人階級內部關系的分裂；另一方面，通過揭示掩藏在表象之下的那些本質，男性氣概表現出了某種進步的本能。在男性氣概的表現的背后，隱藏著對體力勞動的肯定，而且盡管這種肯定只是一種中介，是被扭曲的，但是其背后仍包含了豐富的意義，如勞動力作為商品的獨特性，以及一般抽象勞動聯結和統一各種具體勞動的方式。由于自身持有的各種偏見，男性氣概蔑視所有的資格限定條件，不過它還是對文憑的分工本質，對腦力勞動和技術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主要被用以維持階級關系，而不是選擇最有能力者或提高生產效率，具有某種“洞察力”。

正是透過對男性氣概這一矛盾復合體和性別與勞動分工的奇特整合的理解，我們才得以對早先概述的問題做出初步的解答：為什么在傳統理解、人為界定和意識形態灌輸中，人們毫不期望、最不能使人們產生滿足感的工作（體力勞動）卻被社會中一個重要群體自愿地，甚至是滿懷熱情地承擔起來——至少，對該群體而言，這將是其青年時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永遠的陷阱。

該群體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審視體力勞動的。體力勞動的恥辱變成了積極的表現。從事此類工作，并不是要表達工作的目標或資本主義體系中主導意識形態賦予他們的身份，而是要表達某些情況。這些情況本身在原因論上具有“合理性”；盡管這種合理性是錯位或顛倒的，但與那些直接將體力勞動界定為低人一等的論述理由相比，它倒可能更為合理。

這種合理性不可能是下層社會自主選擇體力勞動的堅實基石。正是在當前反對體力勞動的意識形態潮流中，各種“新階級”才得以在支配地位的經驗關系中群情激昂地向上流動。[［37］](#_37_103)例如，實際上，本研究中的循規者和違規者都屬于工人階級，而且在生產過程中，客觀上處于相似的地位，從事相似的工作。但是，循規者仍然相信，自己與那些“家伙們”相比，擁有更好的工作，屬于完全不同的一類人，特別是有了文憑的武裝之后。這種分工一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起來，無疑會使中產階級的地位得到廣泛的合法化：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中產階級自己的智力和能力使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

###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像勞動和性別分工一樣，種族分工同樣有助于人們形成全面的認識論范疇，建立分工的可能。另外，種族分工也為社會提供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下層階級，這個階級遭受了比白人工人階級更沉重的剝削，因而它間接地、部分地受到來自工人階級自身的剝削（這至少減輕了其自身的被剝削感）。種族分工還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為感受他者之倒退、自我之優越提供了客體（這樣一來，就強化了那些使比較成為可能的主導意識形態話語）。因此，種族歧視從物質和意識形態兩個層面上分化了工人階級。

盡管如此，種族歧視中還有某種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種族歧視為部分白人工人階級，如“家伙們”的勞動力出讓“定調子”，而這種“定調子”的方式帶來了對特定類型的勞動更加細致入微的肯定。此外，種族歧視標示出了男性氣概適用范圍的底限，并指出男性氣概不是對體力的或不體面事物的粗俗維護，而是一種經過謹慎判斷的文化類型。既然從外國移入的族群有可能承擔那些最差的、最艱苦的工作，那么他們也就可能比其他群體更辛苦、更具男性氣概。如果另一個社會群體承襲了男性自信而武斷的衣缽，那么諸如此類的工作就偏離了男性氣概的文化標度，被重新歸為“臟的”、“亂七八糟的”和“非社會的”等類型，這種做法是站不住腳的。

因而，一張復雜的職業圖就形成了，這張職業圖并不是只有一個組織原則。非常輕松的或是腦力的工作被標注上了“娘娘腔”；而最繁重的、最艱苦的工作并不一定是男性化的。由于與移民勞動力聯系在一起，繁重的工作可能掉價為臟的、不被承認的工作。對種族歧視的理解，應更多地著眼于資本主義制度下有關勞動力的復雜的社會定義，而不是從什么純粹的、一成不變的種族敵意出發。

毫無疑問，在種族間的種族關系和社會界定方面也存在著差異。例如，西印度群島裔的男性似乎是從現實的和可歸咎于特定個人原因的生活環境的惡化方面，來保持某種程度的大男子主義（有趣的是，人們會發現，這與其對自身勞動力的判斷之間的關聯是多么遙遠）。不可否認，一些白人工人階級對年輕的西印度群島裔所持的敵對態度似乎是基于性方面的嫉妒。自然，正如同西印度群島裔的工作情況被從充滿男性氣概貶低為骯臟一樣，其性方面與生俱來的勇猛也被貶低為令人作嘔。

對亞洲人來說，似乎也存在著明顯的基本工作文化標度的反向變化。成功的店主、商人和學者被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看作是懦弱膽怯、“娘娘腔”的人，與循規的、女人氣十足的白人一樣被動順從、缺乏進攻性（參看“對同性戀者的無故攻擊”和“毆打移居英國的巴基斯坦人”）。這種惡意的反應，可能可以借助于對此類向上流動（以及獨特的歧視傾向）的洞察來加以解釋，而這種向上流動關乎某種感受，即亞洲人確實應當屬于粗魯的、骯臟的工人階級。人們不清楚該使用哪類歧視，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亞洲人身受兩者之害。

勞動以矛盾的文化形式完成自身的準備工作。如果有關這種矛盾的文化形式的基本論題具有任何有效性的話，那么我們就應該對移民群體中的這類準備工作做出解釋。[［38］](#_38_100)

毫無疑問，就年輕的第二代西印度群島裔而言，其文化反應和文化過程與那些“家伙們”大同小異。他們在某些方面更為進步，并以某種形式將當前的形勢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這些孩子多半在英國長大、接受教育，而且從結構的觀點來看，他們與學校和左鄰右舍的白人同齡人具有許多相同的經歷。我們由此可以想見，這將對他們的非正式文化產生影響，并使他們和那些白人男孩一樣，對學校和勞動力市場的本質擁有某些直接的“洞見”。但是，他們同樣也從西印度群島人那里繼承了一種無工資和貧窮的文化。對他們而言，似乎存在著一種在毫無工資或任何官方、明顯援助的情況下生存的可能。因此，這就為年輕的第二代西印度群島裔準確洞察他們的未來的本質提供了可能——他們的未來得以向前推進，并非由于對某種工作的肯定，而是由于對所有工作的拒絕。

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化和源于自身邏輯的那些行動毫無神秘感，或是最終不會被歪曲，不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變得不完全。但是，如果他們由于拒絕工作而過早地關閉了流動的通路，而且這種拒絕沒有經過對社會現實環境和各種可能進行徹底的分析和政治聯系，那么他們就突顯了白人的應對方式的不全面性，而這種應對混合了洞察、理性、歪曲和最終接受。

隨著結構性失業逐漸成為社會的長期特征，且一部分白人青年被迫陷入長期失業，一種無工資的白人文化可能就此形成（盡管比對的是當前出現的朋克搖滾文化現象，但很有可能是借用了西印度群島裔的文化類型）。必需品可能被轉變為一種虛幻之物，而且通過文化上的調和，不工作成為了一種更為普遍的、“自由”的選擇。有關下層階級的文化再生產問題，如從事體勞動的工人階級的再生產問題一樣意義豐富。但是，我們在此無法深入探討了。

##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文至此，我們已對某些文化洞察進行了探討，并向讀者展示了這些“家伙們”是如何通過內在的“局限”，最終對體力勞動做出了令人驚訝的肯定。

無疑，這已使我們身陷對外部力量、國家制度和主導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子弟所產生的影響強調不夠的風險。雖然人們不可能在一次研究中全面地刻畫出外部決定因素和結構在文化層面上的復雜性，但是還是有可能推斷出文化與意識形態相互影響的某種重要形式。從根本上說就是意識形態作用于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于文化。意識形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生產的影響，同時它又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形式與功效。

我們已經在民族志部分看到，諸多形式的傳統主導意識形態——特別是通過學校調和的——被肢解，被轉化，或是完全被反學校文化擊敗。已經考查過的那些至關重要的分工、扭曲和轉變通常并不是來自于社會統治群體向下傳遞的思想和價值觀，而是來自于內部的文化關系。本書在此要對工人階級對體力勞動的文化肯定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物質論的角度來講，這都極為重要。而且，這種文化肯定有可能向上傳遞給一個對此極不理解的官方意識形態機構。所有分工、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以及借助于體力勞動力所完成的表達，都更強烈地出現在民間團體，而不是任何國家機構之中。事實上，自由民主與這類事物針鋒相對，其代理將之視為需要鏟除的邪惡之物，而不是自身生存的條件。無疑，這既沒有阻止向上輸出的那些意識形態因素被國家所利用，也沒有阻止國家以矛盾的、非預期的方式再生產這些觀念。更確切地說，在“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秩序統治之下，不同機構中的國家代理人所懷有的美好信念，可能就是這些意識形態得以再生產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但是，我們不能完全顛倒意識形態傳遞的典型方向，也不能就此推斷，主導意識形態、國家機構和制度除了為分工、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發揮作用提供有利環境之外，在文化過程中沒有發揮任何積極作用。

我在討論被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概念時，特別關注這些更直接的、更“占支配地位”的結果。此類結果對進一步限制文化洞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時代的“統治思想”，即那些包含在具體制度和更為非正式的媒體（如電視、電臺、出版物和電影）中的“統治思想”。這兩種統治思想可以在一個共同領域里被整合起來，例如學校。兩者，特別是后者，均受到來自于階級文化過程的意義（與有差別的扭曲不同）和范疇的影響，并對它們加以利用。

基于我們的研究論題可知，在意識形態對反學校文化施加的縱向影響中，最重要的兩種就是證實和擾亂。一方面，它們（以某種循環的方式）對文化（生產）過程的某些方面和決定加以證實，而文化（生產）過程則對當前的社會利益集團和生產十分偏袒；另一方面，它們（通過為局部系統注入新事物）使那些仍然對該系統保有某種程度的批判式洞察的文化生產過程陷入混亂。雖然這兩種影響方式并不是對勞動力在主觀上和文化上的準備過程進行直接干預，但是它們參與、影響并強調現實的經驗過程。這里并沒有詭計多端、不擇手段的意圖，意識形態的各種要素只有在與工人階級文化過程的現實運動結合為一體的時候，才會被人接受。關于這一點，如我們所知，人們很難僅通過上面的論述就徹底理解。盡管意識形態的意義和邏輯可能存在于文化過程之外，但是對于特定文化形式的外在特征和內在邏輯，人們只能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接受，特別是當意識形態的意義和邏輯與在文化過程內部產生的意義形成對比的時候。

### 證實

職業指導和建議是“家伙們”在為工作做準備期間被施加的最明顯的意識形態力量。我們之前已經注意到，職業建議和工作所包含的指導性觀念遭到了無情的拒絕，并被重新加以解釋。盡管如此，一些我們可以稱之為暗示性信息的觀點確實仍然得以傳播，特別是在強化文化中業已形成的有關社會分工、性別歧視，以及從事某類工作的必然性的自然主義方面。職業指導與建議通常并不意在傳播這種信息，而意在關注此類事情：工作生活的總體環境；對工序和機器的癡迷；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分工；工業組織明顯的無時間性和必然性；未來工作領域中原子化的競爭本質；產業勞動的艱辛和必然性。這并不意味著職業指導和建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理性職業選擇的一般模型，或是作為一般模型的一部分被接受。相反，理性的職業選擇來源于大量影片所曝光的工人階級大眾的工作形象；來源于備選工作那令人不知所措的多樣性；來源于攝影師不由自主、憑直覺所捕捉的運轉著的機器的影像；來源于白領指揮藍領時那絕對的權威。

或許此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職業影片中的兩性的角色差異。在這些電影中并不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而且性別角色的定型化也從不是此類電影評論的主題。要說有什么的話，那就是明確強調兩性應更趨平等。但事實上，電影中的視覺形象和隱含假設仍保有性別上的分工，并被具有性別歧視傾向的“家伙們”習得。

在一家蛋糕廠里我們只看到女孩子們在工作。當我們觀看一個姑娘給蛋糕裹糖衣的時候，畫外音響起，“沒錯，她干得實在是麻利，這可不是快放鏡頭”。女性總是做那些精巧細致的活兒，她們與更崇高的職業之間的唯一關聯就是為自己的男人擔驚受怕。在一部有關拖網捕魚的電影中，人們看到一位年輕的水手告別自己焦慮不安的母親，而母親站在家門口的臺階上不停地揮著手。他的身影消失后，母親返回屋中，開始憂心忡忡地等待兒子歸來。與這種感情形成明顯反差的是，拖網漁船上的那個男船長被刻畫成了一個淡定、強壯、“不輕易流露感情的”人物。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捕魚量上，而不是在關懷新船員上。

在另一部關于耕作的電影中，生活的艱辛和殘酷一覽無余，但是這兩者都不是只有在男性主題面前才能被提及的尊嚴和才干。此時，畫外音提示我們，“開拖拉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盡管電影中湯姆覺得很容易，因為“他在戰爭中開過大型推土機”。我們只能認為結束語中的這段話是講給男性觀眾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是對那些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來說，生活充滿樂趣”。

意識形態最重要的一般性功能之一，就是將各種不確定的、脆弱的文化分析和結果變成一種普遍的自然主義。意識形態向人們提供了眾多范例以確定這一功能。來自于下層社會的最乏挑戰性、卻最富神秘感的文化生產已經成形、具體化，并得到支持以形成一種真實而生動的共同特性。這種共同特性使所有階級達成某種共識，而這個共識又構成了社會地位再生產的基礎和展示民主的舞臺。事實上，這種共識可能是與某些官方意識形態準則相悖的。這仍然是為穩定付出的微小代價，是一種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做出讓步的形式，這種讓步足以和下層社會向勞動和社會民主要求所做出的明顯讓步相匹敵。對于工人階級而言，這通常標志著與一種絕對主義、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決裂的同時，又回歸到另一種更深刻的絕對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即自然的法則和常識的規則。

對于這些“家伙們”而言，常識的支配力時時刻刻包圍著他們。常識部分是自我創造的結果，部分是證實性的意識形態信息向下傳遞的結果。對于“家伙們”周圍的人而言，常識是行動的明確根據。常識向人們提供了自然化的社會分工和普遍存在的性別上的沙文主義。或許最為重要的是，常識以一種對勞動力已然被扭曲的意義進行證實式曲解的方式，向人們提供一種無法抵抗的感覺：人情世道即工作之道。工作之道是直接而具體的。甚至在這些“家伙們”離經叛道的行為中，也時常出現對“道”的提醒。當他們手拿一塊偷來的蛋糕跑出店鋪時，店主在他們身后大喊，“我花了4先令做那塊蛋糕”；當他們在學校里弄壞一把椅子時，他們被告知，“你父親曾為那把椅子出過力”；在家里，家人以無數種方式告訴他們，向他們證明，“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沒飯吃”。

當世界上的工作必須有人來完成時，就會出現很多種組織常識的方式。被隱藏的文化洞察，而不是對于工作必然性的斷言更多地告訴這些“家伙們”真實的社會組織。常識是“家伙們”那最為偏頗、最受限制的文化“洞察力”的具體化。它阻止“家伙們”去探索更平等、更合理的生產組織。[［39］](#_39_96)

當反學校文化的含義中包含潛在激進因素的時候，在避免“敘述如下”的專斷的同時，對蘊含在反學校文化中的有序、連續時間的顛覆，通過完全自然化，被轉換成了一種慣性和優勢。時間或許不是被建構起來的工業主義的產物，也不是革命性選擇的產物。中產階級的時間并不是（以一種實踐的文化形式）與相對主義和可能性，而是與一成不變的自然及其惰性趨勢構成對照的。與中產階級時間觀念的決裂，使人們趨于一種更為絕對的時間觀念。對于中產階級時間的“部分洞察”，連同其他各種“洞見”，成為從文化和相對武斷到“自然”的轉變，而不是以其他新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對歷史的否定，而不是對歷史的承認，無論決裂后的前景如何。

### 擾亂

正如通過學校和職業工作所表現的那樣，意識形態的主要擾亂傾向之一具有獨特的非預期性。

如我們所知，主導形式的職業指導和“謀生教育”強調的是就業機會和被指導者全方位（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滿足人類抱負、期望的能力之間的現實分化。由于受到反學校文化的影響，這種直接推動力發生了大規模偏離，其錯誤邏輯也被反學校文化所洞察。對于本研究所關注的“家伙們”而言，所有的工作從根本上說都是相同的。然而，意識形態的推動力非常強大，并促使文化洞察陷入混亂。

由于支持分化的意識形態力量是如此強大，且無法說服其對象，因而推動力的影響發生了逆轉，產生了向心作用——不是使工作多樣化，而是使人們漠視導致工作千篇一律的真正原因。工作之所以缺乏多樣性，并不是由一個簡單的原因（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導致的。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電影、演說家的輪番說教，以及員工們在“選擇”過程中所感到的持續不斷的壓力，這些都沒有表現出世界上工作的多樣性，而是超越多樣的領域和如此多樣化的決定因素與原因，表現出了工作那令人驚訝的千篇一律。

因此，工作如此無聊、令人厭倦，且通常毫無意義，并非一人之錯。我們無法為此責備任何人，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動。每個人遭受的懲罰各不相同。但是，在完全不同的領域中，如耕作、牛奶遞送、工廠工作等，都有工頭在嚴密地監視工人，而工人們完成乏味的工作就是為獲得那令人著迷的棕色信封——這些似乎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這助長了先前所談及的自然主義，同時又被自然主義所強化。與其說以壓迫為中心的世界來自于以具體、確定的思想、生產和利益為核心的社會組織，不如說我們擁有一個包含了成千個不受時間影響的理由的自然主義世界。多元決定論帶來了苦難，這正是人類的處境。人們可以與單獨一個敵手搏斗，但絕不可能與從人類所處的環境中生發出來的一百萬個小敵人交戰。

非正式群體抑制了文化洞察，并促使其成員逐漸偏離該洞察。有時候，這種更為直接的擾亂是在職業工作中通過明確強調個人主義的方式實現的。在漢默鎮學校，來自未來的威脅和工作中的競爭使群體團結產生分化，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職業指導老師對五年級學生　我以前告訴過你們，我通常并不提倡自私，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贊成。忘掉現在坐在你周圍的朋友吧，也許你現在正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一起說說笑笑，沒關系。但是，當你們找到工作的時候，世界上所有的朋友就都沒用了。當你自食其力的時候，你就要完全靠自己完成工作，沒有人能幫上忙（……）所以，此時此刻，你就得自私。不要為你的朋友在做什么而困擾，現在就出去，照顧好自己，找到屬于自己的工作，不必等你的同伴。

當然，在特定情況下，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特別是對個人而言——很坦率，且充滿關心。然而，到最后一年年底，半數的五年級畢業生沒找到工作，這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極其可怕的前景：學生們還得做出實用主義的個人決定。現在的就業形勢較之以往更加嚴酷了。然而，事實仍然證明，意識形態總是宣揚自身的必要性，并且利用時間的短暫性排斥了其他的前景和可能。

與就業官員對話可能會強化某種力量，從而瓦解群體及其觀念，或者更確切地說，會阻止群體出現。這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那些“家伙們”，其個人主義的邏輯，有時是精英主義的邏輯，會在社會中播下異議的種子——盡管會抵消文化的作用——并最終發育成各種形式的個人主義和界線。

當然，臨近最后一年年底，當工作遙遙在望的時候，由主導意識形態所激發的個人主義分化，借助于文化上的自相矛盾，已然變得根深蒂固了：

［一次小組討論］

法茲　我去［參加求職面試］了。是這樣的……她極力向我推薦，“你想做鋪路工吧”，她說（……）“你想去修理打字機吧”，我根本就沒提到過打字機［大笑］。她說，“好吧！我會盡力為你找到一些合適的工作，到時候我會通知你的”。

喬伊　她知道你能干什么。她不可能每周平白無故賺三十英磅。她應該知道你的強項是什么。或許還知道你能做什么（……）

法茲　她確實知道，而且想辦法讓你得不到那份合適的工作。

弗雷德　你想做什么，而且說你決心已定，她就偏不讓你做什么。是呀！我機械在行，她就不讓我做機械工作。（……）她說，“你做不了這項工作，因為你得有物理知識”，就是這么回事。

喬伊　哎，就是如此。這就是她懂的東西。她明白，反正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工作。

斯派克　因為如果你找那樣的工作，那你心里肯定有數，你必須會什么。她會告訴你，你得具備物理知識。那么……這純粹是浪費時間，除非你還想學習（……）

威爾　她說的是對的。咱不說浪費時間，就說這一年，你接受了培訓，然后他們還是把你開除了。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對那東西不在行的話。

這些就是職業動力對形成于文化層面的洞察所產生的主要擾亂作用。自然主義充滿并肯定了內在軟弱性，而這種內在軟弱性與意識形態活動聯手作用于文化激進主義，從而廣泛造就了工人階級的固定特征。盡管不平等總是四處可見，剝削被人們承認，不公正和矛盾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飯，但這些事物沒有一樣指向相同的方向。他們不具有共因。如果一些人剝削別人，而一些人受剝削，如果一些人是平等的，而一些人并不平等，那么這一切并不與階級組織化相伴而生。所有人都有機會剝削他人，也都有可能被他人剝削，任何制度都不能，也不希望改變這一切。在任何賭博游戲中，機遇、命運和運氣基本上在洗牌的時候就分配好了。對統治制度和剝削的清醒認識，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文化調和（盡管是扭曲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對洞察的實踐，是可以與平靜地接受這個制度、相信人生中并不存在對個人機遇的制度性壓制并存的。壓制確實存在，但它只不過是人類處境中隨機的一部分。并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人類的本性，才是真正的陷阱。意識形態則協助這一切產生——盡管它不僅僅來自于其自身的資源，但因為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自己創造的，所以人們相信它。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約翰［在一家生產汽車配件的小工廠中工作］　總是有更多的東西等著［加工］，不過，我的意思是，甚至我想說，我每月掙十二英鎊，而我一天能給他們掙一千英鎊。我的意思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金錢。

PW　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約翰　我覺得，任何地方的管理層都是養尊處優的……你看哪兒都是如此（……）

PW　不過，你還是認為事情總的來說還是公平的。

約翰　大體上是公平的，但我的意思很明顯，總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管理層。可我覺得人人都有錯，人們都太貪婪了。這就是問題所在。我是說，即使是那些最窮的人，如果他們掙了一百萬英鎊，他們也會開始……他們還是會想掙更多的錢。雖然他們曾親身經歷，知道許多人吃不飽、穿不暖，但是他們也不會把錢施舍給那些窮人。所有人都一樣，本性都是貪婪的。不過，我想社會還是比較公平的。

［工作中的一次個人訪談］

PW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曾經覺得（……）你應該掙得像（……）主管的工資或紅利那么多？

比爾（一家木材機械廠的實習機械工）　如果每人都這么想，就能實現了。不管怎樣，我也這樣想。但是，對此你也無能為力。并不是這一家工廠，在任何一家工廠工作，情況都是如此（……）我曾經希望，我能夠在那里升職，可是他們不想著我，你知道的……

### 內部對話者

本書所簡述的“意識形態”對于身份地位的重要作用，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直接干預（此處只做部分探討）、制度支持或政治背景，盡管這些作用是重要的，正如意識形態與文化過程相互影響、作用的所有方式。在當代工人階級文化中，意識形態可以被視為一種非正式補充。

各種文化形式的根本弱點就在于個人經驗和可靠性的調和折中性，特別是當文化形式與文化洞察重疊并受其影響的時候。雖然文化洞察是文化相關性和生命力的終極基礎，但是它們從未被明確地表達出來。文化洞察不是斗爭的直接資源，在我們分析的過程中，它們與直接的政治聲明只有一點相似之處，即文化洞察替代不了政策或意識分析層面。在更廣泛的社會情境下，非正式文化過程的具體性、密集度、隱含的激進主義、關聯性，及其有關個體主張的實質，恰恰是其最大的弱點。作為這個社會中的一種反抗形式，非正式文化的本質就在于，它作為規則的例外而自我保留下來。非正式文化對所有可能推翻規則的其他例外都毫不知曉。它沒有意識到自身“規則”的存在。對實際上直接指導其獨特文化反應的世界的分析一片沉默，而意識形態自信地跨入這片沉默之地。無論對錯與否，無論是否被洞察，它就是那規則，它就有那話語權。對于文化形式的弱點而言，意識形態成為了一個內部對話者。不論內容如何，各種強大的意識形態總是具備正式性、公眾性和明確聲明的天賦。它們可以在輿論和共識之中發揮作用，因為在對立的文化過程中，任何事物都無法取代它們的作用和效力。

在“家伙們”和反學校文化的個案中，在那些拒絕制度和傳統道德的叛逆者與反對觀點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感到驚奇的張力和矛盾。這種矛盾并非總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正是這一隱一現強化了對文化洞察的抑制——就像文化洞察受到局限一樣，促使文化洞察進一步陷入混亂，并使它們的各種意涵投射于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當然，每個“家伙”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懷著不同的感情壓力，以不同的解決方法應對某種矛盾。正是文化本身，才能展現出那令人驚訝而持久的含糊不清。違規、拒絕和工具主義的邏輯無疑引發了許多行動、選擇和行為。但是，這種邏輯通常容易被人們視為相對于更大社會道德，即所有人都遵行的邏輯的例外。個人經驗的力量——知曉事物的真正本質——或許能為了每日之生活，逾越這種一般邏輯。但是，個人經驗絕不可能擊敗一般邏輯。雖然文化對個體說，“這對于我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它也可能補充說，“盡管一般說來它可能是錯誤的”。非正式文化對現實行動構成指導，并使之合法化，但是非正式文化最終還是被涵蓋在正式文化這個更廣泛的框架之中。甚至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正式文化被明確拒絕之處，非正式文化的歸類能力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反對和替代性解釋被無休止地納入到規則的例外之中。

［臨近最后一年年底，學校的一次小組討論］

斯潘克斯　是那些“軟耳朵”構成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們。

法茲　絕大多數人就像那些“軟耳朵”，難道不是這樣嗎？他們使這個世界正常運轉。如果把這個世界交給我們（……）一切都會變得亂七八糟的，我們可沒法應付。

PW　（……），你想讓事情變成那樣嗎？

法茲　不，你只要想想就明白了，你沒能耐擁有什么，一些人已經將所有東西都據為己有了。

斯派克　你這是在中傷自己。

法茲　沒有。

喬伊　就是。你說過，如果這個世界交給你，一切都會亂七八糟。

法茲　是這樣。

喬伊　但是，你不會讓一切都變得亂七八糟的。很顯然，真到那時候，你會阻止它發生的。

PW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想當一名聽話的學生？

喬伊　我不想做什么聽話的學生，我就想成為我現在的樣子。

（……）

喬伊　你說你不想聽［老師的話］，但是有時候你就得聽。如果你穿過過道時，地板上他媽的有一個大洞，你可能因此摔倒，還把脖子扭了。你就不聽話，走過去了，摔倒了，那你是自找倒霉。

斯潘克斯　［激動地］我不會那樣做的，難道我會那樣做嗎？

喬伊　為什么不會？你說了，你不想聽話（……）

PW　既然你這么說（……）說明你夠聰明，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你為什么還不聰明地聽老師的話，按照老師說的［好好上課呢］？

喬伊　我可沒說我聰明。我是說，我們當中沒有人聰明到那個程度。

PW　但是，你已經聰明地指出這一點來了（……）那為什么不那樣做呢？

喬伊　因為其他人沒那么做。如果我不玩耍，不喝酒了，他們就不帶我玩了，那么我就不會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了。我現在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我不能離開他們。

威爾　老師們想讓我們變成“書呆子”。這就是我們沖突的地方。他們教我們這些東西，可是我們并不想成為“書呆子”。所以，我們覺得，呃……如果我們變成了“書呆子”那樣，我們就不喜歡自己了。所以，我們不能變成“書呆子”，就想像現在這樣子。

這些“家伙們”的文化最缺乏抱負——支持這一觀點的對立規范與主導意識形態針鋒相對。在這種內部對話者面前，對抗性的內心活動只是變成了一種回答。此處，核心的問題并不是要說明“家伙們”對待暴力的態度是對還是錯——就其殘忍性而言，暴力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性個人主義的反映，而是要從內部證明其自身的合理性。雖然各種文化形式和經過調和的具體行動的“合理性”對主導意識形態進行滲透、顛覆，并使之逆轉，但是主導意識形態仍在質疑將政治封閉于文化之外的真正形式。

［一次小組討論］

斯潘克斯　盡管每個人都會贏得勝利，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獲勝，他獨自一個人被打了一頓，為什么他沒叫上其他人一起呢？

喬伊　打架又怎么樣？就是你把那個小胖子一把拎起來，一頓猛打。他可能家里有十個孩子，但沒有妻子照顧他們。

彼特　是，這么做不對，難道不是嗎？

比爾　你沒時間考慮，因為當你站在那兒考慮的時候，他就可能已經把你殺死了！

（……）

喬伊　如果他不夠勇敢，沒有保護好自己，或者如果他不是……

斯潘克斯　或者如果我在人數上勝過他，四對一……

喬伊　或者，如果他跑得不夠快……

德瑞克　哎！羅伯茨怎么樣了？［一個聽話的學生］，他長大以后，有沒有再找他的茬？

喬伊　那是他的錯，誰讓他長得不夠強壯，那是他的錯。

德瑞克　那不是他的錯，那可能是他爸媽……

喬伊　那只能怪他自己……

比爾　我們的爸媽，我和你打賭，我們的爸媽……

喬伊　［激動地］好了，好了，那么……就是他爸媽的錯，把他養得像個同性戀。

德瑞克　“就是他爸媽的錯！”可你剛才還說那是他的錯呢。

喬伊　如果是他們的爸媽把他們養得像同性戀，那就是他們的錯了。總得有人承擔過錯，錯誤也總是可以追溯到某個人的……因為不管我多大歲數，我總是想看到一些十五歲的年輕人襲擊我（……）

PW　（……）難道你真的那么認為，或者怎么就讓你覺得那是對的？

喬伊　事實證明那就是正確的！

PW　（……）肯定有什么理由使你覺得那是正確的，為什么會那樣？

喬伊　我不知道為什么，你總是想證明它。如果你像……那樣做，就會顯得有點傻。我沒法解釋，你就想證明那是合理的，想讓它看上去是對的，總有這樣做的理由的（……）理由是對我自己說的，不是對警察說的。對警察我就會說，“我當時不想那樣做”，然后開始哭喊，這都是胡扯，你只是想讓自己得到開脫……你知道，我總得有一些理由證明它為什么合理吧。我總覺得，在這段或下段生活中，你總得對你的生活，對你所做的事情有個解釋吧。

PW　可是，如果你不相信這種說法，那它還有用嗎？

喬伊　還是有一點用的。有些情況，比如你確實能夠證明它是合理的，你也就心安理得了。而對其他人（……）你就得想辦法證明那樣是對的，是合理的，至少在表面上證明它有理。深究的話，可能就站不住腳了。你心里明白，那是錯的。只是當有人議論這件事的時候，你會說，“啊，有些道理，我不覺得這有什么殘酷的”。

正如在主觀層面上規定和理解的那樣，在這個地方，文化和社會組織的傳統原則之一，就是“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原則。[［40］](#_40_94)“他們”是在“我們”中得以存續，這一點通常被人們忽略。這種內在劃分并不會令人感到驚奇。在一個確實存在階級分工的和平民主社會中，“他們”和“我們”絕不是界限分明的。這兩者之間的基本區別，無論是在最廣泛的社會單元層面，還是在單獨的個體層面，都必須被熟練掌握、調和、附和。甚至是最為“我們”的群體或個人，也會有一些“他們”的成分在其中。正是這一點使得“我們”徹底出賣了自己。意識形態就是嵌在“我們”之中的“他們”。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與政治實踐無關的非正式文化和個人合法性的力量使然，文化斗爭的力量使然。一旦出現，它就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洞察，并使之陷入混亂。它阻止“我們”變成一個集體、堅定而自信的“我們”。意識形態成為虛假的“我們”、虛幻的團結——人們各自保全自身，并以其他人的名義屈服于最高統治權。如果說國家意志是一間布滿鏡子的大廳，那么這間大廳就需要每一面小鏡子。這里，我們只是對其中一面鏡子的結構和關聯做了考察。

##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注解

我們在前文中所考察的，雖然僅僅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諸多具體形式之一，以及使它得以應用于生產過程的各種態度，但是本研究在某些方面仍有廣泛的指導作用，例如發展一種有關文化形式、文化形式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的更普遍的理論，或是更加準確地界定文化形式在資本主義模式中，對于保持持續的物質生產所發揮的作用。

首先，該研究提醒我們要對文化層面上過于簡化或粗略的唯物主義觀念保持警醒。[［41］](#_41_94)例如，在任何直接意義上，工業的勞動力需求都決定著勞動力的主觀和文化結構，這種觀點就是錯誤的。[［42］](#_42_88)諸如學校之類的特定機構生產著，或者如果運行得更好的話能夠生產出無階級、標準化的勞動力，這種說法也不正確。在對某類工人的強烈渴望中，生產過程必然延伸到半自主的文化層面，而這個半自主的文化層面只是部分地、在特定條件下由生產決定。所謂特定條件，包括意識、集體聯合的創造力、理性、局限性、非預期性和分工。對于體力勞動的形成而言，其獨特的貢獻就在于對體力勞動所做的某種肯定，對一系列分工（主要是腦／體分工和男／女分工）的洞察和轉換。[［43］](#_43_88)

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我們不能假定，文化形式作為一種自主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宏觀因素，諸如階級地位、區域和教育背景等決定的。毫無疑問，這些變量非常重要，不能被忽略。但是，它們又是如何作用于行為、語言和態度的呢？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結構是如何在其自身層面上，在文化背景下，成為了意義的來源、行為的決定因素。結構和經濟決定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著人們必須遵循這些因素。在一些社會中，人們被迫在機器噴槍一端以某種方式工作著；但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這項工作顯然是在很自由的環境下完成的。為了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在人類和文化的調節性領域中，結構性決定因素的符號權力是什么。正是來自于該層面的力量使得人們做出的決定帶來了非強迫性結果，而這些結果具有維護社會結構和現狀的功能。盡管這種說法簡化了我們的意圖，而且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形式和力量，諸如國家、意識形態和各種制度，但是我們可以認為，宏觀決定因素需要通過文化環境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自我的再生產。

以無文憑工人階級的就業選擇為例，我們可以透過階級背景、地理位置、地方的就業機會結構和教育機會來準確地預測其最終的就業狀況。[［44］](#_44_86)毫無疑問，較之于個人在職業指導咨詢時所表達的意愿，這些因素能為我們提供更好的建議。但是，這些變量又是如何決定人們的就業選擇呢？人們做出決定的形式是什么，欣然接受有限機會的依據是什么，關于這些問題，我們仍未做出解釋。事實上，引證大量因素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釋上述問題。因為廣泛引證無助于確定一串或一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是可以從眾多可能性中指明特定結果的。這種方法只能進一步勾畫出有待我們做出解釋的情況，即年輕人在他們所熟悉且又生活于其間的世界中，為什么、又是怎樣以他們自己看來似乎很理性的方式接受那些有限的、通常又毫無意義的工作。為了正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本書已研究過的文化環境做進一步探討，必須將文化過程看作是具有某種自主性的過程。這會使所有機械的因果關系、觀念失去解釋效力，也會賦予社會行動者某種眼界，使他們可以以一種充滿人性，而不是理論簡化的方式，來審視、呈現和建構他們自己的世界。滿足于體力勞動，不是一種由于受到錯誤文化的影響、愚蠢而又完全不合邏輯的經歷；也不是打著意識形態的深深烙印、過時已久的無知經歷。它有凡俗平庸的一面，也有不同于他者的意涵。正是基于內在可信性和自我創造性，它才能被人們體驗。人們對體力勞動的主觀感受就是一種深入探知的過程：它是自身與未來相聯系的有機體。

如果我們繼而需要對文化的獨特層面加以探討的話，那么我們應當如何詳細說明其范圍及本質呢？在我看來，使用機械的或結構的術語來說明，是一種帶有誤導性的做法。文化并不是靜態的，也不是由一系列可以在任何社會的相同層面上記錄下來的永恒不變的范疇所組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和各種文化形式的精髓就在于它們對各類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所做出的貢獻，而這種社會再生產多是創造性的、不確定的和富于張力的。特別是文化再生產，總是包含著生產替代結果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它確實在現實中發揮作用。文化形式輔助再生產的主要關系，就是該文化形式的成員與社會基本階級群體、生產過程之間的關系。雖然具體情況會大為不同，但是我并非意在暗示，主要階級文化在該正式層面上具有概念上的異質性。

在這一詳細論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簡要勾勒出社會文化層面的三個具體特征，從而幫助我們實現論述的主要目標。首先，文化的基本素材由各種符號系統和思想體系所組成。從語言到系統化的身體互動；從獨特的態度、回答、行動、儀式化的行為到表現性的藝術品和具體物品，這些都是文化的基本素材。這些形式之間可能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例如行動可能與言語相抵觸，或者嵌在文化實踐和儀式中的邏輯可能與直覺意識層面所表達的獨特意義截然不同。如果對某一文化的闡述必須要詳盡，那么正是這些壓力和張力為“底層”民族志（以底層群體為研究對象）所需的、更加趨向描述性的分析提供了研究主題。

其次，我認為，諸如此類事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現實的文化生產所造就，而這種文化生產是完全可以和物質生產相提并論的。事實上，在諸如新的服裝潮流產生、物質環境變遷等領域，生產就是指物質生產。這種生產的基礎和原動力，就是非正式社會群體及其特有的集體力量。我的意思是，這些力量是以兩種相互關聯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形式是直接的，試圖對文化成員所處的社會位置（通常與語言存在一種對立關系）進一步做有意義的闡釋和再現，并嘗試各種可能，從而從中獲得某種激勵和轉變。另一種形式就是在第一個過程中所做的世俗的調查研究，以及對世界及其基本組織范疇無意識地進行的啟示性探索。對于文化世界以及其中（第一個）的各種可能性所做的象征性建構，包括了對各種材料的應用——特別是材料中新奇的、只是被部分利用或是尚未被意識形態整合于其中的部分。這些材料可能帶來某些現實的、不可預測的結果。人類出于自身目的，運用能動性對材料施加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上述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材料的本質和世界的結構。相對而言，第一種形式帶有目的性，盡管它并非以個體為基礎。第二種形式則可能大大偏離了特定文化的核心，而且不包含任何目的論，盡管它深深地影響著文化的直接活動，并為特定個體提供長期關聯和回應的基礎。

最后，我認為，文化形式為主體性的建構和認同的形成提供了素材和直接情境。文化形式對于個體及個體之未來，特別是對于表現個體的生命力，作出了十分可信而極富價值的判斷和注解。這好像是在“標記”、“厘清”某些事物。我尤其認為，個體身份認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文化習得的那些觀念意識和主觀歸屬；相反，文化形式本身得以形成、維持和系統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上該文化形式的成員對勞動力的獨特判斷，以及集體模式的有效性。

這些只是文化層面上可見的主要形式、功能和獨特實踐活動中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只有考慮到促使社會群體與其自身、與其他階層、與生產過程發生重要關聯的方式，才能理解文化形式的根本特性和自我的再生產。我們可以認為這個再生產的過程包括兩個關鍵環節。首先，外部結構和基本階級關系，在具體的文化層面上被理解為象征性的、概念化的關系。我認為，這種形式就是對維護該文化的社會群體的生存條件所進行的文化（即不以個體或意識實踐為中心的）洞察。結構性決定因素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并不是通過直接的、無意識的影響實現，而是借助于文化層面的干預，正是在文化層面上，結構性決定因素特有的關系成為了各種形式的解釋所指向的主題。在這一過程的第二個關鍵環節中早已成為意義、定義、認同之來源的結構，為我們在自由民主的生活中“自由”地作出決定和選擇提供了框架和基礎，而這些決定和選擇是系統化的，總體規模巨大，且有助于社會主要結構和功能的再生產。這就是說，工廠每到周一上午就會工人成群，這些工人向我們展示著體力和腦力之間那必不可少的、明顯的等級差異，并在廣泛的范圍內保持著與維持階級和生產的現有結構相匹配的態度。我將這些過程稱為局限，局限與第一個環節中的洞察相互作用，產生了一個文化場域，人們在這個場域中作出人生之抉擇，從而或是再生產，或是接受，或是推翻現存的結構。哪里有洞察傾向于揭露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決定關系，建構社會群體所關注的變革性集體行動的可能基礎，哪里就有局限去瓦解和扭曲這些傾向，并使之得到完全不同的結局。這些局限在文化層面上是具體的，可以防止對文化形式做任何本質主義的解讀，不能產生于生產過程本身，并且包涵了文化過程在功能上固有的弱點、相對獨立的意義體系的作用，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以及強大的外部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我們已經探討的個案中，對當代資本主義特性的文化洞察變成了一種對勞動力的男性氣概的默認贊許。文化洞察險些導致反抗，又差點在接受可獲得的工作任務和神秘地利用工作任務——為了某種文化優勢和共鳴，尤其與性別歧視和男性的表現欲有關——之間建構出政治性的替代選擇。我們不可低估洞察力和理性的力量。因為在那種工作環境中，人們只傾注了最少量的興趣，在最低限度上參與其中。至少在官方意識形態方面，在面對日常生活中截然相反的所見所聞和經歷的時候，將對于從屬地位的自我否認作為平等，是被否定的。

那么，此處的論點是，文化的諸多形式不能被簡化，也不能僅僅被視為是基本結構性因素的附帶表現。它們不是結構和文化中偶然的或開放的決定變量，而是必不可少的循環中的一部分，在這個循環中，不能對任何一個術語加以單獨思考。唯有通過文化層面，社會的真實結構關系才能被轉換為概念化的關系，并再次折回原地。文化就是再生產那必不可少的辯證法中的一部分。[［45］](#_45_86)

這種有關各種文化形式與再生產的看法，既是悲觀的，又是樂觀的。悲觀體現在它揭示了具有諷刺意味的局面，即正是借助于富有創造力的洞察，文化踐行著受到自己指責的行為，例如一大批工人階級子弟一邊譴責、抱怨著，一邊邁向了從事體力勞動的未來。而樂觀則體現在它向人們指出不存在結果的必然性。從屬和失敗并非無法解答。如果存在文化形式對世界作出真實洞察的時刻，那么無論隨之而來的是怎樣的扭曲，在這個基礎之上，總會存在強化鞏固和發揮作用的可能。如果在保守的結果中存在著某種激進的起源，那么其中至少存在某種對抗的能力。我們具備激進的邏輯可能性。結構主義的再生產理論[［46］](#_46_84)指出了主導意識形態（文化也被劃歸其中）是無法被洞察的。一切配合得太過巧妙。意識形態總是先在于所有批評，并先發制人。臺球在平穩滑動的過程中是不會發出啪啪的撞擊聲的。所有具體的矛盾和沖突，在意識形態的一般性再生產功能中消除了。但是，本研究所證明的結論恰恰相反，我更樂觀地認為，在社會再生產和文化再生產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裂痕和巨大的張力。社會行動者不是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而是積極的占有者——通過斗爭、爭論，對結構進行部分洞察，實現對現存結構的再生產。[［47］](#_47_82)除去特定社會的結構性特征不談，正是這種競爭性的解決方式有助于賦予社會獨特性。例如，正是勞動力準備的特定形式為社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不要對文化形式和再生產持有過于封閉或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樣的告誡也是為了承認某種必然的不確定性。人們往往假定，資本主義意味著對從屬階級完全有效的支配。事實遠非如此，現代自由民主形式下的資本主義，也意味著長期的斗爭。工人階級文化中的調節性也是反抗之所在，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制度永遠面臨危機。資本主義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王朝，其穩定性的高低，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甘愿冒不穩定之風險，即懷著收獲最少的統治共識的希望，賦予非預期循環以相對自由。因而，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不確定性，以及因矛盾逐漸升級而不斷變動的平衡。與其他任何制度相比，那充滿競爭的文化再生產對于資本主義制度而言更加重要，只不過生存之道也是更迭之道。

資本主義的自由是一種潛在的真實自由。資本主義將自由看作是再生產的本質所在，并將自由作為自我譴責的工具。沒有下層群體的幫助，統治階級就無法保障這些自由。如果這些自由此刻并未被充分用于它們顛覆性的、對立的或獨立的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怪罪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下注于不確定性，其他制度也可以各自下注。

處于制度核心的那個意義深遠的——卻并非無限的——不確定性，也在告誡人們要警惕階級文化過程中過于功能主義的觀點。例如，毫無疑問，本書所描述的那個矛盾的、非預期的循環，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適時地為資本主義服務。任何穩固到值得研究的系統都必然“有效”。因此，人們通常必須在功能的層面上對再生產進行分析。然而，這種必然不能掩蓋那些不確定因素所帶動的斗爭。例如，“家伙們”的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具有挑戰性和顛覆性，并且咄咄逼人。在再生產的文化過程之中及背后，充滿了決裂、滯后、對抗、根深蒂固的斗爭和真實的顛覆性邏輯——它們為結果而戰，而不是為滿足當前的制度。

這種不確定性也告誡我們要對任何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簡單目的論觀點保持警醒。譬如，國家極大提高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投入，這種做法并不必然是為了獲得資本主義的“最大”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對抗性群體強迫使然；他們利用自身特有的真正的自由尋求自我發展，一如他們所知。當然，國家機構也在不斷被利用和改造，以幫助淡化或消除那些由資本主義造成、但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些機構幫助解決問題的時候，卻不能完全被資本主義所容忍。它們保留空間與潛在的對立性，使爭議常在，并不斷刺激人們的神經——那根資本主義寧愿人們忘卻的神經。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并非是簡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奴仆。他們通常只是在短期地解決、混淆或擱置問題，因為他們所致力于的職業目標最終尷尬地獨立于資本主義功能需求之外。他們或許在不知不覺中助長了階級再生產的非預期形式；但是，同樣地，他們也可能引起對抗和批判的進一步強化。如果沒有這些對抗和批判，統治階級會更好，這種對抗和批判的存在，使資本主義面臨危機。國家機構和制度通常會采用超乎任何純粹資本主義想象、更加奇特、更具替代性、更加使人不知所措的形式，使矛盾深化、激化。這臺官僚主義的、教育福利的國家機器，具有顯著的西方資本主義特征，我們必須部分地將其視為積累性包裝的產物，通過這種包裝，資本主義設法將國家機器轉化為自身優勢，而不是作為自己的意志或赤裸裸統治的表現。這臺機器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它富于變化，并在變化中賦予自我以生命力。

###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為了對制度在文化和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實現概念化，本研究提出了更為準確的建議，這些建議特別關涉系統化誤識和非預期結果的重要性。

第一，我們不能期望特定類型的再生產整齊地發生在彼此分離的制度中。就像學校及其正式的課程表與學習、體力勞動之準備等現實過程無關，其他制度也可能處于與現實社會功能對立的尷尬境地。制度與地方非正式文化互動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和習慣性模式，帶來了非預期且通常不可見的結果。與這些結果相比，制度在再生產中的作用范圍和特殊含義，可能與其正式的特性及明顯的聯系關系較小。此外，同一制度可能在不同類型的再生產中發揮截然不同的作用，舉例來說，與體力勞動力的準備相比，學校在腦力勞動力的準備過程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本研究表明，制度不能作為簡單的個體來研究。制度至少具有三個層面的內涵，我們可以分別描述為官方的層面、實用主義的層面和文化的層面。在官方的層面上，制度可能會對自身的目標做出正式的說明，而這個說明涉及到對社會的主要結構和組織特征，以及二者相互關聯的方式（或者是可能使二者發生關聯的方式）的見解。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我們的社會中，如果我們假定，像學校那樣的國家制度，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如私立學校），以某種明顯的或有目的的方式運作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國家制度的核心目標，并不是去推廣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以滿足被人們普遍認可的上層和下層兩個階級的需要。制度中那些受過教育、憂國憂民、誠實自由的工作人員，對此也不會贊同的。此外，與該層面上的機構實踐最為密切相關的，就是狹義的政治領域，以及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所有決定因素和各種利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部分主要的社會民主政治壓力是通過改革與制度發展，平等分配社會財富和必需品，或者至少實現獲得財富和必需品的機會是平等的。趨同，而非趨異，已經成為了主流的官方取向。

當然，實際上，同樣的標準、意識形態和抱負并不能傳遞給所有人，這也是對現存社會制度的絕對要求。一般而言，在很多制度中，官方意識形態的成功，或者是與之作用相同的反抗文化再生產的消亡，對于社會再生產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例如，對于那些確實已然接受了在工作中實現自我發展、獲得滿足感和興趣等規則的工人階級子弟來說，從學校向工作的過渡，將會是一場可怕的戰斗。大批被“自我概念”武裝的孩子們，將為爭奪對他們而言為數可憐的有意義的工作而拼殺；而大批的雇主，則將拼命把他們逼入無意義的工作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出現較之于當前所存在的、更大的“職業指導問題”。無論是戰時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還是直接有形的高壓統治，都被用來將孩子們驅入工廠。既然這并不是必需的，既然不管自由國家及其制度干涉如何，階級社會的社會再生產大體上仍在持續，那么我們可以推斷，制度的某些現實功能是與其所聲稱的目標相悖離的。由此可知，這種誤識有助于在特定的制度中發生的文化過程持續下去，而這些制度也促成了社會再生產。在第二個層面，即實用主義的層面上，官方的意識形態和目標被傳遞給特定制度的代理人和公務員。這些人可能對某些盛行的或未來的“官方”意識形態那更為理論化的基本原則大加欣賞，但是他們也對自己所面臨的控制和指導問題，以及在承襲的制度中求得生存的日常壓力頗為關心。他們以實用的眼光審視著“官方”意識形態。例如，只有當新的意識形態看起來能夠提供真正實用的幫助的時候，他們才會采納那些新被承認的意識形態，否則縱然他們可以用更加純粹、被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規則證明改變的合理性，他們也不會接受新的意識形態。正是這種實際的想法，妨礙了制度代理人察覺在他們之下究竟正在發生何事。

第三個層面位于上述兩個層面之下，是制度委托人改寫的種種文化形式。這些文化形式作為制度委托人的外部階級體驗，與制度的迫切需要和過程相互作用，特別是當它們與制度委托人發生碰撞的時候。這其中的重要變量之一，可能成為一種對抗性的非正式文化。實際上，該文化很可能有助于實現更大規模的社會再生產，而官方政策則一直在設法擊敗或改變這種社會再生產。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看到的那樣，文化層面上所發生的，對官方神話和錯誤觀念的解構，對世界所做的謹慎評估，都阻止不了制度融入世界。相反，它們還有助于這種融入。如果制度的特性及其意識形態的脆弱性有助于促進某類對抗性的文化和獨特的洞察，那么它也有助于通過提供或鞏固強有力的局限，使對抗性文化和洞察迷失方向，進入一種調和的狀態。另外，它也尤其可能引起分化，特別是在自身所關涉的領域中以及正式與非正式文化之間。例如，雖然學校并不像希望的那樣有效，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場所，而且是絕大多數三、四、五年級工人階級子弟所經歷的對立階級文化復興的最近似的原因。這種復興導致了勞動力主觀歸屬的變化和改進，進而也帶來了非常具體的結果。實際上，反學校文化以一種矛盾而又非預期的方式，實現了一項主要的，盡管不被承認的教育目標，即引導大量工人階級子弟“自愿地”走上技術、半技術和非技術型體力勞動的工作崗位。實際上，反學校文化及其所倡導的過程，對于引發目前的教育“危機”毫無助益，相反倒是有助于防止真正的危機到來。

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上述這三個層面上來思考制度組織中的重要變遷。以教育為例，學者們將進步教育理論與更廣泛的社會民主、政治和制度運動聯系起來，并將其進一步發展、理論化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從而增加對工人階級的教育供給，增加他們的受教育機會。然而，在實用主義層面上，進步教育理論在學校中主要被用作實際問題的實用解決辦法，而在有關教育的基本思想體系中則毫無現實的轉換。在文化層面上，進步教育理論往往帶來某種矛盾和意外效果，從而有助于強化反學校文化過程。對于勞動力的主觀準備，對于以一種與教育的進步目的相左的方式接受工人階級未來的做法，反學校文化過程均負有責任。正是這種涉及學校的、不斷被強化的文化再生產，通過限制教育試驗的成功范圍，保證了教育試驗的未來。

這并不是對教育進步理論或其他制度改革的反對或批判。任何教育或其他制度的轉變，都會在與階級文化、外部系統的客觀需求的復雜關聯中遭遇特有的意外、矛盾和不可知的再生產形式。這就是說，任何制度的目標、任何道德或教育行動，都不會按照其良好的意愿，以牛頓文化機械論的方式向前發展。每前進一步，我們都必須考慮這一步的情境，考慮下層社會（通常以制度和官方的觀點而論）和社會階級關系中的有效循環。

譬如，教育進步理論和“提高離校年齡”計劃實際上已經著手解決現實問題，致力于長期保護孩子們免受產業工作的艱辛和不平等之苦，并幫助他們獲得——當然是以一種非計劃性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某種父母不具備的洞察力和文化進步性。但是，我們不能輕信所謂的進步。相反，我們必須對一系列問題加以思考：以何形式，為了誰的利益，發展趨向如何，通過何種非預期的循環，通常會對社會制度帶來怎樣的再生產結果，人們才能取得特定的進步。

毫無疑問，概括和歸納總存在風險。不同的組織和制度具有不同的支配／被支配關系和專業人員／委托人關系，不同的滯后、中斷和意識形態逆轉，不同的斗爭時機和目的，以及與階級制度、文化再生產模式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的交叉。然而，這也可能表明，許多制度或許在某些層面上、以某種方式，共享著一個自欺欺人的信念，即它們各自所持有的官方意識形態是統一的。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意識形態被不加批判地向下傳播，直至底層的人們以某種方式接受它，并習以為常。意識形態的鏈條對于社會制度的再生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某些時候，這一鏈條也會中斷和逆轉。這可能意味著，在許多制度中，正是文化洞察（受局限性所阻礙）所特有的判斷力激勵成員們采取具體行動，并以非正式權力和控制等帕提亞式的勝利[［48］](#_48_80)，使社會再生產終成定局。

## 第八章　周一清晨與千禧年

引導大多數人對當前現實世界進行清晰思考的（……）是一種比哲學天才發現真理更重要、更具獨創性的哲學事件，因為真理只是屬于知識分子小群體的財富（……）。這不是從零開始、將科學形式的思維植入個體生活的問題，而是要對既有活動加以變革和批判。

安東尼奧·葛蘭西

引自《獄中札記》第325頁和第330頁

本書序言部分曾設問，工人階級子弟是如何，又是為什么會自主選擇接受工人階級工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叛逆者——相對而言，循規的個案更容易被理解——正是借助于對自身現實狀況的部分文化洞察，以及對體力勞動那令人不解的頌揚，才得以保持一種集體、理性，卻不完全的邏輯。我曾指出，這可以被理解為文化再生產的一種形式，有助于促成一般性的社會再生產。關于這一觀點的理論內涵，我們已在上一章中做出了嘗試性的探討。最后，我想從實踐／政治的層面上，特別是在本次研究最為關切的兩個領域——即對叛逆的工人階級年輕人的職業指導和教育——來考量本研究的意義所在。

本書所探討的所有層面的文化表述、分析和決定，表明了在文化層面上可能存在著某種普遍有效性。這似乎與我的觀點尤其吻合，即再生產的文化過程經歷了真實洞察的關鍵期和潛在的極端團結。各種文化形式何等頻繁地挑戰著舊有文化（形式），它們也何等頻繁地再生產著舊有文化。對這一觀點的天真解讀就是，在進步和倒退之間，可以做出某種簡單的干預，或是直接將兩者分隔開來。毫無疑問，這種解釋的問題在于，它遺忘了文化在本質上所具有的整體性（此即民族志部分所強調的），忽視了文化獨特的內在缺陷極其復雜這一事實，而這些缺陷正是文化本質的一部分，且易受到意識形態的入侵。

此外，文化絕不是不受任何約束的。文化與結構因素之間存在著一種中介關系；文化往往在確切的物質、組織和制度情境中——而這些都是對于獨特的關系形式、平衡互補模型的保證。適應和反抗緊緊地鉚接在一起，它們的關系牢不可破，不會因我們的期望而動搖。

就教育或咨詢工作而言，如果我們假定在文化環境中存在著若干方法，僅僅依靠這些方法就足以產生我們所期望的結果，那么就大錯特錯了。準確地說，本書第二部分分析的主旨就是，對于文化形式的理解，不能單就其本身或以其自身為基礎來談。為了理解反學校文化，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在一定程度上從外部來構建文化：從現代資本主義的勞動本質出發；從一般抽象勞動出發；從性別歧視出發；從意識形態出發。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可以依靠抽象／分離的文化形式和獨立的文化自主性，對叛逆的工人階級進行完整且行之有效的職業指導和教育。干預和改革都將經歷從盲目到矛盾、再到文化再生產的循環，而這種循環通常與本書辨析的那些結構性因素有關。

另一方面，從業者面臨著“周一清晨”的難題。如果我們說不出周一清晨要做些什么的話，那么一切就會屈服于純粹的結構主義，停滯在還原主義的同義反復之中：如果社會的基本結構不發生變化，我們不可能有任何作為，但是現有的社會結構又總是阻止我們做出任何變革。要求從業者同時在兩個層面上工作并不存在矛盾——為了被救濟者的利益竭盡全力，在此過程中勇于面對困難，與此同時，對上述行為永遠抱有贊賞的態度，這些都可能對內部存在問題的結構起到再生產作用。命中注定的是，被救濟者必然會將改變和平衡那些不確定性因素的空間和可能性置于從業者身上。置日常的紛繁事務而不顧，就是對社會和文化再生產的活躍、競爭性本質的否定，就是將真實的民眾譴責為生性怪癖之人，就是無視未來。因為忌憚于前文述及的結構性局限這雙死亡之手而拒絕接受日常之挑戰，就是對生活和社會本身所具有的連續性的否定。這既是理論上的失敗，也是政治上的失敗。它否定了再生產的辯證邏輯。一方面是出于善意、基于對發展和轉變規律的思考所采取的短期行動，另一方面是這些短期行動所帶來的不可預測的長期結果，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張力，這種張力是所有社會代理者人生的共同特征，也是為人父母者的每日所經歷的。因而，我們有理由向那些從事社會性工作、在兩個活動層面之間的張力和諷刺關系下行事的人提出質疑。[［49］](#_49_80)

本項研究對于文化層面上所存在的某種程度的有效性和某種程度的不一致性（就結構而言）進行了說明。考慮到前文所述，這足以表明，在文化層面上仍有行動的空間，而且毫無疑問仍有余地向該文化的成員更明確地揭示出，他們特有的文化是如何“講述”他們的結構和社會位置的。至少官方的錯誤觀念和其他意識形態是可以昭示于天下的。既不傷害，也不輕視工人階級的方式是可實現的，但是這種方式是與結構性因素的重要性——盡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封閉——相一致的。這里如若提出一份詳細的計劃，那就大錯特錯了。本書所提供的分析，可能在不同領域被其他學者探討過。但是，我們仍可以在此提出一些普遍原則，并列出本研究所涉兩大專業領域中的一些明確觀點。

\*　在相對統一中認識文化，不能因那些最明顯、外化，或是個體侮辱性的要素而對文化避而遠之；

\*　態度和行為是受到嚴厲譴責的原因之所在，因此應當認識態度和行為背后的潛在和隱含意義；

\*　嘗試對文化層面所完成的再生產功能作出理解，而不是天真地證明各種文化形式與支配性文化形式同等重要，或是更具優越性；[［50］](#_50_80)

\*　向各種文化形式學習，并努力區別文化形式的洞察和局限——特別是與主導意識形態的影響有關的部分。探索各種洞察是如何擴展到對社會的系統分析的；

\*　揭示文化過程，而不是將其神秘化或強化；

\*　在文化層面上認識活動的結構性局限，并進行政治組織，以在需要結構性變遷的時候，作為支持者的一員，或是代表支持者采取行動。

目前，職業指導的各個領域，特別是針對無學歷或低學歷群體的職業指導，都受到了日益嚴密的檢查。[［51］](#_51_78)從某種意義上講，職業指導方面似乎比教育方面存在更大的行動空間，至少對于職業咨詢師來說是這樣的，這是因為咨詢人員并未受到既有制度，如本研究中學校的物質環境和教學范式的約束。另一方面，職業咨詢師所處理的問題，直接與現實世界、不平等就業機會分配過程中文憑和知識的作用相關，而這一切原本就有助于促使教學范式結構化。有趣的是，職業指導咨詢師通常具有極其詳盡的有關文化層面的隱性知識。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環境及其調和性就是他們手中的工具。正是以此為基礎，職業咨詢師才理解了向工作過渡的各種方式。毫無疑問，他們對這類“家伙們”往往比教師更富同情心，而且通常會對學校中的反學校文化成員所做出的評價進行系統性倒置或重新編碼。這種與工人階級文化的對抗性變體相協調的不同形式，就是學校與職業咨詢官員之間緊張關系的源頭之一。另外，人們也確實在嘗試表達根本的文化價值和利益——這些文化價值與利益存在于個體的多樣性觀念中，存在于超越紙上談兵的才能之中，也存在于人們在“生活方式”和“娛樂形式”方面所接受的作風中。

問題在于，文化理解的真正形式被一種無所不在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所瓦解和扭曲。一些價值被從文化中分離出來，并投射到個體及個體的本質特征之上；文化的其他方面則被去情境化、原子化，并且與特定工作的固有特性聯系在一起。于是，利用個體與工作匹配這一基本個人主義范式的行為，顯然變得可行，而這實際上只對中產階級通用。以個體及個體所面對的有意義選擇為核心的發展心理學，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語言。“個人發展”、“自我的概念”、“職業選擇”均獲得了普遍性應用，但實際上，這些詞匯只是在一種文化層面上，對存在于個體和可獲得工作中的虛假差異的同義反復的、個人化的扭曲。

或許對于職業指導實踐而言，本研究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文化層面可以被視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實體，該實體對于社會代理者現實處境的洞察具有被扭曲了的獨特的邏輯和形式。

可以說，人們所能做出的建議，很多都是短期的、原則性的。為了實現更長期的結構性變化，為了徹底改變工人階級子弟所面臨的工作機會和工作質量，我們有必要將那些代表短期力量的專業機構和其他社團，以一種更為政治化的方式組織起來。

\*　運用文化的視角來認識那些可能與文化范疇無關，或是處于交叉過程中的“問題性個案”；

\*　鼓勵工人階級子弟接受再教育。對于他們而言，“文化頌揚”不斷衰微，并使他們跌入陷阱，而工作則是為了獲得更大的承認；

\*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建議只是對特定情況起改良作用，而當前的經濟機會只是具有零和多樣性，即如果一些工人階級子弟利用了現有的機會，那么其他的工人階級子弟將失去那些機會。對于那些被排斥的和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來說，我們必須要認識他們的文化形式的邏輯，而且這種認知模式不應是神秘或虛幻的，而應是誠實和非幻想的。特別應當：

——認識當前由于無價值的文憑泛濫而導致的混亂和無意義性；

——認識絕大多數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工作內在固有的單調性和無意義性；

——在精英領導的社會中，大多數人必須失敗，但與此同時，所有人又被以某種方式要求共享相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必須認識精英領導的社會與教育體制具有的矛盾性；

——認識失業的可能性，相對于可獲得的真實機會和工作的實際意義——無論是否涉及文化層面的含義，存在著被迫失業和選擇性失業；

——廣泛地運用集體實踐、小組討論及各類項目[［52］](#_52_78)，來發現和審視這些工作的文化圖景。文化形式所展現的群體邏輯，同樣也可能與職業指導實踐相關聯。

如果對叛逆的工人階級青年施以原則性教學實踐，可能會面臨重重困難，因此我們在提出建議的時候必須格外謹慎。本研究旨在提醒人們，鑒于其全部階級文化經歷和階級位置，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對于教師的個人風格和教育內容的反映，遠不如對學校結構和主導教學范式的反映強烈。相對于教學風格和特定類型的教育內容，結構和教學范式中關系的基本類型更難以改變。在學校中，教師們不得不與叛逆的孩子保持著尷尬、令人泄氣的課堂接觸，而且這種問題仍將持續下去，以至于他們尋求并形成了一種較為長期的看待上述日常接觸的視角。無論如何，就課堂教育而言，本書所勾勒的文化視角確有一定意義。

目前，在教育界存在一種“危機”。[［53］](#_53_76)該危機的焦點是進步教學法的基本標準和適宜性。一直以來，爭論持續不斷（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爭論中，任課教師和孩子們的看法是完全缺失的），這實際上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在這場戰爭中，發生于學校的那些真實的階級沖突過程、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及文化的和一般社會的再生產過程，都只是被部分地、扭曲地呈現出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場戰爭是虛構的，或者不必表明個人立場。闡述和訂立針對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的教育目標和形式，必須與意識形態之戰無關。例如，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進步論技巧中存在著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困境，而且這些技巧也被卷入了具有諷刺意義的再生產過程中。相反，我們也必須承認，進步論技巧同時也是工人階級獲得發展的一個條件，即工人階級子弟在表達和符號操縱中發展出了某些規訓技術。[［54］](#_54_76)

以職業指導為例，社會的基本結構安排首先拋出若干問題，隨后教育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盡管教育的功用能夠為此類變革提供重要的先決條件，但是這些問題無法僅僅在教育領域就完全獲得改變。這種結構性變遷只能源于特定的政治貢獻——這些政治貢獻可能是由教師們借助其專業的和其他集體的組織做出的——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

一種折中且更為明確的教育可能性，就是為達成某種結構變遷，而在教育過程中施以集體政治的影響。即使最終較為重要的結構完全保持原狀，這種做法或許仍能促進那些所謂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教育機構。哪里的經濟關系和社會基本結構最終堅持國家教育原則及其主導的教育范式，哪里的獨立工人階級機構就有可能通過拒絕或減弱支配性交換關系之邏輯的力量，來避開那些無意識和再生產的循環。鼓勵工人們參加教育培訓，可以使人們對于教師的定義發生改觀；而集體勞動的非結構化和抽象化方法，則能夠使人們承認工人階級非正式文化的重要性及其所開創的再生產過程。交換關系的支配性模式，能夠為團結和自我理解的關系所替代。“等價物”這一虛幻觀念，則可能被合作與承諾所取代——這種合作與承諾的基礎不是個體，而是知識的社會力量。在諸如此類的非對抗性機構框架內，特別針對工人階級的教育實踐內容才可能付諸實踐：拋棄特定的主觀觀念和特殊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對工人階級正式和非正式文化形式的不同邏輯和本質，以及非常重要的一點，即它們在當前文化和社會再生產中所發揮的矛盾作用提出質疑。過去，激進且獨立的工人階級教育形式[［55］](#_55_76)一直存在；甚至現在，各種機構，包括最為重要的工會，也仍然存在于工人階級之中。這些機構能夠并且已經在為教育活動提供基礎。考慮到教育預算的規模（在英國為五十億英鎊）和當前盛行、但被錯誤概念化的觀念——其中與叛逆的工人階級子弟相關的那部分預算，很多都被浪費了或是毫無效用——我們就會發現，將國家基金的一部分移交給獨立的組織機構的主張是極為切實可行的。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或許可以利用時下爭論的混亂局面，為各種機構和實踐提供嚴密的教學和教育方面的“成本效益”論證；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更為自由的年代，這可能會被人們視為一種倒退或顛覆。

這些都是極其復雜的問題。為避免離題太遠，或者過于天真地專注于某一專門領域，我在此處僅僅力圖對文化層面做出分析，提出文化層面的相關性。作為結束語，我們可以針對周一清晨的那些直接而復雜的問題，提出一些原則性的短期建議（這些建議從更長期的觀點來看也有一定意義）。最為根本的是，我認為，文化層面本身可以被認知，其獨特邏輯可以被勾勒，經驗結果可以被理解。教師可以用一種懷疑的、單調乏味的真實目光去審視產業、經濟和階級文化過程。與其對“教室中的混亂和暴力”（具有與保守意識形態相關聯的再生產功能）提心吊膽而陷于道德恐慌，教師們不如將反學校文化放置在特有的社會情境中，并為了成員的長遠未來思考該文化的內涵——絕不介意反學校文化為了使成員在班級中站住腳而提出的那些難題。基于此，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更為具體的建議：

\*　要對階級和機構意涵的雙重標準性保持敏感，這樣一來，教學反應和交流就不會被誤認為是對社會階級和身份的傷害。

\*　認識結構性因素和主導教學范式對教學主動性和風格所設置的限制。對于在分化后的關系中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惡性循環，應對其影響范圍加以限定。這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教育問題，但是本研究所提出的最佳建議似乎是在與反學校文化的對抗中采取戰術撤退，從而避免任何過于簡化的憐憫之情，保持一定程度的機構權威。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提到的那樣，雖然反學校文化帶來了所有那些非預期循環，但是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維護了學校的權威。這是因為，為了從根本上保證自身在指導課堂活動方面的主動性，為了在公認的有限范圍內保證課堂教學內容的有效性，學校目前被物質結構化了。更為激進的教學風格可能被采納，并被那些有政治覺悟、有組織的學生所理解（參見“全國在校生聯盟”[［56］](#_56_76)），但是顯而易見，那些叛逆的學生是最不可能被包含于其中的。例如，“家伙們”按照自己的文化術語，將逃離沖突和傳統教學范式解釋為“敵方”的失敗和恥辱——這種做法帶有其自身的標志性的再生產結果。實際上，這種撤退也可以被視為對復雜矛盾責任的放棄。

\*　盡可能地運用小班（這無疑暗示著要為額外的資源而戰，但這種觀點絕不是要去除學校教育）、小組討論的技巧和集體工作。此類技巧與傳統的個人主義教學范式之間存在張力，但是它們至少在向某種組織單位努力——這種組織可能與那些正在被探索的集體過程和形式相類似。

\*　不時地將各種文化形式、主要轉變、社會態度作為階級工作的基本主題。在追求社會自我分析的過程中，努力提高各種技能和接受訓練。這并不是某種既有意義上的簡單的“相關性”，因為不能假定各種文化形式之間是“等價的”，也不是不加批判地對文化活動全盤接受。這種做法能夠對洞察和局限加以區分，并從支配性文化和意識形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的核心可能將會失敗：工人階級再生產著他們自身特有的服從性，從而完成了社會的再生產。具體的議題（特別是針對白人男性群體，盡管他們很可能與女性群體及少數族群相類似）可包括如下幾方面：

——　在現代社會中，反學校文化在文憑、工作的意義、勞動力的作用和本質等方面表明了怎樣的意涵。

——　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是如何在文化層面上形成的，這又帶來了怎樣的代價。

——　人們為什么將體力勞動與男性氣概聯系在一起，將腦力勞動與女性氣質聯系在一起。

——　性別歧視的代價和轉向是什么。

——　打架、偷竊和恐嚇意味著或表達著什么。

——　友誼和非正式伙伴關系的本質是什么。非正式的文化活動和反應具有怎樣的效力和代價。還可能存在什么其他類型的友誼。

——　文化如何解碼正式信息，如何接受或拒絕官方的和意識形態的信息。文化以理性還是非理性作為自身的基礎。

——　基于非正式文化所做出的各種決定，積累起來的真正結果是什么。

只有接受所有這些結構性限制，并且牢記各種文化形式之間的關聯性，人們才能將這些結論和本書的基本要旨看作是對理論與實踐這一統一體的某種形式的探索。對文化層面的認同和理解是一種不斷接近自我意識、進而更加接近政治意識的行動，也是一種在文化的物質性中認識文化成為某種物質力量的可能性的行動。事實上，這種文化的政治化既是較長期結構變遷的有機要素，也是其先決條件之一。[［57］](#_57_74)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及文化領域與意識形態領域的獨特關系中，文化層面上和教育模式中才真正可能存在有效性。對于各種文化形式之共性的認知，以及對于文化形式特有過程的理解，已然強化了內在軟弱性，已然開始闡明正式文化施于非正式文化之上的影響力，甚至已然啟動了某種自我轉變。這可能不是千禧年，但它卻可能是周一清晨。周一清晨不必然意味著同樣的周一清晨無盡無休。

注釋

[［1］](#_1_190)對我而言，這是那些討論階級意識的英文文獻的根本缺陷。牽涉政治傾向的口頭回答的水平、關于意識的常識性種類的判斷，以及對政治體制的取向，這些通常都會在調查整理所得的論據中有所體現，并可能掩蓋文化的真實動力。因為文化可能帶來反作用，具有對立的潛能，或是就文化形式的真實意涵而言，代表著相對武斷的觀點。舉例來說，“私有化”工人是工人階級中一致性較高的一類，但我寧可將其視為最先進的和潛在激進的工人階級類別之一，而不是最能結合在一起的那一類。我的分析與常見的有關“傳統工人階級”的評價截然相反。參見J.H.Goldthorpe and D.Lockwood, “Affluence and the British class struc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1, no.2, 1963; J.H.Goldthorpe, et al., The Affluent Worker: Industr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M.Bulmer （ed.）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帕金的階級分類更為合理，因為他所劃分的類別與國家階級文化有關，而非實踐意識層面上的經驗回答。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觀點來看，這些類別的范疇非常接近，提出的問題也是相似的。那么，“激進型價值體系”的真實的文化和社會基礎是什么呢？在“協商型價值體系”中，階級合作背后又隱藏著何種形式的洞察和進步呢？參見F.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McGibbon and Kee, 1971。

[［2］](#_2_183)這是盧卡奇有關工人階級意識的觀點中的主要弱點，也是在歷史主義層面上對其著作進行批判的依據。我認為，在與當前著作觀點一致的其他諸方面，這也使葛蘭西關于工人階級文化、群眾黨派和文化霸權的論述出現瑕疵。當然，針對歷史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最尖銳、最有益的告誡來自于結構主義者。參見G.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erlin, 1971; A.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enguin, 1974;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New Left Books, 1970; and Althusser, For Marx, Penguin, 1969。

[［3］](#_3_176)遺憾的是，結構主義者們在有理由對人本主義意識形態那簡單的樂觀主義持質疑態度的同時，也應該破除人性本身。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將主體性作為洞察和客觀分析的可信力量拋棄，而是要摒棄特定類型的馬克思主義所描畫的那種過于中心化的、非辯證的、預期性的本質。

[［4］](#_4_174)有關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對各自結構位置的意識的含義是由盧卡奇提出的。但是，這個含義是完全嵌在歷史主義的問題域之中的。（參見盧卡奇，前引文，尤其是第53—54頁）。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聯系，是圍繞著商品和商品交換的核心作用來闡明的（正如其提供了被具體化和分離成“自由”、“平等”、“獨立”的司法——政治神圣性的基本形式）。我認為，我們應該將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種特性，作為有關資產階級意識及其存在關系的一種基本理論加以理解。但是，并不存在任何內在依據，可以判定工人階級卷入了存在與意識相互轉換的獨特且復雜的過程之中。“勞動力”作為商品的交換，保證了平等和獨立，這一信念充其量也只是在工人處于市場之中這樣的情況下得以維持。當然，也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勞動力才歸個人所有，個人才有權出賣勞動力，并能夠通過訂立契約，以免受偷竊的侵害或各種形式的道德依賴，而將勞動力出賣給出價最高的人。但是，一旦工人訂立了勞動力契約，他就沒有理由再相信自己仍保有這些特性了：

在那里［勞動力市場］，唯有自由、平等、財產和利益發號施令。

（……）商品流通與交換為“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提供見解和信念，提供對以資本和工資為基礎的社會做出判斷的標準，一旦離開了商品流通和交換這一領域，我們認為，我們會在劇中人物的容貌中察覺出一種變化。從前的貨幣持有者，現在作為資本家闊步向前；而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則做為勞力尾隨其后。這一個，擺出一副重要人物的模樣，面帶得意的笑容，精于生意；那一個，膽怯、畏縮不前，就好像那些要把自己藏匿于市場之外的人一樣，除了躲藏起來，沒有任何期望。（Marx, Capital, Allen and Unwin, 1957, Aveling and Moore translation, 第55頁）

請注意，正是資產階級，實踐著由商品形式衍生出來的意識的各種形式和意識形態。這無疑是主導形式。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勞動者要比在封建制度下更為自由，但是仍沒有自由到可以相信自己與資產階級平起平坐。主導意識形態確實在從屬行為中得到了強化，而且盡管工人階級擁有自己的群眾運動和獨特的文化，其實際行為還是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涉及到這種主導意識形態。但是，我們卻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這是怎樣發生的；相反，我們卻有一套令人滿意的理論，在各個層面上將剩余價值、商品形式、意識和資產階級相互聯系起來。結構主義者將商品、司法政治形式、國家形式及其發起者、勞動力理論——有關價值和被資產階級隱藏起來的剩余價值——視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唯一基礎，卻全然沒有考慮到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意識。此類問題廣泛見于有關主導意識形態的次級再生產和較早的關于社會關系的論述之中（參見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NLB, 1973, 第223—224頁）。

在我看來，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既定目標，實在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特別是在今天的情況下——目前，關于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工人階級所特有的意識和文化的理論尚未成形。因而，我認為，這樣一個有關工人階級意識和文化的理論，在說明存在和意識間的相互轉化和協調，工人階級在現實關系、公民社會和國家層面上受到的束縛等問題的過程中，應該能夠像傳統理論那樣對同類的復雜性加以說明。

如我所斷言，上述形式（主導意識形態在從屬行為中得到了強化）一定是相對獨立的工人階級嘗試“理解”和適應其實現再生產的真實生存條件的矛盾的和非預期性的結果。需要補充強調的是，盡管這些生存條件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變化，但是，這些條件仍然和先前一樣，處于一個顛倒的辯證邏輯關系中。顯而易見的是，諸如此類的敘述偏離了中心，并且與資產階級理論中有關商品形式的觀念毫無穩定的聯系。但是它卻可以在相對穩定的資本主義秩序范圍內，準確地指出體現工人階級文化的不穩定、不斷變化和不可預見特性的各種要素。毫無疑問，這不能證明資產階級的意識就是一種已定型化的意識，盡管其提出了自己的物質和司法政治秩序。人們應該去探究，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是如何發生變化，如何存續下來，又是如何最終適應——以某種變動了的形式，在最低限度內復制——那個壓迫自己的制度的。然而，這并非要構想未來的社會形態。與資本主義制度替代封建制度不同，已經做好準備替代資本主義的、明晰的核心制度尚不存在，這也是獲得共識的。當代工人階級的文化與意識缺少一個核心，因此我們不得不假定商品的內核即為其屬性；而且，該文化與意識并不是對稱的，故而不能像在純粹的資本主義模型中那樣，表現為一個在各個層面上相互束縛且統一的、精確的構型。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意識與資本主義共處于一個精密、復雜且極具張力的整合體之中，并且不斷變化，構成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它的動力就是在再生產資本主義生存條件的同時，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部分洞察。

[［5］](#_5_166)在美國的社會學、工業社會學和工業社會心理學中，學者們對群體問題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請特別參見R.Lickert, 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 McGrawHill, 1961; E.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acmillan, New York, 1933; K.Lewin“,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E.Swanson, et al.（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Holt, 1952; D.Katz and R.L.Kah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Wiley, 1966。

[［6］](#_6_160)毫無疑問，經典的弗洛伊德理論詮釋了群體的社會心理特征。雖然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主要論述了超我的個體類別，但是也提及了原始游牧部落的特定成員對某一社會制度的基本要素的內化。在弒父和將故去的父親內化的過程中，為了群體團結和權力，所有個體都要部分地讓渡個人主權。這就需要從霍布斯主義有關“人”都相互為敵的工具性自私論，過渡到群體利益與命運的觀念。準確地說，對已故父親的內化是為了控制和取代那些被群體所接納的個人意見，從而形成一種以群體為單位的邏輯體系。由于缺少直接的早期資料，所以在弒父規則的發展中包含了一種真正的創造力——無疑，真實的父親永遠是一個神話。

[［7］](#_7_158)我此處的觀點曾被指責帶有某種“激進的霍桑主義”的破壞性價值。事實上，我并不是要暗示，我們可以寄希望于真正的非正式群體來挑戰權威，或者非正式群體的團結常常甚至總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我們在民族志部分已經看到的那樣，非正式群體的成員可能會受到其他成員的過分責備，而且該群體在遭遇危機的時候，也并不總是團結一心的。此外，非正式群體的創造力可能總是指向一系列客體，而不是其自身的社會地位，或者轉而對其地位做出反動的或法西斯主義的解釋。工廠并不像學校那樣受到很好的保護和監管，因此工廠會更加頻繁地認識到其他可能的存在。在此，我們并不是要將非正式群體理想化，或者將其作為一種對抗結構權力或官方強制力的具體力量（正如民族志所指出的那樣，無論與誰對抗，通常都要失敗），而是要提出文化創造力的理論形態及其可能性，以避免那種飄忽不定的、武斷的浪漫主義。

[［8］](#_8_158)此處，巴黎的兩位學者——巴特和克里斯蒂娃——關于原樣團體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的著作，給予我極大的啟示。我認為，他們過快地從結構研究轉向主體研究，而完全忽略了國家、制度、階級文化和人類群體的調節作用。盡管如此，克里斯蒂娃的“實踐”和“拒絕”兩個概念，還是有助于我形成自己的觀點。參見Kristeva, La Revolution du Language Poetique, Seuil, 1974；以及一篇綜述，J.Ellis, “Ideology and subjectivity”,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9, CCS, 1976。

[［9］](#_9_150)如果希望將文化實踐及其產物作為群體社會地位、身份和存在的一種相似項加以詳細分析，并進一步列舉有關“實踐是如何從其直接目的出發、不合常規地揭示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的范例，請參見P.Willis, Profane Cultur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10］](#_10_148)教育暨科學部（DE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有關“提高離校年齡”計劃第一年執行情況的報告是這樣結尾的：“最成功的學校應該是這樣的：在這里，有以適當的指導為支持的主觀選擇系統（進步教育理論，特別是“教育的社會實用性”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能夠使學生們感到他們享有‘平等’且‘現實’的機會。”（單引號是我添加的）“平等”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充分證明了教育中“社會實用性”和“進步教育理論”之間的矛盾，以及否定這一等式的洞察的準確性。

[［11］](#_11_144)與官方和公共機構的敘述相比，自身定位的文化過程可以更清晰地審視工人階級子弟所面臨的處境的真實特性。而且，這一文化過程帶來了開拓性嘗試，即識別個體，并將人重新引入為工作和職業選擇做準備的過程中，但是在職校生和對學習不感興趣的學生中所實踐的就業指導卻是由社會上層制定的。事實上，在反學校文化中，存在著先在的文化過程，而這會促使成員完成個體勞動力的準備、工作的進入，以及對很多理想主義的就業指導的洞察。

那些被就業指導所接受的、真實的文化過程，通常是作為良好溝通的“障礙”而被記錄在冊的。文化因素則被視為來自家庭或朋友的“誤導信息”，或是促使孩子們反抗理性建議和決策程序的固有傾向（請特別參見J.Maizels, Adolescent Need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Althone Press,1970；M.P.Carter, Into Work, Penguin, 1969）。在一些研究中，這類文化過程甚至被明確地貶斥為“偏見”，并被置于“更好地理解”的對立面上（DES, Careers Guidance in Schools, 第43頁，第44頁）。

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文化因素作為職業選擇的決定因素而得到更系統的認識。但是即便如此，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理性力量的活躍的文化過程，也只是在關于態度的描述性判斷中才出現。工人階級子弟身處“當下”的“此時此地”，在這個世界里，人們“很少為未來而思考或憂慮”。他們自認為“能力有限”，因此拒絕通常的職業生涯的觀念。最終，此類“文化”解釋就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同義反復：它是在一個更廣泛的層面上，對同一問題的重述。沒有人對這些態度的形成做出解釋。此類文化上的解釋，可能完全出自于一些人盡皆知的、符合慣例的情況和事實：“如果那就是他們想做的工作，而且他們也不反對，那么那一定是他們在某一文化層面上所希望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子弟大體上并不反抗自己的命運，因為那不是他們要做的事情。參見D.N.Ashton,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mong young male workers”,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1, no.1, February 1973; D.N.Ashton,“From school to work: some problems of adjustment experienced by young male workers”, in Brannen, 見前引文；D.N.Ashton and D.Field, Young Workers, Hutchinson, 1976。

[［12］](#_12_142)舉例來說，人們不可能以文憑為依據來界定非技術工人，這是顯而易見的。政府最近一份有關無文憑工人和未受培訓工人的報告，就在界定工作技術的時候遇到了極大的困難（DES, Unqualified, Untrained, and Unemployed, 1974）。報告指出，在學徒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實際上并不具備什么文憑。于是，該報告最終對非技術工人做了一個循環定義：非技術工人就是那些“不僅無文憑，而且通常會——但并非一定——尋找幾乎不提供任何培訓的工作”的人（第2頁）。這一報告還表明，雇主最感興趣的是動機，而不是文憑（第22頁），在那些向工人階級子弟開放的絕大多數工作中，缺少文憑并不是前進的障礙：“為什么一個沒有文憑，但具備良好個人素質的男孩或女孩，不可以渴望在提供學徒訓練或文書工作的地方工作呢？這全無道理！”（第22頁）。顯而易見，工人階級就業中的決定性因素是當地職業市場的拉動力量，而非教育這股推力。

[［13］](#_13_138)例如，可參見M.Weir（ed.）, Job Satisfaction, Fontana, 1976; P.Warr and T.Wall, Work and Well-Being, Penguin, 1975; N.A.B.Wilson, On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Manpower Papers, no.7, HMSO, 1973; Work in America, （report of a Special Task Force to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MIT Press, 1973; W.I.Paul and K.B.Robertson, Job Enrichment and Employee Motivation, Gowan Press, 1970; F.Herzberg, 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Staple Press, 1968。

[［14］](#_14_134)參見H.Brave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C.Palloix, “The labour process: from Fordism to neo-Fordism”, in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CSE, 1976; Brighton Labour Process Group, “The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 in Capital and Class, no.1, Spring 1977。

[［15］](#_15_134)1976年2月，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失業畢業生約為4萬人，大約為1975年同期失業畢業生人數的5倍（《新社會》，1976年2月5日）。根據《衛報》報道，1976年10月，失業畢業生數量達8.2萬人（1976年10月27日）。

[［16］](#_16_134)參見DES, Unqualified, Untrained and Unemployed, report of a working party set up by the National Employment Council，HMSO，1974。

[［17］](#_17_128)Bourdieu and Paseron, La Reproduction, Minuet, 1970.

[［18］](#_18_126)英國的教育“新社會學”也持此立場，參見N.Keddie, Tinker, Tailor, Soldier, Sailor...The Myth of Cultural Deprivation, Penguin, 1973。

[［19］](#_19_127)當然，這是一種簡單化的表達，但足以闡明觀點。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工資是在一定社會和文化條件下，由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工資與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之間的差額就是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包含并大于利潤。勞動力基于價值規律所決定的交換價值而被買賣，在其使用價值的基礎上被剝削（馬克思，《資本論》，第6章）。

[［20］](#_20_125)嚴格地講，此處應解釋一下更重要的相對剩余價值。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如果不延長工作時間，即使借助于機器，工人也無法生產出更多的價值。但是，效率可以通過減少單位成本來降低商品的價值，從而減少商品中勞動者再生產的成本，換言之，也就降低了生產中與剩余勞動時間有關的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資本論》，第4及第5部分）。

[［21］](#_21_126)本書為讀者呈現了一個修正此觀點的個案，當然在這里，經典的理論模型還是為我所用。

[［22］](#_22_126)這就是為什么我在此處的討論中避免使用“異化”這一術語的原因之一。“異化”通常是資本主義逐漸摧毀主體性的一種手段，因而也被作為主體性走向毀滅的標志。我認為存在一種更為復雜的評價，這種評價承認，真正的感覺的摧毀是與現代工作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對那些毫不受文化保護的人而言。而且，該評價也可以作為邁向進步的基礎。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將勞動具體地社會化了；另一方面，它又與本書所關涉的問題更為契合，即在主觀上和文化上生產出一種對“工藝白癡”和自我被工作同化的去神秘化。此外，這種評價也可能在異化程度較低的工作中釋放出各種能力與批判性態度。

[［23］](#_23_126)通過此處有關“家伙們”的論述可見，文化洞察不失為一種理解某一階段的“私有化”工人的“工具主義”方法。這些“家伙們”傾向于去除資本主義的神秘感，而不是成為中產階級。他們從從屬階級被局限的立場出發，片面地對資本主義確實提供的一些自由加以利用。雖然“私有化”的形式可能是個體的，但其本質是集體的。文化洞察可以看作是先進的無產階級意識的一種形態。洛克伍德的傳統工人向我們展示的只是自衛的資本主義工人的迷信和傷感，而對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毫無主觀上或文化上的深刻理解。

[［24］](#_24_124)“抽象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分析的核心范疇之一。參見Marx, Capital, Part I; L.Colletti“,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Left Books, 1972。

[［25］](#_25_122)我完全引用了科萊蒂的觀點，即抽象勞動在分析者的頭腦中遠遠不只是一種精神范疇。抽象勞動是現實社會組織的核心要素，是商品（包括勞動力）交換的真正基礎，并在此交換過程中不斷重現。抽象勞動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也是主觀實踐過程——如前面章節所討論的自我與勞動的分離——所需要的。但是，科萊蒂在有關抽象勞動和異化的關系的論述中，過早地拒絕了人所固有的本質，并且否定了在資本主義所極力強調的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分割中可能存在的進步性和矛盾性。我對科萊蒂的理論所持異議就在于他步盧卡奇之后塵，將工人階級的自我意識等同于將抽象勞動作為一種物化力量的作用原理，等同于將工人階級自身的勞動力當作價值來源的觀點。正是這一謬見，使其將僅僅可能正確的政治分析歸結為工人階級意識的產物（同前，第91頁）。而這也是他與盧卡奇被指責為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之處。我認為，既然這些事物只是被部分洞察，那么諸如此類的認知就最終以一種相反的方式，將工人階級束縛在資本主義秩序之中。此外，這些認知也有助于工人階級文化中懷疑態度的形成，這種懷疑態度為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再生產提供了最低限度條件。

[［26］](#_26_122)我認為，就業指導的優勢和部分成果，及其對工作環境的區分，是基于一種調和的、誤識的意識，該意識形成于對體力勞動的文化適應過程。勞動的共性在此處既呈現出多樣性，又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正如就業指導意見通常建議的那樣，這些多樣化的特征與特定工作的本質屬性無關，或者它們就傾向于分離。就業指導將文化個性化，并通過將其轉換成一種技術來保持其生命力。

[［27］](#_27_118)參見E.P.Thompson,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ts” in Past and Present, （38） December 1967。

[［28］](#_28_118)此處的基本準則是，抽象勞動強調、關聯關乎資本的所有形式。我們由此僅僅可以推論出如下趨勢，即技術勞動讓位于非技術勞動，或者抽象勞動接近具體勞動的實際體現。然而，無論這種趨勢的范圍如何，這兩者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區別。具體勞動確實呈現出多樣化。譬如，機器維修就與機器操作不同。但是，重要的是，這種抽象準則的趨勢在經驗上是可見的。為了有效地澄清這些觀點，可參見Geoff Kay, “A note on abstract labour”, CSE Bulletin, vol.5, no.1（13）, March 1976。

[［29］](#_29_116)絕大多數體力勞動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僅為十二歲或更低。請參見G.C.Mathews,“The Post-School Adaption of Educationally Sub-Normal Boys”, unpublished ME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63。

[［30］](#_30_114)參見W.Spriegel and C.Myers（eds）, The Writings of F. Gilbreth, Irwin, 1953。這種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是將人類的能力作為一種生產力來使用的根本嘗試。但是，人也是社會生產關系的一部分。作為反對無休止剝削的階級文化力量的基礎，非正式群體遠離并抵制這些技術。在采用了運營和維護技術之后，“限制生產定額”和“系統性怠工”仍被延續下來。梅奧及其同事通過經驗研究發現了人類群體的重要性，此后不久，“人際關系”法便被用來嘗試中和這種對立。近來，“新”的人際關系試圖以某種方法利用并戰勝非正式群體的力量。盡管如此，運營和維護技術作為最有影響力的管理方法，仍然保持著支配性地位，也仍然最佳地表現出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內在驅動力。

[［31］](#_31_110)吉氏將作業動作分解為最小的分析單位，通過定量分析找出最合理的動作，使作業達到高效、省力和標準化。——譯注

[［32］](#_32_108)這并不是要否定政治行動在自身層面上的可能性、重要性和相對的自主性。依我之見，任何群眾性政黨，在其能夠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實現自我表達之前，必須理解并且學習工人階級的意識和文化。如若不然，政黨與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就形同虛設。如果自發論（spontaneism）必遭譴責的話，那么“還魂論”（zombieism）亦當如此——它試圖從外部指揮工人階級的行動，而不考慮其行動中已然存在的文化的、類似文化的和政治的內容，或作出病態的或行將消亡的假設。

本書可能由于缺乏直接的關聯性而受到批評，但從根本上看，本書的分析無疑是系統的。無論如何，我將從更普遍的意義上指出，可以說，在對市場位置的關聯性作出準確分析之前，我們需要一種關于政治行動的價值規律。

[［33］](#_33_106)與其說這里所討論的基本交叉評價法與男性工人階級有關，還不如說是與群體相關。例如，對于工人階級女性而言，女性特質與腦力勞動之間的聯系暗含著一種矛盾，即無論在實際生活中工人階級婦女的女性特征如何，男性氣概都是其階級文化身份的一個方面。對于中產階級女性而言，這種聯系甚至比她們本階級的性別定義更加能夠表明，她們的社會和文化角色帶有一種局限性、消極性和與生俱來的荒謬性。此外，我們已經具備了對女權運動及其階級根源、工人階級反對女權運動的形式等問題進行解釋的基礎。

對于中產階級男性而言，在階級與男性氣概的文化（父權制）定義之間同樣存在著諸多矛盾。在工人階級文化的重要領域中，父權制的價值觀念完成了并鞏固著職業梯度的倒置，中產階級男性絕不可能完全不受該倒置的影響。有關“男權運動”發展的階級基礎和起源，請參見A.Tolson, The Limits of Masculinity, Tavistock, 1976。

當然，這并不是說在正文中所呈現的男性工人階級的個案就不包含矛盾。一方面，種族的復雜性對性別和職業價值交叉評價機制構成了威脅；另一方面，工作閱歷的減少使得男性氣概體驗本身成為了一種威脅，甚至指定了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范圍。

[［34］](#_34_104)朱莉·米歇爾的重要著作試圖證明父權制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中是完全多余的。如恩格斯在其唯物主義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概述的那樣，又如米歇爾對弗洛伊德和列維—斯特勞斯的文化分析所做的論述那樣，目前看來父權制似乎是多余的。顯然，對米歇爾而言，父權制僅作為歷史的痕跡存在著，并無任何繼續再生產下去的合理性或正當性。不僅如此，米歇爾還將父權制和資本主義作為兩個完全不同的存在實體保留下來（第379頁），并由此提出了一種站不住腳、不堪一擊的二元政治學（第406、414和415頁）。她斷言，各個系統處于矛盾之中，但實際上卻未對各個系統之間的斗爭或辯證轉換加以論述。毫無疑問，我們在此就是要論述最終存在于一個復雜而又特殊的單元中的矛盾——一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復雜平衡所特有的內在矛盾。確切地講，這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父權制的間接結合。因此，我們很難在意識層面上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父權制區分開來。正是由于繼承了前資本主義的形式，并與某種獨特的、決定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起世俗的、復雜的決定關系（并部分地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文化層面上所孕育的各種更加徹底地關注具體資本主義關系的洞察，才得以轉變成或反動、或保守、或中立的各種形式。那些真正使有關資本主義階級體系的抽象推理混亂不堪的因素，也在混淆著工人階級文化。

更廣泛地看，本書強調了女權運動的潛在危險。女權運動正在受到一種極為短期的觀念，即父權式的性別歧視觀念的破壞，而這種性別歧視也正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外，以某種方式直接壓迫著女性群體。我們需要為一個確定的資本主義父權制——它改變并確定了整個社會總體——提供一個辯證、連貫的概念。毫無疑問，女性承受了最為尖刻且顯而易見的壓迫，但父權制也顯然對男性具有重要含義。參見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nism, Penguin, 1974。

[［35］](#_35_102)男性氣概是如此深刻地嵌在體力勞動之中，以至于我們竟然會對那些旨在強化和提高勞動效率的方法的“客觀性”提出質疑。轉換了的父權制的影響已然被資本主義所強化，但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卻幾乎未被觸及。事實上，父權制的各種形式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緊密糾纏，意味著不存在任何純粹的方式供我們描述抽象勞動。福特、泰勒和吉爾布雷斯的技術，或許并非如他們所料想的那樣正確。甚至對現代組織和方法的整理與簡化，特別是當它們被那些通常在本質上屬于男性形式的工廠文化所抵制的時候，也無法去除早先那自吹自擂的痕跡、不必要的動作，以及對本質的表現，而這種本質實質上與作為生產的生產無關。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自吹自擂正以某種非預期的方式被制度化，并被賦予了某種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規避生產定額核算員的注意。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一個不可預測的領域，為浪費時間、有組織的怠工、對高強度勞動的低制提供空間和微觀策略。

人們甚至可以更加思辨地證明，以這種方式賦予生產獨特的物質形式，不僅僅提供了具體形式的細節和與生產的經驗聯系，也改變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我們知道，當工業化進程即將到來的時候，機械化工業革命所表現出來的異常頑固和有力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無法完全轉變為一種更趨控制論的工業進程。這表明，除了更重要的結構因素外，還存在著深刻的文化傳動機制，使我們對自然具有一種物質的、可見的、機械的影響。

[［36］](#_36_102)這種男性氣概的表達形式，可能會對工作中的斗爭和沖突形式產生影響。工會的職員或工廠工人的管理者，必然也會利用獨特的工廠文化形式來動員男人們——公開展示或虛張聲勢，或運用強有力的、好戰的語言——其中充滿了男性的情感。這確立了一種對憤怒和反抗的真實表達，并可能在短期內極為有效，無疑也是一種有待應對的力量。但是，較為長期的目標可能無法簡單地依此方式被概念化，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在與草根面對面的層次上是無效的。因此，男性的對抗需要以一種恰當而體面的方式解決：明顯而直接的讓步。然而，如果這就是其價格的話，那么人們就可以按此收買它，擺脫困擾。但是，以此方式，特別是以一種更大的男性工資袋的方式來贏得的明顯讓步，實際上可能會掩蓋在（生產）控制和所有權等不太明顯的問題上的長期失敗。人們可能通過短期的、明顯的、巨大的妥協，滿足強烈甚至可怕的需求，而無需對那些暴力可能威脅到的基本安排做出改變。當然，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及各種長期的、持續的歷史因素，這些必須給予重視。這只是一個猜測：或許從特殊的社會民主和短期經濟視角來看——這兩者在英國工人運動中表現得很突出，對體力勞動的肯定與男性氣概的表達方式之間的獨特結合，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一作用尚未受到檢驗。

[［37］](#_37_102)從這一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制度下新階級出現的問題，遠不如新環境下舊階級再現的問題來得有趣。較之于正文所論述的部分，我在此處有關腦體分工狀況的討論，包含了更多關于“新階級”發展的理論意涵。

我認為，下列范疇的劃分是非常重要的：技術上的優化與對生產力的控制；腦力／體力的意識形態分工；意識形態的階級分工；以及現實的階級分工。技術優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非常現實的事情。除了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含義之外，技術優化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客觀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它進一步抑制了對生產的限制。此外，它還消除了對直接需求和占有的限制，并開辟了可變勞動力，從而使生產達到社會抵抗或技術能力的極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提高技術能力的上限意味著控制和計劃的不斷優化，以及勞動強度的加劇。

在生產型資本主義中，這一現實趨勢為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提供了文化和社會的解釋框架。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從制度的集體屬性到個體差異和特性的經典轉變。此處，這種技能優化的機會對于消減社會對生產的制約也是非常必要的。技能優化確立了分工的可能。

對于靠掙工資為生的工人階級而言，控制和計劃優化所造成的客觀差異并沒有在工人階級內部帶來分工。對于絕大多數藍領階層而言，他們工作的實際體驗是大致相似的。伴隨著去技術化、集中化和合理化，在工具間的一臺機器上工作和在生產線上一臺同樣的機器上工作，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確實已經微乎其微了。甚至在工作條件的差別化程度增強的同時，體驗的一致性也在持續著。與標準分鐘和標準化的程序相比，甚至那些明顯的差異（如白領與藍領之間的差異）也變得毫無意義了。對于工人階級來說，他們所面對的那些客觀差異遠沒有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作出的回應來得重要。這些回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關涉了性別歧視與腦體分工的整合。因而，如同回歸到生產一樣，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其物質基礎，而此物質基礎支撐了對腦體分工，特別是父權制和性別歧視之間的關聯的解釋。資本主義需要，并且能夠從意識形態的扭曲變形和此類分工中獲利，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就得到了它們的供給。

由此可見，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是人為造成的，是基于現實建構起來的，而這個現實則與其最初的結構、變形的結構、重新被應用的結構脫節。盡管如此，腦體分工仍然部分地承載著階級分工的意涵。概括起來，階級分工可分為如下兩類：（a）工人階級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在意識層面上的內部分工，它導致那些從事相同類型工作的人相信，他們在社會地位上是不同的；（b）真實的階級分工，它僅僅有助于呈現能力方面的差異。最終源于生產力的客觀趨勢的那個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產階級合法化。技術與控制優化這一真實傾向被用作意識形態層面上的階級分工的基礎，大大超出了生產力的范疇。社會分工被描述和辯護為社會中的生產性分工，在這個社會中，生產和經濟構成了主要的意識形態話語，而這種合法性的轉換幾乎是無法洞察的。

這其中至關重要的變化就是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即從真實的生產傾向到受性別因素影響的腦體分工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實現，既不是資本的內在規律作用的結果，也與時間—結構因素的模糊作用無關，而是借助于矛盾的、半理性化的文化和主觀過程。

因而，以腦體分工為基礎所形成的階級分工，是一種建諸錯誤觀念的誤識。甚至即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已經合法化，它也絕對只出現在工人階級之中。在人們的錯誤觀念中，勞動的腦力方面是作為具體的腦力勞動被個人化的。通過集中化和提高勞動強度，腦力勞動卷入到擴大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無疑有助于擴大，而不是吸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其并非中產階級）。不合邏輯的是，此類勞動被承襲、簡化和重新加以解釋——特別是從公開接受那些在別處被視為體力勞動的工作的角度來看，并被用于維護階級分工，使階級分工合法化。生產過程中那些客觀的技術和控制優化，在成為社會性的腦體分工之前，都是經過漫長的迂回才進入到文化和主體之中的，并被添加進一些新的、獨特的意涵（性別歧視和“腦力”勞動與學校的關聯）。

然而，如果僅僅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就認定腦體分工的作用是維護社會生產關系，那就大錯特錯了。與此類似，如果將維護社會生產關系看作是資本主義邏輯的本質，那也是錯誤的。通過不斷對勞動過程進行重組、優化技術和控制、提高勞動強度，擴大生產的邏輯開始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腦體分工出現（并且不可能擺脫這一條件）。事實上，在腦體分工與擴大生產的邏輯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關系。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否認，那些可以被寬泛地稱作是“腦力勞動”的東西與中產階級無關。管理資本、分配剩余（甚至其中一些會返還給工人階級）和維護社會生產關系的工作當然都涉及到腦力活動。但是，人們很難將看上去相似，但在基本社會功能或生產功能上有所區別的活動分辨開來。階級與階級內部的派系之間的客觀差別這一問題，在上述分析中尚未解決。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腦體分工不僅僅產生于生產過程中，也產生于某些外部過程中，即以真實的生產傾向為基礎，并對真實的生產傾向作出異于其本身的理解，那么我們就無需像普蘭查斯那樣，在洞察意識形態過程時，試圖將真實的生產分工抽離。如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形態形成于他處，而我們沒有發現生產中的真正區分，那么我們甘當責任。我認為，這應當有助于我們識別階級內部的各種真實的派別。參見N.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CB, 1975。

[［38］](#_38_99)對于工人階級女孩的勞動力準備過程而言，這也是正確的。這也可以表明，有關性別角色的具體觀念——從家庭模式到大眾傳媒模式，在學校的情境下，都表現在特定類型的實踐活動之中。這些實踐活動對于文化洞察的轉變，以及對于勞動力的某種意涵和定義的主觀及集體的發展而言，都蘊含著豐富的含義。譬如，用甜言蜜語哄騙男教師，或是直接以性感逗引男教師或許都促使女孩子們認為，女性特有的重要能力并不在于“工作”和“勤勞”，而是在于復雜而矛盾的性操縱、性快感和家庭的建設。

盡管我無法將女孩囊括進本研究的關注焦點，但是此處所概述的研究方法，至少在正式的層面上，同樣適用于對在校女生的研究。

[［39］](#_39_95)為了避免混亂，我并沒有使用“霸權”這個詞。但實際上，從很多方面來看，“霸權”在此處可能有助于表明意識形態與特定文化形式之間關系的準確狀態。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借用葛蘭西的這個概念。可是，目前“霸權”這個詞的準確詞義并不確定，因此我盡量避免使用這個詞。參見A.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enguin, 1973; P.Anderson,“Antinomies in Gramsci’s Thought”, NLR, no.100。

[［40］](#_40_93)例如，參見理查德·霍加特的經典著作，《識字的用途》, Chatto & Windus, 1957。

[［41］](#_41_93)例如，馬克思從未解釋勞動力如何形成，如何主觀地存在，又是如何以某種方式被應用于生產過程之中。在使用失業后備大軍這個概念來解釋工人的意識形態順從的時候，總是存在一套騙人的把戲。無論直接的壓力和額外的競爭壓力如何，我們還是首先需要對導致某種生產力大規模供給的過程加以理解，無論這種勞動力失業與否。

[［42］](#_42_87)盡管我曾指出，生產并不是機械地決定文化層面和那些有助于形成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的過程，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無論以何種方式造就的工人，在任何特定時刻都必須最大程度地滿足生產的全球化需求。這些需求在某種程度上受它們自身被滿足的形式的影響，反之亦然。不過，我們仍然需要面對這些需求的較為獨立的邏輯表達方式和發展規律。借助于本研究的論據，我們可以在這一復雜領域內做出一些初步的評論。

壟斷資本主義的誕生，標志著向勞動過程控制和加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邁進。而競爭型資本主義的市場在商品交換中居于更核心的地位，這就對勞動過程控制起到了制約作用。如果某種工作變得過于困難，競爭型資本主義就會為個體勞動者提供具體的替代性可能。同時，它也試圖對技術升級和革新的速度加以限制，因為這些方面的投資可能會冒資本回報周期過長的風險（如果投資不是用于最佳資本積累，而是用于競爭性的產品升級，那么這種投資甚至是無回報的），而無法獲得自由市場中盛行的短期運營收益。正是同樣的邏輯，阻止個人資本家采用更短的工作日：參見Marx, Capital, Aveling and Moor（translations, 第256頁）。相對而言，現代企業免受這些市場壓力，而且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的內在邏輯，推進對其所購買的勞動力的控制、強化管理和使用。勞動過程不斷被強化，手工技術被進一步控制和分解，這種趨勢是現實存在的（參見Brave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控制的最主要發展方向，就是對規模生產進行專業化的、理性化的控制。因而，存在一種普遍需求（即告別小規模的高度技術化——這會將控制傳遞給這部分人），使低技術勞動力為更大范圍的系統化和更快的工作節奏所利用，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從而使不斷標準化的勞動過程得以相互交替進行。簡言之，壟斷資本主義要求其勞動力中產生一種加速轉變，即勞動者變為技術白癡，以工作為榮，個人與工作活動相融合。

本書所描述的文化和制度過程——作為一個整體——試圖造就出一大批與這一類型近似的工人。確切地講，我們已經探討過的“部分洞察”，本質上就是要貶低和玷辱傳統的工作態度、工作中的控制感和意義。在某些方面，就壟斷資本而言，這些發展具有進步性，并且很可能為不斷社會化的勞動過程提供所需的工人，這些工人是工具性的，靈活、毫無幻想、“敏銳”，不掌握熟練技術，但卻可以很好地參與社會化勞動過程。

當然，無產階級工人的“先進性”不必走得太遠。拋棄舊時技術、職業奧秘和保護性態度，并不必然會拒絕現代工作，或放棄對現代工作無意義性的透徹理解。這種自由、獨立和改變工具型工人的愿望，絕不能墮落為朝三暮四和任何的動機不純。最為關鍵的是，客觀存在于這些先進的無產階級工人之中的社會互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具有偏見性、盲目性和局限性——不應該成為意識與政治目的的互賴和團結。

因此，源于現代壟斷的各種需求是彼此矛盾的。對于進步（或者缺少技術、受到職業約束的）工人的需求同時也使工人不忠于職守、缺乏動機，且易受大眾批判性政治觀點感染。

然而，我認為，這種矛盾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勞動力供給的文化形式所拯救。如果工業對于更為靈活、心無幻想的工人的需求，主要是由一類工人階級的文化過程（當然與這些需求存在一種調節性關系）所滿足，那么這種文化也會（再一次以一種調節性關系）提供能產生各種依附形式、分工和非預期性動機的其他過程，而這些都會以某種形式滿足工業恪盡職守和使政治混亂的需要。與那些違規者相比，循規者在勞動力準備過程中的各種文化變體更有可能造就出不顧貧乏的客觀物質條件獻身于工作、篤信工作的內在價值且具有各種相關資格的工人。而且，這些對立的依附形式的存在，為勞動力分工和等級化奠定了基礎。人們借此瓦解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性，并從意識形態方面使現實的階級分工合法化。事實上，半自主文化層面上產生的這類文化分歧和扭曲使人很難“看透”它們，從而對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變化做出經驗性的判斷。另外，這也可能表明，工業需求與勞動力再生產的文化形式此刻似乎正在走向艱難而矛盾的和諧。然而，長期矛盾無法解決。意識形態過程和物質過程朝著根本對立的方向發展。勞動過程本身正變得越發去技術化和無產階級化，與此同時，勞動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種工作顯然正變得更加等級化和差異化……特別是在資格方面。由此可見，“當生產過程中的客觀技術分工正在進一步縮小的時候，腦力／體力勞動和性別上的基本分工是否還會不斷再生產和擴大生產過程中的分工”，這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在那些針對不斷變化的勞動力的控制和指導中，最有趣的管理革新之一就是“新型”的人際關系：工作重組、工作滿意度和自治性工作小組技術。就工人意識和反抗的形式而言，人們仍然對此類技術的內在邏輯大惑不解。在我看來，有關這類發展的最具啟發性的觀點，就是將其視為對無產階級意識先進性（處于矛盾中）的回應。勞動過程的嚴格分工、高昂的士氣和對企業的忠誠，都日益變得難以實現。這是因為工人階級文化形式和與之關聯的行動，正穿過自我強加的腦力／體力障礙，轉變為一種對抽象勞動的實踐性理解；正穿過自身特有的性別障礙，邁向工作的徹底無意義，并對工作施以更加非正式的控制，從而形成更具對立性的團結——至少是在特定的、非正式的強大領域內。新型人際關系就標志著管理階層試圖利用這一發展中的意識，來獲得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強的工作意愿。

然而，這類戰略性解決方案的最終代價可能是極其高昂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生產邏輯（資本主義穩定性的首要信條）已被放棄，而且創造的條件更易于促使在勞動力中發展出更具批判性和挑戰性的觀點。在短期內，由于中斷的情況少有發生，產量因此可能提高；由于勞動力的相對原子化，反抗也可能減少。但是，如果我們將整個變動的特征概括為把工頭有序、有條件地納入非正式文化，否則他的地位將被篡奪和受到挑戰，那么我們會看到，人們在以此種方式處理與管理層的對立關系的時候，設置了嚴格的限制。無論是權威正式的讓步與貶值，還是非正式的讓步與貶值，都是一種危險的策略，而且所有形式的參與都具有兩面性。能否在控制與服從之間達成一個新的穩定劃分，能否在長久、緩慢、微小的讓步過程中發揮作用，這必定是資本主義的賭注。人們可以期待分工和合法化在意識形態層面的發展，可以說，這就像是逆流而上尋找河流的發源地，從而抑制那種聲稱要掌握工作場所控制權的過度膨脹的野心。

將管理技術方面的各種變化概念化的另一個方法，就是描述企業管理的焦點正在從生產力向生產關系轉移。以前，生產關系只是被簡單地看作為生產力的運轉提供條件；現在，生產關系已經被理解為具有獨特能力的力量。

泰勒制和福特制均旨在促進對生產力的有效、合理使用。這涉及到對生產的客觀社會化，生產的客觀社會化反過來也可能會帶來所謂的意識社會化。在意識社會化中，相互依賴受到了廣泛承認，并被工人們用來控制生產。在自己的時代，泰勒反對“限制生產定額”和“系統性怠工”，但是他這種技術方法所帶來的生產的極端理性化和擴大化，為進一步非正式地控制勞動過程提供了條件。因此，操縱和控制生產力顯然會對社會生產關系產生影響，社會生產關系也會反作用于生產力。

我們知道，人際關系研究的第一次浪潮始于埃爾頓·梅奧的著作，在其著作中，梅奧試圖遏制社會生產關系的反生產傾向，并使之失效。第一階段的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絕不是因為考慮了社會關系，才有意識地重組生產力。這些技術在群體內部產生影響，也可以說是在上層建筑層面起作用，特別是通過群體領導者的影響來管理、操縱、調節群體過程。

第二次人際關系技術發展的浪潮標明了“理想主義”解決方案的局限性。在非正式群體和工廠文化中，一種更為唯物主義的觀念存在并發揮著作用。勞動過程沒有試圖限制非正式群體活動在固定的勞動過程中的不利影響，它本身被視為非正式群體的決定因素，而且對生產過程的操縱也被作為控制各種文化形式的手段。到目前為止，控制下的試管社會主義微觀試驗在某些壓力點，其成敗或許不如資本主義的承認來得重要，但是正是社會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的不適當發展，從實質上限制了生產。當資本主義將其敏銳的洞察力投射在它那至高無上的地位上時，我們可以在此處看到資本主義無限多樣化的資源和彈性。人們甚至可以再次認為，錯綜復雜的工人階級激進主義將被自由讓步弄得更加混亂，而且還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進一步變化的過程中，出現一個新的靜態平衡局面。

\*例如，可參見Mary Weir （ed.） Job Satisfaction, Fontana, 1976; P. Warr and T. Wall, Work and Well-Being, Penguin, 1975; N.A.B. Wilson, On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Manpower Papers, No.7, HMSO, 1973; Report of a Special Task Force to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ork in America, MIT Press, 1973; W.I.Paul and K.B.Robertson, Job Enrichment and Employee Motivation, Gower Press, 1970; F.Herzberg, 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Staple Press, 1968。

[［43］](#_43_87)生產過程的各要素以某種形式再生產著意識形態的結構，這一結構反過來又作用于生產過程。

[［44］](#_44_85)肯·羅伯茨在對學校中的就業服務和職業指導中心論提出批評的時候就提出了質疑。參見“Where is the careers service heading”, Careers Bulletin, DE, 1976。

[［45］](#_45_85)在這種批評還原論或附帶性解讀的嘗試中，我并不希望暗示讀者，結構或是被完全轉換為思想和符號——即假定文化形式具有某種歷史決定論式的明晰，而這正是我所揚棄的——或是由于意識形態、國家和制度的作用，無法在文化和其他層面上形成有效替代模式。除了各種文化形式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社會再生產，這就是我將這些術語區分開來的緣故。

[［46］](#_46_83)例如，可參見L.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n B.R.Cosin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Penguin, 1972。

[［47］](#_47_81)主流社會學過于強調社會化的概念和被動傳播的含義，因而忽略了該過程中的張力和不確定性。工人階級并不總是與中產階級存在差異（不論出于何種原因），也不會如社會化的必然規律所概括的那樣，將劣勢永遠不可改變地傳遞給下一代（參見貧困循環理論及其他類似理論）。

文化模式、行動和態度是應急性產物，而且每一代人都會根據自身原因，對它們進行生產或再生產。為了滿足工業應用的特定需要，每一代人都必須不斷實現和完善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并使之在斗爭和競爭中發揮作用。如果這種持續性再生產的某些顯著特性和曾經受到罷工影響的解決方式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持續性，那么我們就不應該從諸如此類的連續過程中建構社會化的鐵律和動力機制。這種持續性的隱秘作用更加復雜、更具不確定性、更加與外部相關聯，并且更易于變化，因而無法被囊括于社會化這一概念之中。

[［48］](#_48_79)帕提亞式的勝利（Parthian Victor），指的是古代帕提亞帝國騎兵在退卻或佯裝退卻時返身發射回馬箭，這種戰術因此而得名，現可泛指臨走時的敵意姿態。——譯注

[［49］](#_49_79)正是這些層面之間聯系的斷裂或弱化，構成了近來社會學對社會工作相關實踐所提出的建議的真正基礎。例如，請參見S.Cohen, “It’s All Right for You to Talk: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Manifestos for Social Work Action”, in R.Bailey and M.Brake（eds）, Radical Social Work, Arnold, 1975。

[［50］](#_50_79)“新”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組成部分，請參見N.Keddie, Tinker, Taylor: The Myth of Cultural Deprivation, Penguin, 1973。

[［51］](#_51_77)例如，請參見肯·羅伯茨近期對職業服務所做的批判性評論（“Where is the Careers Service Heading”, in Careers Bulletin, DE, Spring 1976），以及有關就業準備的政府報告（Unified Vocational Preparation: A Pilot Approach, HMSO, 1976）。這份政府報告促使教育和科學部設立繼續教育課程審查和發展小組，以便監督和實施具體研究項目和課程實驗。迄今為止，該小組所提供的唯一一份原始文件確認，40％的青年工人完全缺乏教育和培訓準備，并呼吁制定聯合計劃，為青年工人提供培訓和繼續教育。然而，該文件并未涉及年輕人對各種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態度問題，也沒有對那些要求在工作環境中作出“貢獻”和進行良好“溝通”的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加以探索，而這些要求從本質上看毫無意義。肯·羅伯茨對于職業服務的批評極具挑戰性，而且我對于其有關“職業選擇”概念的指責頗為贊同，但是這種做法也很容易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為那些在教育方面處于劣勢的人提供良好的“職業更換”服務或是“相關服務”，與在特定領域內增加整體就業機會毫無關聯，因此在任何一次新的調整中，我們仍然會看到同類問題出現。由于忽視了文化層面，以及這些有限機會的實際經驗性反應的范圍，故而他無法針對就業指導實際應該做什么的問題提出任何建議——無論就業指導的應用范圍如何。

[［52］](#_52_77)學校聯合會職業教育和指導項目（材料正在審核中，尚未發表）就集體工作和小組項目的材料提出了諸多有趣的建議。然而，這些建議最終仍然被個人選擇，甚至是就業市場中位于機遇之上的個體力量等虛幻觀念所束縛。

[［53］](#_53_75)廷德爾事件，近期調查（請參見Bennet’s Teaching Styles and Pupil Progress），首相在拉斯金學院就父母對“新”式教學法之擔憂而發表的演講（1976年10月11日），以及黑人父母長久以來的壓力，都是對進步論、實用性和新型教學法提出的質疑。

[［54］](#_54_75)我一直對這些技術的形式持質疑態度。如我所主張的那樣，正是在各種文化之中，或是部分地源于文化，工人階級的孩子們才可能得以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與所接受的支配性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或許如技術與其文化基礎間的關聯那樣，紀律和精確性仍必須占有一席之地，同樣地，有關技術如何才能實際有效地對抗主導表達形式的觀念也必須保留。

[［55］](#_55_75)參見R.Johnson, “Really Useful Knowledge” in Radical Education 7 and 8, Winter and Spring, 1976。

[［56］](#_56_75)全國在校生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chool Students），成立于1972年，旨在反對強制性校服和體罰。——譯注

[［57］](#_57_73)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將這種觀點反駁為歷史主義或者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進步。這種觀點僅僅意在使人們注意到：對于工人階級來說，如果發展型、而非壓迫式的變遷即將來臨——無論不同層面的相關因素和有效性如何，那么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就有必要在某一階段進行支持性的激進分析。這種觀點還可以提醒人們，工人階級在反對某些“進步”的過程中，扮演著實用主義檢查者的角色，然而他們并非必然發揮積極的作用，也可能發揮一種消極的作用——但這并不妨礙體現其精神。如果文化必須變得更加政治化，那么政治就必須變得更加具有文化性。

# 補充訪談

在最好的情況下，日常生活如同藝術，是一場變革；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就是一座牢籠。在最壞的情況下，反思就像批判，是一種極端保守；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會創造出規避的策略。為了反思而參與復雜而瑣碎的生活，可能會使兩種最壞的情況同時發生。這種做法使前者失卻清白，使后者與罪惡凝結在一起。

由于篇幅所限，我無法就方法論及其與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詳盡的討論。但是，在其他文章中，我已經對處理這一領域問題的一般性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1］](#_1_193)

我在這里愿意承認，無論發生怎樣的改變，參與觀察及其所倡導的各種方法，都表現出了自然主義的發展趨勢，并因而趨向保守主義。民族志敘述是關于現實生活之不確定性的一種事后追溯的產物。由此，在無意之間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整體，它詢問“接下來發生了什么？”“它是怎樣結束的？”“怎么來理解它？”這些問題過分糾結于它們自我參照的世界。這種方法也正在屈尊俯就——能夠想像在一個階級社會中，民族志敘述的地位不斷上升嗎？

研究和調查作為一種活動，我并不否認其存在，也不否認其必不可少的相對獨立性，但是應用如此獲得的知識，極有可能顛倒參與觀察的范式。這種方法的沉默和強制隱匿性，最終導致了政治上的沉默和對某種能力的隱匿。這既是一種拒絕，也是一種賦權。

我們依然無法創造出一種脫胎于時代的形式。首先，我們有必要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片面或不片面地、簡要或不簡要地去接近真實的現在。民族志敘述，就其全部過失而言，是對于極其重要的經驗層面的記錄，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偏愛，民族志敘述十分強調人的能動性。一直以來，人的能動性不斷被忽視或否定，但是對于社會整體的其他層面來說，其重要性又始終在增大。雖然世界絕不是直接“可知的”，而且無法像民族志敘述有時候所提出的那種方式一樣在經驗層面上自我呈現，但是它仍然能夠在理論中獲得具體證明——如果理論從根本上自認存在相關性的話。要根據理論所宣稱的對現象的理解，而不是根據理論自身，判定理論是否妥當。本書（特別是第二部分）試圖利用定性方法的優勢，對社會存在的現實和難題做出描述性的和理論化的回應，同時反對經驗主義、自然主義和將主體客觀化的傾向。

1977年1月，我們曾在大學中組織了一次小組討論，下文就是根據錄音整理而成。一些來自于漢默鎮學校的“家伙們”已經閱讀了本書的草稿。這次討論的焦點是：作為一名研究者，我的作用是什么；對于他們而言，這個研究的結果意味著什么。

（……）

比爾　關于我們的那部分，文字很簡明。

約翰　書的中間部分涉及到我們了。

喬伊　嗯，我是從頭開始讀這本書的。你知道嗎，我本來是想盡我所能多讀一些，但是我后來放棄了，只讀了和我們有關的那部分，還有中間的一小部分（……）

斯潘克斯　你寫我們的那部分，我讀過了。但是，實際描述這本書的部分，我沒有讀……

（……）

珀克　我想，我們最后會不喜歡你的。

PW　真的。

珀克　老實說，我有點討厭你。

比爾　當你說“我們”時，你應該說“你”，因為那只代表你自己。

喬伊　不是“我們”。

斯潘克斯　逃課就是讓人高興。

珀克　對！就是，不上課太好了！

斯潘克斯　別光說“我寫了”，然后就看著我們，期盼我們說“好”。

喬伊　（……）我認為，你知道，我認為他并不是因為自己的緣故才這樣做的。他這樣做，你知道的，是因為有人讓他這樣做。他想知道我們為什么這樣做。你知道，去做1987年那件事［原文如此］，讓你傷透腦筋，而且……（……）實際上，你就是我們禱告的回應，因為你記得，我們過去在學校里，常常心不在焉地寫東西，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們得寫作文……（……）我覺得我們就是學校里的藝術家，因為我們所做的那些事，我肯定有我們自己的藝術形式，特別是那些過去我們常常干的事。而且，我們絕對是學校里的頭兒……如果我們都被分開，并被安排在那些“書呆子”中間，憑我們的本事，我們可能早就是頭兒了（……）我們本應該做點事的，我的意思是，我們當中不乏天才，可都他媽的浪費了。我是說X那家伙，他就像豬屎那樣蠢，真的！但是，如果有人輔導他一下……他現在會很有想象力。我們要是去做他做過的那些事，我的意思是，他做得比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都要好。他實際上肯定不像他裝出來的那樣蠢。

約翰　我可不知道。

［大笑］

比爾　（……）我想，你知道，我們不得不小心提防著，他會讓小組所有人都知道發生了什么，然后我才意識到那不對，但是我很享受逃課的樂趣，喜歡找借口不聽課。你知道，我實際上一開始不太喜歡那樣做——逃課、抽一小時煙，但是慢慢地，我也逃課而且真的喜歡逃課了。

珀克　我也想找你。

PW　即使你不喜歡我。

珀克　我喜歡與人交談。但是有時候，我常常想，你知道的，你正在問一些該死的正確的問題。我總想，而且我常常認為你問的都是一些太私人的問題。

PW　你指的是小組討論，還是個人訪談？

珀克　個人訪談。我想你知道，我確實介意和你談論我的私事，我想你知道……當你和你的同事在一起時，談到了很多根本沒發生的事情。現在，我覺得好多事情都被你們說中了……

比爾　你的意思是，你覺得好多東西是早就想好的了？

喬伊　好吧，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他媽的，沒有一件事是提前想好的。

克里斯　這本書我讀過的部分中，幾乎90％……我都記得。

珀克　是啊，我也能記住我所讀過的許多東西。

喬伊　（……）盡管個人行為被夸大了，但觀點還是有道理的（……）那種感情確實存在于我們心里。

約翰　在書里面，他們顯得比實際粗暴得多。

斯潘克斯　這只是我們的看法。

約翰　當你和你的同伴在一起時，每個人都在改變，每個人都在改變，他們做一些大事，每個人看上去都很厲害（……）當他們大談他們做了什么的時候。

PW　真的嗎？

約翰　是的，他們說的是真的，但是對我來說，他們看上去并不厲害。

斯潘克斯　因為我們認識書里的每一個人，我從來沒去過其他學校。我對紐鎮的許多地方都很熟悉，他們已經把我生吃了，這些地方讓人印象深刻，好可怕……我曾經在一所學校工作，四個孩子朝我走過來，他們還是小孩，他們湊近我，對我說：“你是新來的？”我說：“不，不。”他們說……他們湊近我時，緊緊地握著拳頭，我怎么辦？我拿了一些大磚塊撐在散熱器上，當作武器來保護自己。我一直拿著那些磚。你知道嗎……我只在學校待了十五分鐘，這些孩子就沖進來找我麻煩了。

（……）

比爾　你一開始是老師，后來，我就把你當作我們中的一員了。

喬伊　（……）你就是可以交心的人。你明顯和絕大多數老師的年齡差不多，但是沒有一個老師……他們代表了……他們和我們的距離太遠了。他們常常和我們坐在一張餐桌上吃飯，但是你卻不能真正和他們交談，就是因為他們是老師。

約翰　（……）你能明白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你都能明白。如果他們昨天晚上做了錯事，你只是傾聽、理解，其他老師呢……你知道，他們會說，“那是錯的”，然后你會想，“不要再說任何有關這件事的話了”。

比爾　最重要的區別是，你會聽我們說，你想知道我們會說什么，可是他們不會，在他們當中，沒有人愿意聽我們講。

約翰　他們想了解，也是為了和你保持良好的關系。

珀克　他們所做的，就是在做他們的本職工作，只是這樣而已。

斯潘克斯　他們盡力克制自己……他們想要做的就是讓我們聽話，然后到校長那兒，跟校長說：“我和他們相處得很好，他們在我的課上很聽話。”

喬伊　有時候，當你開始問問題的時候，回答中會出現一些違反規則的事情。那些我們做過的錯事，我們已經告訴你了，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其他老師對我們有任何激烈的反應。這說明，你沒有把我們的事情告訴其他人。

（……）

PW　親密是什么意思？以詹金斯為例［大笑］，他很想接近別人，而且他確實很在意這個。他和別人有什么不同呢？

喬伊　他的舉止，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我覺得，親密感必須以某種紀律來調和。

PW　可是我從來沒有對你們施以紀律約束。

喬伊　我想，如果你告訴我們去做某事，如果在我們制造麻煩時對我們發話，我們就會停下來。

珀克　噢，對！

喬伊　因為你和我們很親近，你是我們自己人，所以我們應該聽你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們需要的是和我們一心、但年齡比我們大一些、更有責任感的人。

斯潘克斯　（……）如果我的伙伴中有人對我說：“噢，得了，斯潘克斯，你那樣有些過火了。”我會說：“對，是太過火了。”從你那兒來的時候，好像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就是這么對我說的。

PW　你覺得我應該一直這樣告誡你？

斯潘克斯　不，我們從沒有這樣想。這是我們第一次談論這事，以前沒想過這些。

（……）

PW　如果“家伙們”的文化阻止你們來這里，那么現在你們還認為它是明智的嗎？

斯潘克斯　我絕不會來這里［大學］，我無法忍受坐在書桌旁，我無法忍受寫字，我不可能整天坐在桌前寫東西，我辦不到。

喬伊　這不是明智的［在學校里搗亂］，但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且，這比什么都不做有趣多了（……）他們給了我們責任感，但是我們卻什么也不知道，無論多少人告訴我。即使他們給我催眠，我也仍然不會認為我確實需要他們，因為我在書本中讀過。我們都認為，沒有一百分，我們也能成功。但是，如果有一百分的話，一切就會更容易了。

（……）

PW　如果你們沒有機遇，那么這是個人問題，還是和整個工人階級有關呢？（……）是不是具有政治含義呢？沒有人強迫你們進工廠，是你們自己一窩蜂地沖向那里。

喬伊　我們過早地進入了社會，我們被教養成自私的人（……）我們太自私了……不管發生什么，我們都不在乎，你看電視上那么多人都他媽的很富裕。你只是想玩命干，事業有成，掙大錢。你還會考慮其他人嗎？哪兒還會想到工人階級？

（……）

比爾　希望孩子能夠得到的東西，都是我曾渴望的東西。

PW　你打算怎樣實現它？

比爾　通過正當或不正當手段。

PW　你們是以個人還是以小組的形式？

比爾　我只想為他們實現目標，而且我愿意，或許不是一切。

PW　你還是沒有回答問題。你打算怎樣實現目標呢？

喬伊　（……）一直以來都是這種方式（……）你得靠自己。有多少次變革真正發揮了作用？而且變革之后，就會有一些人處在社會頂端……并最終成為中產階級（……）

約翰　我想為我的孩子所做的一切，就是盡你最大的能力。強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毫無價值。

（……）

PW　或許就是你自己那“成為男子漢”的信念，阻礙了你智力的發揮。

喬伊　并不是這樣的。腦力工作只是老師要求我們去做他們想做的事。如果老師讓我們玩，就會說，“好吧，去吧”，如果他們想要我們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他們會說不讓我們做的（……）

珀克　每個人都想在學校里成為強硬的人，每個人都想讓別人尊敬他，“他是個硬漢”。

PW　但是，這最終對你，或是對工人階級有幫助嗎？

斯潘克斯　這對于你在街面上混，還是有所幫助的。

比爾　這有助于你度過青春期（……）咱們就看眼下，沒有人敢取笑我們。

喬伊　他們不敢占我們的便宜，你知道，這些年來，他們從來沒有拿我們尋開心，因為我們都很有男子漢氣魄。這就是我的理解。如果我是“書呆子”的話，我身上的所有野性就會慢慢消失。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就沒什么意思了……然后，那些還照這種方式干的“家伙們”就會占你的便宜，我絕不會容忍的。

PW　這代表了男性的搏斗能力……

喬伊　那是我們上一輩的生活，我們的父輩是工人階級、體力勞動者。他們的雄健體魄遺傳給了我們。

約翰　他們可都是有頭腦的人，他們都是未來的老板。而像我們這樣的人，將成為工人。

PW　如果喬伊揍他，那是因為他跳舞特別滑稽［喬伊曾說他是如何在上周六的舞會上，因為被某人冒犯而盯上那個人的］，他是不是就贏了？

約翰　是的，在某一方面他是贏了。如果喬伊的老板非常有錢，他在一次舞會上遇到了老板的兒子，并且揍了他，那么對喬伊來說，那就是自我滿足。

PW　扯平了，是嗎？

約翰　是的，在某方面是這樣的。

喬伊　（……）我知道，我必須要粗暴、蠻橫，不然的話，我就沒法在街上混了。無論我將來會怎樣發跡，我在街上還得受欺負，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

PW　但是，你有可能回去上大學。

喬伊　我不知道。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我要盡可能多搞些女人，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話。

注釋

[［1］](#_1_192)一般性的討論，請參見“The Man in the Iron C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9, 以及Profane Culture的理論附錄，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此項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已在呈交給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最終報告“The Main Reality”中有所論述。該報告現已發表，如有需要，可向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索取。

# “茂寧賽德”版后記

流行已逝，時光倒轉，改朝換代，國不相同。距離也許能產生美，但是這種魅力的成本實際上卻能把人們分隔開來。然而，這并不是人們閱讀社會研究的原因。那些屬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英國男孩的生活和時光，可以為距離他們家鄉千里之遙的你們帶來些什么呢？

在美國人看來，這本有關英國的著作的確非常受歡迎。但是，即使在這兒，在大不列顛，時代已經改變。失業率已經超過了10％，失業人口不久就要直沖300萬。[［1］](#_1_195)其中最受影響的，是那些年輕、沒有技術、剛剛走出校園、低學歷的孩子。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轉型，許多提供給年輕人的工作可能不復存在。國家經費的削減已經全面降低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工人階級子弟所能享受的福利本來不多，教育經費的削減以及一個更強硬的、右翼的、更加“現實”的教育政策則進一步限制了這種福利。曾幾何時，只要他們愿意，本書所談及的“家伙們”就能獲得工作，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那樣了。50％以上的畢業生將直接進入政府主辦的“青年職業計劃”，這一計劃在為他們提供工作經歷的同時，也對他們進行“社會與生活技能訓練”——這是一種半強制性的學校教育的延伸，完全服從于工業的“需要”，而不考慮任何自由的或教育的要求。

我希望這篇新寫出的最后一章能夠向美國讀者呈現本書的意義和主題，來為斯坦利·阿羅諾維茲替“茂寧賽德”版所做的前言做一點補充。

本書的功用，并不在于提供那些與北美情況相似的細節，或者詳細說明兩者之間任何精確的相關性。盡管書中所記述的時代和地域與今日和美國相去不遠，但本書的“魅力”絕不在于細枝末節。當然，特定的距離的確對理解某些關聯有所助益：有時候，那些人類行為的重要特質正是因為相似而被輕視。我補寫本篇后記的目的，就是要勾勒出兩個層面的內容——對于我來說，盡管時代變遷，社會背景也與從前大不相同，但在這兩個層面上，本書依然具有意義：首先，強調和展現特定的廣闊主題，對我來說，這些主題必須始終是任何嚴肅認真的社會分析的一部分；其次，至少對一項教育爭論的當前狀況，它可以做出更加有針對性的貢獻。針對大規模失業這一社會轉向，我將對本書論點的某些意義加以說明和討論，對學界針對本書的批評做出某些回應，并以此為依據，就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做進一步的評論。

文化的相對自主性

關于上述兩個主要層面中的前者，也就是我所主張的必須成為任何社會思想之一部分的寬廣主題，下面的論述不可能是嚴格意義上的對社會理論的陳述。一部分原因是篇幅，一部分原因是個人好惡——我本人并不鐘情于“粗暴”而“薄弱”的抽象，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所處理的“理論”要素本身指向的是某種特定社會機制和體驗中不可化約和不可預測的內容。或許讀者應該將隨后的討論看作是一種一般性的訴求，也看作是閱讀這本書的有益的切入點——它提供了一種閱讀復雜文本的方法，強調了本書中我最希望持續下去并發揮影響的各要素。有必要在本文開始之處指出的是，即便是在針對本國的讀者時，本書也從未將目標定位于提供一種特定經濟、政策和政治背景下的并發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2］](#_2_186)。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是為了提出并展示，在官方政策與話語之外，也就是《英國議會議事錄》[［3］](#_3_179)的政治與財政條款和社區的公共生活之外，特定的工人階級主題和文化是如何獲得世俗性的存在和節拍的。本書的目的是對那些過程、意義、生產和創造做出有機分析（organic analysis），而非并發分析，這些過程、意義、生產和創造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有獨特的邏輯，與“來回反復”的政策和政黨無關，而是與無產者自身狀況的基本特征相關：在本研究中，則是與階級社會中的義務教育和雇傭勞工的狀況有關。正式的公共生活（和我們社會上的很多分析）看不見這些過程中的某些內容，或者即使能夠看見，也將它們分割和標記為“非社會性的”或“可忽略的”的東西；盡管如此，這些過程仍然為公共生活以當下形式存在提供了某些深層次的文化上和結構上的框架和支持，為精英和統治者維持當前這樣的壓迫提供了某些深層次的條件，而這些精英和統治者相信，他們真的在以某種方式設計和經營著他們掌控的這個體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這一角度和利益所展現出來的特定社會環境，的確是永恒的和確定的——至少對于那些參與其中的人來說是這樣。這正是日常生活的社會環境，共同的關切、活動和斗爭在這里交織。這一環境也是符號的意義、目標、產物和體系存在的領域，而這些又都有助于構成和生產這些事物中的某些意義。將這些符號的意義、目標、產物和體系匯聚到一起的，是社會行動者的“經歷”，以及將他們生存所必需的結構和矛盾體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方式。我將這些社會存在的一般層面命名為“文化”。這本書所展現的文化民族志，涉及的就是這一層面上的一個特定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男性反學校文化[［4］](#_4_177)。從根本上來說，我將“男性反學校文化”視為更寬泛的工人階級文化內部的一個變體，而工人階級文化本身只不過是“文化形式”的一種寬松的構成方式，這種“文化形式”共享了社會中工人階級的結構位置的一些共同特征。

不過，本文的要點并不是試圖為“文化形式”建立一個精確的類型學，或者對“文化”進行嚴格的理論界定。我在本書中最想強調的一點是，符號和物質領域這種活生生的關系，應該以它們自己的具體形態、在它們自身的層面上來呈現，而不是一直將它們機械性地簡化為基本的決定性結構。社會再生產和矛盾不應該被刻畫為抽象的實體，它們是動態地嵌在真實人物的真實生活之中，不僅僅是僵化的、具有某種“更深層”結構的“對應”或者“反映”。這并不是說要放棄所有這些結構性決定因素所帶來的感覺。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他人，我們所面對的文化形式都不是完整、均勻和半透明的，不會只是遵從自己的規則或者所牽涉的行動者的明確意圖。相反，總是有一些結構、局限和決定因素阻止它們隨心所欲地發展。行動者的意圖并不是自己就能開花結果的，而是要與一種復雜的過程連接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結構通過“文化形式”占據了一席之地。不過，文化和能動性確實也有自己真實的范圍和創造力，而且永遠不會提前被確定下來。人們必須凝神去發現它們，不僅僅理解它們是如何“運轉”的，更要理解某種被稱作“結構”的東西是如何運轉的。“層面”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像揮桿進球那樣直接就可以決定的問題，而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出乎意料的、反諷性的問題：一套規則和目標——本身具有生活的豐富性——會影響另一套。這些事物的關系不應該被視為實證主義“規則”的領地，也不應該被視為唯意志論的自留地，而應該被視為僅僅由“趨勢”構成的一個矛盾的領域。

在我看來，“文化形式”活生生的創造力和最終的“結構性決定因素”是同時出現的，而最為關鍵和富有戲劇性的是，它們出現的時間也正是人們在生命中面臨“選擇”和根本性轉變的時刻，在這個時刻，特定的結構性先決條件——比如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不同水平的勞動力——必須得以實現（但是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中，這是通過行動者的“自由”來實現的）。在這里，集體性的“文化層面”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如果像大多數解釋所說的那樣，一邊是結構和要求，一邊是個人，那么就很難解釋結構性的要求實際上是如何實現的——除非是國家機構代表資本來完全強制性地實施，或者利用意識形態的迷霧和幻覺讓行動者完全喪失自己的選擇和自由。[［5］](#_5_169)

但是，本書所展現的是那種集體、共享意義上的文化，有著它自己的獨特性，以及永遠活躍可變的特性（而不是作為外部分類裝置的文化）；這種文化用自己的復雜方式告訴我們，“結構”所刻意要求的東西有可能會遭到一些限制、挫敗和對它們的“洞察”——一句話，會遭到抵制。本書展現了選擇、自由，以及權力和傳統地位倒置的個體意義，還展現了為經濟體的某種基本“處境”提供最終的基本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但是，人們必須記住的是，這種解決“處境”的方式深刻改變了此前的要求。在面對“結構性決定因素”時，那些單向思維的人就不會想到這一點。如果忽視了文化及其相對的獨立地位，人們就會退回壓制或神秘化、強力或者神跡那里。

本書還堅持認為，活躍而有改造能力的文化以及社會能動者（他們不僅僅像理論家一樣思考，而且像活動家一樣行動）的集體能力是社會過程必備和基礎的組成部分。生活體驗、個人和群體規劃、道聽途說和非正式的知識、個人的恐懼和幻想、不敬的聯合所產生的具有威脅性的無政府主義力量，以及這些事物的骯臟的物質產物，都不僅僅是有意思的附屬之物（亦即“結構位置”的開放性后果），甚至也不是米爾斯所說的“個人困擾”意義上的對結構因素的個體認知。這些東西都是由其他事物所決定的，但是也能決定其他事物。它們注定要在我們的分析中，以特有的方式，占據一個關鍵性的理論和政治轉變階段。民族志的作用，就是展現這些被壓迫者的文化觀、他們“隱藏”的知識和抵制，以及那些讓他們陷入其中的“決策”依據——這些決策在某種意義上好像是自由做出的，但是卻助長了“結構”的形成。這本書的一部分內容就是展現工人階級形成集體和文化形式的知識的能力——雖然這種形式還很模糊、復雜，常常也是反諷性的，而且也不能化約為資產階級的文化形式——本書還要展現這種能力為政治變遷提供基礎的潛能。

關于再生產的各種理論

最近，在歐洲和美國，以廣義的“再生產理論”為名，一些非常有影響的著作對戰后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里自由和社會民主的教育“共識”中的矛盾和欺騙之處進行了嘲諷。[［6］](#_6_163)比如說，在美國和英國，這一共識認為戰后資本主義經濟急劇擴張基本上是一個好現象。它使得大多數人過上了富足的和中產階級的生活。不幸的是，仍然有問題存在，仍然有很多貧困、不平等和失敗的問題擺在那里。凱恩斯主義之前那種赤裸裸和原始的資本主義體制的殘余仍然存在，但是這種無政府主義可以在基本不挑戰資本主義性質的情況下被消滅。通過更高的稅收，一個擴大的政府是值得信賴的，它有能力糾正這些錯誤。國家教育是為這些改革而設計的利器；即便那些潛在的反對群體，比如勞工運動中的那些人，也認為非分離性的、非國家主義的行動是必需的。

教育貌似提供了一種個人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發展前景，也就是不可剝奪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這又是與一種更大的社會公平的承諾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被納入一種發展的可能性中）。恰巧，所有這些幸福——個人發展和社會公平——又都是彼此兼容的，因為不管怎么樣，它們都有可能使經濟體系更加有效：在這個擴張的和高科技的社會中，更多的技術工人正是社會之所需。賦予人們更多公平的機遇，就是要在那些之前沒有技能的人們中間“發掘各種各樣的技能”。這將釋放出更多的能量和技能，而這正是一個擴張的和技術更發達的經濟體所需要的。這些目標的兼容和成功，還有助于教育實現另一個主要目的：促進社會整合。社會民主制度的“公平”將是有目共睹的。

這些目標的內部一致性看上去簡直是太出色了，以至于任何一項教育失敗[［7］](#_7_161)看上去都像是那些參與者人為造成的錯誤。由于教育本身基本上沒有什么錯（實際上教育本身就是與失敗作斗爭的、披著耀眼盔甲的騎士），這些失敗必然是教育的接受者，以及他們的背景、童年經歷或者周圍環境的錯。美國的輔助教育、對“文化剝奪”的興趣、對貧困宣戰，所有的這些都旨在強化那些更貧苦的孩子的能力和技能，這樣這些“弱勢群體”可以在人生的競賽中與其他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8］](#_8_161)在政策制定者的手中，教育社會學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了家庭、童年、個人心理以及隔離的文化效應，從而鑒別出“失敗”的病根。階級（以及階級分析）真的只是在做一種無謂的同義反復：工人階級承受著教育和文化弱勢的痛苦；那些承受教育和文化弱勢痛苦的人是工人階級。對這些事情，它們不提供解釋，或者對不平等的階級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如何與它們發生這種密切聯系不做出任何說明。大體上來說，生產僅僅是提供“產品”——這是一種中立的角色，等待著有人來“公平地”扮演。

當然，經濟危機、經濟中實際出現的“去技能化”、機遇的消失等現象都對教育中上述自由主義希望和平臺提出了嚴重的質疑。此外，不需要怎么多想，人們就會發現，在一個不平等的階級社會中，個人發展和公正之間不會有什么并存的希望，因為很明顯，對某些人來說，所謂“個人發展”其實什么都不是，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這也不會讓他們成為人上人，與此同時，還總是有人不需要“個人發展”卻照樣能夠呼風喚雨，而這只是因為他們有一對好父母。此外，生活中真實的平等和僅僅機會平等之間其實也存在著一道鴻溝。所謂機會平等，至多只是承諾，你有機會成為品嘗人生競賽“勝利果實”的少數人。一旦競賽開始，對大多數人來說，“平等”意味著什么呢？在那個時候，他們在乎自己的起跑線在哪里嗎？

“再生產”理論家已經有力地指出了上述這些問題。但是，為了承認教育中自由主義目標的內部矛盾和失敗——主流教育社會學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自由主義目標，但總是因為“補償”和“下次做得更好”的希望而變得遲鈍——“再生產”理論家特意增加了一個爆炸性的說法，即自由主義教育之所以失敗，并不是因為執行者有什么做得不夠的地方，而是因為這套體系就是要讓工人階級子弟失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公平，而是為了不公平！這些理論家[［9］](#_9_153)與政策制定者的關系更遠，他們主張系統地顛覆教育中的自由主義目標。要想實現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階級社會的社會整合，只有讓大多數孩子對一個不公正的未來做好準備，確保他們個人的不發展得以實現。主流觀點認為，教育的積極作用就是用教育產品來“公正地”填補經濟體中的空缺；“再生產”理論卻顛覆了這個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及其角色要求制造這樣特定的教育后果。殘酷地說，是生產及其角色決定教育，而不是相反。“更廣闊的社會”以及生產并不是只在那里中立地提供機會，而是在限制和裁定教育在一開始就要產生什么樣的后果。

《學做工》在“再生產”理論的發展中已經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而且在我看來，它甚至對“再生產”理論做出了重要的矯正。它在“再生產理論”的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增加了一個性質維度，曝光了教育中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程式。統計數據顯示，不同階級所享受的福利和承擔的教育后果是非常不平衡的；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對該數據所做的解釋可能并未撼動人們最初的解釋邏輯和方法：這是工人階級子弟及他們的家庭的錯。《學做工》補充了兩樣東西。首先，這群孩子是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教育方法的目標，而如果教育想扮演自己的角色的話，這些人是最需要被吸納進新機遇的，可是這些人也正是那些最為積極地抵制學校教育的人。其次，《學做工》還有助于指出，這樣的文化反應絕對不是什么“無知的”、“落伍的”、“病態的”，或是需要被消滅的，相反，在某些重要的方面，這些文化反應可能要先于自由主義結構的理解。例如，“家伙們”的文化就涉及到，在一個階級社會中，就其最好的機會以及如何在一份體力工作中以最好的方式接觸一個蒼白的未來，押下自己現實的賭注。與此同時，這些人的老師們也盡力投入到人本主義和發展問題上，而這些幾乎和他們從事勞動的實際未來沒有什么關系。這恰恰顯示了自由主義、人本主義以及普遍的“左翼”幻覺到底離那些被壓迫者的實際情況和他們有可能面對的真實可能性有多遠。《學做工》有助于阻擋“文化剝奪”這個逃生艙，并對教育的自由主義目標重新進行評估。

但是，我覺得這本書真正和最為持久的重要性在于，它對“再生產”理論接下來的一個重要論斷做出了重要的限制：教育如何實際參與生產“自由主義期望”的反面，也就是說，教育是如何生產不平等的。對教育領域中自由主義的主張提出質疑也許是合理的，但是“再生產理論”過快地走向了一個過于簡單的反面。很明顯，通過把工人階級塞進一個不平等的未來，教育確實無可否認地執行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命令。這是教育的主要和持續的目的。我們回到了前一部分討論過的教育中特定領域的危險。學生的體驗和能動性成了對結構的反映。人類的認知、文化和能力實際上是豐富多彩、復雜和具有創造性的，但是卻被簡化成了對結構性決定因素的干巴巴的抽象。資本要求這么做，學校于是就這么做！人成了傀儡、僵尸和受愚弄的。他們內在的情感被肆意吸干了。學校甚至是這幅巨大圖景中的主要場所；對于這是如何實際發生的，說法很多，學校也有可能是一個“黑箱”。[［10］](#_10_151)這不是理論性的，而且肯定不是政治性的。悲觀主義極其盛行，這是預定的世俗關系的最壯觀一幕。

雖然《學做工》部分地與“再生產”的視角有所關聯，而且討論的全部都是實際教育結果的重要性，但是這本書實際上更為核心的作用是討論了文化生產的問題。[［11］](#_11_147)我所關注的“再生產”效應，只不過部分地來源于“家伙們”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的自我活動。我們被引向的是之前討論過的“文化”層面。這本書處理的是這些孩子的一個重要人生轉折點，也就是步入工作這一階段，這也是“結構”和“能動性”關鍵性相遇，而不是“結構”戰勝“能動性”的一個經典“選擇點”。本書民族志章節的目的，并不僅僅是讓讀者為一個魔術般的“再生產”做好準備，而是證明和重新創造一種文化的細密紋理和創造性——文化雖然遠遠不是由結構位置直接決定的，但卻是徹底地嵌在結構位置中的。這些章節還旨在展現某些特殊的東西，正是通過它們，某些普遍性的主題和話語得以發展成為“文化形式”的某種特殊形態。正是物質安排、社會組織和學校的教育范式幫助形成了“反學校文化”的動力和結構——就像我們也許會說的那樣，學校組織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不是受資本的抽象需要影響，而是受那些抑制、控制和規范這一文化的非常真實的問題影響。

我希望，在這一脈絡下對“文化層面”的關注會強化我的總體論點，該論點涉及的是在物質和社會生活的自我生產當中，集體和個人認同形成的復雜性和動態機制。它還針對“再生產”理論提出了相當尖銳的觀點。工人階級男性反學校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征，當然是對抗。毫無疑問的是，肯定存在具有同樣特征的其他性別、種族甚至階級的變種，但是一個例子已經足以說明，學校的支配和精神灌輸肯定不是自動的和直接的。如果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因素應該通過信息發揮作用，而這些信息又被孩子們拒斥了的話，那么這些決定性因素又該如何發揮作用呢？事實是，那些接受反學校文化的孩子們確實比較愿意去做雇傭工人，而這正是我接受的最終的“再生產”效應。這一事實說明，學校是通過其他社會場所的矛盾和差異來發揮作用的，而不是通過反映、對應、相似性或者其他什么東西。

《學做工》還指出了某些在“再生產”理論中只能被描繪成學校教育“黑箱”的東西。一方面，對我一直強調的“文化層面”，我們知道它所具備的一些一般性特征：能動性的程度、“洞察”、生活轉變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令人開闊眼界、獲得自由的——以及“選擇”的熟練領域。另一方面，具有反諷性的是，這是通過某些限制性的話語、過程和意識形態來發揮作用的，而它們促使人們做出了足夠多的“自縛式”抉擇，從而滿足了“結構”的要求并再生產了“結構”——即便再生產的方式與資本“理想”的抽象要求相去甚遠。

這本書所描繪的某些更為令人驚訝的事情是：學校與其文化之間驚人的糾結，伴隨著體力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一種深刻的“反意志主義”的文化產物，而它卻不是這種“反意志主義”“正式引導”出來的——事實上，這種文化產物是階級社會的一塊基石，但卻并不總是因直接的壓迫而產生；智力上的“落后”以復雜和驚人的方式與世俗的早熟聯系在一起，把人們投入一種成人的剝削關系當中（這顯示了工人階級文化卷入階級社會再生產中的方式是多么出人意料和復雜）。這本書還展示了，男性氣概的主題是如何以一種不顯眼但是卻很深入的方式占據了勞動力及其體力表達的體驗形式的。這顯示的不是分離的“再生產”，而是在一個社會中，壓迫的形式以及與這些形式相關的意義和感覺的話語的內在不可分離性。這些都不在“再生產”理論的視野之內。我一直在說的一個主要后果是，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被壓迫者的社會和文化形式是一種需要被消滅或者補償的“問題”，而從“再生產”的視角來看，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被忽略，或者僅僅被看作是意識形態。而（我所采取的）文化視角既試圖將它們理解為關鍵性的理論現象，從它們當中學習，從生活中學習，又試圖以某種方式，以一種開放和具有挑戰性的態度，對它們做出正面和批判性的評估。這正是《學做工》與結構閉合的悲觀主義劃清界限的地方，后者認為，當一個孤立無援的個體反對壓倒性的社會決定因素時，結構閉合是無法避免的。

我希望，我所主張的這些論點的要旨，能夠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讀者免除對我的一項（并非不公正的）指責：在《學做工》這本書里，我忽視了而且基本上只是被動地展示了其他重要的社會群體——“書呆子”（循規生）以及女孩子們。

由于我在《學做工》中的主要關注對象是“家伙們”的文化，因此“書呆子”就必然成為“家伙們”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突出陪襯。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學校里循規生的文化多多少少接近于那些理想的“模范”學生的文化。盡管如此，我討論的主要情況是，所有的社會能動者都通過不同方式親手集體塑造了他們自己的命運，而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方式并不僅僅由外在因素決定，而具有“文化形式”迷宮一般的復雜性。但是，要想一次就把這些都說清楚是不可能的！如果民族志給予某一特定“文化形式”“生命”的行為看上去像是剝奪了其他文化形式的活力，使得其他文化形式看上去貧瘠不堪，那么不應該認為這意味著“社會理論”只對前者有效。在一個案例中被強調的東西不應該在另一個案例中被遺忘。這本書不是在煽動忽視或者邊緣化學校里的循規生，而是在鼓勵從類似的視角出發，對他們進行具體研究，以揭露他們的社會存在的復雜性和前景。《學做工》里面絕對不存在這樣一些說法，即“文化層面”對他們來說沒那么重要，或者簡單的機械的意識形態觀點有可能對他們更管用。他們的文化或許與意識形態有一種不同的關系，而且也許可能對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前景”更為敏感，對這樣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所能提供的東西，他們有可能有著自身更為工具性的“洞察”。當某種特定的希望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受這些東西影響的人有可能會以一種非常痛苦的方式體會到一種徹底的幻滅感。

女性主義學者對這本書的批評則走得更遠一些。這種批評很明確地指出，一個群體，也就是女孩子們，在這項研究中被遺漏了（對這項指責，我的回應將和上面的一樣）。不過，這種批評還補充了一點，認為本書展現男性反學校文化的方式，不加批判地接受并且實際上再生產了“家伙們”的父權主義支配和壓迫，而且未能恰當地定位反學校文化在家庭里的根源。一位評論家認為這本書“滿是（對女性）最為粗魯的言語”，并進而抱怨說我沒有直面“這些幻象底下的暴力”1。[［12］](#_12_145)這篇民族志也許確實沒有足夠清晰地表明針對女性的文化壓迫效應——雖然本書有一個章節的標題是“性別歧視”，試圖考察和解釋而不是忽略女性的體驗，而且我確實指出了“家伙們”的支配以及他們“明顯的工具性和剝削性的態度”。可以肯定的是，家庭問題只是在涉及工人階級主題在男性反學校文化的再生時才被觸及，畢竟反學校文化才是本書所關注的東西。然而，如果女性主義學者在閱讀某些我如實記錄下來的態度和語言時感到被冒犯，那么抗議無助于解決問題。在寫下這些轉述的文字時，我并沒有預見到有可能會讓人感到不快；而且，很有可能的是，我之所以能夠做這樣的田野工作，能夠試圖將“家伙們”的創造性和生活作為一種明確的理論和政治策略帶到這本書里來，靠的是一種無意識，也就是與“家伙們”共享男性氣概的結構，而這對女性來說大體上是壓制性的。即便對富有同情心的男性來說，他們也意識不到十分普遍的、在深層次發揮作用的父權的結構。我們現在幾乎很少直面和反對它。

我的回應的要點并不是回避責任，而是試圖發現它與其他責任和議題之間的關系。民族志中包含一個關于父權結構的假設可能是極為容易的，而將父權結構假設與其他結構假設（如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分割開來，將會為本書提供一些其他東西。如果一個人想避免壓迫性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有意或無意的再生產，那么一個包羅萬象的自然主義的民族志是否有可能做到呢？此外，本書之所以要展現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中的性別歧視，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展示它在“家伙們”的生活和物質文化的集體自我再生產中所占據的動態位置。這么做的目的是為了展示在一個物質生活的生產模式中，男性是如何自己陷入到一種特定類型的性別建構中的。對我來說，這既是當時，也是現在我所持的女性主義觀點。

用民族志的方式來展現這一“文化層面”還使我提出了一個理論觀點，這也正是我在該書的理論章節試圖論述的內容，而這在壓迫的生活系統中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它們以一種驚人的、復雜的方式共存并糾結在一起，有時候相互支持，有時候則相互抵觸。像我這樣的中產階級白人男性并不受到這些結構性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的直接壓迫，而且客觀地說，還從其中的某些壓迫中獲益；于是，針對這些東西趾高氣昂地發表意見也許是太容易了，有時甚至顯得不真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一種一般性的情境，可以讓人做出一種超然的分析，對話語、符號系統以及權力和權威的秩序做出通俗清晰的表述。人們遵從某些結構也許會導致他們抵制其他一些結構，并在抵制中再生產原先的結構，或者另一些結構。只有理解不同群體中這些緊張的文化組合，我們才能恰當地分析不同部門和利益擁有什么樣的共同點以及如何擁有這些共同點，它們是怎樣在共同的戰線和聯盟的基礎上被動員起來的。《學做工》試圖針對一個社會群體分析，男性氣概的結構是如何通過勞動分工和體力／智力的分割而得以表達的，以及它們又是如何被用來抵制其他類型的制度和階級壓迫的。這恰恰就是在改變“父權制”的本性，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來展示“父權制”物質存在的類型，以及它在一個領域內持續不斷地進行相關的和經轉化的再生產時所采取的形式。在這里，我看不到任何反女性主義的東西，即便這本書未能明確地承認和譴責這一經過轉化的和經過再生產的父權制針對女性而產生的直接壓迫性后果。我們需要對父權制在“文化形式”中的復雜表現做進一步揭示。

至于學校中的女性文化這一特定的個案（雖然也必然存在著階級和種族差異），沿用本書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假定，學校中的女孩子們在“文化層面”所采取的方式包括針對“校方”的性別范例與成年教職員工自身所采取的對抗和集體認同的建構，這些行動對于女孩子們而言產生了“反諷性”的和在某種程度上預期之外的后果[［13］](#_13_141)，即使女孩子們陷入她們所屬階級和性別的命運。也許，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分析有關女孩子們的反抗問題必須比處理男孩子們的反抗問題更加小心謹慎，因為對男性支配的反抗以及對精神和階級壓迫的反抗是有可能的，而她們所接受的“女性氣質”因素則使得她們很難以暴力的方式來表達她們的反抗。女性氣質看上去要比男性氣概更加復雜，因此她們也許會采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實現某些目的（仍然是在對期望她們做的事情進行反抗），即操縱“女孩子們應該做的事情”中那些順從性的方面；而其他一些目的，比如說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情，她們則會采取一種更加“強硬”的風格（要么就是“厚臉皮地”借用男性的表達方式，要么就是“撒嬌地”夸張地使用公認的女性特點）去實現。無論哪種情況，與公開宣稱的女學生這一身份相比，“閨蜜”文化、浪漫以及特定的女性氣質似乎確為許多工人階級的女孩子們提供了一套更實用的文化機遇和滿足。

當然，學校對待女孩子的這些問題時也許往往不像對待男孩子的類似問題時那么單純和激進，對于男孩子們來說，學歷、流動和“人的發展”等概念仍然很重要。而女孩子們往往需要為她們的未來角色做好更加世俗、直接的“相應”準備：做家庭主婦或者秘書，打打字、燒燒飯、做做“家務”。[［14］](#_14_137)在女性“文化形式”的形成發展方面，學校可能更多地扮演的是“共謀”而不是“反對”的角色。不管是哪種方式，我們都不應低估女性氣質和羅曼蒂克這樣的創造性文化在女孩子們的生活中的角色，它們可能會引導她們走向未來所扮演的家庭主婦和賢妻良母的角色，同時也讓她們承受雙重角色壓迫的剝削：一方面，從事著技術含量不高、很辛苦卻工資很低的工作；另一方面，永無止境的“照顧家庭”的家務負擔。

失業和“文化形式”

除了日本之外，似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已進入失業高峰期，而年輕工人和畢業生受到的影響最大。[［15］](#_15_137)此外，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的勞工數量下降，而新興的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能補充的勞動力需求只能緩解部分問題。這些都意味著，我們已經不可逆轉地進入了高失業率階段，而就業的類型也已經改變。這是不是一個走向所謂“有閑社會”的基礎呢？這對本書中分析和展現的基本過程有著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們有可能看到一個新的、與這些“結構性”變化有關的大眾“文化形式”出現嗎？而與此同時，比方說，與體力勞動有關的男性氣概會不會喪失其作為一種重要文化主題的基礎，而家庭中的性別關系是不是也會發生變化？

就這些議題而言，在我看來，我們可能冒著一個風險，即在變革發生之前，就是在第一聲預響之時就宣布它已經到來！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全球性的衰退和經濟危機之中。這也許會讓我們夸大一些趨勢的深刻程度，這些趨勢也許會在經濟好轉之時失去一些現有特征。實際上，現在的官方失業數據令人震驚且不可原諒（實際失業率一定更高），這些數據表明社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失業率往往高度集中在那些衰落的行業聚集的傳統地區和衰敗的老城區，所以與其說是性質的變化，不如說是平衡關系的改變。此外，當前英國的官方總體失業數據顯示，只有大約15％的失業是長期失業。這一數據只是代表了那些登記在冊的失業人口，卻不包含那些在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前苦苦等待了很久的人，也不包括那些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長期無業的人——有人估計，在過去的十五年里，從丟掉一份工作到找到另一份工作之間的平均等待期已經從兩個星期延長到了三到四個月。[［16］](#_16_137)對那些無論何時都登記為失業人口的人來說，他們的實際情況也是處在兩份工作之間的漫長等待期或者正經歷摩擦性失業，而不是失業。

至于從藍領就業到白領就業的普遍變動，雖然我們可以看出其中的趨勢，但它也有可能被夸大或者誤判。需要記住的是，大多數工人階級勞動力仍然從事著體力勞動。作為先聲的“信息革命”，可能對制造業中的藍領工作，但更可能對信息處理領域的白領工作，即書記員、會計、保險管理部門等，產生深刻的影響；對制造業中的藍領們來說，主要壓力有可能仍然是老式的——勞動過程的“加速”和加強，而不是消失。[［17］](#_17_131)人們也可能不會注意到，許多新“服務”行業至今仍然主要是對主體或事物提供物質性的服務而不是金融和信息，這些行業看重的可能還是密集型勞動和體力勞動。作為文化生活主要特征的、與體力勞動有關的工人階級“文化形式”目前尚不太可能消失。[［18］](#_18_129)

不過，面對可獲得工作總量的相對較少以及青年失業的大規模出現，變化確實正在發生，也許尤其是就《學做工》這本書的目的而言，這種變化尤其重要。這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曾經討論過的某些過程嗎？關于這個問題，讀者們也許會比我回答得更好，因為在北美，人們早就經歷了這些在歐洲還相對較新的現象。我的回答是“會有改變”，但是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看來，確定的事情是，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并不會帶來一個新“有閑社會”的共同的一致性文化體驗，而是會促成一個更加不均衡和矛盾的兩極社會。

失業會對工人階級的“反學校文化”及該文化與帶薪工作的關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本書里的“家伙們”開始只能勉強接受帶薪工作。對于帶薪工作的無聊，他們會抱持一種高度現實主義的態度；放松的方式之一就是不時地逃工。學校里的“家伙們”期望時斷時續的失業，而這也恰恰是他們的經歷。總之，在假定的勞動市場要求和學校教育的文化過程之間，并不存在“緊密”的適應。只要尚未成為永久性失業，失業的增加就可能只表明一種變化了的比率，而不是文化過程在基礎層面上的新現象。我們也許會看到像工具一樣的、靈活的工人被不斷生產出來，但他們已經不再抱有什么幻想，而是情愿接受更長時間的失業。工作可能被去技術化，以至于工作的角色不再帶有那種“使命”或“事業”的主觀投入，而丟掉工作，至少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工作向終極發展的自身過程的一個階段：失業成為去技術化的最終階段！我們對工作吸引力的處理，跟處理失業“無聊”沒什么不同。對工人們來說，兩種情況下他們都會感到無聊。不同的是，就業時有錢拿，失業時沒錢拿。

總之，我們也許面對的是一種過程的擴展，而不是它的轉變，對于學校里的類似過程以及面對工作減少時的消極態度也是如此。隨著“工作經歷”，或許我們應該說是隨著“工作／非工作經歷”（這種表達更準確地反映了“底層無產階級”一直經歷的實際體驗，他們時刻準備著應征做工，卻并不能總是如愿）的總體質量，以及滿意度下降，并且隨著假冒文憑等情況的增加，本書所討論的某些基礎文化過程的動力會有所增加。這不會導致“文化形式”的轉變，而是會放大我們的“文化形式”，甚至夸大某些文化特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反意志主義、對學校的不滿以及對體力勞動的矛盾定位，也許會增加。例如，盡管體力活動可能仍是男性氣概的關鍵支點，但其在工作中的應用范圍會越來越小，學校中智力教育的矛盾越來越多，這些都可能會導致學校和其他場所中暴力和反社會表達的增加。

此外，我們在評估時不能忽略國家這個因素。教育與涉及勞動力規劃的政府機構并不是瞎子。有可能發生的是，年輕人對工作的態度會“惡化”，而學生畢業之后長期“瞎混”也許會消解他們對工作的投入（一種由各種地下的秘密文化過程所制造的投入）。這兩種可能性已經導致在工作和學校、拓展的教育形式、工作體驗項目、“弱勢群體”的“機遇”項目或者相關的志愿或慈善項目之間建立起了各種各樣的“聯系”，試圖防止新一代成為“失落的一代”。[［19］](#_19_130)1這些項目如果能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并對與本書的描述相類似的過程給予支持和擴展的話，那么即使是采用了某種矛盾的方式，甚至常常以“錯誤”的理由為出發點，它們仍然有可能取得某些成功。

盡管有了這些考慮和論證，很清楚的一點是，在未來為年輕人提供的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工作將越來越少。這本書有沒有指出誰有可能獲得這些工作？與這一類型有關的、更為普遍的文化變遷——不管是在校內還是校外——有可能是什么？更加嚴酷的市場環境可能會加劇雇員間的競爭和對失業的恐懼，這最終會提高對非技術和半技術體力勞動者的雇傭條件——要求更高的“文憑”、更好的“態度和才能”（實際上意味著更嚴格的勞動紀律）。這有可能使更加循規的學生獲益，并因此強化學校中和本書所描繪的教育范式里的各種循規者文化。但是，與此同時，那些要求具有更強烈工作動機的職業可能會引發完全相反的感覺，尤其是以集體文化的模式。[［20］](#_20_128)從長遠來看，大多數體力工作將無法承受這些更多的人力投資所帶來的壓力。盡管恐懼得到抵消，但最終仍有可能出現更頻繁的職業變動，或者明顯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因此，我希望雇主們能以文化“現實主義”緩和自己雇傭“素質更高的”勞工的宏大抱負，并關注新員工對自身滿足感的低抱負和低期望。大致來說，雇主也許會更喜歡一個守紀律和膽戰心驚的“家伙”，而不是一個試圖發揮全部才能的、熱情的循規者。這在那些“短暫性”成為薪資交易的一部分的行業里尤其如此：季節性的、零散的或者臨時性的工作有可能隨著“服務經濟”的增長而增加。此外，一些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男性工作機會可能會保留下來，代價是類似女性工人的失業——至少在英國，這些女性是當前失業率上升最快的群體。即便面對平等機會的立法，女性的處境也經歷著相應變化，而在媒體和政治辯論中，人們越來越強調女性應該扮演的家庭角色和女性的使命（結婚和相夫教子），這絕對不是什么巧合。

總而言之，那些并不完全循規、注重文憑和才能發展的男孩子，在畢業離開學校后找到工作的機會并不會完全消失。因此，與這條道路有關的“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徹底改變。可能改變的是“文化形式”的內部張力和矛盾的特性。

那些走出校門的“家伙們”，不管是步入工作崗位，還是參加各種過渡性質的培訓項目，都仍然可能對很多工作表示出搖擺而易變的態度。只要還能找到工作——不管是合法的、半合法的、官方的、非官方的、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他們也許就不會感受到有限的機會嚴重地限制了他們的自由。[［21］](#_21_129)即便意志主義和學校教育可能被拒斥，學校和工作之間的那些教育拓展、聯系、橋梁——盡管處于一種半制度性的狀態——仍然可能被這些人勉強接受，他們將這些當作最現實的就業途徑，通常給他們一份比救濟金稍高的薪水。至少在英國，許多類似的項目，尤其是有關“工作體驗”的項目，確實成為雇主們雇傭廉價勞動力和篩選員工的一個渠道。工人階級文化的形式，比如“反學校文化”，為“家伙們”提供了某些文化上的延續性和技巧，使得他們既能夠抓住這些機遇，也能夠被看做是“適應社會”的人，從而“成功地”為雇主扮演“成年工人角色”并滿足他們的“期望”。

在某些方面，循規者可能在“新”處境下反而過得更糟。他們對工作的選擇更加慎重，他們與官方規定的關系模式也不同，因此他們會更加嚴肅地對待那些繼續教育項目（以及虛假的文憑和過渡項目），認為它們真的有助于個人發展、擴展知識，但實際上它們并不能做到這些。當然，到目前為止，那些提供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工作的雇主們希望將自己的產業“升級”，而且愿意把文憑（如果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參考的話）當做是檢測應聘者的勞動紀律和忠誠的指標，這些都使得循規者在應聘中處境更有利。如此一來，循規者也許會發現，他們最終的職業“體驗”非常令人不滿，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也許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幻滅感”，而“家伙們”卻不會有這樣的感覺。情況很復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但是大體上說，這些過程與本書中所描述的那些相似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很可能會繼續下去，變得更加極端和激烈，而“底層的無產者”的狀況也會進一步惡化。《學做工》中所分析的一些深層次的過程很難被打破；年輕人可能在失業很長時間后仍深陷這些過程中。許多年輕人仍然會被認為是不愿意工作，而那些基本的男性氣概特征仍然會是他們文化風格中的主旋律，我認為，這種文化風格的形成是集體性的，而且一部分是在學校里形成的。失業也許會讓這種男性氣概面臨危機或陷入停滯，讓“家伙們”感到恥辱、壓抑或者憤怒，但是強調男性氣概這一點不會被取代，也不會與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去工作這樣帶有矛盾情緒的意識相分離。事實上，我認為，雇傭勞工和剩余勞動力大軍之間文化上的連續性會繼續存在下去。[［22］](#_22_129)這兩者之間平衡關系的改變，并不需要對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做出什么深刻的顛覆。

反響和實踐意義

本書于1977年在英國出版時收到了廣泛而熱情地評論。我還與教師群體、成人教育班、社區團體和社工、職業教育教師、激進教育團體以及社會學研討會和社會學學生社團進行過討論。我們已經對這些討論引發的一些實質性批評進行了考察。對在美國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的某些更加詳細的批評進行探討是值得的。最后，我將對這本書可能具有的實踐意義做進一步的評論。

有人批評這本書缺乏對方法論的討論，而數據的“可靠性”也遭到質疑。在一次討論中，有人指責說，整個故事都是我編造的，“因為一個‘家伙’在附錄中是這么說的”[［23］](#_23_129)。一位抱有同情的評論者挖苦地給我的方法起了個綽號，“魚肉薯片”民族志，就像電影導演塞爾吉奧·萊昂內所拍攝的“意大利式西部片”一樣。[［24］](#_24_127)他批評說，我對小群體、對話和細枝末節（或者，這比較瑣屑？）的特別關注，使得我未能對更多和更廣泛的正式制度進行嚴格考察。許多人都聲稱，要從我的發現中推導出普遍性的結論，或者重復我所做的研究，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往往也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進入田野；等等。我曾無數次地與人爭辯：反學校文化涉及范圍如何廣大，占學生人數的百分比是多少，甚至我在書中所描寫的某些群體或個人到底是否屬于反學校文化。實踐者則抱怨這本書被分成兩個部分，還說末尾的某些描述有些機械。有些人覺得這本書的整個分析對老師來說都太悲觀和苛刻。還有人覺得我的分析過于“集體主義”，應該更多地對個人情況做出回應。一個更加右翼和令人擔心的回應是，提供什么都沒有意義，因為總是會被反對，而既然文化過程歸根到底是要讓孩子們對社會結果做好準備（當然是他們功能主義或者右翼視角下的社會結果），那么就應該放手讓他們自己去經歷這些，或者更憤世嫉俗的一種說法是，經歷“加油”的過程，以更好地實現目標。例如，職業教育應該關注“文化形式”所拋出的“非官方”標準，而且應該將“自感”的過程簡化為“雇傭角色”。工人階級子弟想要工人階級的工作！我們有什么好擔心的？幫他們一把！

至于最后一點，總是有一種危險，那就是把“進步的”知識和洞見變成了娛樂性的目的。知識是一把雙刃劍。我們這個社會中存在著階級威脅，而在資產階級霸權的情況下，哪些東西“可以說”其實是有很多嚴格限制的；在我看來，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斗爭中，這把雙刃劍確實會帶來風險。總而言之，這本書所展示的全部分析，對于對此接受了一半的那些人來說就是定時炸彈。他們已經忘記了本書后記中所強調的反抗和“文化形式”的動態運動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盲目地發揮反學校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也會導致這樣的后果。此外，即便對本書所展現的最糟糕的闡釋和行動，即“加油”范式來說，憤世嫉俗地承認這些實際的文化，也比試圖將它們作為“病態”來鏟除，或者荒誕地把它們描述成妖魔文化更為可取。以這些誤解為基礎而提出的“解決方案”有可能是非常冷酷無情的，因為這些方案的對象從來沒有被看做是真正的人。

當然，我反對任何與“加油”有關的主張。此外，我的分析絕對不是在“反對或者削弱學校教育”。教育在某種程度上能促進社會流動；這一點必須得到加強，方法則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條件、教育改革、對中產階級的特權進行積極消解，以及對有助于使中產階級教育道路更平順的文化轉變提供制度上的和其他形式的支持。[［25］](#_25_125)即便對那些違規者來說，學校也是一個比工作場所更好和更安全的地方。我們也不應該落入這樣一種陷阱中，即為“非學術”教育設立專門的課程。這種做法實際上會使“非學術”教育變成一種二等教育。在我看來，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應該至少部分地接受一種文化和社會課程，并借此接觸到結構性、歷史性和政治性問題，這就像那些違規者應該始終可以獲得財政上的支持去參加學術課程一樣，也許當他們有可能再次接受教育的時候，這可以作為一種繼續生活的選項。

所有的這些，都沒有直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對于班級里的那些違規生，我們該“怎么做”？這些孩子，即使面對那些我們應該爭取的機會，也會無動于衷。給美國的教師們提出具體的建議，這會顯得我尤其自負；我的目的基本上是做出一個有效的分析，相關的人士可以從他們自己的條件出發，綜合考慮他們自己的分析，采用和改寫、檢驗和修正我的分析。這一領域的實踐永遠都是多種多樣的、試驗性的和靈活的，永遠與學校實際師生構成的復雜情況以及每個學校不同的人事和政治狀況有所關聯。不過，在我看來，所有的這一切都與某些總體性原則有關。我的評論不應該被看做是一套僵化的指南，而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鼓勵，讓人們去感知一種關于知識的“文化政治”。[［26］](#_26_125)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要求我們不再將教育看做是一種國家提供的、中立的工具，用來砍伐、清理那些落伍的、“愚昧的”文化灌木叢，正是這些文化使居民陷入歪曲與誤解中。這么做的目的，是切除和破壞那些“壞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往往是學生們走向真正未來的最好指南，與未來以及未來實際上將如何展開聯系緊密。若想對教育進行更廣泛的考察，使它與當前“學校教育”的做法有所不同，就必須承認和重新評價這些文化。[［27］](#_27_121)

但是，鼓勵人們去感知這種文化，并不是說許多孩子都屬于本書所描述的這種文化，對美國的讀者來說，更不是那樣。當我們采取實際行動的時候，重點應該是靈活性和流動性，也許會與確立基本“文化形式”所必需的嚴格要點產生某種程度的緊張。“結論”部分現在讀起來有點像是過于機械的“實踐”，對美國讀者來說，有點像是一種過于僵化和“理想”的男性反學校文化。對于你們的大多數學生來說，也許有許多其他的因素會產生影響，包括普遍意識形態過程、工具主義、個人主義、文憑蔓延的意識形態力量（它幾乎是成為勞動力的必備條件）、大眾文化的入侵，以及對失業的恐懼。也許，對北美的人們來說，記住這些尤其重要，因為在北美，排憂解難的政府、志愿性的“過渡”項目以及學歷的泛濫，都有著長久得多的歷史。此外，在北美，人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似乎更強調個人因素和某種心理因素，這必然會打破、遮蔽或者撕裂本書中所描述中的某些過程。我在加州大學和多倫多大學進行訪問教學的時候，就已經被告知：反抗的文化“并不存在”，文化現象已經被壓抑或者被完全從個人角度考察。比方說，我常常被告知，班級里“傻瓜”已經多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而常對“搗蛋鬼”做出的處罰就是把他們“轟出教室”，在一間小黑屋里關上“很長一段時間”！據報道，一個“內向”的女孩在學校里受人嘲笑，她的父母不得不搬家。由此可見，對女孩子們與性有關的行為進行控制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更別提她們本來必須遵照的社會群體規范和女性文化），所以校長們常常要女孩子們回家換下那些“過于暴露”的吊帶衫才能回學校。“文化形式”并不需要被一一點明。我們在處理的是某些一般性共同文化過程的趨勢，有時候還有那些看上去“沒有聯系”的日常事件之間的關聯的趨勢。當然，壓制確實管用！如果“搗蛋鬼”被鎖到了小黑屋里，那么某些本來有助于形成反學校文化的文化和社會過程也就被禁閉了起來（但沒有被摧毀）。一旦個人和某些心理范疇占據了上風——也許某一天，每一個叛逆的孩子都會配備一位心理咨詢師——那么普遍性的社會過程很快就會被轉化成個人“失敗”。所有這些無一是在詆毀“文化形式”的意義，而是在更緊急地敦促人們在學校里的所有人都“接受心理調查”之前，承認文化形式的多樣性和彼此之間的聯系。

此外，雖然有一些孩子受到某種“文化形式”，比如本書中所描述的“家伙們”和反學校文化的影響明顯而深入，但是還是有許多孩子只是部分地受到這一文化的影響，而同時受到其他“文化形式”的影響，所以他們也許有時候會表現得叛逆，有時候卻不會。雖然反學校文化的形式只影響一小部分人，但是它也許應該被看做是一種其他群體可以在特定時間里運用的資源，而不是一種人們必須遵守的嚴格制度。在任何一種具體情況下，以下幾點都非常重要：分析各種力量之間的平衡，調查哪些溝通有可能在哪些情況下發揮作用，還有考察學校里豐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之間的共同特征——循規和違規的男孩和女孩的文化，以及不同種族或階級的孩子在反抗時的各種形式——從而以和而不同的體驗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既給人自由又靈活的教學方法。[［28］](#_28_121)這可以用來判斷在這些文化中哪些東西被“洞察”了，同時批判和曝光其中的破壞性和限制性因素，探索不同類型的“實踐陷阱”或“體驗誘餌”的性質。總體來說，這有助于我們弄清學生和學生之間、學生和老師之間的各種關系，從而有可能為學校里的積極的目標或斗爭做出貢獻。這本書只是為一組文化原則和社會動態機制提供了方向，而社會現實也許要復雜得多。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我之前說過的主題，即文化“層面”的相對自主性，而且我還要指出，文化也許不僅在結構和結構性決定因素方面是相對自主的，而且有時候針對具體的個人也是如此。即便如此，它們還是從學校里的反抗文化中吸收新人，例如本書里所說的“家伙們”不會一輩子都在胸口貼塊牌子，上面寫著“違規者”。實際情況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常常在經歷過當地職業市場的磨礪之后，在工作中變得非常聽話，他們看上去已經找到了“事業”的終點，而這些工作也確實許諾給他們美好前景。至少，本書中的一個“書呆子”在經歷了工作中的挫折之后，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非常叛逆和“難辦”的人。本書的焦點正是一種“文化形式”，而不是十二個互不關聯的人。你在學校里認識或一起工作的某些特定個人或者群體也許并不會明顯地攜帶、表現和創造我所描述的“文化形式”，但這并不意味著你自己對那些也許表現形式不同的“文化形式”所做的分析沒有意義。

這也回答了某些我所提出的方法論上的問題。在從事研究和寫作這本書期間，我的目的是展示一種文化的符號性和建構性形式，這種文化由群體中的個體創造，并通過活生生的方式傳遞，但是這并不是它們獨有的，而有可能在類似的環境里大規模地重現，并且可以從某種普遍目標出發來進行分析：不僅有它們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分工，還有它們在將勞工們引入勞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要對這十二個人的一生做一個全面的人類學意義上的解釋——雖然確實應該在別的地方這么做，包括分析他們的體力和心理發展、與性有關的行為、家庭體驗、他們在整個社區里和本地生活中的具體經歷。我關注的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形式”中的某種特定的文化和符號過程，也就是說，主要關注的是學校以及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期，但并不做中立的類型學的描述。也許，為了與人類學的方法區別開來，我們應該稱之為“文化民族志”。

我還相信，“文化形式”和行動只能通過直接的田野工作，以一種有效的方式進行研究。作為實現“代表性”之有效性的唯一令人滿意的方式，“普遍性”（也就是問卷調查）并沒有足夠的深度來報道和展現文化的創造性生命。問題并不在于定量的證據或者精確性（雖然我并不否認它們的功用），而在于涉及到文化或者生活的方式是否得到了正確報道，以及是否以一種真的再現原本狀態的方式呈現。一個人的反應和體驗，哪怕是說話的方式，也許也會比一整套關于“態度”的科學問卷能揭示更多關于“文化形式”的內容。而這是真是假，部分地取決于它在回應中如何觸及到其他人的體驗。

因此，這本書向你展示的，并不是一項關于美國反學校文化的詳細的科學指南，也不是一份用來確定你是否有一個好的“標本”的態度清單，更不是一份關于如何對付叛逆的孩子的藍圖。這本書是靈活的和開放的文化分析的一個例子。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它只是指出了某些一般性的指導原則和有意義的出發點。它試圖將真實文化世界里的某些世俗之風引入到社會分析中來，并指出教育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以及作為某種不僅僅局限于學校教育的制度，必須傾聽這些聲音并與之對話。

就當是叨嘮一場，或者自己給自己壯膽吧。

保羅·威利斯

1981年6月于英國伯明翰

注釋

[［1］](#_1_194)與當前美國“僅僅”7.5％的全國失業率相比，這一數字很高，但是英國各地的情況很不一樣，在東北部的傳統制造業區失業率要低得多（《衛報》，1981年5月）。

[［2］](#_2_185)“并發分析”和下面的“有機分析”都是意大利理論家葛蘭西提出的分析方法。——譯注

[［3］](#_3_178)已發表的英國議會議事過程的記錄。

[［4］](#_4_176)我的另外一本書，《世俗文化》，展現了20世紀60年代末英國青年中流行的兩種“文化形式”：嬉皮士和自行車男孩。

[［5］](#_5_168)比方說，阿爾都塞的理論模式就是這樣主張的。參見L.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B. Cosin,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Penguin, 1972）。

[［6］](#_6_162)參見S. Bowles and H.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Basic Books, 1976）; L. Althusser, 同前引文; P. Bourdieu and J. Passerron, Reproduction （Sage, 1977）; C. Jencks et al., Inequality （Basic Books, 1972）。對英國經驗的回顧和詳細的歷史分析，參見CCCS Education Group, Unpopular Education: Schooling and Social Democracy Since 1944 （Hutchinson, 1981）。

[［7］](#_7_160)關于英國的“教育失敗”，請參見一份觸目驚心的報告，見第一部分注釋［12］。關于美國的情況，可以參考S. Webster, The Disadvantaged Learner （Chandler, 1966）; F. Riessman, The Culturally Deprived Child （Harper and Row, 1962）。

[［8］](#_8_160)我不想否認這些項目中的一些內容確實有價值，尤其是它們對教育者和地方社區所產生的激進影響，我也不想質疑參與者的動機。只是，這些項目的目標都太龐大了。奧黛麗·戈德芬奇在1980年夏天于多倫多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向我強力地指出了所有這些問題。

[［9］](#_9_152)由于篇幅所限，我在這里不能一一指出阿爾都塞、布迪厄以及鮑爾斯和金蒂斯這些人在這一領域各自做出的不同貢獻。有關的分析，可以參見我的文章“Cultural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Reproduction”, Interchange （Toronto）, 1981, II：4。

[［10］](#_10_150)這是邁克爾·阿普爾在對《學做工》的一篇內容異常豐富的評論中提出的有力觀點，參見“What Correspondence Theories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Miss”,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Boston） Spring, 1979。

[［11］](#_11_146)對此的一個綜合和擴展，可參見我的文章“Cultural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Reproduction”，同前引文。

[［12］](#_12_144)參見Angela McRobbi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 in Screen Education 34 （Spring, 1980）。

[［13］](#_13_140)這一部分涉及的討論來自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權主義者們以及安吉拉·麥克盧比發表的著述。參見Angela McRobbie, “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 in Women’s Studies Group, Women Take Issue （Hutchinson, 1978）;“Jackie, and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53; 以及即將發表的“Young Women and Leisure: How Working Class Girls Get Working Class Husbands”。還可參見Chris Griffin, “Report to the SSRC on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of Working Class Girls Project”, 該文獻可從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獲得。

[［14］](#_14_136)這個觀點是最近我在伯明翰與簡·加斯克爾討論的時候，她向我簡明提出的。

[［15］](#_15_136)在1981年1月的英國登記失業人口中，大約40％不到二十五歲。如果不考慮“特殊項目”，主要是為最近幾年的畢業生設計的“青年機會項目”，那么登記失業人數將會達到37萬以上。參見Employment Gazette, 1981, 89:4, S5 and 31。

[［16］](#_16_136)參見W. W. Daniel, “Why Is High Unemployment Still Somehow Acceptable?”, New Society 55: 957 （March, 1981）。

[［17］](#_17_130)就在人們對英國的制造業衰落感到憂心忡忡的時候，人們也許忽視了服務業其實也在衰落。1980年，服務業就失去了25萬份工作崗位。Employment Gazette, 1981, 89:4, S6。

[［18］](#_18_128)這個論點并不是要貶低從女性主義、生態、城市等角度出發的論點的重要性，而只是在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可以從這些運動推斷出事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而且，政治本身也是有相對自主的。

[［19］](#_19_129)值得注意的是人力服務委員會的崛起。在英國，這個部門通過“青年機遇項目”負責勞動力，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安置和培訓工作。該部門的目標有，比方說，“讓受訓者適應正常的工作環境，保持警醒的工作態度，比如守時、守紀，與其他受訓者和主管保持良好的關系”。（引自Unpopular Education, 同前引文，第235頁）。很明顯，人們害怕工作本身的總體方向會消失。在不知道這樣的方向起初是如何產生的，并且留心學校“降低標準”和“缺乏紀律”這樣的批評的情況下，總體性的解決方案似乎就是提供某種制度擴展，至少試圖更加服從于“產業需要”。盡管這些課程有著技術和組織的形式和名稱，但是實際上，它們卻是一種文化上的防守措施，目的在于維持體力工作的節奏、使人們接受人們勞動、支持“反意志主義”，以及加強工作紀律。“青年機遇項目”的課程越來越多，而且在英國，它是唯一躲過經費縮減的政府項目。1981年3月，實際上又有200萬英鎊的預算被追加給了人力服務委員會。

[［20］](#_20_127)參見第二部分注釋［42］就這些展開的長篇討論。

[［21］](#_21_128)至少這些活動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是“非正式”或者“黑色”經濟，也就是那些沒有在稅務部門登記的生產和經營活動。1980年在英國，國內稅務局的常務秘書對此的官方估計是，這些經濟活動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7％（根據倫敦《衛報》1981年5月7日的報道）。

[［22］](#_22_128)這種延續性至少存在于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勞動力大軍”的“漂浮”層和工薪族之間。他將這與“潛伏層”（那些有可能被招募進勞動力大軍中的人）和“停滯層”（那些就業狀況非常不穩定的人）區別開來。參見K. Marx, Capital, vol. 1. Aveling and Moore translation （Allen & Unwin, 第57版，第656—664頁）。

[［23］](#_23_128)這個人所指的段落是：

喬伊　嗯，我現在可以直接告訴你，這里沒有一個是捏造的。

克里斯　我在那里讀到的90％……我其實能想起來。

在克里斯說“90％……”之后，其實有一個停頓，而評論指的其實是后面的話。他當時不知道該選什么具體詞來表達他實際上經歷過這些事情，而不是在指之前喬伊所說的“捏造”。這就是對文本進行解讀時確實會遇到的危險！

[［24］](#_24_126)Gord West, “Cries from the School Corridors of North York, Birmingham and Tyneside”, This Magazine （Toronto）, October, 1980。

[［25］](#_25_124)我在《文化生產是……》一文中對此做過更加系統性地陳述。參見前引文。

[［26］](#_26_124)這部分與我如何看待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一般性責任有關。雖然我已經試圖承擔直接的責任，對本書進行了反思，與個人和群體討論了它的實踐意義（參見“補充訪談”），但是研究能夠在更廣泛的政治和教育平臺上獲得積極運用，才是主要的收獲和回報。

[［27］](#_27_120)還請參見我在《世俗文化》一書最后一章里對“解碼”、“文化形式”的評論。參見前引文。

[［28］](#_28_120)要想了解更多有關這些建議的信息，可參見P. Willis and P. Corrigan, “Cultural Forms and Class Mediations”, i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II: 3 （1980）; P. Willis and P. Corrigan, “Orders of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of Working Class Culture”, Social Text 4, 1981。

# 中心與邊緣：保羅·威利斯訪談[［1］](#_1_197)

1969年到1981年，保羅·威利斯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在那里，他于1978年發表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研究的是嬉皮士和摩托騎士的亞文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977年出版的《學做工》，這是一項具有突破性的民族志研究，討論的是英國一間教室里的工人階級男性氣概的形塑。他還在青年政策領域集中發表了大量著述（1986; Willis et al. 1988; Willis et al. 1990）。他最近的著作是2000年出版的《民族志的想象力》（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他還是《民族志》（Ethnography）雜志的創始人兼高級編輯。

作為人類學的學者，我們做這次訪談的動力主要是一種非學科性的好奇心。英國人類學曾對“它”的方法論在同源學科內表現出一種刻意的忽視，但是后來轉向了一種政治化的運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轉變？為什么一系列起始于伯明翰大學文科大樓外面一座灰皮活動小屋[［2］](#_2_188)的辯論，至今仍被當作傳奇而為人津津樂道？這個訪談有助于我們回答這兩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歷史感，讓我們知道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在研究出版工作之外的日常行政和學術活動。人們很少承認的是，“中心”內進行的教學活動，比如研究生[［3］](#_3_181)主導的、相互協助的工作環境，實際上構成了日后理論創新的前導。只要教室里的權力關系和學習的政治依舊被當作是學術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東西，這種情況就不太可能改變，即有一些工作就是不太容易獲得承認。

我們于2000年5月在保羅·威利斯的家鄉伍爾弗漢普頓市與他交談了一整天。那個地方被稱為“黑郡”，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它繼承了“黑乎乎”的傳統，故得此名。你現在看到的這份合力完成的文稿，正是來自于我們那天范圍廣泛的談話。那些話題既有（通過對形塑地方政府政策的可能性的樂觀討論而展開的）對他自己生活故事的個人反思，也有對人類學和學術界當代趨勢的一些尖銳評論。我們按照三個大主題對這次談話的內容進行了編輯和歸類：“童年和教育”、“教學和研究”、“民族志和理論”。保羅最近經常將自己描繪成一個“知識上的破壞者”，而在這次對話中，我們也能不時感受到他自己打破偶像的氣魄。不過，這種打破偶像的行動在他那里是一以貫之的。不管知識界的時尚如何變幻，他始終堅持一種人文創造力的模式，同時承諾要將理論與政策和實踐聯系在一起——他為充實的學術生涯樹立了一個勇敢的典范。

第一部分 童年和教育

在學校的日子

順著《學做工》這個例子，我們能不能從你自己的童年和學校經歷開始（我們的談話）？這段經歷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后來的職業和知識生涯？

我于1945年出生在伍爾弗漢普頓市，也就是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這是英國中部的一個工業城市，離伯明翰不遠。我猜我的文化背景應該是工人階級的，也許有一點點布爾喬亞。我的父親是一個木匠，后來成了一個“總工頭”，也就是建筑檢查員，為地方當局工作。再后來，他創辦了自己的小房地產生意。

我非常小的時候，九歲，我的母親就去世了。我的父親就像是一臺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動機，他有能力、干勁和責任：一個單身父親照顧兩個孩子，也就是我和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四歲）；而且還在生活中獲得了經濟上的成功。除了不是核心家庭這個缺憾，我們的關系非常親近，是一種非常有男性氣概的氛圍和關系。對他的家庭，我的父親雄心勃勃（“我做的都是為威利斯家好”）；而且他對那種經典的“底層現代主義”持樂觀態度，也就是說，“通過科學和勞動的力量，什么事情都會越變越好”，他用這樣的理性思想來看待生活。雖然希望孩子在學業上有出息，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在母親去世后不久就強迫我們跟他一起到建筑工地上勞動。“強迫”這個詞不對，事實上，那只是一種期望。家里的氣氛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典型情緒：期望值在升高，那種控制自然、控制世界、控制你自己的未來的感覺與日俱增——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就是一種非常強調男性氣概的感覺。在學校也是這樣，運用理性和實際就是一切。……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活動全部都是實際的和科學的，在任何事情上我們都被鼓勵去努力奮斗，不僅僅是在學校。

我上的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文法學校”。那個時候實行的是“11+考試”，也就是從所有十一歲的孩子里選撥15％左右的人去上精英性的文法學校。我的父親對我選擇文法學校和相對精英的教育很支持。他覺得這都在計劃之中[笑]，事情進展得很完美。所以，我的背景是什么呢？一種很特殊版本的上進心：一個典型的霍加特式的“助學金男孩”的故事[［4］](#_4_179)，即通過文法學校體系被選拔去接受好的精英教育。事實上，我是我所在的文法學校里唯一一個后來到劍橋念書的學生。

這段經歷有沒有讓你——用《學做工》中那幫“家伙們”的話來說就是——成為一個“書呆子”？

回過頭來看，很清楚的是，我必須在一種逆境中發奮圖強。那個學校非常強調成績和操行，但是與此同時，那所學校的絕大多數學生都是工人階級子弟。那里的文化是粗獷的，極少數學習努力的孩子和不那么刻苦的孩子之間涇渭分明。我在學校常常感到害怕。當法語老師點我的名，強迫我用法語說話的時候，我覺得很尷尬，我就覺得我不能這么做，不然就會受到老師和其他同學的嘲笑。這讓我一生都沒學到多種語言。我常常哆哆嗦嗦地躲在課桌后面，心想下一個會不會點到我啊？

后來我喜歡上了學校，或者說至少我覺得能搞定。這一部分是因為體育，尤其是英式橄欖球賽。學校那個時候已經由英式足球轉向了英式橄欖球，試圖提升它的形象，看上去就像是一個高貴的“公學”（英國對私立學校的稱呼）。我長得人高馬大，是運動型的，總之，強壯的那種，于是在只有十五歲的時候就被選入了第一梯隊。當時這還不太尋常，與一幫十八歲的男生一起比賽，在年齡上差距還很大。感覺那就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尤其是我們嚴厲、專橫和令人生畏的體育老師，瓊斯先生，突然以昵稱“威爾”喊我的時候。但是，對其他老師來說，你只是“威利斯”。但是突然之間，很顯然由于你出奇地被選拔到了第一梯隊，在同學面前，在女孩子和女士們面前，人們就開始對我說：“威爾，周六見哦！”我成了同齡男孩子中的男子漢。我想，體育尤其是需要身體接觸的體育運動，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舞臺，在那里，你能獲得“亞文化”上的名聲和學業上的名聲。老師們買這個賬。調皮搗蛋會被容忍，甚至會被看作是可以接受的具有男性氣概的表現，這樣的話，循規或者過于守規矩，都會被看作是女人氣。在我的早期生涯中，英式橄欖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用來表達某種獨立、健壯，（表明我）不是一個“書呆子”；但是這種方式又不會讓我把學習成績搞垮。

你當時決定專攻理料，要得高分？

在我整個學生生涯中，我的理科都學得很好，在O-level考試[［5］](#_5_171)之后，我還得了一個學校的物理獎。很詭異的是，學校選擇以奧瑪·珈音的《魯拜集》作為給我的獎品。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學家也是橄欖球運動員，文科是女孩子學的。對詩歌和戲劇感興趣絕對是娘娘腔。我記得很偶然，我的一位老姑媽去世了，我得到了一本拜倫的詩集，是一本很古老的維多利亞時期的裝訂本；她將這本書遺贈給我了，或者至少是傳給我了。有一天晚上，父親把書帶了回來。那個時候我大概是十六歲左右，我就在睡覺前開始讀。我記得我被浪漫的詩句徹底感動了，我在高中第一年[［6］](#_6_165)度過一半的時候遇到了一個重大的危機，那個時候我在主攻物理、數學和化學。我物理學得很好，而且我覺得現在我仍然有一點點物理學家的影子；我喜歡那種精致、有效和清晰的推理過程。只是我沒有那么感興趣。與此同時，我真的被那些浪漫的詩句所觸動，那些詩句就像是在跟我對話，觸及我青春期的那些迷茫，以及我對自己身份的掙扎：我是一個肌肉發達的、玩橄欖球的科學家呢，還是一個在周末被父親拉到建筑工地上干活兒的頭角崢嶸的包工頭呢？

或者是一個詩人？

嗯，是的，我當時試著去寫詩。我必須夸贊一下我父親：我向他解釋了我的兩難處境，他很開放，沒有強迫我。他覺得這很詭異，他不知道我會成為什么樣的人，學校也不太喜歡（我這樣）。不管怎么說，在向周圍的人咨詢了一圈并經歷了某種家庭危機之后，我轉到了文科：文學、歷史和地理。這是一個很脆弱的決定：我本來可能很容易地就會想“我很蠢”，然后繼續盯著物理和化學不放。你知道，我至少可以有一個不同的生命歷程。但是，突然之間，我看上去適應得不錯，在18個月之后，我的英語課就得了A，20個月之后，我就坐到劍橋的課堂里開始學習文學了。

劍橋

那是我父親的錯！在我得了A之后，他說：“你知道你會得到這些A，那么你為什么不去牛津或者劍橋呢？”但是我的學校沒有去牛津、劍橋的傳統，到今天這也要走一個非常特殊的路子，所以在1963年的夏天，我給牛津和劍橋的所有的學院都寫了信，包括女子學院——因為我不知道哪個是哪個。我問那些學院，有沒有機會在最后擠進來？牛津的圣彼得學院和劍橋的彼得豪斯學院在還剩四到五周的時間里錄取了我。我選擇了彼得豪斯。

劍橋令你感到震撼嗎？

是的，我想是這樣。它完全是突然的，那是我在劍橋的實際體驗，在知識層面上，我完全并且幾乎立刻就讓人感到失望。我很快意識到，我其實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不理解那些講座，牛劍著名的導師體制對我不起作用。我很快就形成了一種印象，那就是導師們覺得我是一個從“黑郡”來的工人階級的“野小子”，由于某些錯誤——也許是某種為失業者提供培訓的項目或者類似的什么機會——才能來到這個地方瞎混。幾周之內，低年級交誼廳的指南上出現了一則從一所老牛劍“公學”轉來的笑話：“交誼廳這學期的情況顯著惡化，因為來了一些看上去不能說純正英語的人。”我很確信，這其實指的是我。到現在，我都不是特別清楚我怎么惹毛了彼得豪斯，那里一直是老派右翼保守黨和輝格黨歷史學家的堡壘。到底是因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從來沒問，我從不問這個。我很天真，不懂事地在一個老派的、充滿特權思想的堡壘里徘徊，不僅僅是校園生活，而且很古怪，在課業上也這樣，一個學期不到我就迷失了。

因為它的經院主義？

是的，然而那時我把這些歸因為自己能力不足。我只是覺得沒有能力。有了那個想法之后，我幾乎是不可思議地發現，我再一次地站在了邊緣。小組討論和精讀課把我曝光，對我來說完全是痛苦的來源。我們會找以前沒見過的一首詩或一篇文學作品，然后你要對它做出評價，試著把它放到某個脈絡中。那些“公學”的孩子們擁有的對文學深層次的歷史理解、口語表達上的信心和優雅，讓人感到害怕。事實上我只知道莎士比亞和浪漫主義詩歌。我甚至不能悠然地告訴你英語的時期、大致的階段、流派、分類。這些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更糟糕的是，我不敢開口。而且，我無法搞清楚這套講座體系運轉的節奏或原因。我就是無法把這些講座與我每周要寫的作業論文以及要上的精讀課聯系起來。我們再一次可以回到某種社會科學上的范疇以解釋這種情況：我現在把當時遇到的所有困難，看作是我文化資本相對缺乏的表現。我曾經是一個到那里求學的前途光明的工人階級子弟，期望取得什么成功，但是基本上，我卻被語文弄得沒精打采。如果說當初我還覺得自己有一點點文學氣質和小聰明的話，現在我開始覺得，自己基本上就是一個笨蛋。

我第一學年得了個三流的排名，這很令我尷尬，因為我曾覺得自己應該在這里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暑假結束之后，我不想再回學校。我與老家的朋友們待在一起的時候感到更快樂。不過，我也跟文學死扛上了。這部分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項試圖發展對他人已有的知識的工作。慢慢地，我的情況開始好轉，最終我的學位是“下二等”[［7］](#_7_163)：我努力地跳出他們的包圍，但是并不是特別清楚這些包圍到底是什么。

正像以前一樣，在社交活動中，橄欖球再一次拯救了我。我參加了學院的球隊，成了“小圈子里的頭”，甚至在校部也有影響，我家鄉的地方媒體還做了報道，中學母校的演講日上，這還被當做光榮事跡做了介紹。我當時還是傾向于回到伍爾弗漢普頓。我想念這里的喧鬧、雙層大巴和那種不自負高傲的氛圍。我想念迪斯科。我想念在這里的各式各樣的朋友，以及我的女朋友瓦爾——她后來成了我的第一任妻子。

你的朋友們在你從劍橋畢業后改變了對你的態度嗎？

我不這么覺得，因為我最親密的朋友也拿了助學金去讀大學。我的密友們是典型的工人階級的、從文法學校里挑選出來的、帶有向上流動抱負的孩子，我今天還是會和他們中的許多人聯系。同時，我留在這個地方的原因之一是我認識這里形形色色的人：通過我父親認識的街坊鄰居、抱負不是很大的中學朋友等等。在這些群體里面，人們覺得我變了，甚至到現在，還有人說我的口音變了，變得優雅起來，雖然我用的仍然是一種很明顯的中部地區的語調。我從沒有刻意去改變我的口音，但是我現在對此坦然接受，它就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伯明翰

你是怎么去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什么促使你又去讀研究生的？

我當時已經確定自己不是那種學術人才，于是有了走我父親道路的想法：從工人階級做到一名小商人。于是我申請了曼徹斯特商學院，得了一大筆獎學金。我在那里學會計學、運籌學和商業計劃，還學工業社會學和工業社會心理學。我記得湯姆·勒普頓和一名心理學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突然之間，我成了聰明學生，又一次在班上名列前茅，感覺很棒。

我開始想，我要在社會科學里找一項專長。我在曼徹斯特得到一份獎學金去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是由于我家鄉的女朋友當時在倫敦讀完了本科，我便申請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并獲得了一份理學碩士的獎學金，專業是產業關系。我變得有點嬉皮，長發及肩，對“風云激蕩的革命”感興趣，我也對社會科學感興趣，但是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種操縱的工具，用來告訴老板怎么控制工人——用一種更成熟和更聰明的方法。我開始對寬泛意義上的“文化”感興趣，不僅僅是因為我身邊那些在發酵的因素，而是在想是否可以為我重新被喚醒的學術能力找到符合我真實興趣的調門。我不太清楚我是怎么找到伯明翰，還有那個新成立的致力于當代文化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實際上那個時候它有一個非常時髦的形象，嗯，反正對我來說是這樣。也許是通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員工，或者是通過在曼徹斯特的講座吧。

所以當你開始在伯明翰的學業時，你是第一批學生？

是的。也許是第二批學生吧，總之是非常早的一批，一個剛具雛形的班。我沒機會得獎學金。但是我還是去了，是斯圖亞特·霍爾面試并接受了我。我成了一名自費的在職學生。我想做關于文化變遷、文化發展、針對舊式工作的文化反抗的嚴肅研究。雖然我很高興又回到了伍爾弗漢普頓，但是我也很高興地看到“中心”為我提供了一種跳出之前在伍爾弗漢普頓的階級、文化限制和經歷的方式，或者說，找到了一種與它們之間的新關系。在任何一本自傳里都會有那種扮演積極角色的、扭轉人生的事件，你在什么時間聽到了什么。偶然事件能解釋很多東西。消極的“躲避因素”也是這樣。我只是不想找一份“合適的工作”。

我也被霍爾和他所強調的多學科深深吸引。“我對你是一名社會學家或者英國人或者管他什么身份不感興趣，保羅。我真正感興趣的是，你想研究青年文化和音樂，你想了解現在青年人怎么生活。”與之前我在好幾所機構（包括劍橋）非常受限的經歷相比，這就像是一種解放。

“中心”里的學生和教職工的工作文化是什么樣子的呢？你的同學和你的導師哪個更重要？

第一年，也就是1968年到1969年，我實際上是理查德·霍加特的學生。然后他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是一個非常忙的人，我們的第一次正式交談是在午飯時間。我記得他說——我想是在打飯的隊伍里——“保羅，把你自己沉浸在無為的因素里很重要，不要急著很快地投入到什么事情中。除非你覺得非常困惑了，否則你不可能組裝出什么新東西。所以我不會問你到底打算做什么，或者你的理論是什么。”這很好。濟慈稱之為“消極能力”，也就是能夠生活在不確定中，但是仍然有方向感。我覺得在一份好的研究計劃中，你知道，能夠容忍混亂同時愿意追求連貫，保持那種狀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明確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打算去證明什么，那就去田野中尋找例證，把你總是知道的那些東西寫下來。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承受迷惑和不解，你會感到沒有方向、很困惑，但這也不一定是壞事，克服了就會得到真正的珍寶。當然，要是你一直感到困惑[笑]，那就糟了。但是到了某個階段抓住一個新的話題，這才是關鍵。所以，對一個當時只有二十三歲的人來說，第一印象是：“把你自己沉浸在無為的因素中，保羅。不要定型……”

你當時必須論證你的方法或主題或工作風格的正當性嗎？

不，一開始不需要。不對，我確實這么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我是自費生，半工半讀，要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在繳稅之后分出來交學費。所以，與在劍橋、曼徹斯特、倫敦非常悠閑的、有獎學金保障的生活相比，我到“中心”的時候必須在四個不同的地方教書來支持我的學業。那個時候你能輕松地找到兼職的教學工作：我在阿斯頓大學教“傳播學”、在伯明翰商業學院教“商務英語”、在漢茲沃斯科技學院教“二外英語”、在伍爾弗漢普頓學院教“通識教育”。我在復活節、暑假和周末的時候，還在冰淇凌貨車上賣冰淇凌。我真的工作非常努力，不像那些全日制的學生一樣整天在“中心”悠哉游哉。我在“中心”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是一個當地的男生。我要開車從14英里之外的伍爾弗漢普頓到學校，而且考慮到我的生活情況和每天的社會交往類型，我并沒有感到非常精英或特別。在“中心”的第二年，我結婚了，而且有了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所有的壓力都來了。我并沒有覺得自己像一個精英。我在劍橋做得不好，后來我成了一個有點像流浪漢、提著毛氈旅行袋的全日制學生。我必須非常有效地組織所有那些不同的教學工作，而且在自己的領域里要組織得非常實用。我并沒有把全部的時間都放在“中心”。我只有在想去的時候才去，直接從別人尤其是斯圖亞特·霍爾那里受益；或者當我不得不去的時候才去，比如在召開所謂的“理論研討會”的時候。

第二部分　教學和研究

1968年和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你參與了伯明翰的學生暴動嗎？

我并沒有直接參與1967年到1968年間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暴動。我1968年夏天離開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大伯明翰地區的靜坐活動發生在1968年秋天，這個我參與了。我曾有一種感覺，有點像一開始時對濟慈和拜倫的那種感覺，但是現在社會化了，就是空氣中彌漫的那種東西，那種在日常文化和社會交往中發生的東西。事情再也不會一樣了。我參加了對（伯明翰）大學大禮堂的占領，并在計劃好的集會上靜坐，我喜歡那種氛圍。“中心”的學生是靜坐活動的先鋒，尤其是杰克·海沃德和拉里·格羅斯伯格，他們都是美國人，當時在“中心”求學。我記得，拉里穿著一件粗斜紋布衣服，馬尾辮搭在背上，他是主要的煽動者。我對事情的真實情況的記憶已經模糊了。我當時在各地奔忙：教書掙錢、賣冰淇凌、趕回伍爾弗漢普頓，所以在革命學生中，我也不是全心投入，我有時候突然參與進去，然后又突然退出來去教我的書，還要維持我自己的個人生活。斯圖亞特，他和我完全相反，是學校的一名全職教師。他是靜坐中的重要人物，他在學生和激動的盟友組成的人群前面發表演說，是一個令人難忘的重要演講者。“中心”和那一批剛剛入學的學生卷入得很深。課程取消了，“中心”的全部活動暫停了，所有的時間和能量都獻給了對策略的辯論和政治討論，比如（運動的）要求是什么，應該是什么，或者可以是什么。那是一個非常令人激動的時期。理查德告訴我要不怕困惑，現在這個世界真的被搞了個底朝天。不過，我想理查德·霍加特十分尷尬，他總是腳踏實地、彬彬有禮，而他的孩子，也就是“中心”，卻已經成為學生革命的智庫。

在學校內，有多少（由此帶來的）變化持續了下來？從中心的立場來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切（運動的成果）難道不是都消散了嗎？

嗯，我不知道，我現在已經忘記某些訴求是什么了。但是肯定有學生的意愿得到了表達。學生評議會成立了，許多學生投入到課程發展上，雖然這種改進延續了多長時間是有爭議的。從“中心”的角度來說，這些結果“消散了”？絕對沒有！至少，在我們的思想中，我們是擴展了的靜坐的永久革命委員會。斯圖亞特非常勇敢——也有某種程度的偏執——曾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他覺得自己是在一個敵對的機構安營扎寨，他要擺平這種感覺。但是從那時起，尤其是在理查德離開之后，“中心”就非常明確地成為各種教學關系中的先鋒。我最清楚不過的是，斯圖亞特覺得他是在保護我們不受制度的欺負，“中心”就像是某種實驗，然而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擴大并征服全世界的實驗。不知怎么的，我既處在中心，同時又處在邊緣。我現在想要收回我剛才說的感覺到“正常”、沒有優越感，你可以說，與其他學生一樣，我也分享了某種因為處于事件的中心而產生的重要感。作為一個失敗的“助學金男孩”，我現在被吸收進了革命活動中，做好準備為以一種激進的姿態回歸的東西而斗爭。雖然之前我曾覺得，自己正在加入既得利益者的隊伍，但是后來這件事情發生了，通過歷史上的突發事件，個人的惰性與其他種未來做斗爭，我轉到了一個激進的立場上。我覺得在那些年里，我確實是某種重要運動的一部分，而斯圖亞特就是那個富有魅力的領袖，拿自己的事業做賭注，試圖為我們這個小小的機構注入學生運動中產生的許多情緒和原則，尤其是在學科領域保持開放，以及讓學生的興趣——與外部相聯系的興趣——引導機構的發展。

斯圖亞特·霍爾在多大程度上界定了“中心”的關注點？

也許是某種遠程控制吧，但是當然也控制和維護了基本的參數和政治氛圍。這并不是什么實質性的控制。從集體意義上來說，我們確實控制了大多數的行政管理流程，包括工作、閱讀和研究領域。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集體控制的過程。我們當時絕對是那么認為的。雖然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做的事情也許正是斯圖亞特當時的心愿。這種安排絕對不能讓校方知道：如果校方的管理層知道了，就會引發可悲的后果，比如將“中心”關閉，尤其是在理查德·霍加特已經離開的情況下。第一年是一段非常奇怪的“更迭”時期。在1968年的靜坐之后，理查德離開了。我沒有證據，但是我懷疑他的離開與那場靜坐有關。他會覺得他是在一個激進分子的老巢里，而他永遠不會知道從此以后這個老巢里的人還會做什么。從某一方面來說，他一定感到心滿意足，因為他的雄心壯志實現了：建立這樣一個“中心”來引導文化研究的成型，而《識字的用途》曾經是，現在仍然是，這個領域內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但是我覺得，當“中心”以某種不同的方式成為新左派斗爭的延續陣地之后，他也一定感到憂心。

在理查德之后，斯圖亞特扮演了一種新的領導角色。與理查德的那種相當職業化的學者形象不同，斯圖亞特試圖自下而上地“發酵”一場學術革命。每周一都會開會，斯圖亞特在那里攤開書，說最近又發生了什么，學校又對他做了什么。所有的關鍵議題以及錄取流程都是集體決策的。錄取標準盡可能用理性的方式討論：政治標準、學科領域、學術標準。學生小組對申請人進行面試。學生們對課程了然在心，他們集體選擇研究領域、課題和教科書——雖然這些都在斯圖亞特的指導之下。我記得他就曾警告說，選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時候要小心，因為一旦你讀了，就不那么容易走出來或者欣然接受一種折中的框架。我還記得他無數次地說過，質量才是最重要的，理解的深度和論證的嚴謹程度是說服別人的武器，而不是政治上的宣示。

后來人們對那段時期的偶像化讓你感到吃驚嗎？它被神秘化成那樣子，你感到吃驚嗎？

我不知道。真正學到的東西也許已經被完全遺忘了。我覺得對教育方法以及如何組織學術機構來說，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學到很多。這是一種真正的集體操作的長時段的學術試驗。有點詭異的是，從一場跌跌撞撞但仍然在持續的試驗中，從失敗者的體驗中學到的最多。

“理論研討會”是怎么回事？

我們一開始是想對“文化”做出界定，去尋找相關的學科和方法，這些活動后來就發展成了我們所說的“理論研討會”。在這種研討會上，我們以一種比較系統化的方式對相關的知識傳統進行梳理。在受到那場學生靜坐的刺激之后，我們試圖把一些集體工作的原則帶到研討會上。我記得不是特別清楚了，但是我想，我們是從文學理論、結構主義開始的，然后是社會學。我記得伯格和盧克曼，他們最終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這種努力基本上失敗了。試圖通過一種一致的立場來討論什么是文化以及確定一種方法，并將它們應用到實際的項目中——這種想法被證明不可能實現。人們無法達成共識，而且根本就沒有什么一致的看法。作為一種折中，我們從所謂的“緊密的集體合作”轉到“松散的集體合作”。我們分成了不同的“工作小組”。于是，那些對文學和人文學科感興趣的人去了文學小組；重量級的理論家去了意識形態小組，還有女性主義小組、“種族”小組，等等。我們只是無法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

有政治上的分歧或者理論上的分歧嗎？

我現在回憶起來，最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無法就一個核心的理論內核達成共識；不過你可以想象的是，理論分歧是和政治分歧，在某些情況下還是非常偏執的政治立場，聯系在一起的。那個時候氛圍是很緊張的，或者說，我所感受到的是這樣。這些小組常常在沒有一名教師參加的情況下自己聚會長達一年，而且必然是自我指導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緊密的集體合作”保留了下來。你必須每年暑假在所謂的“中心陳述會”上告訴大家你到底在搞什么。這個地方，你知道，仍然有那種抱負，那種要做大事情的感覺。你會在“中心陳述會”上被人品頭論足，所以你會全力以赴，甚至開夜車來做準備。人們往往會對做陳述感到很恐懼，因為你要在那里展示自己做了什么——他們當然做到了——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通過某種方式來證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規劃的一個部分。現在回過頭來看，許多來自工作小組的陳述——這些陳述也許只是少數幾個學生合作弄出來的——后來都成了專著或者《文化研究工作論文》的議題，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無意間發現了一個有效工作的神奇方式：總體的指導和承諾、實質性的自主、觀念和批評的集中處理，以及個人慌張地在截止日期前趕寫陳述。這是邊緣與中心的又一次怪異組合。一個穩定的集體主義和蔓延的個人主義的不穩定性。

《學做工》

你自己的作品——不管是關于嬉皮士的還是關于“家伙們”的——在“中心”的工作小組中反響如何？

我自始至終都覺得，我的田野工作被他們看做是非科學的、人文的和相當主觀的。我感到的一個明顯的——有時候是私人性的——批評來自于馬克思主義者對能動性和主體性的攻擊，后者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正統的主張，講的是人文主義立場的不充分性。我覺得我必須證明自己的合理性，必須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在其他地方，你也許可以沿著人文的軌跡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但是在“中心”，通過夏季學期里的全體大會，你會感到人們試圖把事情帶回到某種一致的、集中的、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的路數上去。不過我仍然覺得自己不屬于那個陣營。

盡管如此，就我自己的工作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所在的“中心”有一些集中的集體目標，但同時也給自主性的工作提供了空間。雖然“中心”里并沒有一個真正強大的民族志傳統，但這種自主性和（集體）目標的混合使我得以堅持下來。“中心”的陳述會上，人們向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問題很尖銳，我無法回避。我處在邊緣，要非常嚴肅地對待中心。

在這些批評四起的時候，你有沒有為自己的項目做辯護？你有沒有覺得你必須不停地為自己“化圓為方”的方式做辯護？

這么說吧，有人指責我以一種陳腐的或者沒有經過理論化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做研究，而且我有點像是在沒有陳述主要困惑的情況下就假設了答案。通過假設一種主體性和能動性，我是在大腦短路，故意忽視或者干脆就是不顧阿爾都塞關于詢喚的觀點。我的工作起步于這樣一個假設，即“家伙們”是具有創造性的，而不是試圖解釋他們感覺到自己與所有相反的證據都格格不入這個難題。我覺得，把握住“創造性”才是我的主要關注，而且我現在仍然是這么認為的，雖然論證的術語毫無疑問已經改變了。我不知道我為自己做的辯護是否跟我對自己的立場的小聲堅持有一拼。不過我記得，在對我參加的那場工作小組陳述會做出評論時，斯圖爾特說：“保羅所說的創造性，就是我說的生存。”

你關于創造性的思想，在你的作品中有著非常強烈的連續性。

我覺得那是我的故事。我一開始對個體性的藝術活動感興趣，覺得那是事物的中心；但是我未能對這些活動中單調的、審美的、精細的文本版本進行思考。于是這成為我的動力，持續地去日常生活中尋找同樣的東西：也許是某種可以將中心與邊緣聚到一起的東西。而要想在日常的普通經歷中看見創造性、抱負或者審美動機所激發的火花，就需要更長時間。這并不是連續和可見的，而往往是迷失、扭曲或者異化的，或者被轉換成為具體化的形式，在不同場景、機構和情景內根據環境的不同，以奇怪的被壓抑的形式展現出來。關鍵是這些東西永遠不會徹底消散，它們總是會恢復過來。我覺得在每一部知識作品中，人們都在試圖保存這種內核，也就是一種去知曉、陳述或者爭辯的潛意識流或動力。

我從“中心”得到的教訓是，關于“人的創造性”的人文主張不得不受到“中心”內部關于再生產和階級連續性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限制。而且，在“中心”里肯定有人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對我進行批評：我怎么能忽視父權制的分工，把它們都簡化成為階級分化呢。尤其是我對家庭的重要性多少估計不足：正如工廠是資本沖突的場所，家庭也可能是性別沖突的場所；而我的方法幾乎都跟工作和學校有關，而沒有對家庭內部關系給予足夠的關注。在“中心”的陳述會上，有人對《學做工》這本“自然主義的民族志”提出了批評，甚至是強烈譴責，因為他們覺得這本書是在不加批判地重復而不是指責和解構男性至上的習俗、形式和偏見。

事實上，在《學做工》里，我當時確實覺得自己已經考慮到了父權制的范疇和女性主義的批評。這是另一個我感到自己在與之斗爭的壓力，我并不是在拒絕，而是在做創造性的內部擴展、創造和轉移。我仍然覺得，女性主義者沒有認真地對待我努力想表達的某些論點。我想表達的是，性別分工在資本主義內部是如何特別地與體力—腦力分工交疊在一起的。我并不是在說，某種工人階級的男性氣概永遠與體力勞動和男性氣概聯系在一起；男—女和體力—腦力，它們是兩組不同的二元體系，有著自己的脈絡；在其他的情境下，你也許會發現性別、父權制和資本主義范疇的不同表現。就性別體系和資本體系或者資本關系通過對方得到呈現這一點來說，確實有一種不穩定性在里面。

現在，學徒模式正在經歷一場大崩潰，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時間所形成的社會再生產模式被重塑。而且，我們正在目睹一場危機或者說重新構型的過程：與性別、階級和位置有關的思想的重要二元體系如何重新匯聚到一起。我想說的是，民族志的、理論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仍然是有意義的，這意義不在于對特定的工人階級男性氣概給予最佳的描述，而在于釋放出分析的術語，這樣不同的呈現和組合就成了可能。所以說，也許會產生一種更溫和的工人階級男性氣概，或者也許會有一種與父權主義無關的男性氣概。在我的頭腦中，我之前就已經考慮到了女性主義者關于父權體系的觀點。至于我是否在方法論上恰當地順應了他們的觀點，或者他們所提倡的方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這對你來說一定是非常艱難的——你必須鼓起勇氣一遍又一遍地界定你的立場？

是的，雖然你不必在我如何為自己辯護上想得太過于英雄主義。在那段時間里，我住在伍爾弗漢普頓，我開車去伯明翰：在這段時期的早期，我在四個不同的機構打工，還賣冰淇凌；在第二階段，當我成為一名研究人員開始從事《學做工》的相關研究時，我要么是在外面做田野調查，要么是在伍爾弗漢普頓過著非常正常的生活。所有的這些都是對另一種主體性的支持——我不需要在“中心”里維護這種主體性或為它做斗爭。總是有某種生活重心或者基礎，它與別的身份聯系在一起。而且你也可以說，這讓我在田野實踐中保持了某種人道主義和某種樂趣。我并不是一個積極的斗士，在話語上和知識上全副武裝起來，和“中心”里的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革命者做斗爭。我理解所有圍繞詢喚、性別、“種族”這些東西的論點的主體性的意義。這些我都能搞懂。但是，這么說有點不好意思，就是我還有一種“常識”，也就是說，我知道你的身份總是超出階級、性別或種族，牽涉到你所有的生活方式的組合，你如何適應生活，你認識哪些人，你的私人和家庭關系如何——所有的這些東西，都與那些說明明顯的二元分工的理論是不同的。如果你想在田野中理解一間酒館或者一家工廠運作的方式，那就要理解無數其他的東西：幽默、語言、性格類型、玩笑戲謔，而你就是不夠聰明，無法弄懂所有的那些二元對立，還有所有的那些生產其他術語或者其他二元對立的二元對立。一個好的田野工作者知道某種東西的重要性，不會說：“這是一個階級范本。這是一個性別范本。這是一個‘種族’范本。”

你如何看待《學做工》后來收到的反響？

從許多方面來說，《學做工》是一本奇怪的書。我當時并不覺得自己可以走多遠。我當時覺得這“只不過”是一本我終于出版的專著而已。我與出版商簽了一份不怎么樂觀的合同，但是它后來獲得了成功，賣出去了很多本，這很讓我吃驚。這其實有點意外；也許它正好碰到了學術史的某一特定時期，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教育社會學的某一特定時期，教育政治的某一特定時期——政府承諾提供全面的學校教育，但是人們對此的失望和怯魅卻在涌現。這本書現在已經有了很多的版本和譯本。它在日本、德國和美國肯定賣得更多。我最近去了趟韓國，在那里發現有一個盜版也賣得不錯。我將這本書的銷售情況看做是在不曾預料到的地方所發生的有關創造性和社會后果的民族志。它仍然在引發各種各樣的辯論、議題和興趣，超出了文化研究這一領域。也許它在本質上屬于人類學，這既奇怪又讓人感到欣慰。

在人類學家中間，你是否覺得《學做工》在美國的影響更大，因為美國的人類學傳統與英國相比更加寬廣和具有包容性？

我不知道，我無法就人類學下什么權威性的論斷。當然，在美國，這本書最早是被歸入人類學的。好幾所美國大學的人類學系都曾給我提供過教職或發過邀請，而直到最近才有英國的人類學系這么做。就英國現在的情況來說，這部分是偏執，部分是對文化研究蓬勃發展的合理反應。也許他們向我敞開大門，是想保護他們不受其他來源的威脅。也許我的作品在文化研究內部被當做是一匹顛覆性的特洛伊木馬，表明敵人中的精英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政策、政治和大學

你能不能和我們說說，你是如何開始為伍爾弗漢普頓市議會工作的，以及1988年的《青年評論》是如何出爐的？

在撒切爾政府于20世紀80年代初縮減經費之后，我丟掉了自己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工作，有大約一年的時間處于失業狀態。我參與了工黨在伍爾弗漢普頓的活動，他們要我做一項關于青少年失業問題的評估報告。他們的想法是試圖形成和執行有效的政策來應對席卷全市的經濟危機。當時我們正深陷大規模失業的漩渦之中：自1979年以來，該市已經流失了一半的制造業工作。撒切爾的策略是使用貨幣主義、強勢英鎊和國際資本來包抄和教訓工人與工會。英國鋼鐵廠和其他工廠的關閉重創了這個市。青少年失業尤其引人注目。我利用這一機會，試圖就失業對當地的影響做一番全面的解釋；我使用了一整套的研究方法，對包括年輕男性、年輕女性、加勒比海黑人、亞裔在內的社會群體做了抽樣問卷和民族志的考察。我還有三名助手，他們都由市議會撥付報酬，而研究也越做越大。我還對當地主要的政府機構進行了調查——我想應該有十個，目的是搞清楚我所說的年輕人所面對的“新的社會情況”。我想，這是當地第一次對后工業時期大規模失業的地方影響做如此全面的評估。

與通常的政府內部評估不同，我們試圖從年輕人自己的觀點出發來展示這場危機，然后轉而討論地方政府部門應該如何采取措施來應對新的情況和年輕人的新需求。可不要忘記，“黑郡”曾經是工業革命的“硅谷”。你可以說，在1979年和20世紀80年代初，它目睹了后工業革命的開始，此后的真空仍然有待填補。（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則經歷了新工業革命。這是一場我們今天絕對仍然在應對的危機。這個地區和這里的人口在過去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已經適應了工業時代的節奏、剝削、紀律和權力。突然之間，這里失去了方向。相對定型的社會和文化再生產模式遭遇了一場危機。看上去幾乎就像是撒切爾夫人想要把這樣的地區推到邊緣。

你對參與政策制定的體驗是什么？你有沒有試圖去制定一份日程，或者主張政策工作應該給你所說的“給人以美感的創造性”留下空間？

我不能說我（在報告里）提到過“給人以美感的創造性”，但是那是我工作的源泉和希望釋放的東西。政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骯臟的。從讓地方層面做出改變以及也許會為全國層面提供點什么東西這一角度來看，我覺得給地方政客們提供豐富的證據是非常重要的。《青年評論》是一份非常“厚實”的文件，包含了軟硬兩類數據。我強調了用年輕人自己的視角來看待問題的重要性，而不是只采用政府部門和職業人士的視角和標準；我還強調了建立年輕人的系統性表達機制的重要性。從讓變革發生的角度來說，政治操作、尋求聯盟、開放政治影響的新渠道是非常重要的。我幫助他們成立了一個青年評議會。除了分配文化事務的經費之外，它還派人參加一個叫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新的政治機構。這個政治委員會所感興趣的東西，并不僅僅是通常排在教育委員會日程最后的內容，比如青年俱樂部、青年休閑和體育活動，還就住房、治安、社會服務、教育等事務發表報告。青年事務委員會和青年評議會今天仍然存在。《青年評論》的基本精神就是為地方政府重新引導方向，引向年輕人的需要和問題上來，而不是像當時的流行做法那樣，利用政府將年輕人轉變成國際化的資本主義勞工市場上更為有用和廉價的勞動力。

我試圖向志愿部門以及政府建議的是，政策應該根據年輕人的實際生存狀況，而不是根據掌權者關于該如何改變或塑造年輕人的想法而制定。認為有一條金光大道將民族志和政策連接在一起的想法是錯誤的。我覺得民族志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政治的問題——只要你在做田野，就會涉及到政治——確實是一個牽涉非常廣泛的前沿。我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其中之一當然就是采用抽樣問卷，這樣你就可以用大量數字來展示到底發生了什么。這種方法又與定性工作聯系在一起，這樣你就能夠開始嘗試發展出一套年輕人所需要的議程。你不能僅僅在研討會上拿起手機，打電話去問他們想要什么；事實上，處在他們的結構性情境中，當需要匯聚成共同立場的時候，他們也感到迷茫和沒有方向。盡管如此，你可以利用民族志的技術來探求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替他們說話。教育培訓、文化娛樂、住房等方面仍然有一大堆問題需要解決，但對許多年輕的工人來說，主要的問題則是工資過低。比方說，不管他們是有一份低薪的工作還是沒有工作，他們都會發現，要想進入日益私有化的蕭條市場是不可能的。政府到底為什么不處理這樣的議題呢？

你怎樣看待在這種新環境下運用民族志？

我并不是在聲稱我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但是我主張要就年輕人的真實需要做直接的溝通。比方說，從青年事務的視角出發，政府已經將住房需要確定為年輕人問題的中心，而且至少通過一些特殊開發項目，滿足了年輕人關于住房的某些需求。

更集中點說，在我看來，《青年評論》所做的工作幾乎就是那些制造了大量人類學民族志的殖民遭遇的反面。現在，不要忘記的是，我偶然撞入了人類學方法的懷抱這件事情讓我感到寬慰，在我的眼里，殖民地式的民族志幾乎充滿欺騙和罪惡。另一方面，它加給我一個人文主義的推動力，這個推動力也許就是一名白人工人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分子對“人的創造性”的自我理解。殖民地式的民族志帶著一種懷舊的情緒，試圖用一種割斷歷史的或者精英主義的方式，來延續自己受到威脅的或者也許是想象出來的過去。但是，我所做的與此大為不同。我覺得我在做的是幫助那些正在掙扎的“人們”表達他們的立場，從而在面對一系列新的社會關系時，滿足他們的要求。我是權力圈內部的一個反對力量，而不是在趨炎附勢。

當然我知道，事情很復雜。你可以說，我關心一種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卻從一個殖民主義的政府那里領取報酬——不過，工黨真的是這樣一種組織嗎？但另一個事實是，1981年的騷亂之后，在全國范圍內確實出現了一種恐慌的氛圍，人們對青年暴動感到擔心。對政府官員們來說，如何聰明地進行社會控制確實是一個問題。

但是在工黨內部，確實有人真的認為，我們在地方服務、青年救濟和教育上花很多錢，確實對“我們的孩子”有很大的意義。人們有一種感覺，就是整個這個地區是在跟更大的權力對著干。如果你真的考慮了底層的感覺，哪怕是從改良主義的項目中獲得這種感覺，你也肯定會覺得讓組織、救濟和服務更符合真實的和新出現的情況是值得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你覺得你改變了什么呢？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取決于你自己的觀點，取決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在你的新書里，你曾在一處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知識上的破壞者”。在另一處，你說大項目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文化上的園藝工作。回過頭來看你所做過的各種項目，你會說某一個比另一個更有影響嗎？《學做工》是不是比《青年評論》更有影響？

對我來說，很難用某種特定的方式將自己標榜得很成功。當初在“中心”的時候，我們這些理想主義的人自我標榜為有機知識分子，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在一個非常小的知識分子圈子里相互影響，也許最終我們也影響了其他一些知識分子，但是我們并沒有影響整個世界。如果什么事情不是我在直接的背景和環境中完成的，我會不太好意思說這些事情取得了什么可見的效果。當然，你在心里完全可以對這些事情的長遠結果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但是很顯然，這絕不等于事情就會這樣得到解決。在知識實踐中存在掙扎，但這是值得的；而在我們自己的實踐中，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有各自的結果。

我所做的工作，一直是試圖用一種民族志的方式，通過別人的行為來展現當前的結構性情境以及被改變了的結構位置，捕捉它對生活的意義。現在很多孩子已經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了。他們有時候參加培訓項目，有時候從事收入極低的臨時工作，有時候還要求助于父母，然后再參加另一個政府項目。對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角色，或者說是對常規的政府角色做了很大的拓展。政府部門要對整個事態全程負責，而不是一個過渡部分，也不是一個早期階段，而是持續的全過程。布萊爾也曾經說過，要讓50％的十八歲的青少年進入高等學府。學生的構成主體正在發生全新的變化。也許令人驚訝的是，在這個國家，由于現在學生必須自己承擔費用，除了職業教育、計算機培訓等之外，對社會學、媒體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需求還將繼續下去。學習社會科學最后很難找到飯碗，但是（學生）需求還是很明顯的。具有社會意義的民族志，包括我的工作在內，能夠為這些新空間提供非常有用的課程和項目素材，使學生能夠認識、美化和分析他們自己的個人體驗和文化實踐。民族志能夠幫助學習者建立某種自我反思，不是說對自己完全了解，但是可以了解自我的各種可能性所處的情況，了解作為一個歷史性和現實性建構的自我。我保存了許多工人和其他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人在不同的情況下讀過《學做工》，有的是以前在課堂上讀過，有的是碰巧在監獄的圖書館里讀過，他們對自己過去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里的經歷有了新的理解，在精神意義上和社會意義上變得更加調和。我們確實不能低估知識產品的擴散性：文字確實有它自己的生命。民族志里有一種特別尖銳的東西，涉及那些被反復提及、可以再次獲得新生或者用不同的方式再次點燃的經歷，那些在讀者自己的體驗內部、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體驗。對于自我和它們被調整過的生存狀況之間的關系而言，這是一種將這種關系挖掘出來的手段；這也是一種對生活在變化了的生存狀態中的可能意義進行思考的手段。這是一種方式，可以識別出什么東西可以控制，同時識別出“文化錯代”的持續力量，即便我們不知道“同時性”是什么。

你覺得這種作品在現在的英國，一個布萊爾主義者執政、口號響亮、提倡焦點小組[［8］](#_8_163)的國家仍然有可能嗎？

從結構意義上來說，總體政策框架已經轉到了左派的反面，轉到了那種試圖從底層系統性地理解這些議題的激進政策的反面。工黨曾經是將底層的影響和利益連接起來的主要指望，但是如今（這個黨）已經與工人階級脫節了。從許多方面來說，它仍然在推行撒切爾主義的項目，通過宣傳手段與群眾建立聯系。但是布萊爾主義、焦點小組主義以及政治宣傳并沒有吸干政治和政策領域。不管從哪方面來說，政治都在并將繼續參與到對全民的管理中，不僅對這樣或那樣的政府機構，而且對每個人來說，都有許多重大的議題需要解決：如何在智識、文化、個人、政治方面解決這些問題。面對爆炸式增長的新技術、通信手段、潮水般的廉價或無成本信息、新制造業、指數級發展的電腦技術和人工智能、對基因構成的微觀控制，政府應該在管理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商業利益與人類福祉的商品化和這些東西交織在一起，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其中，又該如何處理？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管理這個新世界新涌現的趨勢所造就的社會關系中，政府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尤其是，如何管理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被遺漏但仍然有可能在其他議題上使執政黨毀滅的那些人？就底層感覺的實踐維度成為權力運作的一部分而言，會出現一種新治理模式的解放維度，而且可以從這里挖掘、蔓延和增長。不過在新工黨統治下，我們很難察覺我們如何不僅僅只是跨國資本的一個分支，政府努力培訓工人，以吸引國際資本，但它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過，事情是有很多維度的。不要忘記，政府部門仍然很龐大——在這個國家，每一英鎊開銷中就有45便士是由政府花費的，大多數是由地方政府或通過地方政府支出的。與地方層面的政治和治理有關的問題——比如在當前這樣的情況下，人口是如何被征召的——事實上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在文化和主觀體驗的重要性上升的今天。有一種觀點是，你必須考慮到人民的意見。即便你最終操縱了民意，你也不能用那種老式的自上而下的手段，尤其是在面對面服務時和在公共機構中。關于人權的新話語出現了，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正反映了人們確實已經改變。人們已經不再愿意接受被賦予的身份，比如我是一個工人，她是一個什么。每個人都以彼此不一致的方式，努力按自己的辦法行動。這些文化趨勢如何與那些技術和經濟趨勢發生交集呢？經濟失權與一種奇怪的文化賦權并列在一起。這也正是批判性民族志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即產生更多經過深思熟慮的、整合一致的政策觀點，尤其是針對地方政府的政策觀點。這些觀點既考慮到文化上的推動力，也保持對生計問題的關注。

你剛才說到讓50％的十八歲青少年去讀大學這種政策的影響，以及終身為政府服務的那些人。在你看來，對大學的未來而言，這些變化的潛力和風險在哪里呢？

在大不列顛王國，許多關于教育和培訓的話語都是非常實用主義的，目的是吸引對英國的投資，比如增加我們的“人力資本”、“競爭優勢”等等。全球的（新）狀況已經改變了游戲的標尺：在官方話語中，這是一場永不停息的游戲，他們的目的明顯是要增加勞動力的價值以吸引跨國資本。與此同時，在地方層面，上大學的人更加多元化。見到中年的工人階級女性來選修社會學和文化研究，我至今仍然感到很驚奇，因為與計算機或者人力資源管理相比，前者的就業前景要小得多，而后者的技術也許能為她們提供20年的收入和物質保證。她們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個人發展，是為了理解她們過去的個人和文化歷史，用我過去使用的具有人文色彩的術語來說，是為了尋找她們自己生活中的某種創造性，以及尋找并不是僅僅與勞動市場的結果聯系在一起的可能未來。我覺得這整個領域可以為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和人類學提供巨大的機遇，利用批判性民族志作為活生生的研究項目，在文化實踐和體驗的邏輯內來理解這些新的轉型、歸宿、“馬賽克”以及可能性是什么，所以讀大學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并與正在出現和發展的新意識形式有關，而無需依靠那些過時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等陳詞濫調。如果文化研究一開始是以另一種方式發展，在早期階段讓文化研究民族志成為主流，而不是分裂成好幾個意識形態陣營，那么今天文化研究可能早已經成為成人教育的形式了。

總而言之，當前的教育陷入了一種不同觀點之間不平等的斗爭之中，這些觀點涉及如何看待勞動力，你也許可以把它稱為工具主義的勞動力與表達性的勞動力之間的斗爭，而前者一直占據優勢。不過有時候，尤其是在地方層面，人們的體驗和動力也許會與表達性的勞動力有更多的關聯；而如果你足夠聰明的話，你也許能夠把兩種勞動力聯系在一起，因為對許多雇主來說，成熟的表達性勞動力可以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資源。

未來會怎么發展？我不知道。對制度性位置進行界定、對主觀位置進行界定、試圖論證表達性勞動力是一種經濟資源——所有這些都有可能發生。毫無疑問的是，“精英”與“新”大學之間的分裂會繼續，而“網絡大學”則會興起。我們會走向一種更像美國的狀態。但是以我對地方性大學的經驗來看，它們應該成為真正的大學，而不應該被粉飾為繼續教育學院，只是被授權傳授別人做過的研究。不管從什么標準來看，有一部分地方相關性事務都必須成為高質量工作的對象，政策和民族志的興趣可以在那里會合。

第三部分 民族志和理論

“在那里”：錄音機和民族志的“數據”

我覺得我當時抓住了民族志工作的第一波技術浪潮。那時我的時間很緊張（那是1968年，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而我特別渴望走出去，去看看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那是典型的、第一次的、平淡的民族志式的不期而遇。在伯明翰嬉皮士們活動的中心地帶，有一個酒吧，我去問那里的酒保，誰是這里最有名的嬉皮士。他告訴了我，向我引薦了其中的一些人，告訴他們我正在寫博士論文，講的是音樂和嬉皮士文化，需要收集一些信息。我之前沒修過任何的方法論課程，我也沒有把自己看做是人類學家，我只知道我必須收集素材。于是我說，你們介不介意我錄音啊？他們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便攜式的錄音機和磁帶，不過反正我當時也不知道這個。“中心”剛剛花了一點錢，買了一個質量不錯的盤式磁帶錄音機，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手提箱，我就提著這個沉重的箱子到這些嬉皮士的住所，把它放到桌子上，打開一盤盤磁帶，插上電源（開始錄音）。這就是不加干擾的方法！我當時就覺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搞出一點什么吧，搞出一些材料來吧！”我當時時間很緊張，我就想著趕快開工，不管用什么形式，我要搞到一些素材來用。

你不覺得你只能做筆記嗎？你有沒有覺得你必須做一些錄音？

是的。搞到素材會讓我樹立一種信心，覺得我已經拿到了一些東西，有了那種開始做田野和盡快用素材填補研究的感覺。一堆素材，有點像是一筆錢，與進行理論構思時是不一樣的。你可以日后再考慮怎么利用這些素材，雖然你當時并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你會掌握一大堆數據。要未雨綢繆。我也做筆記，尤其是在一開始做理論解釋的時候。不過我記得，雖然我從田野，也就是嬉皮士那里帶回了一堆筆記，我還是在想：“天哪，我的筆記還不夠！我怎么辦啊？”你們在做田野的時候有沒有過這種感覺？我當時真的有一種不安，覺得我收集的素材還不夠，弄到那些日后可以用的素材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搞清楚錄音是什么時候開始被采用的，它們是不是改變了田野實踐，是不是讓人變懶了？我覺得，我要對文化研究中過于依賴口頭回應的現象負部分責任，對一種文化研究概念，即建立在東拉西扯基礎之上的快速、卑鄙的突然襲擊負責任。首先你求助于錄音機，而當你做完一個小時的訪談之后，你就搞定了一個項目。然后，如果你只是使用其中的幾個詞，為什么當初不干脆就把那個人在酒吧里告訴你的那點事情拿筆記下來呢？[笑]所以你們可以想象嚴肅的田野工作開始受到侵蝕。

不過與此同時，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科技是可以發揮非常出色的作用的。我們現在在利用現代科技方面做得很糟：影像、移動畫面、視頻，等等。有時候“墻上蒼蠅式的觀察紀錄片”、“肥皂劇式的紀錄片”[［9］](#_9_155)以及許多通俗文化都會采用影像手段來表達日常體驗，然而在“專業人士”看來，如果你不用自己的筆和本，你就仍然不是一個真正的人類學家。

但現在這里的問題是，錄音記錄成了民族志本身。這就有點像是用錄音代表了田野工作。

是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以某種方式復制了肥皂劇式紀錄片的缺陷。雖然如果你誤用了田野筆記或者誤解了意思，你也會栽跟頭。所有這一切的“解毒劑”就在于，用靈活和開放的態度使用理論。在所有關于理論如何與民族志建立聯系的問題中，我覺得民族志的關鍵點就在于靈活性。也就是說，當你進入田野之后，你能夠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對理論和假設進行檢測。不過有時候，這也許在你后來對自己的素材進行分析的時候才會發生，所以要仔細地聽錄音，以發現是否會有什么重要的概念從你的錄音里發展出來，它們又是如何與你現在的想法聯系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培養思路、走上正軌的方法。如果你能夠回到田野進行改進，這自然很好，但即便是在這些素材內部也存在著類似的辯證關系；如果你無法再回到田野，你還是可以回到素材的其他部分，或者翻閱田野筆記，帶著一種新的敏感去發現當初你記下這些素材時不曾意識到的議題。素材永遠不應該成為癱瘓的路障，不應該只像水泥板一樣等著我們去把它推向讀者。

這再一次告訴我們，為什么在做田野的時候要用開放的心態記下你覺得相關的東西，用開放的心態記下你覺得有意思的和重要的理論觀點，即便當時你沒有辦法講清楚為什么要這么做。也許在后來的階段，在處理和分析數據的時候，你會知道為什么當初你有一種直覺，覺得這些素材很重要，盡管你當時并沒有理論上的恰當理由。

關于“多點民族志”

你的民族志在人類學內部被接受的部分原因是，這個學科內部當時有一種觀點：我們還沒有考察過階級。這就聯系上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什么東西會被說成是“多點民族志”，你如何去做與更大的系統——資本主義或者全球化——有關的民族志，而這個問題在今天似乎比過去更加緊迫。

我對“多點民族志”以及一些美國式的人類學有一點擔心。通過我們新創辦的雜志《民族志》，我得以了解一些這個學科內部的當代趨勢。許多人類學家通過采納一種當代的歷史觀，來對后現代的轉向做出回應。你對整個國家進行觀察的時候，帶有一點政治經濟學的色彩，你搞一點制度歷史學，然后你得到一張快照：某個人坐在走廊里，與某個來自經濟發展署[［10］](#_10_153)的人在一起。這是一種超級成熟的新聞處理手法。那種明確的人類學的眼光，變成了對當代史進行縱覽的眼光。我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而且這確實有作用。但是，我只是不想丟掉對情境化的人類創造力的關注，對“厚實”的民族志的關注。面對許多現代人類學，你并不是特別明白，為什么它們要告訴你這些東西。它很有趣，它是個好故事，但這又怎么樣呢？作者所要講的是什么樣的問題或困惑，他的制高點又是什么呢？調查的模式有什么特別之處呢？對地方性和敘事的擔憂不應該讓我們拋棄厚實、徹底、細致、細節豐富、給人以美感的民族志，不應該試圖以一個單一的描述框架囊括所有層次的決定因素。

除了敘事這一條途徑之外，還有其他的途徑來理解地方性是如何與全球性聯系在一起的。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地位和某些復雜的內部體驗之間，也許存在著什么快速通道。把主體性或者體驗上的親密感的集中細節記錄下來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對它們進行呈現和保持它們的原貌有多么困難。和其他手段一道，這么做的目的是用一種理論性反思的方式、一種緊迫和微妙的方式、一種可以產生恍然大悟的效果的方式去把握一個機會，將它們與具有廣度和深度的因素聯系在一起，從而揭示結構性的決定因素、變遷和連續性是如何被理解和被展現的。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既是由構型力量和逐漸強化的權力所塑造的，也是由內部體驗和非常地方化的實踐帶來的明顯的生存能力所塑造的。在我看來，多點民族志和縱覽性民族志的危險在于，內部的決定因素、影響和生活力量被假設成為某種“全球之水的蓄水池”。水就像瀑布一樣順著許多層級傾瀉下來，一開始是一種全球歷史，而你把它當做一個層級，然后它流向全國性的舞臺，接著一股股地流到政策和制度層級；有一點水濺到了地方經濟上，還有一點濺到工會和特定的地方，最后等到需要呈現和解釋創造性的群體和個人的時候，你已經無“水”可用了。回流是肯定不會發生的。處理這一問題的方式之一，就是努力理解前面所說的“快速通道”，比方說，努力去理解我們周圍這種商品化的物質和溝通環境中的商品拜物教，去理解這對主體性而言意味著什么。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可以在主體的層面上進行界定的結構性“力量”，并在這個層面上做出交互性的分析，而不是通過無數的中介因素來進行追蹤。非常詭異的是，雖然萬事俱備，但是沒有什么是地方性的，我從未如此重視親密性。先是從全球資本主義開始寫起，然后轉向全國資本主義，接著轉向布萊爾的政策……這樣的做法不會讓你理解那種親密性。

就像存在一種簡化了的和無聊的“全能”政治經濟學一樣，有一種無聊的“話語主義”依然流行。如果你只是關注敘事和話語，那么你對意識和主體性的理解就會停留在一個非常造作和自欺欺人的水平上，讓你自己沒有可能去記錄和理解給人以美感的活動和過程，無法理解其中包含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混沌微妙之處。人們會因為他們無法解釋的熱情而受到感動。人們接觸音樂、科技、情境這些東西，它們會幫助人們保持和發展一種對自我的感覺，這種感覺可以表現和感受出來，也許常常會與他們在話語上的“立場”相抵觸。與（經濟的和符號的）結構性決定因素的一點點滲滴不同，人們會努力以創造性的方式來弄懂個人和私密性的體驗周圍的中介要素，在這樣的特定歷史階段，會有某種東西圍繞著文化、意識和主體性而展開。如今，第三世界正經歷著一個快速壓縮的歷史時期，不僅僅經歷著（經濟上的）工業化，而且意識也在工業化；在那里，主觀變化對這一中介層次的決定作用也許和更大的結構性變遷的作用一樣大。當然，我相信和支持“全球民族志”。它又是如何起步的呢？我們現在不能將“全球化”留給資本家和抽象的理論家。但是我們需要努力去界定我們所說的東西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對經驗主義的批判所導致的結果，是放松對具體的地方性經驗及其處理世界變遷的方式的關注的話，那么我們其實已經走錯路了。我們需要切實維持一種辯證性的開放姿態來面對那些中層制度，它們既受著文化和主觀變遷也受著宏觀變遷的影響。尤其是，它們必須適應努力控制和包容“來自底層”的壓力、阻力和抵抗。在繪制總體圖景方面，新聞記者、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可以做得一樣出色，但是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人類學和民族志的貢獻應該是對體驗給予持續的關注。多點研究及方法論當然對我們理解更宏觀的現象非常重要，但是它們不應該是一種沒有深度、空洞的多重區別，覆蓋在二手的政治經濟學晾衣架上。它們應該展示，隨著權力、地點和利益的不同，同樣的或類似的趨勢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體驗和地方實踐中辯證性地展開的。

理論、民族志和倫理

你覺得誰對你的理論立場影響最大？

目前我已經發展出了一套連貫的理論立場，這既來源于我自己的興趣、經驗上的興趣、政治上的興趣，也來源于我想保護自己的人文主義立場不受其他理論立場的侵害，或者讓它獲得相對于其他理論立場的正當性。我最近的著作《民族志的想象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第一次試圖系統化地表達某種理論立場。《世俗文化》是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種人文主義范式的產物，試圖理解摩托騎士的文化。《民族志的想象力》則試圖理解民族志的特殊之處，一種相對于被語言學范式和后結構主義接管的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的獨特性（這雖說是對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的一種簡化的歸納，但是卻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該書還試圖反思我在《世俗文化》中的幼稚做法，比方說在隨后的討論中得到了啟發，從我自己的角度出發審視進行田野工作的可能性。

對剛剛開始研究生涯的研究生和人們來說，“大理論”構成了一個主要的悖論。你知道，人們會問：“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我現在是一個布迪厄主義者，還是一個符號互動論主義者？”“一個現象學家？”“一個記號學家？”這些框框我都搞不清楚。我自己的觀點是，民族志學者應該有一種健康的獨立性。我事實上并不是反對任何理論。我已經從“中心”了解了所有的理論革命，而我現在則從布迪厄范圍廣泛的著作中獲益良多。不過，如果我之前不曾從人文主義的創造性或者我自己的田野經歷中獲得我自己的根基——不管是多么有限——那么現在我很難不陷入理論中不能自拔。很有趣的是，我想布迪厄也會對他在阿爾及利亞早期的田野工作發表非常類似的感悟。問題是，如果你在田野工作之前僅僅是布迪厄的一個信徒，那么去做創造性的田野工作甚至會更難；你會用到一套布迪厄的體系，尋找例證和范例。在這一點上，我們再次回到了霍加特所說的“沉浸到無為的因素中”。

所以，我反對加入什么學派。研究生往往會覺得他們需要屬于某個學派，然而這樣他們就很難不卷進去，找到一個理論上的，有時則是現實中的“守護神”。在我看來，這有點危險。民族志學者應該專注于自己的議題以及政治選項。在原則上應該是折中的，而不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籃子里。物以類聚，理論家以群分，他們說的東西往往差不多。他們陶醉于自己的重要性，讓自己的“獨特的誘人命題”變得更完善，他們非常非常善于進一步制造相關的概念，用一小片一小片的理論來反對自己的論敵。你最終會感到更加心煩意亂，想搞清理論家說的是什么，而不是文化的意義是什么。只有當理論能闡釋事實、讓事物變得更加清晰、幫助你更完整地展示現象本身的時候，你才應該使用理論。太多的民族志受到了理論膜拜的束縛，而不是得到了釋放。如果沒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可用，不要羞于提出或者采用你自己的、與世界相關的概念——世界顯然走在我們的前面，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無法用之前的范疇來歸類的形式、二元對立、美感和文化形式。對理論和理論家的過分依賴是一個大問題。

你如何指導自己的博士生面對理論，而不被理論壓倒？

我會問他們，為什么對這個課題感興趣，然后用霍加特給我的建議來提醒他們。我會告訴他們，對于那些引起他們興趣的議題，我希望得到一些解釋。我會鼓勵他們進行廣泛的閱讀和勇于嘗試。這也是“知識上的破壞者”誕生的地方。試著使用不同的理論，不過要以一種簡單的形式；不要向布迪厄、馬克思、阿爾都塞、巴巴或者斯皮瓦克低頭屈服。不要做一個“書呆子”！努力去搞懂他們所說的東西在實踐中的實質是什么，搞清楚哪些形式有用，把你感興趣的概念挑出來，看是不是管用。如果它很有啟發性、很有趣，很好，那接著對這個概念進行改造，少做一些破壞。如果不適用，那就試一下其他概念。

你在創作那些已經完成的知識作品的時候是否感到孤單？對你來說，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你的折中主義是否很困難？

好問題。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說我不是。我會說，我是一個人，住在伍爾弗漢普頓，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這個工作不是我的中心。我在學術機構里掙一些錢。我有某種并非由學術機構來界定的存在或者身份的中心感——與我所知道的那個不同，我當然肯定不愿意給它貼金。如果我是一個更多地由學術機構來界定的人，那么有可能不僅感到孤單，而且不可能從事自己的工作。但這是另一種孤單，很詭異地帶來了它自己的團結感，使得我與學術偏執癥絕緣，讓我不再較真地對待那些無休止的爭論。我不太清楚，難道所有的民族志學者不都在一定程度上面對一個問題嗎？入世或者出世。確信田野工作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懷疑人類契約的真誠性。不管他們是否加入某個理論流派，他們都知道民族志際遇中剝削關系所蘊含的巨大矛盾。作為一個民族志學者，你是一個“窺視狂”，你努力四處打探以確保沒有遺漏信息。你還在某種程度上對你的交談對象遮遮掩掩，做出你的解釋。你正在做一種不平等的交換，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因為它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非常不平等。你從這種貌似信任和互惠的關系中得到了一些東西，然后單方面地在學術機構里把它“市場化”成一種公共的、可交換的資源：從本地的使用價值中剝離出特定類型的交換價值。你把它拿走，然后在學術機構里換成錢，就像《學做工》成了一本書一樣，在以后的20年里賣了10萬本。上述的所有“罪過”，我都犯了。雖然現在我更多從事理論而非實踐工作，但是我仍然愿意鞏固這種互動，因為那是試圖理解創造性、感性、特殊性的唯一途徑，即便這一做法以其次級動機損傷了這一目的。

這些多重的常態的社會氛圍的壓力——只有田野工作者能感受得到——有時候讓我覺得，我們的方法是一艘象征性的坦克或潛水艇。田野角色有點像是坦克或潛水艇，這些都是接近陌生人或危險地域的有用工具。你永遠不會知道它們能快速成為一個死亡陷阱，直到你自己試一試。你是研究工具。這才是關鍵。但是，這么做的話，你也讓自己成了一個可以被毀壞的圍欄。

你不常提起另一面，也就是民族志在倫理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不正是民族志的想象力的另一個角度嗎？

也許那就是想象力所要還清的債。不過我在這里特別指出，我已經感到自己與民族志學者們是同一條戰線上的人，不管他們的傾向是什么，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在一個秘密會社里，入會的儀式和會員費就包含了處理那些不能明說的愧疚。也許這就是惡魔墨菲斯特。[［11］](#_11_149)會費越高，成就越大。我能夠感受到這種折中，以及它帶來的那種張力，但是在文本中這卻是無法看見的；我也能感受到一部分對體驗進行描述的方式的重要性；我還能感受到真正作為被牽涉其中的目擊者的體驗；以及一部分無法卸下的罪過，它轉化成一種無休止地折騰人的政治。

我并不在乎他們是被稱為人類學家、馬克思主義者、現象學家還是語言學家。不管是誰，只要他試圖去做下面這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就立刻對他產生認同感；這件事情就是，出于完全只屬于我們這個小俱樂部并極有可能受到社會能動者懷疑的理由，而參與到某種社會情境中，而這一理由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邊緣地位是其他一些事情的中心。然而看到你四處打探之時人們如此開放和坦誠，我還是感到吃驚。你并不是有意識地像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那樣想做什么骯臟的交易，但是正如我之前說過的那樣，你已經有了這些感覺，就是要“弄一些數據”。如果說我已經建立了一個學術之家的話，那也是和那些意識到這種道德兩難的人一同建立的。你幾乎可以說，與那相比，理論流派是非常不重要的。而且，我厭惡某些純粹的理論家。我想逼迫他們走出來，面對那些道德兩難。揪住他們的后衣領對他們說：“這就是你所說的東西。”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那些學術上的事情，我不會說：“給我展示一些經驗數據。”我要說的是：“你是否真的努力從你所談論的人那里獲取過與你所說的理論有關的數據？”對那些與你不同的人尤其要這么做——那些人安安穩穩地坐在研討會小組里；或者對那些你想提出一些批評意見或者說一些讓他們感到不舒服的話的人，也應該這么做。一方面，在沒有與我們討論的對象交談，或者沒有授予我們討論的對象平等的互動式人性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可能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如何能夠在不對他們進行某種程度的剝削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你們知道，在現存的社會關系下，坦誠迫使我們變得不坦誠。這導致了關于承諾、回報和政治的討論：為什么我們要將自己置于道德困境中才能起步。在這一設定框架和辯解的過程背后，有一個妥協的但并非錯誤的獨特能量，使得我們與社會科學的“外套”分離開來。而正是這種關于道德困境之能量的共識，使得我與這個陌生的群體產生了共鳴。

參考文獻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Why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1978 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Youth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Future Role and Organis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2.4. Institute of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Willis, Paul, Andy Bekenn, Tony Ellis, and Denise Whitt

1988 The Youth Review: Social Conditions of Young People in Wolverhampton. Aldershot: Avebury.

Willis, Paul, Simon Jones, Joyce Canaan, and Geoff Hurd

1990 Common Culture. Buckingham: OUP.

注釋

[［1］](#_1_196)本文是戴維·米爾斯和羅伯特·吉布對威利斯的一個采訪，對理解《學做工》的寫作背景乃至威利斯本人的思想很有幫助。原文發表于《文化人類學》雜志2001年第16卷第3期。——譯注

[［2］](#_2_187)這是一種可移動的建筑，用來做臨時性的辦公室或房間。

[［3］](#_3_180)在英國，研究生指的是獲得本科學位后繼續從事學習的學生，比如文科碩士、理科碩士和博士。

[［4］](#_4_178)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創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譯注

[［5］](#_5_170)O-level考試的全稱是普通水平教育綜合考試（General C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是每年在英國和世界大約一百個國家和地區為中等學校學生主辦的畢業會考。——譯注

[［6］](#_6_164)英國義務教育到中學五年級，即十六歲時結束，然后是中學高等教育兩年，然后才能讀大學，這相當于我國的高中教育。那些讀中學高等教育一年級的預科學生，又被稱做六年級學生。——譯注

[［7］](#_7_162)在英國，學士學位的分類有四個主要的等級：一等學位，對應于學位水平平均70％或75％或以上，各校有所不同；二等學位，寫做“2：1”,對應的是60％～69％或65％～74％；下二等學位，寫做“2：2”，對應的是50％～59％或55％～64％；最后的是三等學位，對應的是40％～49％或50％～54％。剩下的分類是“不及格”。

[［8］](#_8_162)在布萊爾執政早期，其治下的政府聲稱自己將會倚重“焦點小組”來收集民意。所謂焦點小組，指的是一種由“普通群眾”組成的受到監控的議政小組。但是廣大的“下層階級”并不受焦點小組的歡迎：文盲、長期失業者、社會邊緣人都被排斥在這種小組之外。有學者認為，這反映了布萊爾主義者并未將這些人看做是“人民”的一部分。——譯注

[［9］](#_9_154)觀察紀錄片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技術基礎在于便攜型攝像機和磁帶攝像機的出現。這種紀錄片放棄解說，放棄扮演，紀錄片導演成了“墻壁上的蒼蠅”，觀眾和攝像機只是被動觀察者。經過剪輯，它也會有類似肥皂劇的情節，因此也被叫做肥皂劇式的紀錄片。——譯注

[［10］](#_10_152)英國政府于1999年設立了九個地區發展署，目的是為當地受到經濟挑戰的商業與社區尋找、建立相應的解決方法。——譯注

[［11］](#_11_148)墨菲斯特是《浮士德》里惡魔的名字，浮士德以自己的靈魂與其立賭約。——譯注

# 索　引

（條目后的頁碼為原書頁碼，見本書邊碼）

Alienation, 異化

Althusser, L., 阿爾都塞，L.

Anderson, P., 安德森，P.

Ashton, D.N., 艾什頓，D.N.

Auld, R. , 奧爾德，R.

Autonomous work groups, 自治性工作小組

Balibar, E., 巴里巴，E.

Barthes, R., 巴特，R.

Bennett, 貝內特

Bourdieu, P., 布迪厄，P.

Braverman, H., 布雷弗曼，H.

Brighton Labour Process Group, 布萊頓勞動過程研究組

Carter, M.P., 卡特，M.P.

Cash, 現金

Cohen, S., 科恩，S.

Colletti, L., 科萊蒂，L.

Commonality of labour, 勞動力的普遍性

Concrete labour, 具體勞動

Conformists, 循規生／者

Counter-School Culture, 反學校文化: comparative cases, 比較案例，drinking, 飲酒，eveningtime, 夜間活動，excitement, 刺激，fighting, 斗毆，fire extinguisher incident,消防栓事件，“hardknocks”，“重磅人物”，i n for m a l knowledge, 非正式知識，informal mobility, 非正式流動性，informing, 告密，mother, 媽媽，opposition to authority，對抗權威，parental views，父母的觀點，police, 警察，political attitudes, 政治態度，qualifications, 資格，racism, 種族歧視，rejection of the conformist, 排斥循規生，relation to working class culture, 與工人階級文化的關聯，role of the commercial dance, 商業舞廳的角色，romanticism, 浪漫主義，rules, 規矩，self direction,自我導向，sexism, 性別歧視，sexual relations, 性關系，smoking, 吸煙，social landscape of the school,學校的社會風景，style, 風格，talking, 談話，teaching styles in relation to, 教學風格，teachers, 教師，“the laff”,“樂子”，“the pisstake”,“嘲弄”，“them and us”,“他們和我們”，theft, 偷竊，time, 時間，truancy, 逃學

Crowther, G., 克勞瑟，G.

Cultural the, 文化，social reproduction in institutions, 制度中的社會再生產，creativity, 創造力，expressive antagonism, 表達性對抗，ideology relation to, 意識形態關系，individual and group logic, 個體邏輯和群體邏輯，informal group, 非正式群體，interpretative analysis, 闡釋性分析，limitations, 局限，material outcomes, 物質結果，misrecognition, 誤識，non-reductive notions of,非還原論觀點，partial penetration, 部分洞察，penetrations, 洞察，political expression in relation to, 政治表達，politicisation of, 政治化，practical consciousness, 實踐意識，production, 生產，radical genesis of, 激進的起源，rationality of, 合理性，relative autonomy of, 相對自主性，social structure, 社會結構，structural location, 結構定位，structuralist theories of, 結構主義理論，subjectivity, 主體性，symbolic systems and articulations, 符號系統和思想體系，uncertainty, 不確定性，unintended consequences,非預期結果，unity of, 統一，warning against functionalism,警惕功能主義，weakness of, 弱點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

Cultural reproduction, 文化再生產

Dartington School, 達亭頓學校

Dhonely, F., 董利，F.

Educational gradient, 教育梯度

Ellis, J., 埃利斯，J.

Ellis, T., 埃利斯，T.

Engels, F., 恩格斯，F.

Field, D., 菲爾德，D.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 生產的力量

Ford, H., 福特，H.

Freud, S., 弗洛伊德，S.

Furt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Review and Development Unit, 繼續教育課程評論與發展組

General abstract labour, 一般抽象勞動，the standard minute, 標準分鐘，the“therblig”基本動作單位

Gilbreth, F., 吉爾布雷斯，F.

Ginzberg, E., 金斯伯格，E.

“Gold bricking”, 逃避工作

Goldthorpe, J.H., 戈德索普，J.H.

Gramsci, A., 葛蘭西，A.

“Great Debate”, the, 大辯論

Gretton, J., 格雷頓，J.

Hadow Report, 哈多報告

Halsley, A.H., 哈斯利，A.H.

Hammertown, 漢默鎮

Hargreaves, D.H., 哈格里夫斯，D.H.

Hawthornism, 霍桑主義

Hayes, J., 海斯，J.

Herzberg, F., 赫茨伯格，F.

Historicism, 歷史主義

Hoggart, R., 霍加特，R.

Hopson, B., 霍普森，B.

Humanism, 人本主義

Human Relations, mark Ⅰ, 人際關系的第一階段

Ideology, 意識形態，confirmation, 證實，common sense, 常識，dislocation, 擾亂，dominant, 主導的，interfac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意識形態與文化的相互影響，internal interlocutor the, 內部對話者，multidetermination, 多元決定論，naturalism, 自然主義，official, 官方的，structuralist notions of, 結構主義觀點，“them and us”, “他們和我們”

Indiscipline in the classroom, 教室秩序混亂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Informal and the formal, relations of,非正式和正式關系

Instrumentalism, 工具主義

Intelligence, 智力

Jackson, M., 杰克遜

Job re-structuring, 工作重組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滿意度

Johnson, R., 約翰遜，R.

Kahn, R.L., 卡恩，R.L.

Katz, D., 卡茨，D.

Kay, G., 凱伊，G.

Keddie, N., 凱蒂，N.

King, R., 金，R.

Labour power: commodity, as a,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comparative cases, 比較案例，cultural self-preparation of,文化的自我準備，masculine expression of, 男性表達，oppositional expression of , 對抗表達，racial overtones of, 種族含義，resistance to mental work, 排斥腦力工作，site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再生產勞動力的場所，subjective sense of, 主觀意識，teleology of, 目的論

Labour process, the, 勞動過程

Levi-Strauss, C., 列維—斯特勞斯，C.

Lewin, K. 勒溫，K.

Lickert, R. 李克特，R.

Limitations，局限，combination of divisions, 分工的結合，division between mental and manual labour, 腦／體（勞動）分工，division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男女性別分工，division between races, 種族分工

Lockwood, D., 洛克伍德，D.

Lukacs, G., 盧卡奇，G.

Macrobbie, A., 麥克羅比，A.

Maizels, J., 梅澤爾斯，J.

Manpower requirements, 勞動力需求

Manual work, 體力工作

Marx, K., 馬克思，K.

Mathews, G.C., 馬修斯，G.C.

Mayo, E., 梅奧，E.

McColgan, D., 麥可根，D.

McWhirter, J., 麥克沃特，J.

Media, the, 媒體

Mental manual labour division, 腦／體勞動分工，articulation with patriarchal divisions, 父權制分工的表達

Merrill, C.E., 梅里爾，C.E.

Methodology, 方法

Mitchell, J., 米歇爾，J.

Myers, C., 邁爾斯，C.

National Union of School Students,全國在校生聯盟

“New” classes, 新階級

“New” human relations, 新型人際關系

Newsom Report, 紐瑟姆報告

Norwood Report, 諾伍德報告

O & M techniques, 運營和維護技術

Occupational gradient, 職業梯度

Palloix, C., 帕洛伊，C.

Parkin, F., 帕金，F.

Paseron, J., 帕瑟隆，J.

Patriarchy, 父權制，articulation with mental/manual division, 腦體分工的有機整體，consequences for women, 對女性的影響，consequences for middle class males, 對中產階級男性的影響

Paul, W.I., 保羅，W.I.

Pedagogic practice, 教學實踐，suggestions for,建議

Penetrations, 洞察，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qualifications, 關于教育和文憑，concerning individual and group logics, 關于個體和群體邏輯，concerning general abstract labour, 關于一般抽象勞動，concerning labour power as a commodity, 關于作為一種商品的勞動力

Plowden Report, 普洛登報告

Political organization, 政治組織

Poulantzas, N., 普蘭查斯，N.

“Privatised worker”, the, 私有化工人

Progessivism, 進步主義

Qualifications, 文憑

Quality of modern work, 現代工作的特性

“Relevance”, 關聯

Robbins Report, 羅賓斯報告

Roberts, K., 羅伯茨，K.

Robertson, 羅伯森

Rodger, A., 羅杰，A.

Rogers, C., 羅杰斯，C.

RSLA, “提高離校年齡”計劃

School, 學校，material basis of, 物質基礎，open night, 開放日，見教學范式; timetable, 課程表

Sexism, 性別歧視

Shop floor culture, 車間文化，bartering, 物物交易，chauvinism,沙文主義，continuities, 連續性，“fiddling”，哄騙，“foreigners”，外人，“gold bricking” and “systemmatic soldiering”，逃避工作和系統性怠工，informal control, 非正式控制，informal group, the, 非正式群體，informing, 告密，“pisstake”, the, 嘲弄，practical joke, the, 惡作劇，sexism, 性別歧視，“them and us”, “他們和我們”，theory and practice, 理論與實踐，wage packet, 工資袋

Social classes, 社會階級，class identity, 階級認同

Social democracy, 社會民主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社會關系的生產

Social reproduction, 社會再生產

Socialisation, theories of, 社會化理論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Spens Report, 斯彭斯報告

Spontaneism, 自發論

Spriegel, W., 斯普里格爾，W.

“Standard minute”, the, 標準分鐘

State and State Institutions, the, 國家和國家制度，the cultural level, 文化層面，the official level, 官方層面，the pragmatic level, 實用主義層面

Stevens, B., 史蒂文斯，B.

Super, D., 休珀，D.

Swanson, G.E., 斯旺森，G.E.

“Systemmatic soldiering”, 系統性怠工

Tawney, R.H., 托尼，R.H.

Taylor, F., 泰勒，F.

Teachers，教師：types of approaches, 方法的類型; classroom breakdown, 課堂紀律受破壞，low expectations, 期望低，ridicule, 嘲諷，“right attitudes”, 正確態度，sarcasm, 諷刺

Teaching paradigm, 教學范式，classroom breakdown, 課堂紀律受破壞，“class insult”, the, 階級侮辱，comparative cases, 比較案例，defining framework of, 定義性的框架，differentiation of, 分化，discipline,紀律，equivalents and the exchange in, 等價物與交換，face to face control, 面對面控制，integration of, 同化，material basis of, 物質基礎，performance, the, 表演，post-differentiated relationships, 分化后關系，re-integration of, 重新整合，relative autonomy of, 相對自主，ridicule, 嘲諷，“right attitudes”, 正確態度，“truth”, the, 真相，variants of, 變體，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工人階級文化

Tel Quel group, “原樣”團體

Theory and practice, unity of,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Therblig”, the, 基本動作單位

Thompson, E.P., 湯普森，E.P.

Time, 時間：changed notions of, 變動的概念，cultural notions of, 文化概念，“standard minute”, the, 標準分鐘，“therblig”, the, 基本動作單位

Tolson, A., 托爾森，A.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從學校到工作的轉型: apprenticeships,學徒期，arriving in work,上崗，attitudes of employers,雇主的態度，cross-over categories, 交叉類，cultural apprenticeship, 文化學徒，informal cultural continuities,非正式文化延續性，irreversibility, 不可逆轉，officially defined continuities, 官方定義的連續性，particular job choice, 特定的工作選擇，見工作指導；suggestions for, 建議，unofficial criterion, 非官方標準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意外結果

Vocational guidance, 職業指導，careers films, 職業指導影片，careers officers, 就業指導官員，careers teaching, 就業指導，“client centred”, 以顧客為中心，connoted information,暗示性信息，counselling,輔導，denoted information, 直接性信息，individualism in, 個人主義，influence on culture, 對文化的影響，“job profile”, 工作概況，“lifestyle”, 生活方式，manpower requirements, 人力要求，“self-concept”, 自我概念，social psychology and, 社會心理學，suggestions for, 建議，world of work, the, 工作世界

Wage packet, the, 工資袋

Wall, T., 沃爾，T.

Warr, P., 沃爾，P.

Weir, M., 威爾，M.

West Indians, 西印度群島裔

William Tyndale Junior School, 威廉·廷代爾初級中學

Wilson, N.A.B., 威爾森，N.A.B.

Women, 女性: labour power of，勞動力，division of labour, patriarchy and, 勞動分工與父權制

Working class culture, 工人階級文化

Youth Unemployment, 青年失業

# 譯后記

翻閱《學做工》，實屬情理之中。兩位譯者都曾從事社會再生產相關研究，而該書作為研究再生產的經典之作，自然不容錯過。自1977年出版以來，該書已經被翻譯為多個版本，銷量達10萬冊以上，成為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在20世紀讀者最多的經典著作之一。

翻譯《學做工》，卻純屬機緣巧合。如果沒有2008年5月耶魯大學社會學系組織的民族志國際研討會，如果沒有當時正在耶魯訪學的呂鵬兄與出席研討會的作者保羅·威利斯的積極溝通，兩位譯者就不可能承擔這項艱巨但有意義的翻譯任務，而《學做工》這本經典著作也就可能失去用簡體中文在大陸出版的機會。

正如“茂寧賽德”版前言所說，《學做工》不僅是一部關于英國20世紀70年代青少年狀況、揭示社會再生產機制方面的民族志，而且是一部對理解當代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勞工運動和青少年問題都有重要引導作用的理論著作。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的意義并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減弱，反而變得更為重大。從全球角度來說，大規模的青少年失業問題已經愈演愈烈，甚至在法國和英國等后工業社會引發了大規模的騷亂；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中國也出現了一支日漸龐大的、由青少年組成的“新失業群體”，包括被喻為“蟻族”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許多研究都試圖從結構和制度的角度來理解和分析這些現象；而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及后續著作中另辟蹊徑，更加關注“主體性和能動性”，也就是更加關注年輕人在文化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自我體驗和自我闡釋。由此，《學做工》更有助于讀者從一個比較歷史的角度和“以人為本”的視角出發，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青少年教育和失業問題。

在此，兩位譯者要特別感謝“人文與社會”譯叢的編委成員以及呂鵬兄為促成簡體中文版出版而付出的諸多努力。感謝一直支持我們工作的同仁和親友。

該譯作是分工合作的產物，除中文版前言為兩位譯者合作完成外，其他各部分具體的分工如下：

凌旻華：“茂寧賽德”版前言，目錄，前言，致謝，第一、二、三、四章；秘舒：第五、六、七、八章，補充訪談，“茂寧賽德”版后記，中心與邊緣：保羅·威利斯訪談。

原著語言艱澀，作為本書譯者，雖一路小心推敲、謹慎求證，仔細互校全文，以求保證譯文質量，但翻譯中難免仍有不妥之處，敬請諒解。兩位譯者也懇請各方專業人士、廣大熱心讀者不吝批評指正，以便在將來有機會對這個譯本做進一步修訂完善。

秘舒　凌旻華

2010年10月1日